

青年自学丛书

# 儒法斗争史话

曹思峰 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青年自学丛书

儒法斗争史话

曹思峰 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40,000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0

统一书号: 21.1·74 定价: 0.66元

#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 《青年自学丛书》编辑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

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广大知识青年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断涌现，一代革命青年正在茁壮成长。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特编辑、出版这套《青年自学丛书》。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实用农业技术知识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起积极作用，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更好地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们对大力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改进。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1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	
孔丘的复辟梦·····	7
李悝和《法经》·····	16
西门豹治邺·····	24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	29
秦行商君法而富强·····	36
孔家店二老板孟轲·····	45
孙庞斗智·····	52
范雎逐穰侯·····	59
“制天命而用之”·····	66
——荀况的法家思想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	74
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	81
千古一帝·····	90
焚书坑儒·····	98
大泽乡风云·····	106
——秦末农民反孔斗争	
楚汉相争·····	114

黄老之治·····	123
“削藩策”与“清君侧”·····	129
董仲舒和“独尊儒术”·····	136
桑弘羊舌战群儒·····	144
——盐铁会议	
王莽的“托古改制”·····	153
白虎观会议和《白虎通义》·····	160
“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166
——王充	
向谿纬神学挑战的科学家·····	174
——张衡和祖冲之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183
——东汉末年农民反孔斗争	
魏武挥鞭·····	190
隆中对策·····	199
从吕蒙读书谈起·····	206
《神灭论》和《齐民要术》·····	213
唐太宗和他的法家思想·····	222
女皇帝武则天·····	231
史家申韩刘知几·····	239
韩柳之争·····	247
《封建论》和李愬的淮西之捷·····	257
年青的法家诗人李贺·····	266
“天街踏尽公卿骨”·····	274
——唐末农民反孔斗争	

“祖宗之法不足守”·····	281
——北宋王安石变法	
沈括和《梦溪笔谈》·····	291
儒家阴谋诡计的代表作·····	299
——《辨奸论》	
卖国大儒秦桧·····	305
反动道学家朱熹·····	312
爱国思想家陈亮·····	321
反动儒学普及本·····	328
——《三字经》	
“凡事一新，毋循旧弊”·····	337
——元世祖忽必烈	
“古今异势，便俗为宜”·····	346
——张居正变法	
尊法反儒的斗士李贽·····	353
“开了城门迎闯王”·····	362
——明末农民反孔斗争	
“推故致新”·····	369
——明末清初的法家王夫之	
“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378
——清圣祖康熙	
“九州生气恃风雷”·····	388
——清末法家龚自珍	
编后记·····	396

#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

在西周末期的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〇年)，古老中国的西北地区曾发生过一次巨大的地震。《诗经》上有几句气势磅礴的诗句，就是描绘这次大地震的：

烨烨(yè 叶)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卒(zú 族)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威力多大呀！这次地震的巨大规模，引起了西周奴隶主阶级极大的恐慌，当时有个大夫就忧心忡忡地说：“周将亡矣<sup>①</sup>”。他将自然现象同王朝的兴衰联系起来，当然是不科学的。周朝并没有因此而亡。然而，过了十年，我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在奴隶们的反抗斗争的推动下，一次更为剧烈的社会大“地震”爆发了。这次“地震”遍及全国，持续几百年，叱咤风云，惊天动地，一切“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都被震乱，奴隶制的西周王朝在这次“地震”中象纸房子般轰然倒塌了！这就是从公元前七七〇年开始的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



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大大小小的奴隶主遭到了灭顶之灾。昔日高踞于宝塔尖上不可一世的周天子，到了春秋时期，突然发现自己的指挥棒不灵了。过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俯首听命围着转；现在却不然，诸侯争霸，亵渎天子，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竟敢对周天子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了。周天子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懵头懵脑地从宝塔尖上跌下来了。刚开始，周天子还想维护尊严，派兵讨伐对他不太礼貌的郑国诸侯，谁知出师不利，不但损兵折将，连他自己也吃了一箭！从此周王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晋文公打了胜仗，在践土会盟诸侯，竟吆五喝六地将周天子召来作陪。更有甚者，楚庄王不仅陈兵周天子领地的边境，还派人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大有取而代之之意。然而，诸侯的好景也不长，它们管辖下的卿大夫起来夺权，诸侯国里也乱套了。在鲁国，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大夫联合起来，甚至把国君鲁昭公赶跑，搞了个“陪臣执国命”。整个春秋时期就是这样天翻地覆，奴隶主头子被杀的杀，亡国的亡国，狼奔豕突，一片混乱。当时晋国有个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叫史墨的，曾将这种“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社会大变革局面形象地喻之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②生动地描绘出这一变动时代的基本特征。

为什么在春秋时期会突然翻腾起如此的轩然大波呢？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这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全国土地全由以周天子为头子的奴隶主占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被称为“公田”。周天子把“公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奴隶主用皮鞭和棍棒强迫奴隶耕种。虽然奴隶制本身也经历了它的上升阶段，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井田制这种既残酷又落后的生产方式，越来越成为迅速提高的生产力的桎梏。于是，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新兴力量“私家”抬头了，他们在“公田”外开垦荒地，招徕逃亡的奴隶用租佃方式耕种，建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逐步地，“私田”超过“公田”，“私家”富于“公室”。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的奴隶主头子为了增加收入，实行了“初税亩”，向“私田”征税。这件事说明井田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奴隶主阶级只得被迫承认封建土地私有这个既成事实。此后，各诸侯国纷纷效仿，“私田”合法化，土地也可以买卖了。新兴地主阶级又乘公室势力衰弱，起来夺权。鲁国的季氏、孟氏、叔氏三家新兴地主阶级就两次瓜分了公室；齐国的大夫田成子用新的生产方式争取群众，杀掉齐简公，夺取了齐国政权。生产力冲破了生产关系的束缚，井田制日趋崩溃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动乱正是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表现。基础崩坏，建筑在这基础上的大厦当然成为风雨危楼，怎么会不倒坍呢？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大变动局面的形成，是奴隶社会此起彼伏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直接结果。奴隶们的反抗斗争和奴隶起义，是实现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强大动力。在奴隶社会中，奴隶被看成为会说话的工具，终身被禁锢在井田里，受尽压榨与摧残，吃人的奴隶社会

就是在奴隶的尸骨堆上建筑起来的。有压迫，就有反抗。奴隶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了。为什么奴隶主们“不稼不穡”、“不狩不猎”，而庭院中却堆满谷物、猎物？奴隶们发出愤怒的吼声，砸碎镣铐，举行了一次次起义，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奴隶们的造反行动贯穿于奴隶社会的始终，搅乱了奴隶主的酣梦，有力地冲击了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尤其到了奴隶社会后期，奴隶起义更是如火如荼，连绵不断。请看：在陈国，筑城的奴隶起来暴动，杀死了两个奴隶主贵族；在卫国，手工业奴隶起义，包围了卫庄公的王宫，惊惶失措的卫庄公逾墙而逃，跌断了大腿，几年以后，奴隶再次起义，又赶跑了卫侯辄；在郑国，大批起义的奴隶聚集在萑苻之泽，打击郑国的反动统治者；在奴隶主统治的心脏地区也发生了起义，周景王二十五年（前五二〇年）发生的一次有手工业奴隶参加的起义，把周天子都赶走了。在连绵不断的起义中，规模最大的是春秋末期杰出的奴隶领袖柳下跖领导的起义。他率领着一支九千人的起义大军，“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打得奴隶主贵族“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心惊胆战，毛骨悚然。愈演愈烈的奴隶起义证明：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奴隶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奴隶制度，直接促使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而且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开辟了道路。奴隶是这场社会大变革的主力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

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电闪雷鸣，天翻地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潮流咆哮向前。烜赫一

时的西周盛世中所包含着矛盾，全都因此爆发而表面化。奴隶主阶级在政治上已败落，经济上被挖空，意识形态上亦腐朽了。到处是岩浆隆隆欲出的火山，奴隶主阶级再也找不到一块安定的绿洲了。这个社会大动荡充分表明奴隶制度“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同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大飞跃，大变革。人类社会就在这大变革中高歌猛进！

这场社会大变革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搏斗，必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并把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卷入这一斗争旋涡，迫使他们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反映在思想政治领域，就形成了以儒法两家为主角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实现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变革，就必须先造成舆论，法家就是他们的思想政治代表。由于这批人主张“以法治国”，主张以地主阶级的“法治”来取代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所以被称为“法家”。而不甘心灭亡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千方百计用反动意识形态向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舆论和夺权斗争进行疯狂的反扑，儒家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由于这个派别的祖师爷孔丘在年青时干过“儒”的营生，按照“周礼”，给奴隶主贵族办丧事，当吹鼓手，这个派别就被称为“儒家”。就这样，在春秋末期，以儒法为代表的两条路线

斗争的序幕拉开了。

---

注：① 《国语·伯阳父论地震》。

②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 孔丘的复辟梦

西风，古道。一匹瘦马拖着破车，在颠簸不平的山路上跑着。孔丘蜷缩在车上，耷拉着脑袋，神情沮丧。刚才被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撵出来的可怕情景，还使他心惊肉跳，余悸未消。

原来这天孔丘带了门徒颜回和子贡鬼鬼祟祟地来到泰山南坡柳下跖的营寨，死皮赖脸地求见跖。他先假惺惺地对柳下跖来一番肉麻吹捧，接着便端出他那一套仁义道德的反动说教，并以高官厚爵为诱饵，诱骗跖“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放下武器，与奴隶主贵族言归于好。但是，奴隶和奴隶主从来就是势不两立的。柳下跖对“以强陵弱，以众暴寡”的奴隶制是深恶痛绝的，早就恨透了孔丘这条奴隶主的丧家狗。他怒发冲冠、气宇轩昂地批驳了孔丘的谬论，揭露了他“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两面三刀，“诈巧虚伪”；鼓吹孝悌，“欲求富贵”；“妄称文武”，是古非今的种种罪状，厉声痛骂他是“罪大极重”的“盗丘”，是“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的“巧伪人”！最后，跖斩钉截铁地说：孔丘，你说的那一套，都是我最痛恶的，赶快给我滚！不许再啰嗦了！孔丘在柳下跖义正辞严的痛骂下，吓得面如土色，六神无主，连滚带爬地逃出了营寨。他爬

儒法斗争史话插图



图一 二

上马车,还浑身颤抖,“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半天喘不过气来,狼狈不堪,吃了个十足的大败仗。

老态龙钟的孔老二为什么竟敢冒险去游说柳下跖呢?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推行“克己复礼”反动政治纲领的必然表现,是他做着复辟奴隶制迷梦的结果。

孔丘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奴隶起义、平民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使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奴隶制统治支离破碎,只剩下断垣残壁。孔丘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败着。他的祖父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因宋国内乱,逃亡到鲁国落户,从此成了个颇为潦倒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没落和家庭的破败,奴隶主阶级反动思想的熏陶,使孔丘在年轻时就立下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大志”。他顽固地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如痴如狂地说:“周代的制度是多么昌盛,多么丰富多采呀!我崇拜它!”孔丘维护周代的奴隶制,要把奴隶重新打入十八层地狱,要恢复奴隶主贵族“钟鸣鼎食”的“极乐天堂”。为了挽回“礼崩乐坏”的世道,孔丘抛出了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复礼,就是复辟,就是要恢复西周时期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一整套奴隶制上层建筑。“克己复礼”是孔丘一生梦寐以求的目标。

为了实现“克己复礼”,在政治上,孔丘提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要恢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再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旧贵族重新上台。在孔老二的心目中,西周奴隶制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



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诬蔑新兴封建制代替没落奴隶制的大好形势是“天下无道”，乱七八糟。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季氏“僭越”周礼，去祭祀泰山，还用只有周天子才能用的仪式“八佾舞于庭”，孔丘知道后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大嚷：“是可忍，孰不可忍？”晋国的新兴地主阶级铸了一只刑鼎，把法律公布于众，使奴隶主贵族再也不能象过去那般恣意妄为。这下如同掘了孔丘的祖坟，他顾不得什么“文质彬彬”了，气势汹汹地责问：你们这么干打破了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何以尊贵”？“何以为法”？“何以为国”？他痛心疾首地哀叹奴隶制的晋国要亡国了<sup>①</sup>。孔丘仇视一切新生事物，一只改变了形态的酒杯，一首反映社会大变动时代的歌曲都会使他大为恼火。更有甚者，在他看来，连人的脾气也是古代的好，他认为现在的“小人”脾气都变坏了，所以敢于“犯上作乱”。<sup>②</sup>孔丘就象疯狗一样，对一切革命行动和新生事物都恨之入骨，狺狺狂吠。

在思想上，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孔丘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意识形态之大成，诸如“仁义”、“忠恕”、“孝悌”、“正名”、“天命论”、“天才论”、“中庸之道”等等，形成了反动的儒家思想。在这些唯心论、形而上学和宗教神学乌七八糟的大杂烩中，“仁”是孔丘思想的核心。孔丘一直标榜“仁”就是“爱人”。果真是分阶级地爱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孔丘在他所代表的奴隶主阶级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宣传这种虚伪的唯心主义人性论，目的是蒙蔽人心，要大家爱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一小撮。至于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那他是从来不爱。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二年），郑国的奴隶主

贵族残酷地镇压了一次奴隶起义。孔丘听到这个消息，露出了狰狞面目，丧心病狂地叫道：杀得好！对这些“盗”就是要“宽猛并济”！青面獠牙的刽子手加上“彬彬有礼”的“仁爱”画皮，这就是孔丘“仁”的实质！可见，孔丘宣扬的所谓“仁政”，就是为了麻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志，以实现其“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反动纲领。

为了实现“克己复礼”，在经济上，孔丘拚命维护井田制，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改革。春秋末期发生的社会大变动，首先是由于奴隶制的基础井田制被破坏了。要“复礼”，就要复井田。孔丘为残酷压榨奴隶的井田制涂脂抹粉，无耻地吹嘘奴隶主给奴隶的好处多，拿奴隶的少，“施取其厚”，“敛从其薄”；同时恶毒攻击新的封建租税制“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sup>③</sup>。鲁国自从公元前五九四年实行了封建税制“初税亩”后，季氏、孟氏、叔氏三家大夫采用了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势力越来越大，两次瓜分了鲁国公室。孔丘恨得咬牙切齿。公元前四八二年，季氏再次进行改革，孔丘对季氏无可奈何，就抓住帮助季氏搞改革的学生冉求大发其火。不仅宣布冉求“非吾徒也”，断绝师生关系，而且气急败坏地策动党羽，对冉求“鸣鼓而攻之”，充分暴露了孔丘的反动立场。

正是在没落奴隶主阶级反动立场的支配下，孔丘顽固地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四出奔走，“知其不可而为之”，演出了一幕幕“累累若丧家之狗”的丑剧。事实证明，他反动的一生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一生，就是复辟梦彻底破产的一生。

公元前五一七年，鲁国国君鲁昭公纠集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讨伐季氏，妄想削弱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不想季氏、孟氏、叔氏三家联合起来，反把他驱逐出境了。孔丘认为这是“斗筲之人”“犯上作乱”，于是根据他那条“乱邦不居”的说教，也匆匆忙忙跟着昭公逃到齐国。在齐国，孔丘又大肆贩卖“君君臣臣”的复辟经，策划围剿新兴地主阶级，结果阴谋败露，在一片喊杀声中，捧着刚淘好还未下锅的湿米，仓皇逃回了鲁国。

这次回到鲁国，孔丘变换手法，利用教育阵地进行复辟活动。他意识到，只要能用反动思想拉住一帮人，就能树起一支政治力量。他搜罗门徒，培植私党，利用讲坛大念复辟经，大唱尊古调，把“诗”“书”“礼”“乐”一整套宣扬奴隶主反动思想的破烂货对学生进行满堂灌。他还将女儿和侄女嫁给爪牙来集结死党，拼凑反革命黑班底，有准备有步骤地实现“复礼”。

正在孔老二志满意得，暗自庆幸自己的惨淡经营有些起色的时候，从旧世界营垒中杀出了一位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他敢于和孔丘唱对台戏，开课讲学，宣传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思想。孔丘主张“隐恶扬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竭力粉饰美化奴隶制，企图用华丽的外套去掩盖病入膏肓的奴隶制。少正卯却大胆地揭露腐朽制度的癣疥疮疤。他“记丑而博”，把自己洞察到的奴隶制末世的黑暗内幕，向人们大胆地揭示着。孔丘不准人们造反，不准“犯上作乱”。少正卯却大声疾呼，号召人们起来掀翻吃人的奴隶主阎罗殿。他把革新之理说得头头是道，感人肺腑，反映了社会大变动的潮流，说出了

人们心里想说而未说出的话。沸沸扬扬的革新思想不胫而走，广泛传播。孔学名高实秕糠。孔丘颠来倒去讲的都是些奴隶主贵族僵死的教条，一股酸味馊气，学生早就听腻了，纷纷逃学，跑去听少正卯演讲。“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好几次只跑剩一个泥塑木雕似的书呆子颜回。一边“聚徒成群”，人声沸腾；一边形影相吊，冷冷清清，少正卯的革新理论对孔丘的复辟事业是个很大的威胁。说不过就压，压不服就杀。孔丘忧心忡忡地说：“小人成群，斯足忧矣！”他深深感到，要维护奴隶制就非除掉少正卯不可。

公元前四九八年，孔丘靠着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不断变换手法的鬼蜮伎俩，爬上了鲁国司寇的位置，随后又窃取了鲁国代理宰相的职务。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蓄谋已久的血腥镇压开始了。他上台不到三个月，就逮捕了少正卯，并准备处决。当时有学生提醒孔老二，少正卯深得人心，名望颇大，何况还是大夫，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不能随意处决。但孔老二利令智昏，哪管这些。他硬给少正卯按上了心地阴险，行动怪僻，言论虚伪，专记丑恶之事，专走邪门歪道等五条罪状，并支起嘶哑的喉咙，再三声言：犯一条者该诛，少正卯五条俱全，必置死地！就这样，不但极端凶残地杀害了少正卯，还暴尸三天，杀一儆百。少正卯的被害，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血淋淋的阶级报复。孔丘再一次用屠刀挑去了他“仁者爱人”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法西斯式的恶霸嘴脸。镇压少正卯之后，孔丘又为奴隶主头子鲁定公出谋划策，用花言巧语和反革命武装的两手，堕毁了季孙和叔孙两家

的城邑。

孔丘虽然窃取了鲁国代理宰相的权位，疯狂一时，但由于他执行的是一条儒家的复辟路线，所以必然是短命的。他的鬼心肠不久就被季孙等三家新兴势力识破，只做了三个月的代理宰相就被赶下了台。孔丘的复辟梦又破产了，好不伤心！他只得带着狐群狗党，重又跑到各诸侯国去推销“克己复礼”的黑货。

孔丘五十四岁出去周游列国，一游就游了十四年。这回他可交够了厄运，吃足了苦头。他驾着一辆殷商时代的破旧马车，戴了顶不禁风寒的周冕，打着“克己复礼”的破旗，一路上直起喉咙“沽(卖)之哉，沽之哉”地叫卖，大言不惭地自吹有谁用他，一年见效，三年保险成功。孔老二跑来跑去找主子兜售复辟经，先后到过卫、蔡、陈、郑、楚等国。但由于他那套反动货色都是发了霉的过时货，问津的人并不多，尽管孔丘费尽心机地到处钻营，可怎么也不能称心如意。比如在卫国，孔丘是很下过一番功夫的，好几次被赶出来，又厚着脸皮跑进去，结果演了个“五进五出”的悲剧，还是站不住脚。事实上，整个中国大地四方都在起火，奴隶主贵族自顾不暇，谁还敢用孔丘？新兴地主阶级和劳动人民则视他为丧家之狗，人人喊打。孔老二所到之处，不是被冷嘲热讽，就是被驱逐出境，甚至被打得夹着尾巴乱逃。有一回，孔丘和他那一伙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被包围了，七天开不了饭，饿得大眼瞪小眼，愁眉对苦脸。子路出去抱了点东西来，煮的时候，颜回饿得发急，偷了嘴。偏偏又给孔丘看见了，于是板起脸训斥，颜回又赶快表白。这些主张

“礼让”的伪君子，竟为了吃，吵起嘴来<sup>④</sup>。孔丘在外流窜十几年，没有一个安定的住所，没有做过一回象样的复辟美梦。周游列国回来，孔丘手下的弟子死的死，散的散，都不愿意再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了。孔丘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却落得个众叛亲离，栽栽子立的下场，等到子路一死，连愿随他“乘桴浮于海”另谋出路的也找不到一个了。

孔丘曾经掐着手指计算过自己的一生：三十岁立下了“克己复礼”的志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妄想着到了七十岁，就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但是当铁的事实把他自我欺骗的复辟梦砸得粉碎的时候，剩下的便只有一丝低沉而可怜的悲叹声：“吾道穷矣！”

历史的车轮滚滚飞转。新兴地主阶级越战越强，凯歌高奏；没落奴隶主阶级气息奄奄，相继倒台。孔丘的复辟梦彻底破产了。公元前四七九年，孔丘呜呜咽咽地哼着哀歌，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久矣不复梦见”的周公去了。

---

注：①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② 《论语·阳货》。

③ 《左传》哀公十一年。

④ 见《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

## 李悝和《法经》

鲁迅曾经说过：“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这话是很发人深省的。

万事开头难。“吃螃蟹”尚且如此，那么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做出的“第一次”就更难能可贵了。历史上，敢于进行“第一次”革新尝试的都是生气勃勃、敢作敢为的先进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程中，处于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就曾经表现过这种首创精神。这里向大家介绍的是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的第一次变法——魏国的李悝变法，以及李悝所撰写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

让我们从头说起。

事情发生在战国初期。公元前四〇三年，由没落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晋国被魏、赵、韩三家大夫鼎足三分，建立了三个新兴的封建制国家。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三家分晋”。在魏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魏文侯掌握了政权，当上了第一代国君。但这时的魏国刚从奴隶制的晋国脱胎出来，晋国的君主原是周天子的同姓，奴隶主贵族在这里盘根错节，影响很深。

魏文侯的弟弟魏成是个“食禄千钟”的奴隶主大贵族。为了维护气息奄奄的没落奴隶制，他不惜老本，把每年俸禄的十分之九用来结交儒家信徒。在他的收罗下，孔老二的高足子夏和他的学生段干木，子贡的学生田子方等一伙都钻到魏国，蛰伏在魏成的奴隶制黑幕底下，窥测方向，并先后被安插到魏文侯的身边。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被儒家势力所占领。子夏自从窜到魏国后，一直摇唇鼓舌，授经传艺，收了三百多个门徒，开设了一个孔家分店，把“克己复礼”的反动衣钵接了过去。他破口大骂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活动是“好滥淫志”，胡诌什么“父子君臣以为纪纲”，“官序贵贱各得其宜”，才是“天下大定”的“治国之道”。同时，魏国还残留着的奴隶主贵族世袭特权和反映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井田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生的魏国处于奴隶主势力的阴霾雾障中，国力衰竭，民不聊生，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这一切，怎能不使魏文侯心急如焚呢？

“为国何如？……为国何如？……”

魏文侯经常紧蹙着眉头，苦思冥想。

魏文侯虽然处于儒家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但他并不信儒。他听到儒家津津乐道的奴隶制“古乐”，就要打瞌睡，而听到那些反映变动时代激扬的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他反对儒家虚伪反动的“礼治”，厌恶古代的陈旧腐烂的东西，对于夏“道古修身”的反动说教嗤之以鼻。为了保卫地主阶级政权，巩固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魏文侯任用了著名的法家政治家李悝(kuī亏)(约公元前四五五年——公元前三九五年)



为相。李悝向魏文侯提出了“食有劳而禄有功”，“赏必行，罚必当”，按地主阶级法治路线进行变法的建议。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变法——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第一次！要在儒家反动势力很强很深的魏国进行第一次变法尝试，可以设想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啊！缺乏经验，没有借鉴，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李悝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无所畏惧，猛打猛冲，向充满了腐烂气息的奴隶制势力展开了有力的斗争。

世卿世禄制是维护奴隶主贵族世袭特权的反动制度。李悝毫不迟疑地把斗争的锋芒直指这个反动制度。他尖锐地揭露了那些依仗世袭爵禄、显赫淫逸的奴隶主贵族，“出则乘车马衣美裘”，“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他们是社会上违法乱纪，聚众闹事的“淫民”。正是他们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李悝斩钉截铁地向魏文侯建议：只有“夺淫民之禄，以来（徠）四方之士”，才是魏国唯一的出路。他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对奴隶主贵族实行地主阶级专政，铲除他们的根基，确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力，把夺回来的俸禄用来酬报愿为魏国的新兴地主阶级效力的四方人士。这条“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政治路线，使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声望逐渐提高，吴起、西门豹、乐羊等大批忠于新兴地主阶级事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云集魏国，得到重用，形成了一个以法家为骨干的领导核心，狠狠打击了奴隶主阶级顽固势力。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为了发展

农业，巩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尽地力”并不是单纯的发展生产，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他针对当时残存的“井田制”，提出了“废沟洫”的主张<sup>①</sup>，铲除井田的疆界，促进农田水利建设。后人评价这件事称“井田废，沟洫涇，水利所以作也，本起于魏李悝”<sup>②</sup>。“井田制”的废除使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占了支配地位，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为后来的法家变法开创了先例。商鞅变法提出的“废井田，开阡陌”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当时，魏国的奴隶主贵族为了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还招揽大批农民和民间女子“雕文刻镂”、“锦绣纂组”，致使农田荒芜，杂草丛生，严重破坏了新兴的封建经济。李悝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事害，则饥之本也”。明法严禁奴隶主招揽民工。李悝还给魏文侯算了一笔帐：魏国当时方圆数百里，除去山林，河泽，城邑乡居外，实际可耕种面积有六百万亩。如果勤劳耕种，每亩就能增产三斗，反之就会减产三斗，这一增一减，全国数百里地就会相差一百八十万石的收成。“尽地力”与“不尽地力”结果竟如此悬殊！为此，李悝提出了“治田勤谨”的口号，鼓励废除井田后获得一定自由的农民积极从事农田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并且“必杂五种”，充分利用地力。李悝为了打击工商奴隶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破坏封建国家的活动，还创造了“平籴法”。“平籴法”就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粮价。丰年时，国家按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粮，作为储备，碰到灾年、歉收年再按平价售出，“取有余以补不足”。这样，即使“遇饥馑水旱”的灾年，也能做到“民毋伤而农益劝”。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政策，巩固了新兴

的封建经济,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魏国很快繁荣起来。

战国时期,是新兴地主阶级逐步战胜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战争不休的时期。奄奄一息的奴隶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儒家,用虚伪的“仁政”来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兼并战争。法家则比较坦白,公开认为只有发展军事力量,才能用暴力建立和巩固本阶级的统治。李悝曾任“中山”和“上地”的军政长官。当时流传着一个李悝“断讼以射”的故事。他规定打官司如遇到难以判断的是非诉讼,就用比赛射箭来决定输赢,能射中靶子的就算官司打赢。<sup>③</sup>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做法似乎有点好笑,但当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军功行赏罚的法治精神。因此“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训练出了一支以善射驰名天下的军队,在与秦国作战时,打了个大胜仗。李悝还制定了强兵政策,选拔“武卒”,建立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

李悝变法,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变革,它使魏国摆脱了奴隶制,变为一个封建制国家。李悝抓住了“法治”路线这个纲,和农、战这两个关键,使变革后的魏国“国以富强”。在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上,魏国军队占领了秦国的全部西河之地,并且南击楚国,北击齐国,活捉齐王,成为战国初期诸侯国中的强国,“诸侯莫能与其争”。

李悝变法使没落奴隶主贵族遭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他们在受了第一次打击后,定了定神,很快又组织起力量向新兴地主阶级疯狂反扑过来。他们有的杀人行凶,有的毁法叛乱,有的聚众闹事,这伙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赤裸裸地跳出

来了。“这是一伙盗贼！”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李悝认识到“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为了捍卫变法的成果，李悝汲取了各国新兴地主阶级法律条文的精华，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地主阶级法典——《法经》。《法经》是一部反映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战斗锐气的文献，是魏国变法实践的产物。

《法经》共分《盗法》、《贼法》、《囚(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其中规定了保护地主阶级政治经济权益，镇压奴隶主贵族犯罪活动的一系列措施。《法经》的出现，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来巩固经济基础。李悝将那些诽谤国家改革、扰乱社会治安、盗窃国家军政机密和妄图破坏变法的奴隶主顽固派，一律斥之为“盗”、“贼”，《法经》的头两篇就是《盗法》、《贼法》，强调首先要对他们加以镇压。《法经》坚持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它规定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太子丞相，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违法乱纪，一律要处罚受刑。这在剥削阶级中当然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但在当时用法律形式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奴隶制等级制度。它警告奴隶主贵族：任意杀人是犯法的，如有违者，斩腰枭首，以示民众。这就砸碎了奴隶主可以肆无忌惮地杀害奴隶以及迫害新兴地主阶级而不受法律制裁的“礼治”，打击了奴隶主破坏变法的活动，为新兴地主阶级更广泛的夺权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律是阶级意志的体现。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制定和颁发自己的法律，付出了多少代价啊！春秋末期法家先驱邓析因为著“竹刑”，惨遭奴隶主统治者杀害；过了几十年，晋国的范

宣子“铸刑鼎”，又招致复辟狂孔老二跳脚谩骂，但是历史潮流阻挡不住，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法治”主张的《法经》问世了！不论从它所确立的规范还是系统性方面来说，都比以前的成文法更完善，更成熟。这反映出经过一百多年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封建制的政治和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这是新兴地主阶级又一胜利！

由于阶级本质决定，《法经》必然包含着镇压劳动人民的内容，同时“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口号，也不如后来商鞅的“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更鲜明地将矛头指向没落奴隶主阶级。但是《法经》所规定的“严刑峻法”卓有成效地打击了奴隶主反变法的阴谋活动，因此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卫鞅受之，入相于秦”，把《法经》作为实行法治的依据<sup>④</sup>。在秦、汉，《法经》还成为制定法律的蓝本，秦的《秦律》、汉的《九章之律》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制定的。李悝的《法经》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悝的变法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巩固统治的第一次尝试。这是一桩充满朝气的新生事物。但是当时的地主阶级还很幼稚，变法还不完善，特别是忽略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打击儒家之徒，以致在魏文侯死后，儒家势力又沉滓泛起，使魏国出现了复辟逆流。后来，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在总结魏国变法的经验教训时，曾指出，李悝变法使魏国“强国天下，威行四邻”，但后来“法慢”，没有继续坚持法治，结果“国日削”。功亏一篑，令人惋惜。

然而重要的是，李悝在没有轻车熟道可循的情况下已经

跨出了第一步。李悝变法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显示了法治路线强大的生命力，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新兴地主阶级。李悝和《法经》在古代儒法斗争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抹杀的。

---

注：① 明·董说《七国考》引《水利拾遗》。

② 宋·高承《事物纪原》引《沿革》。

③ 《韩非子·内储说上》。

④ 《桓谭·论书》。

## 西门豹治邺

历史上流传着的“西门豹治邺”故事，发生在战国初期积极实行法治的魏国。

当时的邺（现河北省临漳县），地处魏国和赵国的交界处，是个战略要地。公元前四百多年，为了加强边防，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法家变法的成果，魏文侯和李悝派西门豹任邺令。

西门豹带着厉行法治的使命到了邺地。可是一到那里，只见流经邺地全境的漳河水混浊汹涌，周围土地荒芜，城镇萧条，人烟稀少，一片凄凉。西门豹觉得十分纳闷：象这样的地方如何执行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呢？他于是“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经过一番调查，才知道邺地荒凉贫困的根子出在当地奴隶主残余势力身上。这帮家伙为了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大搞“河伯娶妇”的鬼把戏，把老百姓害苦了。原来，那条漳河，因年久失修，“迁徙无常”。每到夏秋两季，一经暴雨，河水猛涨，经常泛滥成灾。当地奴隶主贵族就暗中勾结地方官三老、廷掾以及巫婆，乘机鼓吹“天命论”，装神弄鬼地到处散布迷信，胡说只有为河伯娶媳妇，才能免除水灾，借此敲榨勒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从每年收刮的数百万钱中，拿出二、

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其余坐地分赃，全部落进各自的腰包。在奴隶主贵族的支持下，由巫婆出面，每年强迫“选聘”穷人家的女儿，洗身沐发，装饰打扮，充作“神妇”，然后坐到一张彩床上，投入河中。就这样不知多少穷人家的少女被活活葬身于河水之中。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使邺地人民贫困交加，苦不堪言。尤其是那些有女无钱之家，更是纷纷逃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西门豹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非常气愤，决心狠狠打击这股恶势力。

但是，从哪儿下手呢？西门豹初到邺地，人生地不熟，加上奴隶主旧势力盘根错节，迷信鬼神的思想流毒很广，斗争十分复杂。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西门豹，要推行法家路线，改变邺地面貌，就必须把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同反对奴隶主反动势力的斗争结合起来。不用“无神论”去批判“有神论”，不用朴素的唯物主义去批判唯心主义，就无法摧毁奴隶主掌握的政权和神权，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这是由当时阶级斗争的性质所决定的。西门豹决定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斗争策略。他不动声色地对父老们说：“等下次给河伯娶妇时，请告诉我一声，我也来为她送行”。

到了这年“娶妇”的日期，西门豹带了兵丁，赶到现场。邺地的一些头面人物也都来了。漳河岸边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足有二、三千。那个年已七十，作恶多端的老巫婆一拐一扭，神气十足，她身后紧跟着十个穿一色绸衣的女弟子。一阵咒语以后，老巫婆正要把一名无辜少女投向河中，西门豹不慌不忙地说：“且慢，去请神妇过来，让我看看长得美不美。”老巫婆



以为西门豹也贪财眼红，很想巴结一下这位新来的长官，便顺从地领过“新娘”。西门豹看了一眼就摇摇头说：“这位新娘长得并不美嘛！麻烦你去报告河伯，说，等选到漂亮的，改日再送来。”老巫婆脸色大变，还没开口，早被兵丁拦腰抓起，甩进了漳河。一些头面人物一下子惊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过了一会不见动静，西门豹又说：“老巫婆怎么还不回来？一定是上了年纪，不中用，请弟子去看个究竟。”于是一个领头的小巫婆被投入水中。紧接着扑通扑通两声，又有两个小巫婆也被扔到河里。那里的旧贵族和巫婆、三老见此情景，有的吓得张大了嘴，有的抖索着身子，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河心，唯恐西门豹也要自己去见河伯，平时的威风早已一扫而光。西门豹装作没看见，转身对主持这一仪式的三老说：“看来，巫婆是女流，恐怕说不清缘由，还得麻烦你去走一趟。”三老想要挣扎，兵丁们不容分说，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把这个老家伙推下了河。为了进一步揭露、打击奴隶主旧贵族和地方宗教势力，西门豹显出十分虔诚的样子，仍然静静地守在河边。不一会，西门豹又对旁边廷掾等一班官吏说：“巫婆、三老都不见回来，怎么办呢？只得麻烦你们几位啰！”这些家伙一听魂飞魄散，一个个象鸡啄米似地“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趴在地上不住讨饶。眼看鬼把戏不戳自穿，河伯娶妇真相暴露无遗，西门豹便对他们说：“爬起来吧！河伯留客太久，我们回去了。”话音刚落，坏蛋们如遇大赦，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

从此，邺地的官吏和土豪，再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情了。西门豹在法家路线指引下高举“无神论”的战斗旗

帜，机智、勇敢地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他不愧为先秦杰出的无神论者。

西门豹大破河伯娶妇骗局后，立即对邺地的政治经济进行改革，积极实行法家重“耕战”、尚“法治”的路线。

他首先派人勘察地形，动员大量人力，改造漳河。但是不久，旧习惯势力又打出“减少人民烦苦”的幌子，企图阻挠这个计划的实现。西门豹毫不让步，据理力争。在西门豹的支持下，经过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沿漳河开挖了十二条水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漳水之用遂以宏”，“民人以给足富”，终于使漳河化害为利。兴修水利的结果，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原来遍布邺地的盐碱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每亩产量比其他地区高出好几倍，“尽地力之教”的政策得到了落实。这些水渠，在魏文侯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始终发挥了作用。人民感激西门豹，赞扬他除害开渠的功绩。直到明朝，民间还传颂着这样的诗句：“持酒登堂酬西门，邺县千载甘棠芬”<sup>①</sup>。

西门豹治邺期间，严格奉行法家的法治政策，“秋毫之端无私利”，对左右官吏也尚“法”去“礼”，因此引起了儒家代表人物的不满。他们在魏文侯面前诽谤西门豹，说他把邺地搞得“廩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魏文侯亲自到邺地察看，西门豹就以事实作了回答。他走上城楼，击鼓召集兵民。随着鼓声，“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西门豹再一次击鼓，立刻又有许多驾牛车、挑粮食的民众云涌而来。魏文侯看了又高兴又惊讶，大为赞叹。以后，西门豹又主动请战，

率领邺地士兵北击燕国，收复了被燕侵占的土地，邺地逐步成为魏国的东北屏障<sup>②</sup>。西门豹为巩固魏国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作出了贡献。

列宁指出：“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始终伴随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西门豹治邺的过程，就集中反映了战国初期这一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奴隶主贵族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当他们没有力量，即将灭亡的时候，就不得不求助于宗教和鬼神，企图借用上帝和鬼神的权威来束缚革命人民的手脚，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拚命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有神论”，正是一切没落阶级的共同特征。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取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就必然起来反“天命论”，破“有神论”。他们在与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中，建立了为法治路线服务的思想理论——“反天命”和“无神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尽管存在着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但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反革命必定“尊天命”，要革命必须“反天命”，这就是“西门豹治邺”给我们留下的历史经验。

---

注：① 《临漳县志》卷十四。

② 《淮南子·人间训》。

##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

与李悝同时代，在魏国反对奴隶主阶级，建立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激烈斗争中，曾冲杀出一批法家的重要代表。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吴起(?——前三八一年)就是其中的一位。

时代造英雄。战国初期，社会大变动的暴风骤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深深激励着卫国年轻有为的吴起，他决心投身革新洪流，为新兴地主阶级干一番事业。可是，卫国是个奴隶主阶级势力根深蒂固的地方，吴起的愿望遭到了本国旧贵族的竭力阻挠和恶毒攻击。为了寻求革新道理，吴起决定到鲁国求学。临走时，他告别了年老体弱的母亲，啮臂发誓：不干出一番事业，决不回家乡。

吴起怀着满腔的热情来到鲁国，慕名拜曾参为师，想学一些治国之术。但不久就大失所望。原来，曾参是孔丘的嫡传弟子，他讲来讲去都是孔老二那套“克己复礼”的陈词滥调，与吴起的理想完全是南辕北辙。于是，吴起和曾参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终于发生了一场冲突。一天，吴起家乡有人来报信，说他母亲死了。吴起悲痛异常，很想回家看看。但转念一想自己壮志未酬，岂能回乡？就毅然决定不去奔丧。吴起的行动是同儒家的“孝道”与“丧礼”背道而驰的。早就对吴起深

表不满的曾参再也忍耐不住了，便板起面孔训斥他，要吴起赶快回家奔丧。但吴起坚定地回答：不回去！气得曾参吹胡子瞪眼睛，竟然以“不孝”的罪名，把吴起赶出了门。走就走！斗争的风浪，使吴起各方面成熟起来，要求革新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根据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需要，认真学习兵法，准备投入战斗。后来，吴起听说魏文侯举贤变法，革新事业搞得很有起色，就打点了行李，兴冲冲地赶到了魏国。

在魏文侯面前，李悝称赞吴起是个用兵甚于司马穰苴（春秋时齐国名将）的杰出军事家。思贤如渴的魏文侯十分高兴，急忙召见吴起，同他促膝交谈。吴起总结了“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sup>①</sup>的历史经验，认为决不能被“仁”、“义”迷住眼睛而放弃向敌人进攻的良机，要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彻底粉碎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的猖狂反扑，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sup>②</sup>。魏文侯对吴起的既要重视政治，又要重视军事的法家主张赞不绝口，立即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他为将。

吴起为大将后，十分注意用法治思想治理军队。他认为一支军队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鸣金收兵而不退，击鼓冲锋而不进，那么“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因此，吴起严格执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的法家政策，而且“行之以信”。平时，吴起和士卒朝夕相处，同甘苦，共患难。他“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军中有一位士兵患了脓疮，吴起亲自用嘴为他吸吮，深受士卒爱戴。此外，吴起讲究战术，提出四条作战要领，即“气机”（指挥果断，步调统一）、“地机”

(利用有利地形)、“事机”(善行间谍工作,分化瓦解敌方)、“力机”(注意增强我方人力、物力的素质)。它与儒家以礼治军,只信“天命”不讲实际,不讲人的作用的反动军事路线,是完全对立的。

正确的路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吴起刚到魏国不久,就带兵渡河西征,一举攻取了当时还未实行封建改革的秦国的五座城池,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守,专拒秦、韩。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吴起作战七十六次,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魏武侯执政时期,有一次他居然以五万军队,把秦国的五十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吴起在魏国以卓越的军事成就,为李悝变法,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魏国经过变法,国势日益强盛,奴隶主阶级势力大大削弱。但没落阶级的垂死挣扎,仍然是魏国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最大威胁。奴隶主贵族象恨李悝一样,对吴起也极端仇视,一心要拔掉吴起这个眼中钉。等到魏文侯一死,魏武侯即位,他们就利用武侯年轻缺乏经验,拚命打击革新派,复辟奴隶制。与此同时,他们还极尽诬蔑造谣,挑拨离间之能事,企图陷害吴起。有个叫王错的贵族在武侯面前胡说吴起镇西河,建战功,是想收买人心,图谋不轨。目睹奴隶主复辟势力猖獗的局面,吴起感到十分失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被迫悲愤地离开魏国,前往楚国开辟新的战场。

楚国位于我国南方,在各诸侯国中幅员最大,人口最多,春秋时期曾经称霸一时。但自春秋后期以来,政局一直控制在昭、景、屈三家大奴隶主贵族手里。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公

元前三九一年，韩、赵、魏三国联军在大梁、榆关把楚军打得一败涂地，楚国只得卑躬屈膝地备厚礼求和。楚悼王是个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他即位后，看到国家破败不堪的局面，很想学习魏国，变法图强。当他获悉吴起到楚国的消息，就好比是久旱的禾苗逢甘露，急忙找到吴起，请他当楚国的令尹（宰相）。从此，吴起又成为楚悼王积极推行法家革新路线的得力助手，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当时楚国奴隶主贵族势力还很强大，它给吴起变法带来了重重困难。为了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制定恰当的变法措施，吴起决定先到楚国大贵族屈宜臼那里摸摸底，单枪匹马闯入了屈府。屈宜臼摸不清吴起突然造访的用意如何，但早就听说他曾大闹魏国，弄得那里的旧贵族六神不安，不由得心惊肉跳起来。吴起先开腔，平静地对屈宜臼说：“楚王不知道我吴起才能低下，却让我当了令尹。今天，我是特意来请先生评论一下我的主张的。”“请说吧”，屈宜臼淡淡地说了一句。吴起坚决地说：“依我看，第一，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和俸禄；第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养兵强国与诸侯王争天下。”这下可把屈宜臼气得半死，他急急忙忙搬出孔老二祖传的看家武器——“礼”，向吴起的革新主张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和诬蔑。他说什么谁想“变其故，易其常”去搞革新，决没有好结果；又说什么“兵”是凶器，使不得，与人争天下是“逆德”，“逆天道，戾人理”，大骂吴起是惑主殃民的“祸人”。屈宜臼这一番表演本来就是意料中的事情，吴起对此毫不理会，转身气昂昂地跨出了屈府。屈宜臼恨得咬牙切齿，指着吴起的背影恶狠狠地说：

“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其实这句话，正从反面说明了吴起是一个坚定的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

楚国奴隶主贵族的恫吓和阻挠，并没使吴起后退半步。他针对楚国国内“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社会状况，明确地向楚悼王指出，这是“上偏(比)主而下虐民”的“贫国弱兵之道”。要扭转这种局面，变“贫国弱兵”为“富国强兵”，应当立刻“明法审令”，严格执行法治路线。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在楚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首先废除奴隶主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爵位传过三世，就收爵禄，废贵族称号，为建立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创造了条件。其次，明察官吏，裁减没有能力或无关紧要的冗吏，强化政权机构。再次，就是毫不客气地“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强迫奴隶主贵族离开世袭盘踞的领地，这样既开垦了荒地，更重要的是狠狠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力量。另外，吴起还吸取了魏国变法的经验，十分强调“要在强兵”，用革命的暴力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开辟道路。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吴起的变法如同秋风扫落叶，无情地打击了奴隶主势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吴起还率领大军“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成为战国初期的又一强国。吴起变法的胜利再一次显示了法治路线的强大生命力。

但是，没落阶级是决不甘心灭亡的。“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他们麇集在一起，阴谋策划，伺机而动。吴起变法一年后，楚悼王去世了。那些憎恶革新，一心复辟的奴隶主贵族听



到这个消息，一个个欣喜若狂，恨不得立即把吴起一口吞下去。一场反革命叛乱发生了。

在为楚悼王治丧的那天，一伙执弓舞剑的暴徒蜂涌而至，对吴起采取了突然袭击。吴起临危不惧，奋力反抗。可是寡不敌众，已经无处可退了。他拔出身上带血的箭，奔进灵堂，扑倒在楚悼王的遗体上。疯狂到极点的奴隶主贵族此时哪里还顾得上“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国法，一时乱箭齐发，吴起躺在血泊之中，楚悼王遗体上也扎满了箭。贵族们还不解余恨，又车裂了吴起。箭中王尸，按照楚国的法律是要受到制裁的。继位的楚肃王下令将“射吴起而并中王尸”的奴隶主贵族七十余家满门抄斩。吴起壮烈的死，既生动表现出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所具有的英勇气概，也说明了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是势不两立的。

吴起变法失败后，儒家势力抬头，军政大权重新落到奴隶主贵族手里。他们“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sup>③</sup>，胡作非为，倒行逆施。楚国就此一蹶不振，日益衰弱。到楚怀王时，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屈原，再次提出了变法主张，但也遭到旧贵族的迫害。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在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惋惜地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sup>④</sup>。

吴起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把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强兵”，用革命暴力来保证变法，巩固政权。正是这条正确路线使他“用之魏则魏强，用之楚则楚伯(霸)”<sup>⑤</sup>。他的变法对于以后法家思

想的发展影响极大。战国中期杰出的法家代表商鞅所制定的秦国革新路线和实行的变法,就是在研究和总结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吴起变法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

注: ①② 《吴子·图国第一》。

③ 《战国策·楚策三》。

④ 《韩非子·和氏》。

⑤ 李贽:《墨子批选序》。

## 秦行商君法而富强

两千多年前，在秦国都城栎（ll 力）阳的宫廷里，有一天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大论战。

这一天，秦孝公召集群臣，讨论变法的问题。会上商鞅正在发言，他用铿锵有力的声调说：“常言道：疑行无成，疑事无功。为了国家的富强，完全不必因循旧法，恪守古礼！君上，我们应该不顾一切反对的议论，立即变法！”商鞅激烈的措词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安静肃穆的栎阳宫笼罩着一种紧张气氛。一阵难熬的寂静后，旧贵族的政治代表甘龙按捺不住了，他拉着嘶哑的嗓门威胁孝公：“不遵古法，变更礼制，只怕天下人都会反对你，君上应该郑重考虑呀！”另一个旧贵族杜贲则装作忧国忧民的样子说：“对！我听说：没有百倍好处，就不能改革旧法度。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时论战进入了高潮，一方主张变革，一方主张法古，弓张弦紧，针锋相对。商鞅身临战场，毫不畏缩。他痛斥旧贵族因袭旧法，抱残守缺，根本不配讨论国家大事，用“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响亮口号压倒了他们的反动气焰。甘龙、杜贲们被批驳得理拙词穷，狼狈不堪。最后孝公怀着喜悦的心情大声宣布：“我决定实行变法，再也不迟疑了！”随即果断地颁布了“变法之令”。这场大论战，



图二二

就是商鞅变法的前奏。

商鞅明明是个卫国人，为什么跑到秦国导演了一场变法运动呢？其中是颇有一番曲折的。商鞅出身于卫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从小就“好刑名之学”，倾慕法家学说。年轻的时候曾跑到法家思想的摇篮——魏国，在崇尚法家的丞相公叔痤(cuó 瘞)那里当家臣。尽管地位不高，但他决心学习李悝、吴起，在魏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变法事业。公叔痤很器重商鞅的志向和才干，临死前特地将这位年青人推荐给魏惠王，说商鞅“年虽少，有奇才”，劝魏惠王加以重用。但笃信儒学的魏惠王对这个年青人根本不屑一顾，反而认为公叔痤的建议“岂不悖哉”。就在商鞅失望于魏国时，传来了秦孝公的“求贤令”。于是，他携带着平日刻苦研读的李悝《法经》，毫不犹豫地来到了秦国。

这时的秦国，在战国七雄中是个积弱深久的落后国家，奴隶制残余还大量存在，奴隶主贵族集团把持着政权，在军事上也常吃败仗。因此，当时中原诸侯都看不起秦国，甚至将它参加诸侯会盟的资格也取消了。公元前三六一年即位的秦孝公，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目睹这一贫弱局面“常痛于心”，很想进行一番改革。他一即位，便颁布了“求贤令”，大声疾呼“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积极招纳人才，为秦国的政治改革献计。商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来到秦国后，他通过秦孝公身边的大臣景监的帮助，会见了求贤心切的秦孝公。刚开始他曾同秦孝公作过三次意味深长的谈话。头两次，商鞅抱着试探心理，

故意向秦孝公讲述一些先王之道、仁政礼治。但孝公对这些陈腐的儒家道理毫无兴趣，越听越不是味，最后竟打起瞌睡来了。事后，还气虎虎地责问景监：“你给我介绍的是个糊涂蛋！怎么能用啊！”第三次，商鞅向孝公阐述了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孝公听得津津有味，兴高采烈，“语数日不厌”，终于确立了任用商鞅进行变法的决心。为了给变法扫清道路，他主持了宫廷大论战，支持商鞅，制定了变法的路线，商鞅变法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

公元前三五九年，商鞅根据孝公的指示拟定了变法令。在法令公布前，商鞅采用了“南门徙木”的方法，为法家言必信、行必果的法治政策大造舆论。他派人在栎阳城的南门树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明文规定：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口，赏予十金。消息传开，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但大家都窃窃私议，疑惑不解，没有一个动手扛的。本来嘛，奴隶主贵族是奉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圣人”之教的，大家受骗都受够了，谁愿意再上一次当呢？隔了一个晌午，木杆还是矗立在南门口。后来，布告上的“赏予十金”，又加到了“赏予五十金”。大家更感到奇怪了。就在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人，抱着试探心理，大胆地扛起木杆就走，把它送到了北门口。守门的卫兵果然递给他五十金。“南门徙木”这件事，很快在秦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商鞅执法如山，说一不二。

就在这一年，商鞅吹响了向没落奴隶主阶级进军的号角，先后两次公布变法的新法令，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政治上,商鞅崇尚法治,反对礼治,坚持用严刑峻法,破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开辟道路,加速了秦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当时秦国有大量的贵族卿士之家,享受着所谓世卿世禄制,“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sup>①</sup>”。商鞅称他们是一伙吃里扒外,严重损害地主阶级利益的“奸民”,决心剥夺这些人的政治特权。他在新法令中明文规定“国以功授官予爵”<sup>②</sup>,坚持按照战功的大小重新确定爵位和俸禄,没有军功就取消一切特权,这就有利于从斗争中造就一批忠于地主阶级事业的文武官吏,逐步把旧贵族把持的军政大权夺回来,改变“君弱而臣强”的局面。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打破奴隶制的分封制所造成的分裂状态,商鞅推行郡县制,宣布把全国分为三十一个县,进一步削弱了奴隶主贵族割据势力,加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商鞅还在秦献公“为户籍相伍”的基础上,实行了“连坐法”,规定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相互监督,揭发“奸人”,“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措施对打击和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是十分积极的。当然,它也有镇压劳动人民的一面。

商鞅在进行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摧毁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商鞅变法前,奴隶主贵族赖以生存的井田制造成了秦国“地大而不垦”,许多农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不仅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直接妨碍了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商鞅针对这一社会弊端,提出“开阡陌封疆”的革新主张,废除井田制,用法律条文宣布奴隶制生产关系为

非法,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商鞅还颁布了“重农抑商”的法令,招民垦荒,奖励耕织,打击工商业奴隶主,保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经济。商鞅的这些改革,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使原来没有丝毫土地,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变成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的农民,促使社会生产力向前迅猛发展,改变了秦国“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后面貌。

商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向没落奴隶主阶级发起了进攻。当时,旧贵族奴隶主喋喋不休地宣扬儒家的“仁义”、“礼乐”等反动说教,抵制变法运动,大搞复辟倒退的罪恶勾当。商鞅认为:“蠹众而木朽,隙大而墙坏”<sup>③</sup>,这些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意识形态,破坏作用是巨大的。他把儒家思想比作吸食人血的毒“虱”,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除掉这些毒“虱”。为此,他果断地宣布“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严厉措施,把那些“烦言饰词”、宣扬“贫国弱民之教”的儒家诗书集中起来,付之一炬。有力地防止了儒家思想的蔓延。

商鞅所倡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要受到旧贵族反动势力的顽抗。由于商鞅变法搅乱了秦国奴隶主贵族的酣梦,使他们不仅失去了种种特权,再也不能象往昔那样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甚至连穿着贵族式样的服装都要受到限制。因此,这帮不愿失去自己天堂的反动派,“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本能地组成一支支反革命复仇军,大搞破坏活动。新法令宣布不久,奴隶主贵族和反动儒生就利用传统的习惯势力煽动成千上百



的人到首都闹事，假造“民意”，公开反对变法。后来，奉行儒家路线的贵族代表公子虔与公孙贾，又唆使太子犯法，向商鞅的法治路线挑衅，妄图将变法运动扼杀在摇篮之中。但商鞅并没有被守旧派的这种反动气焰所吓倒，他认识到：秦国“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并依法明断下令逮捕躲在太子背后的教唆犯公子虔和公孙贾。将公子虔判了刑、公孙贾脸上刺了字，打退了这股复辟逆流。变法第四年，公子虔再次跳了出来，公开叫嚷要与商鞅较量，但商鞅依然镇静自若，依照地主阶级的法律，再次判处公子虔重刑——割了鼻子。同时还处死了民愤极大的奴隶主贵族祝懣，并在渭水边大张旗鼓地镇压了七百多个破坏变法革新的反革命分子，大长了地主阶级的志气。那些旧贵族遭到沉重打击后，表面上口是心非地大谈变法的好处，骨子里却把牙齿咬得格格响，伺机报复。但商鞅对这些“乱化之民”是看得很透的，索性把他们统统流放到边区强迫劳动，使秦国的变法沿着正确的轨道又深入了一步。

“秦行商君法而富强”<sup>④</sup>。由于商鞅推行的变法路线是一条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路线，这就为秦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在商鞅变法路线的指引下，秦国经过十几年奋发图强，迅速兴旺起来。千里秦川，焕然一新：井田的疆界废除了，荒芜的田野种上了庄稼，“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sup>⑤</sup>。在兵精粮足的基础上，商鞅率领秦军挥戈东向，击败魏军，夺回了被魏国占领的黄河以西国土。那个把商鞅赶出魏国的魏惠王，看到秦国打到了自己的大门口，这才如梦初醒似地长叹：“唉！当初我听公叔痤的话该多好哇！”悔之

莫及。战争的胜利，为秦国向东方发展，打开了大门。从此，秦国由一个被诸侯瞧不起的奴隶制弱国，一跃而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封建制强国，生气勃勃地大踏步前进。路线正确，后来居上。这就是商鞅变法提供的一条经验。

商鞅变法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斗争并没有结束。那些被地主阶级专了政的宗室贵戚，对商鞅变法的“怨望”也与日俱增。公元前二三九年，他们乘秦孝公患病的机会，企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商鞅下台。有一天，他们派了个叫赵良的人，窜到商鞅那里大放厥词。此人是个沦为“逸民”的反动儒生，他本着儒家“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反动说教，疯狂攻击商鞅变法是“残伤民以峻刑”，“积怨畜祸”，并恶毒诅咒商鞅“何不遄（快）死”，威胁商鞅赶快下野，归田隐居，否则就危在旦夕。几经风雨考验的商鞅对这个小丑的疯狂挑衅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理会。但是商鞅看到的只是赵良的个人进攻，却没有看到在赵良背后站着大批的奴隶主旧贵族，更没有对“杜门不出已八年”的公子虔之流引起足够的警惕，这是商鞅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

几个月以后，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称秦惠文王。公子虔一伙精心拼凑的反革命还乡团一下子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们使出弄虚作假、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段，诬告“商鞅欲反”，迫使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奋勇迎战，但因兵少力弱而失败。最后，奴隶主复辟势力竟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这位杰出的法家战士。商鞅的悲剧，证明了复辟党对革新派的反攻倒算从来就是法西斯式的。

商鞅被害后，奴隶主推行复辟倒退的反动路线，使秦国政局出现了暂时的反复。商君虽死，秦法未败。由于商鞅的法家路线深入人心，秦国上下都能“言商君之法”，这就成为当时反复辟的巨大力量。商鞅为新兴地主阶级革新事业献出了生命，但秦国仍然沿着商鞅变法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复辟势力虽能得逞一时，然而终究阻挡不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

注：① 《商君书·画策》。

② 《商君书·靳令》。

③ 《商君书·修权》。

④ 《韩非子·和氏》。

⑤ 《荀子·强国》。

## 孔家店二老板孟轲

被历代反动派作为宣传孔孟之道的通俗读物《三字经》中有这么几句话：“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说的就是孔家店二老板孟轲童年的故事。

公元前三七二年，孟轲出生在邹国一户破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在他幼年时，因为家离乱坟岗很近，因此，孟轲整天和邻居小孩一起，模仿专办丧事仪式的人，在乱坟堆里吹吹打打凑热闹。念念不忘昔日奴隶主贵族威风的孟母，见儿子如此“不成器”，真是犯了大愁，荒废了读经学礼，那可是件大事啊！于是她认为“此非吾所以居处”；领着儿子把家搬进了城。

没想到城里车马穿梭，人声喧嚷，又把孟轲给吸引住了。他尽管手捧着经书，有口无心念着，可两眼却直盯着窗外街道上热闹情景。孟母满心想指望孟轲将来能重振贵族家业，见孟轲仍然心不在焉，就以“断机杼”的方式，狠狠教训了孟轲一通，然后又搬家了。这回她把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时间一长，孟轲也摇头晃脑地哼起经书，拱手作揖学起礼来，嘴里还“子曰”、“诗云”地唠叨个不休，在奴隶主阶级反动思想的熏陶下，孟轲从小就立下了复辟奴隶制的志向。

孟轲生活的时代，正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战国时代。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诸侯国中的奴隶制政权先后垮台，地主阶级的新政权相继确立，法家的政治路线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是比孟轲稍早的著名法家代表商鞅，在秦国迅速取得变法实效的事实，极大地鼓舞和推动着当时中原各诸侯国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可是，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却对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刻骨仇恨；对奴隶制的崩溃、奴隶主阶级的失败痛心疾首，捶胸跺脚。他顽固地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拚命鼓吹复辟倒退的反动主张，公开提出“法先王”的反动政治路线，扮演了一个比春秋末期企图阻止社会大变动的孔丘更加疯狂的反动角色。

孟轲是个复辟狂。伴随着各诸侯国新兴地主阶级的节节胜利，孟轲的复辟野心更加恶性膨胀。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用一张投机商的嘴巴，东窜西跳地游说各国，叫嚷要“正人心，息邪说”，鼓噪“法先王”，向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路线发动了猖狂进攻。

孟轲气势汹汹地指责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为“不仁”。他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sup>①</sup>。一句话，要“法先王”，就必须在政治上施行“仁政”，如果“不以仁政”，则“不能平治天下”。孟轲鼓吹的“仁政”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就是要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复辟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孟轲鼓吹仁政的“仁”字，与孔丘鼓吹“克己复礼”的“礼”字的性质完全一样，毫无区别。孟轲眼巴巴地看商鞅在秦国废除了奴

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忍不住破口大骂商鞅是“暴吏”、“民贼”；同时又发出世道衰微的哀叹，大肆宣扬一代不如一代的谬论，胡说什么：“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在经济上念念不忘恢复奴隶制的井田制，也是孟轲鼓吹复辟倒退、推行“法先王”反动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孟轲反对“重耕战”，狂叫“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他在游说过程中向奴隶主贵族献策说，想要恢复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并不难，只要先把那已被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打破的土地“经界”正起来，保管奴隶主阶级的世袭封地和奴隶占有制丢不了。完全抹煞了奴隶制的井田制从来都是以奴隶的血泪和白骨做根基的事实，不惜工本，极力美化井田制，说什么井田制可以使“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其目的无非是要给井田制蒙上一块骗人的遮羞布，以便让奴隶主阶级平平安安、名正言顺地重新获得“恒产”。

孟轲言必称尧舜，行必效先王，狂热宣扬尊孔读经，妄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儒家统治。他多次肉麻吹捧孔丘。什么“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sup>②</sup>。还把孔丘说成是“先圣”中的集大成者。因此孟轲公开提出要向孔子顶礼膜拜，熟读《春秋》、《论语》。在游说诸侯期间，孟轲这个不学无术的腐儒，还杜撰了一则《揠苗助长》的寓言，捏造一个农夫拔苗助长，结果弄巧成拙反而糟蹋了庄稼，影射攻击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其实孟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根

本不懂农业生产，不懂农民。他捏造的这个故事，不仅是对农民的歪曲，也是对法家的诬蔑，只能暴露出他的顽固和无知。

孟轲在反对以商鞅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革新事业的过程中，不仅全盘继承了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而且发展了儒家思想，形成了反动思想体系——孔孟之道。其中“性善论”便是孟轲的新创造。

孟轲认为人性都是善良的，就好比水性总是向下流的道理一样。但是孟轲又马上强调这种“善性”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只有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贤臣”，才天生具备“善性”。由于这些“先王”、“贤臣”都是不用学习就能知道一切的“先知先觉”，因此他们是专门代表老天爷意志主宰人间世界的救世主。只要这些“先知先觉”以“不忍人之心”去“行不忍人之政”，那么治理天下就可以象在手掌上运转小玩意儿那样容易了。就这样，从天赋的道德观念出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反动谬论纷纷出笼了。在孔丘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孟轲是第一个把“天”和“人”结合起来，炮制“尽心，知性、知天”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反动思想家。“法先王”反动政治路线也正是以这个思想路线为理论基础的。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必然得出主观唯心论的修养方法。孟轲主张充分发挥“心”的作用，摆脱耳目感官的诱惑，使心中固有的“善端”发扬光大。他认为一旦达到这个境界，统治者就能成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圣者”、“神明”，而被统治者也会自觉服从统治，于是，天下太平，人的“善

性”也保住了。

孟轲似乎为人类之“善”费尽了心机。其实不然，口口声声自称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的孟轲，正是一个血腥镇压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刽子手。为了给各地复辟势力壮胆打气，他一会儿奔到滕国，一会儿又赶到宋国。一听说燕国大臣子之掌握了政权，实行封建变革，孟轲便大发雷霆，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无法无天，必须严加镇压。他急急忙忙从鲁国窜到齐国，竭力煽动齐王出兵伐燕。在孟轲的推荐和策动下，他的党徒匡章率领齐军对燕国进行武装干涉，扼杀了燕国一场方兴未艾的政治变革，极其残酷地把子之剁成了肉酱。

鲁迅曾经深刻而又形象地揭露过孟轲的“性善论”是十足的假慈悲。他说：“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鞞觫(kú胡、sù速)，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鞞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了”<sup>③</sup>。孟轲鼓吹性善论，是要掩盖奴隶主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要革命人民放弃对奴隶主阶级作殊死斗争，俯首贴耳地服从它们的统治。

然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法先王”的招魂幡并不能使垂死的奴隶主阶级起死回生。尽管复辟狂孟轲为此奔走呼号了一生，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一副狼狈相。在魏国，他向魏惠王鼓吹的那套“仁政”，开始魏惠王还有兴趣，后来看看并不管用，也变得爱理不理，孟轲没办法，只好灰溜溜地离开魏国。到了邹国，邹穆公对孟轲的“仁政”非但置之不理，而且干脆连



饭都不给他吃。但碰壁并不能改变孟轲的反动立场。在邹绝粮后，孟轲忽然听到了鲁平公准备任用他的得意门生乐正子治理国家的消息，顿时喜出望外，勒紧裤带赶到鲁国，心里又打起篡权复辟的如意算盘。由于乐正子的吹捧，鲁平公很想拜访一下孟轲。谁知孟轲在鲁国早已声名狼藉，平公近臣臧仓当众揭发了孟轲不过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根本不是什么贤德之人，建议平公不要见孟轲。平公一听，便打消了起用孟轲的念头。这对孟轲来说，就好比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复辟计划全部落空了。恼羞成怒的孟轲一面咬牙切齿地咒骂臧仓，一面不得不自欺欺人地仰头悲叹：“我不能见鲁侯，这真是天命啊！”历史是无情的。不管孟轲采取什么办法，是骂，是杀，是骗，都扑灭不了革新的烈火，更阻挡不住历史车轮的前进。公元前二八九年，八十四岁的孟轲终于在到处碰壁的冷落处境中完结了自己的反动一生。

任何反动阶级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直到临终前，孟轲还是忘不了他那复辟奴隶制的宿愿。他学着当年孔老二编纂《春秋》、令弟子拼凑《论语》的样子，也让几个死心塌地跟随他的门徒编纂了记载他反动言行的《孟子》一书，妄图在他死后也留下那么一本变天帐，以便向进步势力反攻倒算。孟轲死后，他那一整套复辟倒退的反动理论纲领和策略，被历代反动派捧为至宝，成为孔孟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毒深广。随着尊儒反法反动思潮的泛滥，孟轲的身价也被历代反动派愈抬愈高，被戴上“亚圣”的桂冠，成了孔家店的二掌柜。但是，任何反动派的垂死挣扎都不能阻挡奔腾向前的革命洪

流,孔孟之道决计成不了反动势力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铁证。今天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来,孔孟之道的反动思想堤岸就被彻底冲垮,完全露出了它的复辟、倒退、卖国的反动本质。

---

注: ① 《孟子·离娄上》。

② 《孟子·公孙丑上》。

③ 《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六卷。

## 孙庞斗智

毛主席曾多次论述到古代许多著名的战役和军事家的思想。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提到，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可以采用孙臆“围魏救赵”的战术，肯定了孙臆的战略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处多事之时”<sup>①</sup>和“当大争之世”<sup>②</sup>，儒法两家不仅在政治路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且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军事路线的斗争直接为政治路线服务。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坚持法家路线，必然要用暴力摧毁奴隶制，破坏儒家的政治路线。孙臆与庞涓的交锋，就是这种斗争的一个缩影，而“围魏救赵”——桂陵之战，则是孙庞间斗争的第一个重大回合，它反映了儒法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我们就先从这个故事谈起吧。

那是狼烟滚滚的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越打越厉害，公元前三五三年，独霸中原的魏国出兵攻打赵国。魏强赵弱，不几天，魏军的铁蹄就长驱直入，包围了赵国国都邯郸。魏国大将庞涓全副披挂，骑着高头大马在城下耀武扬威地亲自督战，偌大的邯郸眼看唾手可得。庞涓盘算着怎样回去邀功请赏，心中好不得意。赵军眼看抵挡不住了，急忙派使臣向齐国求援。赵国与齐国疆土相连，齐威王鉴于唇亡齿寒的教训，

立即决定出兵援赵。他要任命精通兵法的孙臆为大将，孙臆拍拍自己失去膝盖的双腿，沉痛地说：“我是个受过刑的残废人，当大将怕敌人笑话，还是请别人吧！”齐威王不得已，只好改派田忌为大将，委任孙臆为军师，让他坐在有篷的战车里，给田忌出谋划策。田忌是个急性子的人，赵国使臣一日数番地催救兵，搅得他心如火燎。将印一到手，他就要调兵遣将，杀奔邯郸。孙臆在一旁拉住他说：“且慢，为将须讲兵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庞涓骄悍轻敌，将全部精兵拉上前线，国内只剩些老兵残将，我军不如出其不意，直攻魏都大梁，卡住他的交通要道，逼他回救大梁，在途中选择有利时机狠狠揍他一下，既打了庞涓，又救了赵国，岂不是一举两得吗？”田忌大喜，于是立即改变战略部署，亲自率领齐军，浩浩荡荡向大梁进攻。

大梁告急的战报传到邯郸城下，庞涓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孙臆会来这么一手。他顾不得整顿队伍，立即下令全军撤出赵国，拨转马头回救大梁。魏军人困马乏，疲劳不堪，经过桂陵的时候，正遇上埋伏在道旁的齐军，齐军以逸待劳，“击其惰归”。没几个回合，魏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庞涓伏在马上抱头鼠窜，回头望见稳坐在战车上的孙臆，心里万分懊悔当初只剜了他的膝盖骨，没砍掉他脑袋！

庞涓如此仇视孙臆，并不单是为吃了败仗，根本原因还在于两人的政治路线是对立的。他俩原来是同学，一起从师学兵法。孙臆是齐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他刻苦用功，学识才能远在庞涓之上。庞涓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心里十分

妒忌，恨不得孙臆早死，由他逞能。他才能有限，却求功心切，还未满师，便急急忙忙跑到魏国去，当了上将军，想大大地出一番风头。

当时的魏国，虽还摆着一副小霸王的架子，可远非魏文侯时可比。自从魏武侯上台，逐渐抛弃了魏文侯时代的法家路线，奴隶主旧贵族乘机死灰复燃，大搞复辟活动，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法家吴起受逐，西门豹被旧贵族杀害，商鞅也呆不下去，“乃遂西入秦”。到了魏惠王的时候，国内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一点祖业眼看要弄光了，魏惠王不得不“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谁知招来了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开口曰仁，闭口曰义，胡说什么“仁者无敌”，搞得更加乌烟瘴气。魏惠王对孟轲鼓吹的这一套虽然若即若离，但他对“乘夏车，称夏王”这一套复古主张倒也颇感兴趣。他仿照周天子的制度，“广公宫，制丹衣，桎建九旂”。魏国这种腐朽倒退的政治空气，对一心想升官发财的庞涓倒很合适，反正操刀使棒的武将不多，庞涓称王道霸，封爵晋级，混得很不错。当时齐魏争战势不可免，利禄熏心的庞涓深怕孙臆日后到齐国去，自己不是对手，就虚情假意地请孙臆到魏国来，好拖住孙臆，不让他给齐国出力。但是，庞涓又怕魏惠王赏识孙臆，就卑鄙地诬陷孙臆，用酷刑剜掉了他的膝盖骨，还在他脸上刺上罪犯的标志，企图使孙臆不敢露面，无法施展才能。卑鄙无耻的儒家奴隶主的利己主义完全浸透了庞涓的灵魂，他已经堕落成魏国奴隶主贵族势力的一条看门恶狗。

然而，庞涓的毒手，虽能剜掉孙臆的膝盖，却挡不住孙臆

向法家思想迈进的步伐。他看穿了魏国儒家路线的黑幕，对庞涓一伙怀着深仇大恨。他十分怀念自己的家乡齐国，决心回到齐国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的齐国，走的正是上坡路。齐威王励精图治，任用邹忌为相，聘请法家慎到为顾问，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继续巩固地主阶级政权。他实行法治路线，“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提倡农战，奖励发展生产和有军功者，逐步改变了原先在儒家路线统治下“诸侯并伐，国人不治”那种贫弱局面，不几年，便使“齐国大治”。故国的强大，给飘流异乡的孙臆以极大的希望和温暖，他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刑余之人”而自暴自弃，暗下决心，要“因势辅时”，为在齐国贯彻法家路线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经常巧妙地躲过监视，拄着拐杖，在通往齐国的路边张望。终于，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他秘密地回到齐国国都临淄。孙臆的真才实学，很快博得了齐威王的赏识，不久便被委以重任。齐威王还拜他为师，跟着他学兵法，经常在一块起劲地研究、争论当时的战争问题。

从春秋到战国，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夺权的武装斗争连绵不断，汹涌澎湃。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孙臆，站在法家政治路线上，鲜明地亮出了自己进步的战争观。他痛斥孟轲一伙“积仁义”“以禁争夺”的谬论，指出在当时列国争战的情况下，用“克己复礼”的一套扑灭战火根本办不到。他认为，如今天下大乱，只有拿起武器，“举兵绳之”，用战争消灭战争，促进社会发展，这与商鞅“以战止战”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战国时期，战争的频繁推动了军事思想的发展。孙臆虽然军务很忙，但他十分重视总结作战经验，经常不顾鞍马劳累，抽空作

文，为后人留下了《孙臆兵法》这部重要的军事专著。这部军事著作基本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对战争的看法、态度和军事思想，它继承了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的军事思想，在某些方面又有发展。它反映了战国时期战争的一些特点，总结了一套比较灵活而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同时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比如孙臆强调“事备而后动”，意思是：要夺取战争胜利，必须做好战前充分的准备。孙臆还提出以寡击众的军事思想，他说，在“敌众且武，必战”的情况下，就要机智大胆地“辟（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集中自己兵力，分散和牵制敌军，用奇袭打它个措手不及，置强敌于死命。“围魏救赵”就是这样一个出色的漂亮仗。孙臆在法家的正确路线指导下，通过无数次战争的实践，军事指挥艺术飞快提高，成为封建地主阶级著名的军事家。桂陵战后，他已经是威震中原的名将了。公元前三四〇年，他又用“减灶诱敌”之计成功地指挥了另一场著名战役——马陵之战。

那年春天，野心勃勃的庞涓率领军队向韩国进攻，韩国打不过，忙派使臣去齐国搬救兵。齐威王又请孙臆为军师，协助田忌统率大军去救援。这一次田忌仍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将进攻的矛头指向魏都大梁。庞涓在桂陵之战中吃过苦头，这次预有准备，急忙忙撤兵回国。魏惠王同时派太子申率领留在国内的军队，前去迎敌，打算与庞涓纠合一起，夹攻齐军。牛鼻子牵到手了，田忌高兴地问孙臆这次有何妙计，孙臆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他说出一套退兵减灶、诱敌深入的计策：立即率军东撤，避敌锋锐，途中逐日减少营地军灶数目，使敌

人造成错觉，滋长轻敌情绪，冒险深入，然后再选择有利之机，伏击围歼敌人。

且说庞涓率魏军回国途中，听说齐国已撤兵，就下令紧追。他发现齐军遗留下来的军灶逐日在减少，第一天够十万人吃，第二天只够五万人吃，第三天，稀稀拉拉，顶多只够三万人了。庞涓被假象迷惑住了，趾高气扬地对部下说：瞧，齐兵哪是我的对手，三天逃亡的兵士就超过大半，还能打仗？暗暗发誓全歼齐军，枪挑孙臆，一洗桂陵之辱！庞涓利令智昏，忘乎所以，丢下步兵和辎重，只挑选一支轻骑，快马加鞭，猛追齐军。

孙臆早已撒下天罗地网，他估计魏军第三天傍晚可以到达马陵，那时那地，山深林密，月黑风高，正是歼敌良机。齐军一万名弓箭手，早已埋伏在马陵道旁。孙臆命令士兵，只要看到火光，就一齐放箭。他又下令把路旁的大树一齐砍倒，堵住道路，只留下道旁一棵，削去树皮，亲手写上几个大字。当天夜晚，庞涓果然昏头昏脑地闯到马陵，前锋刚进马陵道，便被横七竖八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时庞涓猛然发现旁边一棵大树上好象隐隐约约有一行字，他叫士兵点起火把，火光一闪，只见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触目惊心大字，顿时魂飞天外，还来不及转身，马陵道旁的伏兵早已万箭齐发，齐兵暴风骤雨般地冲着火光杀来。魏军大乱，大败而逃，太子申被活捉。庞涓走投无路，只得拔出佩剑，长叹一声：“遂成竖子之名！”恨恨地自刎而死，结束了他为儒家路线充当马前卒的可耻一生。



孙庞斗智,孙臆胜庞涓,究其原因,决不单纯是武艺高低的问题。“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魏国被一条倒退的儒家路线所统治,内外交困,四处碰壁,西败于秦,南败于楚,东败于齐,在军事路线上也渗透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根本无视社会的前进,情况的变化。政治路线的反动决定了其军事路线的错误。孙臆的法家军事路线服务于革新的政治路线,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此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庞涓纵然声嘶力竭,也难逃当奴隶主贵族殉葬品的可悲命运。孙庞斗智,实质反映的是齐魏两国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杰出的军事家孙臆,也正是因为贯彻、执行了法家路线,“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一九七四年在山东临沂西汉墓中发现的《孙臆兵法》残简,对研究先秦时期儒家法两家在军事路线上斗争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它有力地证明了孙臆不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而且是杰出的法家。他的军事思想完全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服务的。

---

注: ①② 《韩非子·八说》。

## 范雎<sub>(jū居)</sub>逐穰侯

事情发生在秦昭王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七一年)。

一辆秦王特使的专用马车通过了戒备森严的秦国边卡函谷关,风尘仆仆地向都城咸阳驰去。突然,马车被一队车骑拦住了。车骑中一辆华丽的马车上坐着的就是丞相穰侯魏冉,他大声盘问道:“使者此行魏国,没有带进外乡那些蛊惑人心、扰乱国政的食客游子吧?”使者战战兢兢地站在车厢门口说:“小人不敢。”穰侯狐疑地朝使者的车厢瞪了几眼,带了他那一帮走了。使者的马车继续赶路。忽然,车厢的门帘掀开了,从内闪出一人,一面对使者说:“穰侯为人阴险狡诈,此去绝不会善罢甘休,定要回来搜查。”一面急速地翻身跳下了马车。那人的身影刚从车道边的蜿蜒小路消失,穰侯派来的侍卫已经追上了马车,上车抄检了一番,一无所得,才快快离去。

好险哪!这个逃避了穰侯的搜查,匆匆隐去的人是谁?他,就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范雎。范雎是魏国人,出身贫苦,年轻时任魏国中大夫须贾的家臣。当时的魏国处在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下,范雎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抱负受到了以丞相魏齐为首的旧贵族的嫉视,他们诬陷他随从须贾出使齐国时“通齐”,打得他牙齿脱落,肋骨折断,昏厥过去。还将他

扔进茅厕，派狗腿子在他身上拉尿，最后还要杀害他。备受侮辱的范雎设法逃脱了魏齐的魔爪，改名为张禄先生，四处流亡，“不敢昼见（现）”。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范雎的法治主张更坚定了。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九十年前商鞅走过的道路，历尽千辛万苦，跟随着秦国使者来到咸阳，求见秦昭王。但是，一开始秦昭王没有重用他，只是置之客舍，款以粗茶淡饭。

一年后，秦昭王突然收到了一封“上书”。上面用含蓄的口气指出，在秦国“无能者”当职，“有能者”则为“圣王之所弃”；“上书”建议昭王推行赏罚分明的法治政策，指出“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断于有罪”；“上书”还告诫昭王：“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提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法治主张。“上书”最后还非常感慨地写道：这些事情要说得深，我不敢形之于笔墨；不说深，那说了也不中用（“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这封上书虽然不长，但是话中有话，欲言又止。秦昭王看完，陷入了沉思。

原来，这封上书中暗指的就是穰侯魏冉在秦专权的事，这正好说中了昭王的心事。魏冉是奴隶主旧贵族的代表，秦惠文王的舅子。自从秦孝公去世后，秦惠文王在旧贵族唆使下，杀害了商鞅，执行了一条打击法家，重用旧贵族的儒家路线。魏冉就是在这时上台的，后来封于穰城，称为穰侯。他是惠文王、武王、昭王三朝的“元老”，到秦昭王时，身为丞相，权倾朝野，声势烜赫。秦昭王刚即位时年纪很小，穰侯和昭王的母亲宣太后，以及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等旧贵族结成死党，掌握

了秦国的政权。穰侯一伙在经济上，拚命维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私家富重于王室”；政治上，专横霸道，“威振秦国”。穰侯还竭力迫害法家，把外来的地主阶级谋士一律斥之为“徒乱人国”的捣蛋鬼。在军事上，穰侯为了保持他们的世袭特权，推行了一条“远攻近交”的政策，向远隔千里的齐国发动了频繁战争，分散了兵力，造成了秦国对赵国阨与之战的惨败。当时，穰侯又亲自为将，准备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齐国的纲、寿，以扩大他的封地。对于穰侯一伙的胡作非为，秦昭王越来越不满。为了改变自己无权的地位，他开始和新兴地主阶级有了共同语言，逐渐信奉法家思想，认识到“儒无益于人之国”<sup>①</sup>，“法不立，乱亡之道也”<sup>②</sup>。就在昭王积极准备夺回丧失的权力的时候，他收到了这份上书。“这是谁写的？”署名是张禄。“张……禄……？”随从告诉他，就是那个从魏国来的张禄。昭王忙派人去请他到离宫来。

约定会见的时间到了。昭王的御乘刚到离宫前的长巷，就听到一片喧闹声，一群宦官在赶一个外乡人：“大王来了，还不快闪开！”但这人却用宏亮的声音嚷着：“秦国只听说有太后、穰侯！哪里来的大王呀？”这声音就象针芒一样，把秦昭王刺了一下。他忙叫卫兵去打听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外乡人就是化名为张禄的范雎。昭王急忙下车，恭恭敬敬地把范雎请上车，一起来到离宫。

离宫内寂静无声，左右侍卫都被屏退在外。昭王半跪而请范雎：“寡人倾听先生指教”。范雎谦恭地回拜，但是默然。过了片刻，昭王又跪而请问，范雎仍是默然。自是三回。昭王

最后诚恳地跪问道：“先生守口如瓶，真不肯畅言指点我么？”范雎三试，见昭王真心求教，就说：“臣极想为秦效力，但因所言及的都牵涉王亲贵戚，不知大王如何想法，故三问而不敢答。”昭王焦急地对范雎说：“事无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先生只管直说，不用忧虑。”在昭王再三恳求下，范雎激昂地说：大王既然如此诚意，“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贤于生！”他警觉地朝宫外看了一眼，就一五一十地谈了起来。他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昭王上受太后管束，下遭奸臣欺骗，长居深宫，终身迷惑，发展下去，“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强调必须逐步夺回国家政权。接着他又谈到秦国的对外战争。他说，秦国地形险固，士卒百万，战车千乘，又有勇于战斗的百姓，有这几个有利因素，要统一天下就象放出猎犬抓只野兔一样容易。但“至今闭关十五年”，进展不大，根本的原因是“穰侯为秦谋不忠”，上了他的“远攻近交”的当了。秦昭王急切地说：“请先生指教。”范雎以大量事实深刻批判了魏冉的“远攻近交”完全是劳民伤财、牟取私利的“非计”，“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所以仗是年年在打，但增加的是穰侯的土地，秦国的疆域却不能扩大尺寸。他主张采取符合秦国地主阶级利益的“远交近攻”政策，先取临近的韩、魏，由近而远，“霸王之业可至也”。范雎的主张博得了昭王的赞同，当即拜范雎为客卿，负责统一战争。

昭王任用范雎后，由于执行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统一战争取得了连续不断的胜利。几年时间里，攻占了韩、魏的许多城邑。以昭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地位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彻底消除以穰侯魏冉为首的奴隶主旧贵族集团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范雎再一次告诫昭王，现在“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他将穰侯，华阳等四宗旧贵族称为“四贵”，指出“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范雎还揭露穰侯进行的伐齐战争，胜利了，战果窃为己有，失败了，嫁祸百姓和国家；穰侯的亲信死党遍布朝廷上下，君主反陷孤立，如此下去必“失其国”。范雎再次指出，“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强调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保证国君的地位。昭王接受了这个意见，在范雎帮助下，“强公室，杜私门”，向“四贵”进行出击。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二六六年），他废黜太后，撤消了穰侯的丞相职务，将这一小撮旧贵族驱逐出关，免得留在秦国再掀波扬澜。穰侯被逐之后，家产装了一千多车，“宝器珍怪多于王室”，但是政治特权被剥夺了，复辟迷梦破产了。经过五年艰苦斗争，盘根错节的“四贵”，逐步瓦解了，范雎的法家路线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和旧贵族殊死搏斗的风口浪尖上，昭王拜范雎为相，秦国的地主阶级重又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昭王和范雎逐穰侯之后，又迎来了打击武安君白起的战斗。“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他是穰侯一手提拔起来的武将。在和赵国进行的长平之战中，白起根据范雎制订的战术，射死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国主将赵括，打了个胜仗。但他竟然擅自决定将生擒的四十万赵军，除二百四十个弱小者外，全部活埋。这种和法家路线背道而驰的错误行动，引起

“赵人大震”，“人心背秦”，严重妨碍了秦国的统一战争。但白起知过不改，反而居功自傲，无视中央。昭王和范雎屡次命令白起挂帅，攻打赵邯郸。他却装病要挟，“终辞不肯行”，并且散布流言蜚语，公然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昭王对此极为愤慨，和范雎商量之后，毅然免去白起“武安君”爵位，降为士伍，赶出咸阳城。白起拒不思过，内心不服，最后被秦昭王赐剑自杀。

范雎逐穰侯的斗争，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的又一次反复辟斗争的高潮。这场斗争主要集中在政权问题上，它标志着地主经济发展后，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法家同儒家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过这场斗争继续了秦国自商鞅以来一度中断的法家路线，使新兴地主阶级在秦国的政权机构中重又占据了优势。在昭王执政，范雎任相期间，秦国疆域不断扩大，百姓勤于耕作，官吏执法严肃，朝廷控制全国，处理百事迅速。当时杰出的法家荀况曾入秦作实地考察，他在对范雎发表观感时，称赞秦国的政治是“治之至”<sup>③</sup>，是七国中搞得最好的。荀况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顺应了历史的潮流。“非幸也，数也”<sup>④</sup>。在各诸侯国政权程度不同地旁落到信奉儒家思想的奴隶主贵族手里的时候，秦国却别开生面，取得了反复辟的胜利，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和昭王、范雎所执行的法家路线是分不开的。

当然，在秦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仍然很尖锐，旧贵族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在这种阶级斗争背景下，范雎动摇了，于公元前二五六年，“谢病请归相印”。他的后任，法家蔡泽也

只当了几个月的丞相，就因遭到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恶毒攻击，而主动辞职。这固然反映了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阶级局限性，同时也说明“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但是秦国经过商鞅、范雎两次打击奴隶主贵族，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占了优势。旧势力虽然还在蠢蠢欲动，但已成了强弩之末，无论怎样也阻挠不了新兴地主阶级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去夺取新制度的胜利。

---

注：① 《荀子·儒效》。

②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③④ 《荀子·强国》。



# “制天命而用之”

## ——荀况的法家思想

荀况(约公元前三一三——前二三八年)是从儒家营垒中冲杀出来的法家代表。战国末期,他曾以鲜明的立场同孟轲之流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可是,荀况这种从儒到法的革命性转变,却遭到历代儒家卑劣的歪曲与攻击。他们一方面把荀况的法家思想斥责为“悖圣人之意”的异端邪说,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把荀况和孟轲之流的斗争歪曲为“同门异户”的“内部之争”。其实,荀况与孟轲,一个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呐喊者,一个是没落奴隶制度的吹鼓手;一个进步,一个反动。彼此之间,从来就是黑白分明,泾渭难混。荀况的法家思想光辉,决不是历代儒生所能掩饰的。

荀况是战国时赵国人。那时战国七雄并争,较早实行封建变革,一度强盛的齐国由于抛弃了法家路线,逐渐衰弱了下来,“齐宣王褒儒尊学”<sup>①</sup>,在都城临淄的稷门之下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学宫,聘请当时有名气的学者讲学,成为战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年青好学的荀况也来到齐国游学,他的政治生活就从稷下学宫开始了。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战场,琅琅书声,

掩不住新旧思想的激烈搏斗。在同一个讲堂上，法家慎到讲过学，道家宋钲传过经，儒家“亚圣”孟轲也放过毒。荀况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来到稷下学宫以后，没有走死读书的路。他认真钻研各个学派的学说和思想，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影响，并且经常走出去，到社会的大课堂中走走看看。他曾风尘仆仆地游历了齐、楚、赵等国，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用事实来认识和检验各家的学说。当时的社会，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国的变法风起云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蓬勃发展，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天天土崩瓦解，现实的一切都是对孔孟之道的严厉的批判。尤其是从齐威王执政时崇法而兴到了齐宣王尊儒而衰的历史教训，使荀况看清了形势，立志做一个时代的先锋。尽管荀况在齐国曾“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受到过儒学的熏染，但他在社会现实的教育下，终于从儒家阵营里勇敢地冲杀出来，在稷下学宫树起了法家的大旗。学术上的地位，使他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主讲。许多有志青年都拜他为师，韩非、李斯就是他亲手培养的。他带领学生们去各国游学，一边学习变法经验，一边传播革新思想。晚年，他定居楚国兰陵，挥笔奋战，著书数十万言，那就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荀子》。

鲁迅说得好：“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荀况和孟轲差不多是同时代的，由于离的近，看得清，他抓住孟轲这个黑靶子，用战斗的法家思想武器，向着儒家“畏天命”、“法先王”、“性善论”等一系列反动思想猛烈开火。同时在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中，进一步为法家

奠定了理论基础。荀况这么一个法家思想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春秋末期以来，新兴地主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付出了血的代价，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当然还有许多含混不清的难题，新兴地主阶级要继续前进，迫切需要有人总结、解答这些问题。荀况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承担了这个任务，挺身而出出现在先秦法家思想界的前列。

当时，科学水平的低下，使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认识不清。孔孟之道利用这一点大肆宣扬反动的“天命论”，为维护奴隶主统治服务。荀况却针锋相对地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思想，在哲学领域向孔孟挑了战。孔老二不是摇头晃脑地哼什么“天何言哉？万物生焉，四时行焉，天何言哉”的澜调吗？吹嘘老天爷真伟大，一言不发，就叫万物照着他的意志转。孔老二不是还掐着指头恐吓说“君子有三畏”吗？其中第一条就是“畏天命”。在孔孟看来，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世间一切的绝对权威，它的意志决定着人间的治乱、吉凶、生死、祸福，从而也就安排了奴隶主贵族在人间的绝对统治。奴隶们的造反，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变法，都是违抗“天命”，都得遭到雷劈电击的“天罚”。新兴地主阶级要建立自己的统治，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天换地，就必须大胆否定反动的“天命论”。荀况的《天论》的问世，正是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需要。在《天论》中，他大声疾呼：“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着自己运动变化的规律；天也没有对人间发号施令的权利。什么“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统统是孔孟的骗子经。他又说，浩瀚的太空，日、月扬辉，星河灿烂，禹当国王是这样，桀当国王也是这样，“治乱非天也”，人的生死、富贵取决于人们能否“强本而节用”，能否遵循正确的途径办事，根本不存在着“天命”，又何必去“畏”、去“顺”呢！

对天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荀况响亮地回答：“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说，人类要改造自然、利用自然，首先必须征服自然。物质生产的方式和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荀况看到当时人们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日益显示出对“天”的能动作用，人定胜天的思想，正是在战国末期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在《富国》篇中，荀况把“制天命”的思想讲得更具体了。他批评一些人“为天下忧不足”靠天吃饭的思想，这些人觉得老天恩赐的现成的东西太少了，不够吃，不够用，是个很成问题的“公患”。荀况批驳说，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人有一双手，什么办不到？在大地上，人可以种五谷，种各种蔬菜，种瓜桃枣李，头年的收获中，只须取很少一部分当种子，第二年就可以获得新的丰收。人还可以养飞禽走兽，养鱼养鳖；还能种麻养蚕……天地间的万物，只要“人善治之”，就能使人类丰衣足食。荀况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也是他先进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认为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的，依然是人，而不是天。只要用一条法家路线“善治之”，就能推翻奴隶制，建立封建制，“天不能死，地不能埋”<sup>②</sup>，而“辟田野，实仓廩，便备用”的法家耕战政策，就是“人定胜天”的保证。“制天命而用之”，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战斗口号！过去法家西门豹治邺不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吗？地主阶级处在生气

勃勃的上升时期，他们是敢于改天换地的。人定胜天的理论，有力地驳斥了孔孟宣扬的“天命论”，对于新兴地主阶级能动地变革社会，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鼓舞、促进作用。

在当时的社会中，对人类来说，既然天不可“畏”，那么什么可畏？荀况说：“人妖则可畏也。”因为这些“人妖”“桔耕伤稼”，破坏生产；“余贵民饥”，鱼肉人民；“政令不明”，统治黑暗，很明显，这群“人妖”，就是儒家，就是奴隶主贵族。他们是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许多灾祸，都是这些人兴妖作祟的结果。荀况所处的时代，奴隶主阶级已被打得丢兵弃甲，封建制政权在各诸侯国基本建立，但奴隶主复辟的温床还到处存在。荀况看到了这个严重的威胁，他的警惕性是很高的。

“人妖”的存在，也有力地揭露了孟轲所谓的“性善论”。孟轲胡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实质上，孟轲认为“性善”的，只有奴隶主贵族。新兴地主阶级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则被攻击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轲从“性善论”出发，鼓吹“仁政”，为奴隶制复辟服务。荀况尖锐地揭穿了欺人之谈的“性善论”，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性恶论”。他冲破上智下愚的儒家定律，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通过后天的实践和学习而获得的。他认为“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小人”只要不断学习和努力，就可以“化性而起伪”，变为“君子”。虽然他离开人的阶级性抽象地谈人的善恶，没有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但他认为“君子”与“小人”本性一样，可以互相转化，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革新思想。从“性恶论”引出了荀况的法治思想，他

认为要使国家强盛，必须“明礼义，起法正”，“重刑罚”。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时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性恶论”强烈地提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要求，并驳斥了反动而虚伪的为奴隶主阶级涂脂抹粉的“性善论”，这就是它的历史作用。荀况，对儒家的反动内幕有比较透彻和比较深刻的了解，他把孔孟之徒斥为“贱儒”、“眚(mào)儒”。在《非十二子》一文中，他那支犀利的笔，几乎扫荡了孔老二嫡传的各派。他最清楚“仁政”、“礼治”是什么货色，那是亡国倒退之道，“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sup>③</sup>。荀况崇尚“法治”，认为“行法志坚”，“则可谓劲士”；“重法爱民，则能成为霸主。他主张论功行赏，废世卿世禄，赏罚分明才能算“王者之政”。荀况也谈“礼”，但根据他的法治思想作了全新的解释，赋予浓厚的法的内容。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sup>④</sup>。在这里“礼”就是法治的总纲。这是与孔孟“克己复礼”截然不同的一条政治路线，即靠“法治”，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一统天下。

“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奴隶主阶级几百年的统治，有自己一套“法”，新兴地主阶级虽然年青，但在百年的斗争风浪中，也创立了自己的一套“法”。荀况的历史观是“法后王”。《荀子》一书开宗明义第一篇就写着“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是后来者居上。“先王”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他们的业绩十分渺茫，“后王”的业绩才是“粲然”可见，靠得住的。“法后王”就是厚今薄古，革新前进。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荀况的思想理论研究，完全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现实斗争服务的。他不是闲逸清高的学者，而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一生奋战在时代的激流中，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几十年前，秦国发生了“商鞅变法”的大革新，如何看待这个运动，否定，还是肯定，儒法两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信而好古”的孟轲叹息“世衰道微”，把“商鞅变法”骂得一无是处，诅咒“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儒者不入秦”，儒家之徒们对秦国的实际一无了解，但众犬吠声，他们都跟着孟轲瞎鼓噪。为了反击儒家的叫骂，为了对秦国的革新运动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荀况毅然带着学生们专程赶到被儒家诬蔑为“好利而无信”的“虎狼”之国——秦国，对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进行实地考察。

春风，快马，大道。八百里秦川奔来眼底，多么富饶妖娆，这就是商鞅变法后的封建制秦国啊，那生气勃勃的景象，使荀况心绪也随着绵延的山峦起伏难平：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这不就是地主阶级的“后王”远远超过了奴隶主阶级的“先王”的铁证吗！这里的老百姓朴素勤劳，这里的官吏“明通而公”，封建制比奴隶制大大优越！秦国丞相，法家范雎让他谈谈“入秦何见”的访问观感，荀况从心底赞叹说：“治之至也”。秦国，将要接近新兴地主阶级法治的最高理想了，这是大有希望的国家，这是各封建诸侯国学习的典范。荀况在这里看到了封建大一统国家即将诞生的曙光，他满怀激情地对秦昭王说，秦国已经具备了统一六国，实现“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有利条件。秦国之行，使荀况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

料。回来后，他满怀战斗豪情，写下《强国》、《王制》等著作，为商鞅变法的胜利大声叫好，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秦国的变法实践就是荀况“法后王”的现实的现实基础。“后王者，天下之君也”，“法不贰后王”。“法后王”就是要以秦国为榜样，以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专政，进而实现大一统。荀况寄无限希望于秦国。历史终于证实了荀况的预见。在荀况过世不久，他的学生李斯辅佐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在当年荀况向秦昭王建议统一四海的地方，宣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诞生了！

当然，荀况作为从儒家营垒中冲杀出来的法家先导，仍不免带有某些儒家思想的痕迹。例如：他尖锐地批判了孔孟的反动复辟路线，却没有象韩非那样指名道姓地痛斥孔丘；他叛逆了儒家，痛骂那些“贼儒”、“陋儒”、“腐儒”、“俗儒”，但自己还曾以“正儒”自居，不肯摘掉儒家的帽子，等等。但是瑕不掩瑜，荀况毕竟是一个杰出的法家，他的革新进步的光辉思想，哺育了韩非、李斯等一代法家斗士，为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荀况的历史功绩是永远磨灭不了的。

---

注：① 《盐铁论·论儒》。

② 《荀子·儒效》。

③ 《荀子·富国》。

④ 《荀子·劝学》。



##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

“一本万利”和“一字千金”是两则很普通的成语。但查一查它们的出典，原来都同战国末期的吕不韦密切相关。

“一本万利”是投机商的口头禅。这个典故出自吕不韦和他父亲的一段对话。吕不韦是战国时期卫国濮阳人。他是个“家累千金”的大投机商，也是个“家僮万人”的大奴隶主。有一天，正在赵国京城邯郸做投机生意的吕不韦，见到了押在赵国做“人质”的秦昭王的孙子异人，经过交谈，感到“奇货可居”，便兴冲冲地赶回家，和他父亲商量起来。

“……你看，那些小人耕田种地，能获多少利啊？”

“哼！种地？顶多十倍！”——老奴隶主鄙夷地回答。

“那么经营珠宝呢？”

“我看有百倍之利！”——老家伙瞪着贪婪的眼珠说。

“如果立一个国君，能够获取几倍好处呀？”——吕不韦狡黠地问。

“立国君？呀！那就一本万利，无法计算啦！”——老奴隶主攥紧拳头，叫了起来。

“对！正是这样。”吕不韦高兴地将遇见异人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父亲，并立即策划抓住异人这个“奇货”，干一场“一

本万利”的政治投机生意。

吕不韦先去游说异人，告诉他自己愿意竭尽全力帮助他立国的打算。异人流落在赵国多年，无人搭理，一副窘迫相。一听吕不韦愿意解囊相助，顿时喜出望外，当下许诺：“先生如果计划成功，我做了国王一定和你共享天下。”于是，吕不韦又带了大批奇珍异宝窜到秦国，用重金贿赂了秦昭王太子安国君所宠爱的华阳夫人。经过吕不韦百般钻营，加上秦国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支持，公子异人终于回到秦国登上了王位，被立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也因此当上了丞相，封为文信侯，得到洛阳十万户的食邑。三年后，庄襄王死了，十三岁的秦王嬴政继位，秦国的大权就落到了吕不韦手里。他名为相国，号称“仲父”，实际上成了实权在握的“太上皇”。吕不韦就这样阴险狡猾地钻进了秦国的政权机构，成为战国末期没落奴隶主的主要政治代表。

吕不韦一上台，就把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化为复辟行动。在庄襄王元年，他刚当上丞相，就公开宣布“大赦罪人”，“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把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为了“继绝世”，吕不韦如丧考妣地“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为已被秦国推翻了的周朝天子招魂。为了“兴灭国”，他把被秦国灭亡了的卫国国君送到野王地方，帮助他复国。为了“举逸民”，吕不韦还迫不及待地网罗遗老遗少充当自己的“门人”、“食客”，在政治上大搞“存亡继绝”，向新兴地主阶级大肆反攻倒算。

吕不韦虽然在秦国声势赫奕,不可一世。但是,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事业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这是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便已过渡到封建制。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较量,以“商君之法”为标志的法家路线在秦国已经深入人心。吕不韦要改弦易辙,用儒家路线代替法家路线,必须大造反革命舆论,以征服人心。同时,吕不韦还有个难言的苦衷,这就是秦王嬴政虽然年轻,却对他祖先所执行的法家政策很感兴趣,从小就立志做法家路线的忠实继承者。这时,秦王政已经成年,按规定即将举行“冠礼”,亲理政事了。老奸巨滑的吕不韦完全明白,这位年轻的国君亲政将意味着什么。为了推行他的反动路线,必须用先发制人的方法束缚与控制秦王政,吕不韦便赶在他亲政的前一年,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丑剧。

公元前二三九年(秦始皇八年)的一天,咸阳城门口公布了一部名曰《吕氏春秋》的书简,洋洋二十余万言。最有趣的是,旁边还挂着布告说:谁能对这部书增删一字,悬赏千金。一字千金?这可是一笔很大的赏金啊!但是当看热闹的人群知道这是相国吕不韦的大作,都一个个摇摇头,四下散了。谁也不愿为此而招杀身之祸。

《吕氏春秋》这部书,是吕不韦为了复辟奴隶制的需要,雇佣了一批儒生拼凑起来的。吕不韦装腔作势地以“一字千金”的形式大肆宣扬,目的是要炫耀他的反动权势,借此钳制社会舆论,将反动的儒家思想在秦国定为一尊。这部书分成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篇,内容十分庞杂。它标榜“兼儒墨,合名法”,网罗九流百家之说,是一部以“杂家”为幌子贩

卖儒家黑货的反动著作，是全面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吕氏春秋》所以打着“杂家”的旗号，是因为当时奴隶主阶级已经日薄西山，孔孟儒家的“显学”地位也岌岌可危；而秦国又是法家势力最强大的地方，儒家更是声名狼藉。吕不韦公开扯出儒家的破旗是不行了，只得用这种“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这是奴隶主阶级在彻底没落时候采取的更狡猾更隐蔽的手法。然而“东涂西抹不成妆”，“杂家”的面目终究掩盖不了《吕氏春秋》极右的儒家本质。

《吕氏春秋》疯狂地鼓吹复辟奴隶制度，恶毒地攻击新兴的封建制度。面对当时的社会大变动，吕不韦没有半点看得上眼，破口大骂，又是“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又是“当今之时，世阨甚矣”，纯是一派世纪末的悲鸣。他认为，这都是由于周朝奴隶制被破坏，周天子垮台的结果，他哀叹“乱莫大于无天子”，时刻盼望周天子重新上台，企图倒退到西周的奴隶制时代去。吕不韦还拚命推销奴隶制的分封制，主张分裂，反对统一。书中蛊惑人心地说：“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居然认为国家越分裂，就越能传世长久，美名无量。吕不韦根据这种杜撰的理论鼓吹“存亡继绝之义”决不可废，竭力扶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维持诸侯割据的局面。战国末期巩固和发展封建制，统一全中国的洪流一泻千里，吕不韦的倒行逆施是对历史的反动。

《吕氏春秋》从头到尾贯串了一条尊儒反法的黑线，对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长期奉行的法家路线，进行了全面的反攻

倒算。吕不韦气势汹汹地诅咒法家严罚厚赏的政策是“衰世之政”。他用偷梁换柱的手段将以耕战为“本”的法家路线，篡改为以仁、孝为“本”的儒家路线。他极端仇视法家，咒骂商鞅“无义”、吴起“不肖”，邓析该杀，胡说任用法家治国“愈治而愈乱”，丧心病狂地叫嚣，只有把法家斩尽杀绝天下才能太平。<sup>①</sup>吕不韦对复辟倒退的祖师爷孔老二则极尽吹捧之能事，赞扬他治国有方，谁也比不上他的政治才能。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就是因为不按孔丘那套办，所以弄得礼崩乐坏，赤裸裸地暴露了他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吕不韦还利用《吕氏春秋》大造篡政夺权的反动舆论。他极力宣扬传说中古代先王“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的禅让制。书中记载了一个寓言，说是有个人要将一个婴儿扔下河去，婴儿吓得哇哇大哭，有人惊讶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人傻乎乎地回答，因为这孩子的老子是个游水的好手呀！吕不韦就此大发议论：“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sup>②</sup>？”弦外之音，就是对秦王政说，别以为你父亲当了国君，你就准能当，还是让贤吧。吕不韦还大讲做一个好君主应该“无智”、“无能”、“无为”，要求秦王政做一个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傀儡，否则就要“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这些正是吕不韦时刻觊觎秦国最高权位的野心的自我写照。

但是尽管吕不韦费尽心机，秦王政却毫不理会这些儒家黑货和威胁恫吓，坚定不移地执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吕不韦见搞文的一手不行，就决定搞武的，加紧扶植另一个奴隶主复辟集团嫪毐(lào滂ǎi挨)集团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

嫪毐原是个犯了流氓罪，被秦国官吏抓进监牢的专政对象。吕不韦在推行复辟倒退路线，大搞招降纳叛的过程中，选中了他，将他释放出狱并偷偷塞进皇宫。后来，嫪毐博得太后宠幸，于公元前二三九年被封为长信侯，拥有大量封土和奴隶，成为秦国第二个最大的奴隶主政治代表。秦国的政治局面一度落在吕、嫪两家的控制之中。

公元前二三八年，年满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威风凛凛地从咸阳来到在雍地的祖庙，举行“加冠”典礼。就在这一天，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吕不韦和嫪毐却正在策划着一场反革命暗杀阴谋。

秦王政冠礼结束，当夜留居在雍的蕲年宫。利令智昏的嫪毐错误地认为时机已到，趁夜盗用御玺，纠集了自己的爪牙，欺骗宫廷卫队，组成一支反革命政变武装，准备进攻蕲年宫，谋杀秦王政，窃取政权。吕不韦狡猾地躲在一旁，甜滋滋地准备混水摸鱼，盘算着一旦嫪毐得手，秦国就是我吕某的天下。但是吕不韦高兴得太早了。秦王政果断地识破了这一阴谋，临危不惧，立即发出反击命令，派遣相国昌平君和昌文君分别带兵镇压叛乱。顷刻之间，便将嫪毐拼凑的乌合之众打得落花流水，嫪毐落荒而逃。秦王政平叛回到咸阳，心怀鬼胎的吕不韦推病不敢出来迎接。秦王政心中有底，决定各个击破，暂不打草惊蛇。他下了通缉令，不久就逮捕了嫪毐及其死党，分别处以死刑，拔掉了这一祸根。

揪出了嫪毐，就暴露和孤立了吕不韦。第二年，秦王政根据调查，掌握了吕不韦参与嫪毐政变的确证，就毫不客气地按

法家“刑不避大夫”的原则，罢了吕不韦的相位，并勒令他迁居洛阳。但吕不韦这个复辟头目贼心不死，人在洛阳，心在咸阳，明里恭顺，暗中和六国奴隶主旧贵族勾勾搭搭，妄图东山再起，推翻秦王政的统治。秦王政认识到，要建立新兴封建制，完成统一事业，就必须尽快踢开这块绊脚石。公元前二三五年，秦王政写信给吕不韦，严厉谴责这个野心家：你有什么功劳于秦，竟能得到食邑十万户？你凭什么亲眷关系，竟敢要当我的“仲父”？最后下令：“你给我赶快滚到蜀郡去吧！”看到这里，吕不韦一阵寒颤，脸色惨白，感到大势已去，象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一下子瘫了下去。“一切都完了”，这个逆潮流而动的复辟狂发出绝望的哀鸣，喝了一杯毒酒，见孔老二去了。

秦王嬴政和吕不韦的这场斗争是儒法斗争史上的一个重大战役。这场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秦国的范围。实质上是不甘心灭亡的奴隶主贵族，与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展开的一场生死搏斗。在这场斗争中，年轻的秦王政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崭露头角，初试锋芒，大踏步地跨上了政治舞台，他取得了反复辟斗争的经验，巩固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

秦王政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向着统一全中国的目标迅猛迈进。

---

注：① 《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

② 《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

# 先秦法家思想集大

## 成者——韩非

韩非双眉紧锁，全神贯注地奋笔疾书。

“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sup>①</sup>！看着竹简上这句斩钉截铁的话，韩非不禁思潮翻滚。不久前和堂谿公争辩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这天，韩非也是正在埋头著书，忽报有一个叫堂谿公的来访。堂谿公一进屋，就胡诌开了：“我听说，服礼辞让，修行退智，才是保身之道。现在先生主张立法术，设度数，依我看，这可是会危于身而殆于躯的啊！”他顿了顿，又以吴起、商鞅惨遭杀害为例，喋喋不休地说：“先生偏偏舍弃保身之道，而冒险去干危殆之行……唉，我看是太不足取了！”韩非耐着性子听完这番迂腐的说教，用犀利的眼光对着堂谿公，坚毅地回答：“感谢老先生的好意。但我无法从命。废先王之教，行法术之治，这正是我信仰的事业。为了实现这个事业，却又贪生怕死，这是贪鄙之为。我看，更不足取！”……

堂谿公的话非但没有把韩非吓退，反而更激起了他对韩国窃据政权的奴隶主贵族的仇恨。他义愤填膺地控诉了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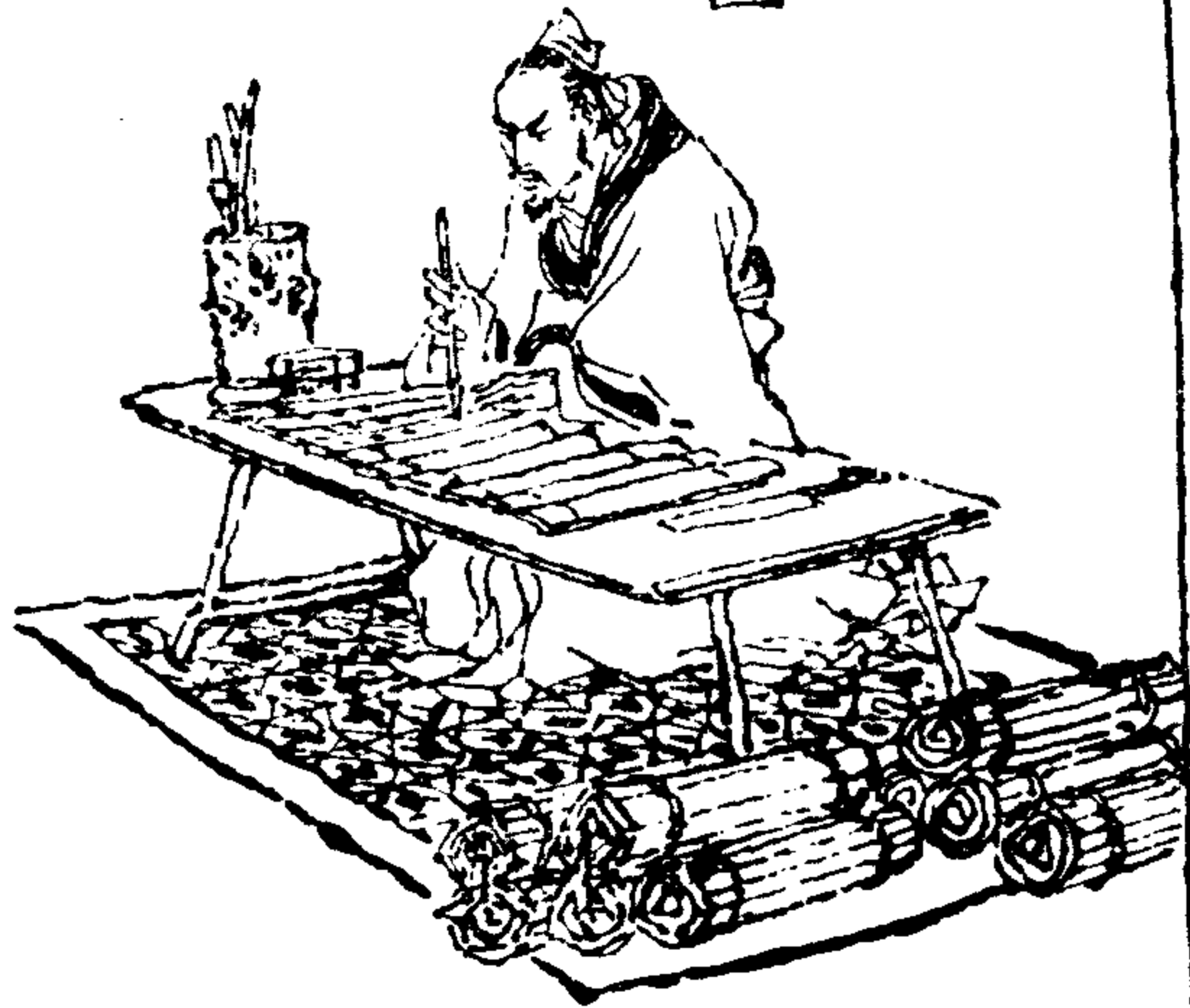


備忘錄中書圖

圖三二

和

和



主贵族镇压法家的罪行和儒家所造成的法家人士“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的血腥恐怖；淋漓尽致地描绘了韩国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的艰难曲折。著名的《孤愤》篇就这样问世了。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国。当时，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经过几百年艰苦卓绝的阶级搏斗，在各诸侯国已相继夺取政权，实行了变法。但是，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法家思想故乡之一的韩国，在战国初期就发生过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韩昭侯时，又任用法家代表申不害实行变法，“修术行道，国内以治”<sup>②</sup>。申不害一死，韩国的变法活动也随之夭折，奴隶制复辟的阴霾笼罩着全国。一小撮篡夺了政权的奴隶主“重人”“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物以同类聚，人以阶级分。奴隶主贵族得势，一群“盛容服而饰辩说”的儒家之徒也蜂涌而来，大肆制造复辟舆论，“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韩国从此“主卑国危”，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在对外战争中，根本无法抵挡强盛的秦国攻伐，丧城割地，连续败退。韩非眼看着一个好端端的封建国家弄得如此破败衰微，非常痛心。他多次上书韩王，建议“服术行法”，励精图治。但在儒家反动路线的恐怖下，韩非得到的只是蛮横无理的阻挠和危言耸听的威吓。韩国的弱乱，是中原六国向封建制发展过程中走过的“之”字形道路的一个缩影。

为什么原来称霸一时的中原六国纷纷衰落下去，而被人看不起的秦国却越来越强盛？为什么新兴地主阶级经历了长期斗争，却不能牢固地掌握政权？新兴地主阶级需要总结商

鞅以来的变法斗争和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个任务落到了韩非的身上。

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家庭。韩国在儒家得势下出现的弱乱形势，使他年青时就憎恨儒家的学说，而好“刑名法术之学”。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复辟斗争的需要，开始了法家理论的总结。当他听说杰出的法家思想家荀况在楚国讲学的消息，马上远道赶到楚国，和李斯一起拜荀况为师。韩非从荀况“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法后王”的进步历史观和对孔孟仁义道德的批判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在离楚回国时，韩非还沿途考察了各国变法革新和政治经济情况。回国后，就以自己参加斗争的亲身经历和大量研究成果，孜孜不倦地开始了理论总结工作。

韩非从七国成败的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意思是国家的强弱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贯彻法家路线。韩非深刻指出：“慕仁义”，也就是搞儒家的那一套，必然要导致失败！他用春秋时期宋楚泓水之战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个道理。泓水之战中宋国开始占优势地位，但是那个蠢猪式的宋襄公一味讲仁义，竟眼看着楚军安然渡过河，整好队，结果丧失战机，反被原来处于劣势的楚军杀得大败，宋襄公也吃了一箭重伤身亡。韩非说，这就是“慕仁义之祸”呀<sup>③</sup>！他把秦国和魏、赵、韩三国作了比较后指出，“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魏、赵、韩三国，推行了儒家路线，造成“弱乱”；秦国实行“法治”，路线对头，所以强大。一句话：“明法者强，慢法者

弱。”韩非当然不可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路线问题，但他指出“慕仁义”与行法术是水火不相容的，对儒法斗争从路线上作了理论总结，这就使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复辟斗争达到了一个更自觉的高度。

战国末期，没落奴隶主贵族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变换反革命伎俩，混入地主阶级政权内部。这些复辟势力的代表“言是如非，言非如是”，是一伙阴险毒辣的政治骗子。这些“奸人”的危害性，韩非是耳闻目睹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当时流传着的“狗恶酒酸”的故事：在宋国，有个卖酒的，他的酒质醇芳，买卖公平，酒店的招牌也做得很大，然而就是很少有人光顾，酒都变酸了。什么原因呢？原来酒店里有一只恶狗。恶狗挡门，谁还敢来呀！韩非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国亦有狗”，那些篡了权的奴隶主贵族就是“猛狗”，他们对法家人士狺狺狂吠，“迎面齧（hé 合）之”，搞得卑主危国<sup>④</sup>。韩非说，要防止奴隶主贵族篡夺政权，就应该粉碎奴隶主复辟集团，“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坚决实行地主阶级专政。

在韩非之前，商鞅重视“法”，申不害重视“术”，慎到重视“势”。他们都抓住了法家路线的一个侧面，进行了变法实践。但是由于法治路线的不完善，没有取得最后胜利。韩非“以法为本”，把“法”“术”“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法”，是指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术”，是根据法家路线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势”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即国家政

权。“法”、“术”、“势”三者的结合形成了地主阶级专政完整的理论，这是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新发展，为胜利进行反奴隶主复辟斗争，完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地主阶级统一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要反复辟就必须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在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中，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儒家思想“乱上反世”的反动作用，在《五蠹》《显学》等战斗檄文中尖锐地指出，“儒以文乱法”！而“儒之所至，孔丘也”。这是一个凝聚了多少法家前辈鲜血的深刻结论啊！韩非抓住儒家复辟的祖师爷，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在先秦法家中可以说是第一个人。

是主张变法革新还是主张复古倒退，这是执行什么政治路线的理论根据。韩非继承了荀况“法后王”的理论，对孔丘一伙“法先王”反动观点进行了迎头痛击。他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论证了社会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胜过一代。韩非对儒家所崇拜的“先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说“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当然，奴隶主阶级在它上升时期也是生气勃勃的，韩非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但他敢于鄙视这些儒家众口皆碑的“圣贤”，充分表现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厚今薄古的战斗风格。韩非认为治理国家不应遵循古法，墨守成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时代变了，相应的政治措施也要变。他辛辣地鞭挞那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象“守株待兔”一样愚蠢可笑。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法新圣”、“美当今”的主张，理直

气壮地歌颂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事业。

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所谓“仁义道德”。没落奴隶主阶级面对日益衰落的政治局面，不敢公开亮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只能用“爱人”“仁政”这些娓娓动听的词儿来美化奴隶主阶级专政，反对地主阶级的暴力革命。韩非揭露说，你们的“先王”们一面判人死刑，一面却淌着眼泪，装出“仁义”的样子，所谓“仁义”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当时有这么件事被儒生们传为美谈：鲁国有一个怕死鬼，当兵打仗每次都当逃兵，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家里还有老父，我战死了，谁去赡养他呀！”孔丘听说了，竟如获至宝，“大孝子，大孝子”地赞不绝口，把他推荐给国君当了官<sup>⑤</sup>。韩非愤怒地指出：“为政如此，则国必乱”，“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孔丘的“仁义”“孝悌”是亡国的谬论！把孔孟之道的虚伪性和危害性揭露无遗。

韩非还拆穿了儒家之徒贩卖孔孟之道的骗人手法。儒家之徒言必称尧舜，还恬不知耻地自谓“真尧舜”。韩非举了个寓言说，齐王曾经问一个画匠，画什么最难，画什么最容易。画匠回答说：画犬、马最难，画鬼魅最易。为什么呢？因为犬、马这些东西，人们天天见到，不能乱画；至于鬼魅，根本无人知晓，任你乱涂乱抹，谁也不能非难<sup>⑥</sup>。韩非尖锐指出，儒家就是一伙只能绘神绘鬼的骗子。尧舜已经死了几千年，你们却抬出来瞎吹，这不是“非愚则诬”吗？韩非还讲了这样一件趣闻，说是有个走江湖的向燕王自荐会不死之术。燕王急忙派人去向他学。但是使者未到，那个会不死之术的人已死了。燕王大怒，怪罪使者拖延，将他杀了。“燕王大谬！”韩非说，“那

个自称会不死之术的，不能使自己不死，安能使燕王长生？”<sup>①</sup>韩非由此想到了儒家的说教，他揭露说，孔丘之徒鼓吹“听吾言，则可以霸王”，但是你们的鼻祖孔老二成天说仁道义，以天下之大，却只招到七十个弟子，而死心塌地的却只有他自己一个，落了个孤苦伶仃的下场<sup>②</sup>。自身尚且难保，却说能使别人“霸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吗？所以，韩非把孔孟之徒列为危害国家的“五蠹”之首，他以极大的愤怒大声疾呼：铲除这些“邦之蠹”！

就这样，韩非从政治路线，斗争策略，到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各个方面，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批判了儒家学说，写下了一部十余万字的《韩非子》，将法家前辈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历史教训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最后胜利提供了思想武器。

后来，韩非的作品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到《五蠹》、《孤愤》，不禁拍案叫绝，连声感叹：“啊，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作者，和他在一起谈谈，那就是死也无所悔恨了！”李斯告诉秦王，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他的同学韩非。秦王政思贤若渴，设法把韩非接到了秦国。韩非入秦后，积极为统一事业出谋献策。后因李斯的妒嫉、排挤而死在秦国。韩非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战斗了一生。他虽然没有能够亲手去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他却用《韩非子》这部光辉的著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史上竖立了一座里程碑。《韩非子》的诞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成熟。秦始皇实践了韩非所提出的法治理论，创造了空前的伟业。

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韩非的法治理论也包含着镇压劳动人民的一面。他的历史观最终逃脱不出唯心史观的窠臼，因此他批判孔孟之道也不可能是彻底的。韩非和他的法家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自己时代的局限。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韩非的法家思想在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他的反孔篇章，直到今天，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

注：① 《韩非子·孤愤》。

② 《史记·韩世家》。

③⑥⑦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④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⑤⑧ 《韩非子·五蠹》。



# 千古一帝

“秦王骑虎游八极，  
剑光照空天自碧。  
羲和敲日玻璃声，  
劫灰飞尽古今平”<sup>①</sup>。

这几句诗是唐朝诗人李贺对秦王政丰功伟绩的热情讴歌，极其生动地描绘出当年秦王政率领千军万马，进行艰苦卓绝统一战争的战斗形象。秦王政的一生是坚持前进的一生，既是统一中国确立封建制的第一人，又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厚今薄古的改革措施，成为先秦法家路线的伟大实践者，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千古一帝”。

公元前二三〇年，秦军在秦王政的领导和指挥下，首先灭掉了韩国。经过十年激烈的鏖战，赵、魏、楚、燕也相继被秦军灭亡。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又命令负责灭燕的王贲大军乘胜前进，挥戈南下，指日拿下最后一个诸侯割据的齐国。旌旗猎猎，金鼓咚咚；尘土飞扬，战马嘶鸣。秦军挥鞭长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齐国压去。此时齐国国力衰弱，军心涣散。秦军以泰山压卵之势直捣齐国首都临淄，齐国统治集团进退维

谷,只得树起了降旗。就这样,秦王政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一代雄主,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统一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期法家路线的伟大胜利。秦王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坚持执行法家要求革新,主张统一的政治路线,得到了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秦王政又任用了荀子的学生、著名的法家李斯和法家军事家尉繚,采纳了他们提出的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为统一战争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秦王政根据法家“因功行赏”,和“任人唯贤”的原则起用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将领,并给有错误的将领以立功的机会。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秦王政三次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政治路线的正确,使秦国的千军万马以破竹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取得了统一战争的最终胜利。

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的胜利,也是对垂死挣扎的奴隶主旧贵族的毁灭性打击。那些旧贵族坚持分裂,破坏统一,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他们有的派间谍入秦,挑拨离间;有的用计消耗秦国的国力,拖延战争。在各种破坏活动中,燕国的太子丹导演的“荆轲刺秦王”的丑剧,是一个典型事件。

荆轲是燕太子丹豢养的门客,一个死心塌地为奴隶主阶级效劳的亡命之徒。燕太子丹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为了挽救他那个阶级覆灭的命运,派遣荆轲以进献秦国叛将樊于期的头颅和燕国军事地图为名,带着一把浸透毒药的锋

利匕首，去谋刺秦王政。这一天，在威武的咸阳宫大殿上，秦王召见了荆轲。荆轲装作“归顺”的样子献上地图，秦王接过地图打开慢慢展阅，突然，“图穷而匕首见”，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出现在图卷里。说时迟，那时快，荆轲凶相毕露，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操起匕首，就要行凶，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秦王敏捷地转身一闪，荆轲一个趔趄（liè烈 qiè妾）扑了空，秦王趁势拔剑反击，一剑砍断了荆轲的一条大腿，荆轲惨叫一声，滚下台阶；他还要垂死挣扎，再次把匕首掷向秦王，结果击中了铜柱，秦王又连砍数剑，处死了这个反革命小丑。这出“荆轲刺秦王”的阴谋，最后以“秦王斩荆轲”而告终。

没落阶级的阴谋暗杀、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段，是它们的阶级本性及其反动政治路线的必然表现。但是，这只能加速它们的灭亡，绝对阻止不了新兴地主阶级走历史的必由之路。要求统一的汹涌潮流，将席卷一切残枝败叶，“一去兮不复返”。经过整整十年的艰苦奋战，秦王政终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成就了“超五帝，侔三王”的丰功伟绩。在统一后的第一次朝会上，秦王政决定改尊号，将“秦王”改称“始皇帝”，以此来颂扬他所开创的封建帝业的胜利。从此，以“千古一帝”秦始皇为标志的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揭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被推翻的六国旧贵族，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对新制度极端不满，挑起了秦王朝向何处去的论战。就在秦始皇召开的第一次朝会上，隐藏在秦王朝内部的奴隶主分裂势力的政治代表丞相王绾(wǎn宛)跳了出来，他振振有词地说：现在天

下初定，不分封子弟，无法太平。主张在燕、齐、楚等地分封诸侯王，恢复分封制。王绾的话得到一部分人的随声附和，“皆以为便”。在这场斗争中站出来批判这种开倒车的谬论的是李斯。李斯一向坚持法家路线，在统一战争中是秦王的重要参谋，这时已担任最高司法长官廷尉的职务。他见分裂势力猖狂挑战，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的同姓子弟不能说不多，但到头来却是‘相攻击如仇讎’，相互残杀，视如仇敌，连天子都无法禁止。现在陛下好不容易统一了海内，应当设立郡县，不搞分封，这才是安宁之术。分封诸侯是搞倒退，势必后患无穷！”李斯的一番话把王绾一伙驳得哑口无言。秦始皇坚决支持李斯的意见，他坚定地说：“廷尉说得对！过去天下战乱不休，就是因为诸侯林立，割据称雄。如今再搞分封，无异于自己树兵，要想天下安宁，那就难了！”秦始皇批判了主张分封倒退的谬论，下令废除奴隶制的分封制，不搞国中有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由中央派官吏到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郡县制的实施巩固了秦王朝的政治统一。百代都行秦政法。郡县制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统一的关键措施，“垂二千年而弗能改”<sup>②</sup>，这是秦始皇对历史的伟大贡献。

政治上的统一局面，为经济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秦王朝建立前，由于诸侯割据造成的混乱局面，严重阻碍着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威胁着国家的统一。秦始皇为了取得统一事业的胜利和巩固，雄心勃勃地在广阔的领域内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抓了三件大事。

统一法令，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秦王朝建立不久，秦始皇就向全国颁布了一项重要的法令——“更名民曰‘黔首’”。“黔”是黑色的意思。秦朝尚黑，黑色是社稷的象征。“民”在商、周奴隶制时代是奴隶的代名词。在奴隶主眼里，“民”根本就不是“人”，只是一种可以任意买卖和屠杀的会说话的工具。那时，新兴地主阶级被奴隶主贵族称为“庶民”，在政治上也没有丝毫地位。现在新法令将“民”这个侮辱性的称呼改称为“黔首”，这是秦始皇对过去受奴隶主阶级压迫的阶级的一种尊称，从法律上肯定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获得解放的奴隶的社会地位。这项法令下达后，天下“大酺”，成千上万的“黔首”饮酒欢呼。热烈庆祝这一改变名称的措施。公元前二一六年，秦始皇又颁布了第二项重要法令——“使黔首自实田”。规定地主和自耕农只要按土地的实数向国家缴纳一定的赋税，就可以取得土地的私有权。秦始皇颁布的这二项法令，摧毁了六国残存的奴隶制土地所有制，确定了封建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秦始皇的法令还规定“强本抑末”，“重农抑商”。从公元前二一九年到公元前二一一年，把十几万户人家分别迁到人烟稀少、土地辽阔的地区，用赐爵、免役、奖励牲畜和粮食的办法鼓励开荒，发展农业。同时，把犯罪的官吏和奴隶主商人迁徙到今两广一带，把十二万户六国旧贵族迁到咸阳，加以监督，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文字。秦王朝刚建立时，面临的情况是“田畴异亩，车途异轨”，“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

字异形”<sup>③</sup>，货币，度量衡的差异更是悬殊。秦始皇抓住这些统一的重要环节，在全国统一后的第一年就开始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工作。秦始皇将统一的度量衡器具加刻诏书发至全国，替代了原来各国长短、大小、轻重和进位单位都各不相同的度量衡，并划一全国货币，铲除了原六国贵族的地方独立性。秦始皇统一车辆的轨道，拆毁原六国各自为政修建的关卡、堡垒等障碍，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世界筑路史上罕见的四通八达的驰道，秦始皇的千骑万乘在这些驰道上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巡游。车同轨和筑驰道对巩固中央集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秦始皇还推行了“书同文字”的政策。文字是人类交流和保存思想、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统一国家的建立，对文字也提出了统一的要求。但是秦统一以前的战国古文，形体紊乱，参差不一，一个简单的“马”字，就有近十种写法。秦始皇对汉字形体结构进行了规范化，使汉字最终超脱了图画文字的框框，奠定了后代汉字的基本结构。我国地广人众，各地方言差别很大，文字的统一，使字形字义基本一致，保证了中央集权的巩固。“书同文字”，对构成我国文化主体的汉族文化的统一和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秦始皇的这些统一措施，为巩固新兴封建制和以后长期保持全国统一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当时处于我国北方境内的匈奴奴隶主贵族集团对日益富强的秦王朝垂涎三尺，不断用骑兵入侵中原，到处烧杀掳掠，北方人民惨遭匈奴奴隶主铁蹄的蹂躏，秦政权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公元前二一五年，秦始皇

亲巡北方，坚决主张以抗战来保卫新兴的封建制。他派遣大将军蒙恬带领三十万大军戍边，以后又将太子扶苏派去督战。秦军两次击败匈奴贵族的部队，迫使匈奴不敢南下。秦始皇把收复的大片土地，分设了四十四个县，加强管理，并把许多刑徒、罪犯迁到那里屯垦卫戍。为了长远之计，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动员了几十万士卒和民工，按地形的高低，用大块的石头，连接和加固原秦、赵、燕、齐的长城。人民用勤劳的双手，高度的智慧，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鸭绿江边），驰名世界的万里长城。它象一个战士高高屹立在秦王朝的北大门，威武不屈，防御了我国北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活动，保护了新兴封建政权。万里长城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历史丰碑。包括叛徒、卖国贼林彪在内的一切反动派利用捏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攻击秦始皇，只能暴露他们尊孔反法、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他的一系列措施，也都是为统一事业这个中心服务的。秦王朝统一后消除了战国时诸侯割地为城，以邻为壑，战乱不休的局面，“虽山川如故，而景物全非”，生产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秦始皇时造的有名粮仓“敖仓”，到了楚汉相争的第三个年头，还存有大量的储备粮，成为刘邦重要的粮食基地。

在奴隶制的废墟上建立起封建王朝的大厦，这对秦始皇来说是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但是，秦始皇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他蔑视既往，敢于进取，创立了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遵循的一整套宏伟规范。在战胜奴隶制、巩

固封建制的革命事业中，秦始皇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历史证明，秦始皇是一个“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尽管他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无愧为厚今薄古的专家，中国封建王朝的“千古一帝”。

- 
- 注：① 《李长吉集·秦王饮酒》。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③ 许慎：《说文解字·叙》。



#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治时期采取的一次镇压奴隶主复辟活动的暴力措施。在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史中，围绕着对秦始皇的评价，毁誉纷纷。其中“焚书坑儒”这一重要政治事件，更是争论的焦点。包括叛徒、卖国贼林彪在内的一切反动派都心有余悸地切齿诅咒“焚书坑儒”；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焚书坑儒”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行动，是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

还是让历史来发言吧。

千古一帝秦始皇建立了秦王朝后，并没有停歇下来。他为了把自己所开创的封建帝业“传之无穷”，日以继夜地工作，他每天规定要批阅一百二十斤重的竹木简奏章，不看完不休息。但是，奴隶主阶级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复辟活动。秦始皇接二连三地接到了从各地呈送来的关于奴隶主贵族复辟捣乱的报告：

东郡送来奏章汇报说，一块大陨石落在东郡田野，有个旧贵族分子在石上偷偷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奴隶主贵族采取这种拙劣的伎俩假造天意，妄想恢复诸侯割据的局面。

这是华阳送来的报告：在一个风寒月黑的秋夜，秦廷使者从关东路过华阳平舒道的时候，突然从草丛中跳出一个乔装山鬼的人，当道拦住使者，尖声大叫：“今年祖龙（指秦始皇）死”，然后一溜烟逃跑了。

……

这些鬼鬼祟祟的复辟活动表明，奴隶主阶级时刻都在伺机反扑。如何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这个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在新兴地主阶级面前。秦王朝建立以后，奴隶主贵族政治上被打倒了，经济上被剥夺了，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有相当势力，他们凭借这块世袭领地，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各地送来的敌情报告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而更严重的是，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在朝廷的七十个博士中就有不少是笃信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他们利用没落阶级的反动意识形态制造反革命舆论，经过密谋策划，一会儿，煽风点火于茶馆酒肆，一会儿又造谣生事于街头巷尾，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自己，妄想恢复旧制度，形成了一股反革命的逆流。

新兴地主阶级要巩固政权，防止奴隶制复辟，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专政，战胜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抗。一场酝酿已久的生死斗争，已势不可免，一触即发了。

公元前二一三年的一天，秦始皇在雕龙盘柱的咸阳宫里大宴群臣。秦廷的博士官也应邀出席。酒过三巡，博士官的首领仆射周青臣怀着新兴地主阶级的胜利喜悦，热情洋溢地向秦始皇致颂词：“原先秦国的疆域不过数千里，而今仰仗着

儒法斗争史话插图



陛下的圣明英武，灭诸侯设郡县，统一天下，消除战争灾祸，人人安居乐业。古往今来，哪个人能及得上陛下的威德啊！”秦始皇作为统一事业的实践者、新兴地主阶级的领导人，怎能不对本阶级的胜利感到由衷高兴呢？顿时欢笑满堂，在座的大臣纷纷起立，举杯欢呼，争先恐后向秦始皇祝酒庆贺。这时，混在博士行列中的反动儒生淳于越，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打着忠于秦王朝的幌子，气势汹汹地跳了出来，冲着大家说：“以往殷、周王位所以能相传千余年，就因为他们分封子弟和功臣。现在陛下得了天下，而弟子们却成了匹夫，万一国内有乱，谁来相救？”说到这里，他搬出了孔孟“信而好古”，“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sup>①</sup>一类反动说教，并有恃无恐地叫嚷：“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淳于越凶相毕露，公然把矛头指向新兴封建制度，疯狂地叫嚣要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向新兴地主阶级发起了突然袭击。

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制的分封制，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反动儒生抬出孔、孟这些政治僵尸，哪里能把他吓倒？他胸有成竹，轻蔑地望了淳于越一眼，沉着镇定地请群臣就此问题进行辩论。位居丞相的法家李斯又一次站到斗争的第一线。他严厉地驳斥淳于越说：“五帝不走老路，三代不相沿袭。各代统治方法的不同，是因为根据当时情况各有所异。现在陛下所创建的奇功大业，哪里是你们这帮迂儒所能懂得的？！你说的三代旧况，早已行不通了，何足效法？”李斯严肃地跨前一步，两眼象利剑一样直刺

淳于越，继续说：“当年诸侯相争，儒生们充当游士说客倒也情有可原。如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但你们仍旧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唯恐天下不乱。这该当何罪？”李斯一席话，义正辞严，吓得淳于越面如土色，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当然，淳于越之流的复古言论是以孔孟之道作为他们的理论根据的。为此，李斯接着又愤怒揭露这批儒生“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死抱着腐朽反动的孔学不放，“私学而相与非法教”，颠覆地主阶级国家政权的种种罪恶活动。他激昂地向秦始皇建议：立即封闭私学，除《秦记》等史书、民间医药、农书及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外，凡宣扬孔孟之道的《诗》、《书》、《百家语》一概烧毁，以“别黑白而定一尊”。如果要学法令，一律“以吏为师”。李斯在秦始皇正确路线指引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烧毁孔孟儒家经书，封闭儒家私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革命的建议。

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对于夺取政权后的新兴阶级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反动阶级总是利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动员反革命力量，腐蚀、瓦解革命阶级，以达到在上层建筑部分复辟，打开缺口，然后改变经济基础，实现全面复辟。吕不韦就采用过这一手，这对秦始皇来说是记忆犹新的。应该给这场大辩论下个结论了。秦始皇威严地说：“李丞相说得对！”当即果断地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宴会后，秦始皇命令李斯起草公布了“焚书令”，规定谁要是在三十日之内抗拒执行，就处黥刑；“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坚决实行专政。“焚书令”大灭奴隶主阶级的威风，大长新兴地主阶

级的志气。这一行动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反动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的正义行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

咸阳等地的广场上，烈火熊熊，浓烟滚滚，竹简在嘎嘎爆裂，焦丝残帛随着狂风满天飞旋，一场巩固政权、防止奴隶制复辟的革命风暴席卷了全国。

牵一发而动全身。秦始皇的这一革命行动打中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要害，各地的反动儒生魂飞魄散，惶惶不安。孔老二的八世孙孔鲋得到焚书的<sup>②</sup>消息，脸色灰白，冷汗直流，怀着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刻骨仇恨，一面恶狠狠地叫嚷“秦非吾友”，“吾将藏之以待其求”，<sup>②</sup>一面把《论语》、《春秋》等儒家著作悄悄地藏进孔府墙壁的夹层里，准备等候时机，反攻倒算。烧了儒家的经典，就是攻克了贵族奴隶主一个重要的复辟阵地，这怎能不使他们呜呼哀哉，哭天号地呢？

焚书后不久，又出了一件事：反动儒生侯生、卢生失踪了。这两个长期潜伏在秦始皇身边的反动儒生见复辟的希望如肥皂泡般破灭了，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暗地里密谋策划，大骂秦始皇。两个家伙，一唱一和，恶狠狠地攻击秦始皇“专任狱吏”胡说采取法治，是什么“天性刚戾”；把秦始皇不顾身体劳累，彻夜披阅奏稿诬蔑成“贪于权势”。他们在大肆发泄对秦始皇的刻骨仇恨后，仓惶出逃，准备伺机卷土重来。对于反动儒生在咸阳等地结党营私，造谣生事，攻击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系列破坏活动，秦始皇早已注意了。现在，他们竟然公开跳了出来，这使秦始皇无比气愤。他决心坚决打击，决不手软。他

派了御史官员审问咸阳城里的儒生，揪出了两个，挖出了一批。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秦始皇把从事复辟活动最猖狂的四百六十个反动儒生判处死刑，“坑之咸阳”。“坑儒”是对严重危害新兴封建制度的反革命分子的镇压，而对其他不参与叛乱阴谋的博士，还是照常让他们“优游论著”，加以信用。

“焚书坑儒”这一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革命行动，象晴天霹雳，使一切反动儒生闻风丧胆，失魂落魄，在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千多年来，一切反动派无不抓住“焚书坑儒”，大肆攻击秦始皇“暴虐无道”。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不甘落后，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恶毒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他的死党也别有用心地哼起了“竹帛烟消帝业虚”的反动诗句。在那个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林彪一伙更是丧心病狂地咒骂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但是，反动阶级的咒骂并不能抹煞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的革命本质，反而恰恰暴露了它们对革命事业的无比恐惧。其实，历史上的革新派对“焚书坑儒”向来是予以肯定的。尊法反儒的无畏斗士李贽说过，焚书坑儒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指出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反动儒生罪有应得。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也热情赞颂了秦始皇这个革命行动，断然指出：“不燔（fán）六艺，不足以尊新王”。当然，地主资产阶级中的革新派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并没有能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肯定“焚书坑儒”，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对此作出真正科学的

评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说得好：“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指出“焚书坑儒”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打退复辟势力进攻，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的行动。

当然，秦始皇对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打击是不彻底的。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毕竟“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镇压奴隶主复辟派不彻底；更主要的是，他没有也不可能从政治、理论的高度去彻底批判孔孟之道，铲除奴隶主复辟的社会基础，致使奴隶制残余势力得以潜伏，有的甚至钻进了秦王朝的政府机构中，最后导致这个新生政权的覆亡。

阶级斗争有共同的规律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表明，要巩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单靠经济基础的变革是不够的，还要进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如果这个工作不抓好，革命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这就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今天，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人类发展史上最辉煌、最艰难的事业，决非任何封建帝王所能比拟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特别重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进一步从政治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注：① 《孟子·离娄章句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 大泽乡风云

## ——秦末农民反孔斗争

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安徽大泽乡的上空电闪雷鸣，疾风呼啸。一支由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这里掀起了反封建反复辟的革命风暴，吹响了推翻秦王朝的战斗号角，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

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与赵高篡权复辟，疯狂推行儒家反动倒退路线，激化社会阶级矛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赵高原是赵国的一个贵公子。赵国被秦灭亡以后，他怀着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无奈秦王朝的强大，一时难以下手，便改用打进去的办法，“乃自宫以进”，在秦王朝宫廷里当了一名宦官，钻进秦王朝的心脏，深深隐藏下来。不久赵高又自吹“通狱法”，打出拥护法治路线的旗号，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做了公子胡亥的老师，还兼管皇帝的印玺。

公元前二一〇年七月，秦始皇又一次出巡东方各郡，不幸

在沙丘病倒了，秦始皇感到体力不支，急令跟随出巡的赵高书写遗嘱，要远在上郡防守匈奴的长子扶苏赶快回到自己身边。谁知信还没发出，秦始皇就突然去世了。这时候，钻在秦王朝心脏“管事二十余年”的赵高再也憋不住了，立即撕下伪装的画皮，露出了反革命的狰狞面目。他用花言巧语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拉拢李斯。并以瞒天过海的卑劣手法，篡改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立胡亥为秦二世。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篡权阴谋终于暂时得逞。而这中间，唯一有可能起来揭露和抵制政变的丞相李斯，却由于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经不住赵高的威胁利诱，为了保全自己，表现了不可原谅的妥协。

秦二世胡亥是秦始皇最小的儿子，原是深受溺爱的花花公子，在赵高思想影响下，变成一个“慈仁笃厚”、“尽礼敬士”的儒生。他虽然被赵高一伙捧上了皇位，却事事听任赵高摆布，实际权力完全落在赵高手里。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赵高立即用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他本着孔老二“兴灭继绝”的反动纲领，提出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sup>①</sup>的复辟路线，把那些被新兴地主阶级打倒了的没落奴隶主贵族重新捧上台，把原来受到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罪犯统统释放出来。他实行“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的反革命政策，使许多忠诚于秦始皇法家路线的文武大臣惨遭毒手，后来一度曾起来与赵高作过斗争的李斯也未幸免。赵高还挥起复仇的屠刀，把秦始皇的子女斩尽杀绝，牵连受害者不计其数。宫廷大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咸阳城里一片恐怖气氛。

在篡权复辟的同时，赵高还对被解放了的自耕农大搞反攻倒算。沉重的赋税，无止境的徭役，把劳动人民压得简直透不过气来。这边是一队队骨瘦如柴的农民押着米粮白草，由四面八方向咸阳集中运输，供宫廷享用；那边是一群群破衣褴衫的苦工，搬着巨大的木头石块，由巴蜀一带送到关中，去建筑阿房宫。本来，“闾左”即从事农业生产的贫苦农民，一般是服役的，这时也承担了空前繁重的徭役，造成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大批已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重又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这种历史的大倒退，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仇恨。“黔首安宁”变为“黔首振恐”，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犹如一只点燃了导火线的火药筒。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解除重新沦为奴隶的威胁，改变赵高复辟以来“黔首振恐”的局面，坚持革命斗争的贫苦农民勇敢地承担了新兴地主阶级无法完成的反复辟任务，推动着历史车轮继续前进。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正是这场反复辟斗争的先锋。

陈胜、吴广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沉重的阶级压迫，使他们较早地产生了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思想。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陈胜、吴广和九百名被赵高一伙强征到千里以外的渔阳去戍守的贫苦农民，因遭暴雨袭击，滞留在大泽乡。按照当时的法律，延误戍守期限是要杀头的。在凄风苦雨中，一张张憔悴的脸都愁眉不展，人人紧捏着拳头。怎么办？在这关键时刻，陈胜和吴广挺身而出，他们用悲愤而响亮的声音对大伙儿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就是说，



与其等死，不如举旗造反，即使阵亡疆场，也死得轰轰烈烈。经这么一鼓动，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怒吼声，冲破孔孟“天命论”的束缚，揭竿而起，勇敢地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了。他们杀死带队的军官，“为坛而盟”，正式宣告起义。就这样，几百名穷苦农民以满腔怒火，点燃了各地反秦斗争的熊熊烈火。

起义农民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很快占领大泽乡，攻克蕲县，接着又向陈县挺进。大泽乡起义军“奋臂大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影)从”。各地起义农民纷纷“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宰”，“以应陈涉”。起义浪潮汇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

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大军，赵高一伙慌了手脚。他们一方面派兵镇压起义军，一方面暗中勾结原六国的奴隶主复辟势力。但是，起义农民毫不畏惧，英勇奋战，打得秦军“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一败涂地。仅仅几个月，大泽乡风云席卷了整个中原地区。农民革命武装解放了大批人民和土地，狠狠打击了以赵高为首的复辟政权，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地主阶级。

农民起义的怒涛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然而激流漩涡难免使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那些曾被秦始皇镇压过的六国旧贵族，为了恢复旧日的富贵荣华，发泄对秦始皇的仇恨，这时也乘机扯起反秦的旗号，或抢占地盘，复国称王；或钻进起义队伍，伺机复辟。这样，就使起义军除了与公开的敌人作斗争

以外,还必须同混进反秦阵营内部的复辟派作斗争。以陈胜、吴广为首的革命派又一次经受了这场考验。

孔老二的八世孙孔鲋从墙壁夹层中挖出他早先窝藏在那儿的“四书”、“五经”等变天账,抱着孔家祖传的“礼器”,混入农民起义军,并钻到了陈胜的身边。他装着一副对农民军忠诚的样儿,阴险毒辣地鼓吹复古倒退思想。他说:“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今诚法之,则六国定不携,抑久长之本”。挖空心思地诱骗陈胜兴灭继绝,走复辟奴隶制的老路。陈胜对奴隶生活是记忆犹新的,他知道按孔鲋话去做的结果,必然使苦难的弟兄们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想到这些,陈胜不由得火冒三丈,不等孔鲋说完,就怒斥道:“六国的后代,我坚决不能封。你说的那些连骨头都腐烂了的帝王,与我们起义有什么相干。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你凭什么要我们效法古代?!”<sup>②</sup>陈胜的回答句句铿锵,字字有力,孔鲋瞠目结舌,无地自容,扭转屁股,狼狈地滚蛋了。

孔鲋的复辟阴谋破产了,可是旧贵族的残余复辟势力仍在起义军内部猖狂活动。陈胜在广大起义群众的支持下,又与反动儒生张耳、陈余为代表的复辟势力进行了激烈斗争。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革命形势迫切要求起义农民迅速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起义军夺下陈县,陈胜、吴广立即召集各方代表商讨这个革命的长远之计。起义军和陈县的老百姓听说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一个个都兴奋极了,一致推举陈胜为王。广大军民焕发出来的热烈的气氛却和站在一旁的张耳、陈余阴沉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陈胜故意请他们也表表态。

哪知他们一开口，就指责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是残暴无道，是“破人国家，绝人后世”。接着又反对起义军建立自己的政权，胡说建立农民政权，是“示天下私”，会弄得人心离散，应“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之后”。陈胜一听，又是一派胡言，便干脆回答他们：快收起你们的那一套吧，要想搞兴灭继绝，克己复礼，办不到！就这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革命政权——“张楚”政权，在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斗争中胜利诞生了。从此，农民起义军在革命政权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把反封建、反复辟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九月打到了离咸阳只有百来里的地方，赵高复辟政权日薄西山，危在旦夕。

就在陈胜调兵遣将，准备捣毁赵高老窝的关键时刻，张耳、陈余又一次跳出来，向陈胜提出了分兵攻打赵地的分裂阴谋，说“愿领三千人马，为大王北伐赵地”，企图诱骗农民革命军的队伍，作为复辟工具，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陈胜警惕性很高，为了防止意外，就指派“故所善人武臣为将军”，只让张耳、陈余做了北伐军的左右校尉。可是张耳、陈余到达赵地后，就公开鼓吹分裂，宣扬反秦是为了“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并与当地的复辟势力串通一气，使反动力量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他们乘起义军遭到秦军反扑的时候，挑拨陈胜与武臣的关系，怂恿武臣自立为王，自己篡夺了这支起义军的文武大权。陈胜得到消息非常气愤，但为了顾全大局，共同对敌，暂时承认了以武臣为王的称号，并命令他们急速派兵西进，支援正在关中同秦军顽强搏斗的周文大军。可恶的张耳、陈余竟唆使武臣按兵不动，袖手旁观，一面继续扩

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使周文大军终因寡不敌众，又无后援，归于失败，起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在张耳、陈余分裂活动的影响下，混入各路起义军的复辟势力，完全放弃了反秦斗争，起了外部敌人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对农民革命事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加上六国旧贵族的猖狂进攻，在很大程度上牵制和分散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使即将灭亡的秦二世、赵高，得再度集中兵力，向起义军反扑。陈胜、吴广两位杰出领袖先后牺牲，起义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阻挡不了的。谁搞复辟倒退，谁就非垮台不可。秦王朝最终还是在农民革命的风雷中彻底崩溃。赵高这个“指鹿为马”骄横一时的复辟狂，也终于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秦末农民大起义彻底地摧毁了妄图实现奴隶制复辟的赵高政权，也使地主阶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在客观上起了巩固新兴封建制的作用，并为西汉初年法家路线的推行开辟了道路。陈胜、吴广这两位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的光辉名字，将同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英勇事迹，一起载入革命史册，永世长存！

---

注：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孔丛子·答问》。



## 楚 汉 相 争

公元前二〇七年，由陈胜、吴广点燃的反秦烈火烧遍全国，秦末农民大起义进入到一个新高潮的时刻，在中原战略重镇彭城（今徐州）内外，是一片人喊马嘶、金鼓齐鸣、旌旗招展的场面。起义大军将从这里出发，分兵两路，向赵高复辟政权发动总攻击。陈胜、吴广牺牲后，刘邦、项羽领导着农民军继续战斗。一路大军，由刘邦率领，由西而进；另一路大军，由项羽统辖，从北而上，最后两支大军会师于咸阳，完成对秦王朝的战略进攻。

出发前，楚怀王曾向诸将约定：谁先进关，谁就是关中王。大军誓师以后，刘邦和项羽都率军踏上了自己的征途。

刘邦（公元前二五六年——前一九五年），沛（今江苏省沛县）人。早年在家务农，后曾做秦的乡村小吏“泗水亭长”。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他在沛县起兵响应，成为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

刘邦年轻时，在咸阳看到秦始皇，曾叹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表达了他对秦始皇所建树的伟业无比倾慕。现在，他膺服重任，率师西进，决心要把自己的抱负付诸实践，建立一番同秦始皇一样的伟业。

刘邦平时“不好儒”。他常说：“为天下安用腐儒！”甚至看到儒生的装束就厌恶，曾把儒冠拿来当“溺器”使用，致使儒家之徒都不敢到刘邦麾下干事。这次他西征咸阳，引军路过高阳，有个叫酈食（yì 昇）其的上门谒见，他一听来的是个戴高帽子的儒生，心里就火了：现在是军事时期，那有这么多闲功夫来陪儒生泡蘑菇，高谈宏议？于是传令：不见。可谁知酈食其也是个厉害人物，他见刘邦给自己吃闭门羹，气得大叫：“哪是什么儒生，老子是高阳酒徒！”刘邦一听不是儒生，马上转嗔为喜，把酈食其请了进来，向他道歉，并虚心向他请教“取天下”的办法，最后采纳了酈食其的“袭陈留，得秦积粟”的正确主张，使部队兵员、粮草迅速得到补充，壮大了力量。

由于刘邦能够虚心纳士，善于倾听意见，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进攻路线，再加军纪比较严明，部队所过之处，一律“毋得掠卤”。因此军威大振，一路上斩将夺关，势如破竹。公元前二〇六年，刘邦率领大军直逼咸阳城下，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部队开进咸阳以后，马上下令封闭秦王朝所有“重宝财物府库”，严禁劫掠，并随即还军霸上，召集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继承并简化了秦王朝的法治制度，将新法告谕四乡，以安民心。这样一来，“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饗军士”。由于刘邦继续执行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因此，在打下咸阳以后，很快地建立了一套法治秩序，赢得了关中人民的拥护，“唯恐沛公（刘邦）不为秦王”。

项羽此人，情况同刘邦就大不一样了，他出身于“世世为楚将”的楚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他卷

入了起义的洪流，作战很勇敢。钜鹿之战前，河北起义军遭章邯率领的秦军包围，形势危急。各路援军不敢出击，纷纷“作壁上观”。项羽亲率八千壮士，“破釜沉舟”，驰援河北起义军，一举打破了章邯的包围，扭转了局势。但是，随着地位的变化，项羽的没落阶级的劣根性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个人野心日益扩大，并逐渐在复辟势力的包围下，执行了一条倒退的路线，成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随着路线的改变，他进行的战争也就带有极大的破坏性。他每到一个地方，烧杀抢掠“无不残破”。在新安城南，一夜之间就极其残暴地坑杀二十万秦的降卒，暴露了他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本性。这次他率领四十万大军西进，一路上声势赫赫，叩关疾进。真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以为咸阳城马上唾手可得，天下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称王称霸的时刻就在眼前。不料大军刚到函谷关，就传来刘邦已打下咸阳的消息，真使他又羞又恼，气得哇哇乱叫。攻下函谷关后，急急忙忙率兵赶往咸阳。在新丰鸿门摆下了“鸿门宴”，表面上请刘邦赴宴，实际上是想除掉刘邦，抢夺头功。

刘邦明知这宴席摆得不善，但为了争取主动，还是带着张良、樊哙闯进刀斧丛中准时赴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鸿门宴”上，杀机四伏。项羽专横跋扈，几次要下手干掉刘邦，但刘邦队伍内部比较团结，事先作了周密安排，利用项羽内部的矛盾做了分化瓦解工作。刘邦临危不惧，智斗项羽，同他在宴会桌上展开正面交锋，变被动为主动，逼得项羽难以下手，最后终于安全脱险，使项羽的阴谋彻底破产。

“鸿门宴”虽然不是剑拔弩张的两军对垒，但在酒杯背后充满着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比战场上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也正是这次“鸿门宴”，拉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相争”序幕。

“鸿门宴”以后，项羽逼走了刘邦，更加有恃无恐，骄妄自得。他率领铁骑踏进潼关，第一件事就是血洗咸阳，杀降王子婴，火烧阿房宫，掠夺宫室美女、财宝，破坏刘邦建立的法治秩序。接着又驱逐并杀害了楚怀王，迫不及待地“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把被秦始皇扫灭的六国国君的后裔抬举出来，重新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分封的十八个“诸侯王”中，最边远的汉中地区“封”给了刘邦，称为“汉王”；最富庶的秦地剖分为三，“封”给被秦人“痛入骨髓”的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要他们钳制刘邦，堵住刘邦东出之路。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这标志着，项羽终于彻底背离了农民军革命路线，忠实地成为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政治代表。

面对项羽背信弃义、擅自裂土封王的罪行，刘邦及一些出身于下层的将领樊哙、灌婴、周勃等怒火中烧，一致要求同项羽决一死战。在法家肖何、张良的建议下，刘邦率队伍来到汉中。到汉中后，刘邦与肖何制定了一条统一全国的正确路线，这就是，以汉中为根据地，推行法治，发展经济，然后“收用巴蜀，还定三秦”，进而问鼎中原，统一中国。公元前二〇六年秋，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出兵“三秦”，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击败了秦的三个降将。在“三王”封地，设置了郡县；随后挥师东进，用正义战争打开了项羽炮制的分封局面的缺口，

正式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相争”。

楚汉战争开始后，刘邦亲率汉兵转战沙场，“大战七十，小战四十”，负伤十余次，始终没有屈服。战争初期，双方力量非常悬殊。项羽拥兵四十万，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战略要地；而刘邦只有几万军队，僻居汉中一隅之地。但刘邦坚持了法家路线，实行郡县制和其它一些正确的措施，并且有关中作为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在吕雉、肖何的领导下，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物力，因而使刘邦越战越强，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项羽虽然兵力强盛，但由于倒行逆施，裂土分封，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又没有后方基地，结果诸王叛乱，陷于兵力分散、疲于奔命、内外交困的窘境。

公元前二〇五年五月开始，楚汉两军主力开始相持于成皋、荥阳一线的正面战场。这时候的军事形势，已朝着有利于刘邦发展。但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隐藏在刘邦军中窃据军权的野心家韩信开始了他的分裂罪恶活动，给刘邦汉军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刘邦胸有成竹，坚持法家路线，同队伍内部以韩信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作了坚决斗争。

韩信原是一个无名小卒，后被提升为大将。掌握重兵以后，野心随着地位的变化迅速膨胀。他重用反动儒生蒯（kuǎi 块上）通，对蒯通的刘、项、韩“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的分裂计划很欣赏。在成皋之战最艰苦的时候，他擅作主张，拥立早在秦始皇时就通缉捉拿的罪犯、奴隶主复辟派张耳为赵王，违背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后刘邦冒着危险，亲自夜驰韩信军中，出其不意地夺去兵符印玺，重新把这支已被韩信分裂出去的军队控制

在自己手中，并严厉地警告了韩信。但韩信根本不思悔改，在蒯通的怂恿下，又破坏刘邦的统一战线，攻打已经降汉的齐国，害得正在齐国做劝降工作的酈食其以身殉职。占领齐地以后，韩信置正在正面战场上同项羽浴血苦战的刘邦于不顾，以齐地“伪诈多变”，不分封“其势不定”为借口，胁迫刘邦封他做“假齐王”，分裂野心进一步大暴露。对于韩信不顾大局，“自立为王”，按兵不动的无耻行径，刘邦和部下都很气愤，但为了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项羽，刘邦暂时满足了韩信的无理要求。等到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就在还军途中，驰入韩信兵营，“夺其军”，“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sup>①</sup>，使韩信的分裂阴谋又一次破产。

在成皋之战的相持阶段中，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一方面从政治上争取民心，团结内部，坚持同以韩信为代表的分裂势力斗，利用诸侯王和项羽的矛盾，争取了项羽部下的重要将领九江王英布背楚归汉，建立了反楚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制定了一个正面坚持、敌后扰乱和从西北两翼牵制楚军的作战方针，将楚军牢牢钉死在成皋周围，并先后两次大破楚军，消灭了楚大司马曹咎和大将龙且两支有生力量，使项羽更加进退维谷，如陷泥潭。

公元前二〇三年，走头无路的项羽，向刘邦提出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搞“西汉东楚”的分裂局面，妄图积蓄力量，卷土重来。坚持统一的刘邦断然拒绝了这一和谈阴谋，他看到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便积极地转入反攻。经过周密筹画，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完成了对楚军的战略包围，并发扬追穷

寇的精神，指挥雄师对节节溃败的楚军展开战略进攻。公元前二〇二年十二月，刘邦的大军以排山倒海、气吞万里之势向楚军发动了总攻击，在垓下同项羽展开了战略决战。

那天，古战场上北风凛冽，星光惨淡。已成瓮中之鳖的“西楚霸王”项羽，凄凄凉凉地躲在帐幕中喝闷酒。突然，“洞庭波泻木叶下，不知何日归故乡”的阵阵楚歌声顺风飘进帐中，随即，四面八方都响起了这样的楚歌。听到这一阵阵如泣如诉、异常哀怨的楚音，楚营中顿时骚动起来，正在喝酒的项羽也突的跳了起来：什么？莫非汉军已尽得楚地，“是何楚人之多也！”于是项羽绝望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乌骓马和虞姬，不禁呜呜咽咽地唱了起来：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尽数遍，泣不成声，虞姬拔剑自刎，项羽跳上乌骓马，带了八百随从，摸着黑夜仓惶出逃。这就是所谓“霸王别姬”的悲剧。

第二天清晨，项羽逃到乌江边，只剩一百多随从，他迷了路，去问一个老农，结果老农故意指引他进入了一片沼泽地。想再寻路而逃时，但听见杀声震天，旌旗遍野，刘邦指挥的大军席卷而来。项羽被迫自刎乌江，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楚汉战争就这样以刘邦的胜利、项羽的失败，宣告结束了。

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在洛阳南宫开了个庆功会。刘邦

问群臣，汉兴楚亡的原因是什么？有人回答，刘邦能“与天下同利”，项羽却“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刘邦说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举了张良、肖何等人为例，认为自己所以能取天下，在于善于用人，而“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结果，这个庆功会开成了经验总结会。

刘邦这里说的用人问题，也就是组织路线问题。由于刘邦有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所以他比较能够搞“五湖四海”。他的主要文臣武将，如肖何、曹参、夏侯婴等，都是秦朝地主阶级的下层官吏，周勃是手工业者兼办丧事，樊哙是卖狗肉的，灌婴是商贩，对于这些人，刘邦都能不论出身低微，不避亲疏远近，量才使用，甚至破格提拔，大胆使用。经过长期战争考验证明，这些人都坚持前进统一，忠实地执行刘邦的法家路线，为统一的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战功。他们在刘邦周围形成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

相反，项羽搞的是用人唯亲，孤家寡人那一套。他平素“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要不，就是信用儒家之徒。他最信任的“亚父”范增，就是个主张“立楚之后”，搞“兴灭继绝”的奴隶主复辟派。即使在项羽那个“亲亲”的小圈子里，也是矛盾重重。项羽的错误路线，使他不得不自食其恶果。

楚汉相争，是儒法两家两条路线根本对立的思想、政治、组织、军事路线的决战。项羽在身败名裂、自刎乌江时，还执迷不悟，仰天大叫“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实质上，是他推行的复辟路线决定了他“失道寡助”。楚亡汉兴的历史雄辩地证



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它有力地告诉我们：历史是不会倒退的，统一必然战胜分裂，郡县制终将取代分封制，这个历史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刘邦，正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趋势的杰出的法家。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是刘邦在楚汉战争胜利后，回到故乡探亲时作的，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雄心壮志，与“霸王别姬”时项羽的哀鸣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注：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 黄老之治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帛书，为研究秦汉时期的儒法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黄老思想的著作，如《老子》有两种抄本，前面还附有《经法》等久已失传的古佚文。为什么这些帛书会大量保存在汉文帝时的墓葬里，郑重其事地成为宗室贵族的殉葬品呢？原来，儒法斗争在汉初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在汉初法家路线统治下，法家当权派推行了大半个世纪的“黄老之治”。

在西汉初期的封建统治集团中，首倡“黄老之学”为“用世之学”的，是相国曹参。刘邦在沛县起义时，他就跟随刘邦，“攻城野战”，出生入死，为汉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天下初定”，曹参被派到齐任丞相。由武将改行做文官，过去南征北战的老经验很多都用不上了，巩固政权还得从头摸索。于是，曹参召集当地“长老诸先生”，向他们讨主意，如何“安集百姓”。谁知几百个儒生意见不一样，鸦聒雀噪地闹了一场没结果。后来有人介绍说胶西有位“善治黄老言”的盖公，曹参忙请来议政。盖公向他讲了一通“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术”，听来句句有理，曹参果断地采用了。这新的一套果然灵

光,曹参相齐九年中,“齐国安集”,曹参也因此被赞为“贤相”。

刘邦早就看中曹参是个人才,肖何死后,吕后依照刘邦临终的遗嘱,调曹参到中央当了西汉王朝的第二任相国,他仍然把齐国的“黄老术”带来,“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之约束”。按照汉高祖刘邦和肖何的既定路线、政策办事。别人当宰相,日理万机,忙忙碌碌,他呢,表面上看去,“日夜饮醇酒”。一次,相府附近的花园里,一群官员大白天喝酒唱戏。曹参有个部下觉得这样放肆,不成体统,就请曹参游花园,想让相国出面教训他们。想不到曹参竟乐呵呵地入了席,品菜饮酒,与那群官员“歌呼与相应和”,一起玩个痛快。这个“束发河山百战功”<sup>①</sup>的汉朝开国功臣,难道变成贪图安逸的懒虫了吗?

不,不是的,曹参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法家政治家。他的尚黄老之学,从现象上看是偶然的,其实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新兴地主阶级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从“战国之争,逮乎秦、项,凡数百年,至汉初而始定”,秦始皇死后,赵高篡权,法家路线几陷中断。刘邦建立汉朝,费尽千辛万苦才使这条路线继续得到贯彻执行。吕后执政时,战争的狂风暴雨虽然平息,但“天下初定未久”,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曹参这时出任相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协助吕后坚持刘邦的法家路线。创业难,守成亦不易。刘邦指定曹参为第一候补相国,是深知他堪负重任的。曹参饱经沧桑,深谋远虑,表面上的“无为”,只不过是策略。但是年少不更事的汉惠帝对此却不能理解,怀疑曹参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皇帝,埋怨这位相国太不管事,无所作为。曹参知道了就问惠帝:陛下觉得自己与高帝

比哪个高明？惠帝说，我怎么敢和高帝比呢？曹参又问：那么我和肖何比呢？惠帝说，看来也及不上啊！曹参便启发惠帝说：对啦，高帝和肖何定天下，制法令，路都给我们铺好了，既然如此，你当你的皇帝，我守我的职务，“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对刘邦、肖何开创的事业，“遵而勿失”可说是正确的。曹参在重大问题上从来不含糊，对阴谋家、野心家警惕很高，“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他重用的都是忠实执行法家路线的“谨厚长者”，靠这些人固守阵地，维护刘邦时代初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黄老之治”对巩固封建经济也起了很大作用。赵高篡权、楚汉相争，直至异姓王叛乱的长年战乱，使社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甚至连皇帝的马车都配不齐同色的四匹。地主阶级从巩固统治地位出发，很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当然经济上“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而是用封建经济战胜奴隶制经济残余。吕后机敏地抓住环境稳定的时机，把刘邦所制定的“重农抑商”政策贯彻下去，比如下令开荒，奖励农桑，剥夺工商奴隶主的做官权利等等。她执政的十五年，“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巩固了政权，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把初创时“民失作业，而大饥馑”的衰败景象，变为“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的安定局面。正象当时民歌唱的那样：“肖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无为而治，实际上是有为而治。

文景时期，黄老之学盛极一时。汉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执政后继续推行了法家路线，但是也对“清静无为”感兴趣。黄老之学，正因为“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他的丞相陈平是个法家，“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高帝过去分封的九个同姓王这时都羽翼丰满，可见中央政权的脚跟还没站稳，于是汉文帝巧妙地拿起“其治为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以守为攻。他穿着粗布衣“亲率耕”，“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对犯错误官员的处理也比较注意策略，比如有个大臣叫张武的，受贿贪污，文帝并不将他法办，反而自己掏腰包，把皇库中的钱拿出来送给他，“以愧其心”，让他下次不好意思再犯。当然对危害中央集权和破坏统一的人，文帝是毫不客气地行使专政的。一次济北王起兵叛乱，文帝立即派十万大军征讨，由于巩固统一的法家路线深入人心，“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起来协助朝廷平乱，仅一月便生擒济北王。文帝推行黄老之术，在新形势下，是有利于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怪不得明代法家思想家李贽盛称他“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稳实”<sup>②</sup>。由于巩固了中央集权，汉初黄老之治在表面上的“退”而实质上是“进”了。

汉初法家当权派推行黄老之治，把黄老之学作为巩固封建政权的手段，不是偶然的。它既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有思想上的渊源。在先秦，道家虽然是没落奴隶主的一种思想流派，但同儒家思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与斗争，特别是道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对儒家形而上学的有力冲击。史称：“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在批儒这点上，道家是法家的同盟军。到了战国时

代，在儒法斗争的推动下，道家发生了分化，其中稷下黄老学派摒弃了道家原先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唯物主义，将消极的“虚无”解释为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精气”。先秦法家慎到、申不害、韩非都受过黄老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变法胜利的前提下，强调“有道之君贵(虚)静，不重变法”<sup>③</sup>，以巩固法家路线的统治。况且“时不同，无为亦不同”，汉初黄老思想已同法家路线结合起来，儒家和黄老学派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儒法斗争在新形势下的反映。中央政权在“尊法”的前提下讲“无为”，是为了安定法家的天下，而“尊儒”的地方势力则唯恐天下不乱。“树欲静而风不止”，对黄老的两种态度，是复辟与反复辟的反映，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窦太后惩罚儒生的故事，便是这场斗争的一段精采插曲。

窦太后是文帝的妻子，“喜老子言，不悦儒术”，家庭教育抓得很严，“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有一次，信黄老的黄生与儒生辕固为了汤武杀君的故事在朝廷上争起来。黄生说汤武是杀君夺权，用“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的比喻，主张立“上下之分”；辕固则说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不能算篡夺。当时吴王刘濞等地方割据势力正虎视眈眈，阴谋篡权，黄生维护君权，就是维护中央集权，辕固攻击君权，分明是为反革命叛乱制造舆论。争到最后辕固强词夺理，他还狡辩道：“照你这么说，高祖代秦该当何论呢？”黄生当然不便回答，但是窦太后却不容辕固这么猖狂。她把辕固找去，故意考问他《老子》一书，辕固是个“黜老子”的儒生，他公然放肆地回答：“这种奴仆念的东

西,我不懂!”窦太后勃然大怒,喝骂:“难道比不上你的儒家破烂吗!下令把他扔进兽圈,去与野猪搏斗,出尽了这个儒生的洋相。到武帝时期,窦太后又把儒生赵绾、王臧下狱处死,并先后罢了“隆推儒术,贬道家言”的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的官,煞住了这股尊儒歪风。在她手里儒生们一直不敢抬起头来。她作了二十三年皇后,十六年皇太后,六年太皇太后,将黄老之学推行了近半个世纪。

从汉高祖到汉宣帝,基本上坚持了法家路线。汉宣帝教训太子的时候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清代的魏源作了解释,“谓黄老王而申韩伯(霸)也”,也就是说,黄老之治与法治是相联系的。尽管黄老之学适应了西汉初年某种社会客观需要,但“清静无为”的保守色彩与先秦法家的光辉比较,毕竟是相形见绌的。在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夺取政权之际,便是它们踏上下坡路的开始,封建地主阶级也不能例外。只有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

---

注:① 王安石《曹参》。

② 《史纲评要》。

③ 《韩非子·解志》。

## “削藩策”与“清君侧”

公元前一五四年，西汉景帝即位的第三个年头，在统一的中国境内，突然鼙鼓动地。一支乌合之众的队伍，打着“清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直向京城杀奔而来……这就是爆发在西汉初期，以吴国的诸侯王刘濞为头子所发动的“吴楚七国之乱”。这次叛乱因何而起？为什么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说来话长，得从晁错和他提出的“削藩策”谈起。

晁错（公元前二〇〇年——前一五四年）是汉初著名的法家政治家。他在年轻的时候，曾认真学习、研究了先秦法家商鞅、申不害等人的法治思想。汉文帝在位时，他开始在朝廷任职，经受了锻炼。汉景帝即位以后，他升任为御史大夫，成为汉景帝身边一个主要的谋画人物。晁错一生积极参预、制定了朝廷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他提出的“削藩策”，更为巩固西汉初期的中央集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汉初期，地主阶级还处于上升阶段。但是，被打垮的没落奴隶主残余和封建割据势力还拥有一定的力量。特别是那些诸侯王，收罗了许多业已失去政治靠山的反动儒生作为黑高参，与奴隶主贵族残余、工商业大奴隶主勾结在一起，跨州兼郡，招降纳叛，大量兼并土地，夺取劳动力，垄断盐铁、



铸钱等重要经济部门。尤其到了景帝即位以后，这些诸侯王力量越来越强，称王称霸的野心也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公然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地步，给中央集权的汉王朝造成严重的威胁。

对于这样的严重形势，晁错看得很清楚。他认识到：日益膨胀的割据势力，是威胁中央集权的心腹之患。要使王朝的政权得到巩固，就必须限制和消灭野心勃勃的诸侯王。更何况眼下这些诸侯王的叛乱，已成骑虎之势，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激烈争斗在所难免。只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采取暴力行动，把这些诸侯王消灭，才是清除隐患的上策。于是，晁错便向景帝提出了坚决有力的“削藩策”，向诸侯割据势力提出了挑战。坚持法家路线的汉景帝，支持并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先后削夺了赵王封地常山郡、胶西王封地六个县、楚王封地东海郡，给诸侯割据势力以初步的打击。

一条正确路线的贯彻总是要经历斗争考验的。晁错提出的“削藩策”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进步措施，必然招致分裂割据势力的极大怨恨和拚死反抗。他们勾结打入朝廷的内奸，四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对晁错进行了恶毒攻击和诽谤。这消息也传到了晁错的家乡。晁错年迈的父亲听说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提出什么“削藩策”得罪了那些有权有势的诸侯王，可吓坏了，急忙赶到京城，教训晁错少管闲事，还是趁早收回“削藩”的主张，免得给自己和家庭招来横祸。望着父亲那激动而又惶恐的脸色，晁错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坚定地向其父表示：“削藩策”一定要坚持，否则，中央集权制度就

得不到巩固。胆小的父亲不忍见灾祸延及到自己，回家就自杀了。亲人的死，考验了晁错，更坚定了他的法家立场，决心把“削藩”措施贯彻到底。他建议景帝立即对诸侯王发动总攻击，把“削藩”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个苦心经营了四十年，正在策划武装叛乱的吴王刘濞。

吴王刘濞何许人也？他是一个政治地位显赫，经济力量雄厚的大工商奴隶主，一个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野心家、阴谋家。他阴险狡猾，手段毒辣，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在当初受封为吴王的时候，为了骗取他叔父刘邦的信任，硬装出一副谦恭的老实相，俯首贴耳，诚惶诚恐。但屁股一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等到刘邦死去，他更是毫无顾忌的从经济、组织、政治各方面和中央政权大唱对台戏。他倚仗着吴国优越的经济条件，冶铜铸钱，煮海水为盐，因而财用充裕，甚于皇帝。他以免除赋税、提任官吏收买人心，并大量收罗带罪潜逃到诸侯国的亡命之徒，纠集死党，自立山头。他目无中央，把所辖的五十二城搞成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更可恶的是，他还效法孔老二，大耍两面手法，以“克己”的手段来掩饰“复礼”的野心，表面上长期“称病不朝”，装聋作哑，暗地里磨刀砺剑，“积金钱，脩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sup>①</sup>，勾结其他诸侯王窥测时机，以求一逞。

对于吴王刘濞的不臣之心，晁错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他毅然上书景帝，指出：吴王刘濞表面上“称病不朝”，暗地里骄横不法，竟发展到要举兵作乱的地步，如今，只有将他消灭，否则就要给中央政权带来无穷的祸害。晁错坚定的法家立场和

强硬的“削藩”措施，使得刘濞又气又怕，便狗急跳墙，勾结了打入汉中央政权的他的原封国宰相、内奸袁盎，联络一批居心叵测的诸侯王，拼凑起杂七杂八的反动武装，在“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反动口号下，发动了武装叛乱。

吴王刘濞为了煽动其他六国诸侯王叛乱，把对汉中央政权的仇恨全部倾注在晁错身上。他在告同伙书中，对晁错进行了无耻的诽谤和攻击。他叫嚷晁错“无功天下”而“侵夺诸侯之地”。危言耸听地胡说晁错是一个杀功臣、容奸人、用妖言诬乱天下、危害国家的“乱臣贼子”，必须举兵诛之，才能够“存亡继绝，振弱伐暴”。看，刘濞对执行法家路线的晁错是多么切齿痛恨，简直把晁错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刘濞搞叛乱，真象他表白的只是为了晁错一个人吗？不，“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一种策略”。晁错敢于坚持一条正确的法家路线，始终站在“削藩”斗争的最前列，诸侯王割据势力千方百计要把他搞掉，固然是刘濞打出“清君侧”旗号的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恰恰表现了叛乱势力的软弱无力。汉中央政权力量强大，要求统一，反对割据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些都是刘濞看到的。因此他懂得，如果公开打着反对中央的旗号，那无异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所以只能借助“清君侧”策略为掩护，口上高喊要除掉晁错，实际上是为了篡权做皇帝，是为了推行他那条复古倒退、分裂割据的儒家路线，以实现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迷梦。所谓“清君侧”不过是分裂势力搞篡权、复辟的一种卑劣手段而已。

“削藩策”与“清君侧”不仅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策略的斗

争，也是法家与儒家两条不同路线的一场斗争。

面对着“七国之乱”，儒法两家的态度泾渭分明。一些儒家以及打入朝廷的诸侯王内奸，对吴王刘濞的分裂活动弹冠相庆，对晁错进行了疯狂的围攻、陷害。但晁错临危不惧，坚持法家路线，更加坚定了削藩除乱的决心。他一方面及时向景帝揭发袁盎暗中勾结刘濞、充当内奸的罪恶行径，要景帝提高警惕，及时消除内患。另一方面，他又建议景帝御驾亲征，激励士气，迅速剿灭七国叛乱。景帝听到七国谋反的确切消息以后，立即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反击“七国之乱”的兵力。但是，他对于袁盎的内奸活动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袁盎勾结了朝中另一个“好儒术”的大臣窦婴，在景帝面前拨弄是非，把吴楚七国叛乱归因于晁错，胡说：“方今计独斩错，发使赦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景帝上了袁盎的当，错杀了晁错。晁错被杀，吴王刘濞却并不因此放下屠刀，改邪归正。当景帝在接见从前线回来的校尉邓先，询问前线战事如何时，邓先回答道：吴王刘濞准备谋反已经几十年了，这次叛乱表面上以诛晁错为名，其真意并不在晁错啊！一席话说得景帝悔恨交加，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当，喟然长叹曰：“吾亦恨之。”于是景帝下了粉碎叛乱的决心，飞檄传令讨伐吴、楚等诸侯国反中央、搞分裂的罪行，派出了著名的将领周亚夫率兵攻打叛军。周亚夫率领的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得叛乱武装人仰马翻，溃不成军。结果这次“内乱”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被平定，六个诸侯王相继畏罪自杀，分裂势力的头子吴王刘濞黄袍未及加身，就被诛于斧钺之下，落得个可耻下场。

“吴楚七国之乱”和法家晁错为“削藩”而殉职这两件事，深深教育了汉景帝，他在平定了这次叛乱以后，继续贯彻推行晁错提出的法家路线，下令被消灭的诸侯王一律不得立嗣复国，所有王国的行政一律由中央任命的官吏全权处置，这样，国家的统一显著加强，中央集权更加趋向巩固。

“削藩策”和“清君侧”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策略，也代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前者要前进，后者要倒退；前者要统一，后者要分裂。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一切野心家要想搞分裂，搞倒退，从来就是没有出路的，最后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不管奉行儒家路线的反动没落阶级怎样机关算尽，打着什么旗号，阴谋总是不能得逞的，即使得逞于一时，也决计不会长久。吴王刘濞的叛乱活动，虽然惨淡经营了四十几年，盘根错节，但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就落得个冰消雪化、一朝覆亡的可耻下场，这个分裂主义头子连同他发明的“清君侧”这一臭名昭著的反动策略，将“永远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而晁错虽然不幸遇害，以身殉职，但是他所贯彻、制定的法家路线，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因而也是进步的。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将得到正确的评价和肯定。

吴王刘濞的尸骨早已与泥俱腐，但他的那套“清君侧”的鬼把戏，后来成了反动派阴谋篡政，闹分裂，搞倒退的一种策略，毛主席说：“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sup>②</sup>。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也把吴王刘濞的“清

君侧”视为至宝，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及时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林彪同吴王刘濞一样，最后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

---

注：① 《汉书·吴王濞传》。

②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编者按语。

## 董仲舒和“独尊儒术”

请出历史的亡灵演出反革命复辟的新丑剧，这是一切反动派的惯技。董仲舒这具政治僵尸，就是长期以来为一切反动头目所拥护和利用的一个历史亡灵。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复辟狂林彪也居心叵测地狂吠：“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从历代反动派到林彪，为什么这样如痴如狂地吹捧董仲舒？董仲舒和他的“独尊儒术”是什么货色呢？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前一〇四年）出生在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的一个尊孔崇儒的地主家庭。他从小就被父亲圈在书斋里啃《诗》、《书》、《论语》、《孝经》。家庭的熏陶，使孔孟之道的反动毒汁浸透了他的全身。他从小就立志要步孔老二的后尘，当一个“鸿儒”。年青时候，他又进一步选中了孔丘的复辟经《春秋》，苦心攻读，揣摩备至。为了从《春秋》的字缝里找到发迹升官、跃居龙门的诀窍，董仲舒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整整三年，非但没有走出书斋一步，甚至连窗前的花园也不望一眼，号称“三年不窥园”。

公元前一四〇年，汉武帝刘彻即位。他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和加强统治，下了一道“求贤诏”，命各地长官推举“贤良方

正之士”到京城献策。自以为得计的董仲舒破门而出，挤进了“贤良方正”的行列。一到长安，董仲舒顾不得旅途劳辛，即刻展纸研墨，振笔疾书，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举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

在《举贤良对策》里，董仲舒恶狠狠地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是“尽灭先王之道”，所以秦皇朝只有十四年就完蛋了。他耸人听闻地惊呼，继承了秦朝法制的汉朝已经如同“朽木粪墙”，处于“土崩瓦解”之中，要想保住天下，永世长存，只有用我的良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在这里，董仲舒公开扬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黑幡。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罢黜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法家思想，要封建统治者由尊法转为尊儒。秦始皇靠法家争天下，汉高祖靠法家坐江山。“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迫使儒家那套在较长的时期内不敢招摇过市。汉初，法家思想及其路线猛烈地涤荡着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个历史时期，是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高歌猛进的时期。为什么到了汉朝中期，会出来一个董仲舒，疯狂地叫嚣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这有着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

原来，在汉武帝当政的时候，地主阶级经过几百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特别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已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基本过去了。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性，是随着它们政权的夺取而



逐步丧失的。到汉武帝时候，地主阶级的阶级地位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汉武帝初即位那年，就已有有人跳出来鼓吹“独尊儒术”了。汉武帝刚即位时，仅仅十六岁，实际上掌权的是几个尊孔的大地主保守派。当时，丞相卫绾(wǎn苑)公开扬言要取缔一切宣传申(不害)、商(鞅)法家思想的人，大量任用儒生执政；次年继任的丞相、曾参与杀害晁错的阴谋家窦婴，更是一个“好儒术”的顽固派，御史大夫赵绾等竟然煽动武帝不要向主持朝政的窦太后奏事，理由是窦太后“菲薄五经”，不敬孔孟。后来外戚田蚡当了宰相，一上台就吵嚷着要“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延文学儒者”。尊孔妖风的刮起，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一部分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凶残的剥削，已经激化了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它们预感到革命风暴的来临，随时担心着自己岌岌可危的命运，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用孔孟的唯心史观分析西汉阶级斗争形势，得出的所谓汉王朝好比“朽木粪墙”处于“土崩瓦解”的危言耸听结论，实际上恰恰是大地主保守集团对自己前途的一种担忧。这批从大奴隶主转化而来或与奴隶主势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地主保守派，急于寻找一种反动的思想武器，以维护和巩固它们的地位。与此同时，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派别儒家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顽固不化的儒生仍然死抱着奴隶制不放，而另一部分则改换门庭，另找主子，投靠了日益走向反动的大地主阶级保守派。两股反动势力，一拍即合。董仲舒的后台就是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独尊儒术”的出笼是反动儒家学派与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产物。

尊儒就是尊孔。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不惜舞笔弄墨，引经据典，抬出早已烂了骨头的复辟狂孔老二，吹嘘他是有王德而无王位的“素王”，是“法天立道”的通天教主；孔丘的《春秋》是“应天作新王之事”的巨著，人们的行动都要以它为指南，辨别是非也要以它为标准。经董仲舒一吹，这么个乱叫乱颠、四处碰壁的奴隶制卫道士，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统治权威，孔老二被捧上了天。

董仲舒的反动历史作用，不仅仅在于全盘继承了孔丘儒家的衣钵，而且更在于按照封建地主阶级的面目改造、发挥了儒家学说。孔孟之道是一种“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些说：幼稚的）、荒谬的”唯心主义体系，是奴隶主阶级处于没落时期的反动意识形态。即使在它产生的时代，也已被先秦法家批判得体无完肤，现在如果仍然照搬那一套陈腐不堪的说教，显然已经不能掩人耳目了。因此需要对它进行一番改铸，给它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神秘外衣，以便进一步骗人。这就是董仲舒一生的反动行径。

他首先接过孔老二的“天命观”，大加发挥。在《天人三策》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滔滔不绝地对“天”大发议论，他不厌其烦地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人间万物，都是天的意志的象征。谈天是为了喻人。继而就抛出了“为人者，天也”的谬论，把天和人混为一谈，并荒唐地用阴阳五行说来作论证，他说人是按照天的意志、面目塑造出来的：一年三百六十六天，十二个月，所以天就赋予人类三百六十六根小骨节，十二根大骨节；天地有五行（金、木、水、火、

土), 所以人便有五脏; 时节分四季, 所以人生有四肢; 天有阴阳, 人有哀乐……这种种奇谈怪论, 意思只有一个: 天创造了人类, 人类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天意”的安排, 甘心情愿地受天的“摆布”。如果人的行动符合“天意”, 就会受到“奖赏”, 洪福降临, 富贵荣华; 反之, 就会受到“警惩”, 天打雷轰, 死无葬身之地。

那么, 九重高高, “天意”渺渺, 何以能下达人间呢? 不用愁, 董仲舒早就准备好了下文: 君主就是“天”在人间的代表。“王者承天意以从事”, 天子“受命于天”, 代表上天行使权力。以此类推, 谁反对皇帝就是逆天, 敬天就要“忠君”。广大劳动人民永远只能俯首贴耳, 甘为奴隶。董仲舒新发明的“天人感应”说, 是对孔老二“天人合一”的进一步发展, 为“君权神授”炮制了更为荒诞无稽的理论根据。

董仲舒又在孔老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和孟轲“性善论”的基础上, 抛出了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 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低微卑贱的意思)之性。这里的“圣人”, 就是当然的统治者, 他们天生是善的。斗筲就是指广大劳动人民, 他们则是天生恶的, 象瞎子一样, 只配受人剥削欺凌。这种“性三品说”, 就是企图从人性论的角度来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董仲舒又从反动的人性论出发, 引出了圣人统治群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思想, 提出了“三纲”(“王道之三纲”)即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反动理论。他编了“阳贵而阴贱”的定律, 推出: “君为阳, 臣为阴; 父为阳, 子为

阴；夫为阳，妻为阴”。这里，君、父、夫是臣、子、妻的绝对统治者，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根本大纲。为维护和调整“三纲”，使它成为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董仲舒又抬出孔孟的“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三纲五常”这个反动的伦理纲常，总括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道德原则，构成了禁锢劳动人民的精神桎梏。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封建统治奉如珍宝，当作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残害着广大无辜的人民。

董仲舒的这些陈词滥调，都是建筑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上的。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社会制度的改变，朝代的更替，无非是依次循环，换汤不换药。又说，“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今同是一个“天下”，“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还是象孔丘那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万无一失。对这种谬论，毛主席曾作过深刻的批判：“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它的要害所在。

经过董仲舒的加工和改造，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孔孟之道，改头换面，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儒家书籍从火烬的命运一跃而为神圣的经典。董仲舒是完成这个反动工程的第一个反动思想家，为此，他被历代儒家捧为“百儒之首”、“七十三贤”、有“王佐之才”的“汉代孔子”，还在他的家乡盖了“董子

庙”，塑了“董子像”，把他排进了孔家店的行列。

可是，遗憾得很，董仲舒的走运，只不过是死后的事情，生前他并没有被重用。他煞费苦心地上奏章，满以为可以由此致位卿相，飞黄腾达，谁知武帝只给他一个小小诸侯王封国里的江都相，后来又当过一个地位相当的胶西相。为什么呢？因为汉武帝不信儒，尽管他年青的时候读了一些孔孟的书，也容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在后来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成长为坚定的法家人物。他执政期间，重用法家桑弘羊和张汤、汲黯等，积极推行了一条法家路线。对董仲舒根本不予重用。

对此，董仲舒耿耿于怀，十分不满。他身居江湖，志存朝阙，无时不窥测着朝廷的动向。公元前一三五年，董仲舒正在家养病，听说了高园殿先后两次失火的消息，顿时精神百倍，马上搬出“阴阳术”的看家本领，借题发挥，上了一道诽谤朝政的奏章——《庙殿火灾对》，胡说这两次火灾的根源，在于“汉承秦制”的法家路线，任用法家人物。他建议汉武帝“承天意”<sup>②</sup>，杀法家，“平天怒”，息民怨。董仲舒这一手为的是敲山震虎，赶走法家，自己可以发迹高升。没料到奏章到了朝廷便露了馅，汉武帝勃然大怒，立即把这个造谣惑众的孔孟之徒投进监狱。铁窗难熬，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才获释出狱。

然而，董仲舒贼心不死，风头一过，他马上又祭起了倒退的黑旗，朝廷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总要出来跳儿跳，鼓噪一通。当时法家桑弘羊帮助汉武帝制定了“盐铁官营”政策，他就气急败坏地狂吠这是“富了国家，苦了百姓”，要求“盐铁归

于民”，即实际上是归于工商奴隶主。汉武帝发起反击匈奴的正义战争，他就迫不及待跳出来兜售卖国哲学，主张“说以厚利，结之于天”，鼓吹“和为贵”的投降主义路线。为了进一步阐发孔孟之道，晚年时，他又学起孔老二修《春秋》的模样，摇动秃笔，专心著书，写下了思想内容极为反动的《春秋繁露》，把他那“天人三策”等乌七八糟的各种反动观点，统统塞了进去，《春秋繁露》便被历代反动派当作一部尊孔法典，流毒甚广。

今天，“独尊儒术”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什么董子庙、董子像早已成了反面教材。这样的一个反动人物竟被林彪奉若神明，定为表率，只能表明林彪和董仲舒一样，都是孔老二的信徒，暴露了他妄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嘴脸。

---

注：① 《汉书·儒林传》。

② 《汉书·五行志》。

③ 《汉书·匈奴传赞》。

# 桑弘羊舌战群儒

## ——盐铁会议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二月的一天,京都长安城里人群熙熙攘攘,车辆络绎不绝。一群宽袍大袖、南腔北调的所谓贤良、文学挤进了未央宫。未央宫议事大殿,顿时热闹起来。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了。

这次会议与其说是以皇帝的名义召开的,不如说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一手炮制的。当时,昭帝年幼,霍光辅政。他独揽大权,结党营私。纠合了一帮象儒生杜延年之类的无耻之徒,企图彻底废除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但是,上山路偏遇顶头风。有一个曾经跟随汉武帝几十年,并帮助武帝出谋划策的老臣——御史大夫桑弘羊,却硬是和他们作对。桑弘羊坚持“故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为捍卫汉武帝的法家路线同霍光之流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霍光之流就把桑弘羊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别看这霍光是个“不学亡(无)术,阖于大理”<sup>①</sup>的大草包,在搞阴谋勾当方面却颇有一点手腕。他不仅在昭帝面前制造流言蜚语,恶意中伤桑弘羊,而且伙同党羽杜延年蓄谋召开“盐铁会议”,妄图以辩论“盐铁官

营”政策为由，对桑弘羊发起突然袭击，以达到废除盐铁官营，改变汉武帝法家路线的目的。但是，霍光知道，桑弘羊是个很难对付的法家，如果亲自出场，同他辩论，准得要洋相百出，狼狈不堪。左思右想，决定退居幕后，指使党羽杜延年出面，特地从全国各地物色了六十多名能言善辩的孔孟之徒，即贤良、文学，充当炮筒子，在台前鼓噪。

霍光一伙直到会议安排就绪，才怂恿汉昭帝下诏书给桑弘羊。桑弘羊接到皇帝的紧急诏书，赶到了会场。在霍光的策动下，一场激烈异常的儒法大论战就这样拉开了。

贤良、文学们一个个跃跃欲试，摆出一副公鸡斗架的凶猛架势，看上去，恨不得马上把桑弘羊扳得一败涂地。原来这帮从孔孟经书中讨生活的家伙，对汉武帝、桑弘羊的法家路线是深恶痛绝，耿耿于怀的。今天狭路相逢，显得分外眼红。桑弘羊一见此景，料定今天必有一番恶战，但是这位久经战斗风霜的老人，从容不迫，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准备迎接任何明枪暗剑。

贤良、文学们开腔了。他们一张口就搬出“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儒家信条，气壮如牛地冲着桑弘羊说：你们的“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闹得国富民穷，现在老百姓买不起铁器，吃不起盐，饥寒交迫，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请看，多么娓娓动听呵，这些无耻之辈，竟把自己打扮成一群“为民请命”的正人君子。他们纷纷狂悖地逼桑弘羊立即“罢盐铁、退权利！”

桑弘羊是一位汉武帝握手托孤的老臣，他深深懂得，眼前





图六二

这场争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因为盐铁官营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奴隶主侵略势力的一项重要措施。这帮儒生将火力集中在“盐铁官营”上，就是想抽掉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政策的物质基础，进而彻底改变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为了捍卫汉武帝的法家路线，桑弘羊先用深邃锐利的目光环视了这批利欲熏心的贪婪之徒，然后以刚强有力的声音回答了儒生们的挑衅。他指着儒生问道：你们如此起劲地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果真是为普通百姓着想吗？这纯粹是弥天大谎。如果诸位不健忘的话，应该记得，盐铁原藏“深山穷泽之中”，试问，除了“专山泽之饶”的豪民，一般百姓谁有力量霸占山泽煮盐冶铁？还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豪民，只有他们才能独霸一方，招徕奸猾之徒，“众邪群聚，私门成党”，一有可乘之机，就兴风作浪。文帝时可以私人铸钱、冶铁、煮盐，致使国家经济命脉操纵在郡国诸侯王和富商大贾手里，终于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差点颠覆了汉家江山。武帝鉴于历史教训，囑本大臣掌管天下盐铁，为的是“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盐铁官营以来，农业有了好转，国家收入有了增加，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们这批儒生，“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却摇唇鼓舌，搬弄是非。请问，你们到底是为民请命，还是为己请命？桑弘羊的一席话刨出了儒生的根底，他们为之争“利”的“民”正是一些地方诸侯王，大工商奴隶主，也就是他们自己——一小撮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他们狂吠“罢盐铁，退权利”，就是妄想罢掉坚持中央集权的法家路线，退给他们分裂、割据之权。儒生们受到桑弘羊

的痛斥，一个个搔头抓耳，不敢吭声。桑弘羊仍不让步，他义正辞严地当众宣布：先生们，你们的美梦做错了，盐铁官营是“国家大业”，“不可废也”<sup>②</sup>。他大声疾呼：“并兼之路”必须彻底杜绝，“养强抑弱”的局面决不容再现！桑弘羊给了贤良、文学们当头一棒，使这帮来势汹汹的家伙，一下子矮了半截。但是，他们不会就此罢休，赤裸裸地攻击盐铁官营的一着未得手，便改取旁敲侧击的手法，厚起脸皮，把矛头转到对匈奴战争的问题上。

他们先抬出孔老二的亡灵，打起“贵以德而贱用兵”的旗号，大放厥词，攻击汉武帝抗击匈奴的战争是穷兵黩武，“废道德而任兵革”，全怪几个“好事之臣”惹起战祸。

“贱用兵”者，反对战争之谓也。对于任何战争，首先要分清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匈奴，是西汉时期盘踞在中国北方境内的一个奴隶主军事政权。它看到西汉王朝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农业先进，就垂涎三尺，经常发动武装袭击，杀人劫货，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当时，匈奴和西汉的矛盾，是我国境内匈奴奴隶主贵族和西汉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和新兴的封建制度的矛盾。因此，西汉对匈奴的战争完全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当年，汉武帝坚持了爱国抗战的正义立场，起用了奴隶出身的卫青和霍去病为将领，经过数年血战，终于收复失地，赶走了侵略者。然而，儒生们无耻地攻击这场正义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道德”就是袭用儒家蠢猪式的

仁义道德，大搞屈膝投降，他们的“贱用兵”，就是攻击反侵略战争，甘当汉奸卖国贼。桑弘羊严厉反驳了这帮卖国之徒，并高度赞扬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是“匡难辟害”，“以义伐不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它维护了国家安全统一的正义行动。桑弘羊的有力反驳压住了这伙儒生的嚣张气焰。

贤良、文学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别有用心地弹起了“抗战亡国”的调调。他们指着桑弘羊狂叫：桑大夫，你知道吗？为了争北方那块“无用之地”，有多少人死于非命，陈尸旷野？又有多少人流血沙场，终身残废？“一人行而乡曲恨，一人死而万人悲”。他们又说，正是这些战争造成“老母垂泣，室妇悲恨”，如再不罢兵休战，则将“国家破灭，身受其殃”。好一群悲天悯人的“忠臣孝子”，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妥协投降。

列宁指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汉武帝抵御匈奴入侵的战争就是这样的进步的战争。贤良、文学们如此不择手段地恶毒攻击抗匈战争，其目的就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反动政治势力，妄图投降匈奴奴隶主，和匈奴奴隶主贵族建立反动的政治同盟，以实现分裂、割据的迷梦。盐铁会议上这伙贤良、文学们淋漓尽致的表演，充分暴露了儒家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

面对贤良、文学们的狂吠，桑弘羊怒火燃烧，义愤填膺，他指着这伙孔孟之徒说：匈奴是汉朝的心腹大患，“汉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如果不认真对付，必将后患无穷，他又用历史事实说明汉武帝即位以后，征伐匈奴，制止了边

患，“初虽劳苦，卒获其庆”，这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的正义行动，有何不当？！儒生们被驳得一个个呆若木鸡，缩紧了头。桑弘羊又继续理直气壮地说，今天，匈奴侵略者又陈兵瀚海，覬覦边城，对我虎视眈眈。他总结了西汉历史上“和亲”政策不能制止匈奴侵略的教训，严正指出，尽管汉朝政府曾每年给他们十分丰厚的礼物，可是匈奴统治者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贪侵”成性的凶狠豺狼，“只能武折，而不可以德怀”，就是说只能用反侵略战争击败它，而不能用仁义道德感化它。他激愤地对群儒说，大敌当前，如再不备，则“万世必有此长患”。在座的如果还有不想存心卖国的，那就应赶快丢掉幻想，提高警惕，坚持屯边政策，“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这才能象秋霜振落叶一般，彻底打败侵略者。否则就是自毁长城，“引狼入室”。

在桑弘羊义正辞严的批驳下，贤良、文学们一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觑。怎么办呢？儒生们一筹莫展，可是一想到杜延年海口许诺：只要难倒桑老头，就有高官厚禄、爵位封邑，一下子劲头又来了。

于是，这帮贤良、文学经过一番交头接耳，嘀咕了半天，又唱起了“诵死人之语”的拿手好戏。说起这个，儒生们可得意极了，一个个摇头晃脑地说：御史大夫，自古以来“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这个天经地义的道理，您总该懂得的吧！接着，他们又直接捧出孔孟的陈腐说教，拚命鼓噪“复往古之道”。根据这一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他们指桑骂槐，破口大骂商鞅变法“反圣人之道”，搞得“秦人不聊

生”。诬蔑秦始皇“上无德教，下无法则，任刑必诛”，结果国祚不永，二世就亡了。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贤良、文学们颂古，是为了“道古以害今”，开历史倒车。他们攻击先辈法家，正是“饰虚言以乱实”，妄想对汉武帝的法家路线进行反攻倒算。

桑弘羊作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代表，尖锐地批判了儒家的反动历史观，坚持从理论上捍卫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他根据法家的进步历史观，提出了“异时各有所施”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必须根据形势，“因时而行”，随着时代变化而实行变革。为了击退贤良文学对法家的攻击，他热情歌颂商鞅变法“功如丘山，名传后世”，认为秦所以由弱到强，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就是因为遵循“商君之遗谋”，贯彻了法家路线。桑弘羊还热情赞颂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指出，对于孔丘那一套反动思想，对于一小撮醉心于复辟倒退的孔孟之徒，“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为了更有力地击退这帮贤良、文学的猖狂反扑，桑弘羊毅然将群儒们崇奉的偶像孔丘端将出来，痛加鞭挞。他轻蔑地对儒生们说：你们所崇拜的大圣人孔丘，在鲁国吃不开，在齐国被驱逐，到了卫国站不住脚，跑到匡地又被老百姓包围起来，差点儿丧了老命，最后困于陈蔡，断炊绝粮。什么圣人？此人到处投机钻营，追名逐利；明知行不通，还要开倒车；分明是条四处挨骂、走投无路的丧家犬。寥寥数词，把孔丘其人的全副丑相勾画得淋漓尽致。接着，桑弘羊又把话锋转到这帮贤

良文学身上，步步紧逼地怒斥道：你们这伙“祖述仲尼”的儒家之徒也决不是好东西，而是“内贪外矜”、“情貌不相副”的伪君子，“往来浮游”的人间蠢虫！桑弘羊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以唇枪舌剑，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挖心剖腹的清算，有力地捍卫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挫败了霍光一派的罪恶阴谋。六十多名贤良、文学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结果却象泄了气的皮球，灰溜溜地一轰而散。“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的失败、法家桑弘羊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这次论战的实况，由东汉桓宽收集在《盐铁论》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研究桑弘羊的材料。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桑弘羊虽然在盐铁会议上胜利了，但是霍光一伙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会议一结束，霍光便利用职权，任命自己的亲信杨敞为大司农，实际上罢了桑弘羊的官，并强令废止了酒类专卖等政策。次年秋天，又指使党徒杜延年，诬告桑弘羊串通“谋反”，极端卑鄙地把他杀害了。

但是霍光的罪恶黑手，扭转不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盘。桑弘羊倒下了，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和抗击匈奴的方针，仍在继续贯彻下去，惊心动魄的儒法斗争在继续进行着。

---

注：①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② 《汉书·食货志》。

## 王莽的“托古改制”

历史上的孔孟之徒，都是一些竭力主张复古倒退，死抱着枯木朽株不愿进行任何改革的顽固分子。但是，当他们陷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后，有时也会戴上“改革家”的脸谱，玩一下“改制”的把戏，借以骗人，也骗自己，以便苟延残喘。西汉末年，臭名昭著的大儒王莽（公元前四十五——公元二十三年），演出的那场乱哄哄的“托古改制”丑剧，便是属于这一类情况。

王莽的“托古改制”，表面上看起来似有改革之名，实际上却只有复辟之实。“托古改制”的实质是在于尊孔复古。它是王莽为代表的大地主腐朽集团为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维持行将崩溃的西汉政权而施展的一个大骗术。

西汉政权自从汉元帝刘奭上台以后，开始进入了它生命的后期。这时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开始“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封建统治政权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政治上，儒家路线代替了法家路线；经济上，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豪强手中，农民遭受着极其沉重的剥削，出现了“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的局面，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达到了非常激烈的



程度。另外，再加上当时的中央政权，大都是掌握在“重侯累将，穷贵极富”的贵族集团手中，而这些家伙为了争权夺利一直相互倾轧，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更进一步将西汉政权拖进了进退维谷的深渊。为了维持它们的腐朽统治，大地主集团急需换马，寻找自己的代理人。王莽这个大儒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爬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大地主贵族集团的政治代表。

王莽是一个出身于贵族之家的纨绔子弟。他的姑母是汉元帝的皇后，因为这样的关系，王家一门就依仗权势，飞黄腾达起来。王氏家族“分据势职，盈满朝廷”，计有九人封侯，五人封为大司马大将军，到了王莽时，出自其门的地方官吏更是多如牛毛，声势之盛，简直不可一世。然而，王莽的上台，除了这家世的渊源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阴险地玩弄了儒家的两面派手法。

王莽年轻时就是一个虔诚的孔孟信徒，“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一言一行，甚至连戴帽穿衣，都是标准的儒家那一套。对儒家经典之一——《周礼》，他更是刻意揣摩，心领神会。结果，儒家的那一套虚情伪礼、假仁假义的两面手法，竟被他施展得滚瓜烂熟，运用自如。你看：他为了使“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真可谓深得孔老二“克己复礼”心传，他表面上谦恭非凡，行仁履礼，很快地博得了朝廷一部分官员的赞扬。他平时挥霍无度，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而当国家遇到水旱之灾的时候，他却假惺惺地吃斋食素，并硬逼自己的老婆装出一副“衣不曳地，布蔽膝”的寒酸相来接待客人，显示出一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正人君子”模样。结果，那些受到王

莽恩惠笼络的社会“贤达”、“名士”，便鼓起如簧之舌，到处为王莽游说鼓吹，又使他从中捞到了很大的政治资本。特别是对他那个掌握大权，身为大司马大将军的伯父王凤，王莽更是百般阿谀谄媚。王凤病危不起，王莽可来了劲，日夜陪伴在王凤的病榻前，甚至“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殷勤之态，令人作呕。当然，一番心机没有白费，王凤临死前总算把王莽竭力推荐给汉成帝，使他官运亨通，爵位激升。随着地位的增高，王莽的两面派手法也玩弄得更加厉害，于是更加得到皇帝的信任。三十八岁那年，他用阴谋手段除去了自己的政敌淳于长，爬上了大司马的高位，并以辅助平帝的名义独揽了朝廷大权，完成了篡权的第一步。

王莽大权到手以后，就撕下了道貌岸然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杀气腾腾的嘴脸。他为了扩大势力，推行一条“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的儒家任人唯亲的路线，排除异己，收罗死党。他到处“聘求名儒，征命术士”<sup>①</sup>，把社会上的那些反动儒生都集中在自己的门下。谁稍有二心，他就“胁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sup>②</sup>。在王莽的软硬兼施下，终于在他周围组成了一个以儒生为骨干的大地主官僚集团，为最后篡权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公元五年十二月，王莽毒死平帝后不顾大臣的反对，立了一个才二岁的孺子婴为皇帝，然后制造符命，指使手下的党徒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等字样刻在白石上公布于世，威逼太后承认王莽是“居摄践祚”的“假皇帝”，最后，干脆一脚踢开孺子婴，打着“奉天命”的旗号，改汉室为“新”朝，正式篡夺了帝位。然而最可笑的是，王莽这个野心家，在逼孺子

嬰让位的最后一刻，仍然不忘记施展儒家的两面手法，亲自拉着孺子嬰的手，“流涕歔歔”，珠泪满面，并好象内心有愧似的“哀叹良久”，搞得站在一旁的文武百僚，也莫名其妙的大为感动。王莽的篡位上台，真把儒家那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鬼脸勾划得入木三分。

王莽篡权以后，为了维护大地主集团的腐朽统治，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托古改制”的破烂货，全面推行了一条尊儒反法的复古倒退路线。他恶毒攻击秦始皇和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叫嚣“秦为无道，残灭诸侯以为郡县，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在这里，王莽如此仇视秦始皇，把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伟大功绩，污蔑成祸乱之由，一无是处，这固然暴露了王莽尊儒反法的丑恶嘴脸，但最主要的还是在借咒骂秦始皇来攻击汉宣帝以前的那些法家所继承的秦始皇法家路线，为推行分裂倒退的儒家路线制造理论根据，为实现“托古改制”的丑剧大造反革命舆论。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王莽大力提倡尊孔读经，拜倒在孔老二的脚下，举起“尊孔复礼”的破旗。他狂妄地叫嚷，要“制礼以治民，作乐以移风”，妄想用孔孟之道的枷锁来捆住农民的手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发誓要“尽力毕制礼作乐事”，因此，他治明堂，开秘府，宣教化，立《乐经》，在长安和一千多个反动儒生一起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并对《周礼》顶礼膜拜，赞不绝口，把它作为搞“托古改制”的蓝本。在政治、思想上宣扬尊儒反法的基础上，王莽正式把“托古改制”付诸实践。

王莽改制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王田制”，改天下田为

“王田”，奴婢为“私属”，规定不能私自买卖。他颠倒黑白地胡说：在实行“井田制”的古代，“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看，在王莽的眼中，古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啊！完全是一派桃源胜景。而秦朝呢？王莽又恶狠狠地咒骂说：“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是“坏圣制，废井田”，所以“兼并起，贪鄙生”，真是罪莫大焉。在这里，王莽颂古非今，赞美井田制，攻击秦始皇，决非真的要去恢复奴隶社会的井田制，而只是对农民进行欺骗，为大地主攫取更多的田地大开方便之门。公元十二年，王莽亲自到明堂“授诸侯茅土”，就是一次土地分赃。他表面上依据《周礼》规定的章程办事，实际上却是托古人之鬼魂为大地主集团服务，把大量的土地供奉给那些贪婪的大地主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同时使农民俯首贴耳地听凭他们的剥削。他穷凶极恶地向农民咆哮，如果“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从这里可以看出，王莽的所谓“王田制”，根本不是为了解决土地的严重兼并，而是为了让大地主集团获得更多的土地，给广大劳动人民套上更为沉重的枷锁。它代表的完全是以王莽为首的大地主官僚集团的利益。王莽本人就是一个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在他被封为安汉公，大肆张扬吃素食的时候，就霸占着最高数目的土地，对农民进行着极其残酷的剥削。“王田制”的颁行，维护了大地主集团的反动利益，为气息奄奄的奴隶主残余势力打了一剂强心针，并使大批早已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又重新被戴上奴隶式的桎梏，更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激起了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强烈反对，因此，

“王田制”仅行施了三年，就被迫给废除了。

与此同时，王莽还推行了一系列敲骨吸髓的经济政策。他滥发货币，将早已停用的古老货币拿出来使用，并动辄加以更换，从中捞到不少外快。“变改不信”，由于没有一种统一的货币，从而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将汉武帝以来货币统一的局面搞得一团糟。另外，王莽还不顾国力的衰败，穷兵黩武，先后发动了多次不义战争，严重地破坏了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友好关系，更加剧了广大农民的负担。

王莽的“托古改制”，完全是一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复古倒退路线。它的结果，使“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广大农民背乡离井，倾家荡产，“涕泣于市道”，天下人口骤然减少，整个社会一片昏暗。

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王莽的“托古改制”只不过是沉滓泛起。王莽的倒行逆施，更加剧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一场声势浩大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很快就将王莽的“新”朝焚烧在熊熊的烈火之中。

以绿林、赤眉为主力的农民大起义，不仅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了王莽“新”朝的残酷统治，而且从思想上对王莽“托古改制”的尊孔逆流给以有力的冲击。他们高举战旗，转战黄河南北，焚经书，捉儒生，冲破“三纲五常”的反动信条，镇压昔日的王公大臣，使那些反动儒生、地主官僚闻风丧胆，纷纷“怀协图书，遁逃林藪”。王莽这个自命为“真命天子”的孤家寡人，也被起义军的洪流，冲得众叛亲离。大厦将倾，末日临头，王莽直吓得浑身筛糠似的抖个不停。不知听了哪个臣子的馊主意，

王莽还带领满朝文武，到长安南郊对天嚎啕大哭，演出了一幕祈求老天爷保佑的丑剧。当时，只见王莽和他的那群朝臣一个个涕泗横流、丑态百出，以为用眼泪就能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然而正当王莽呼天保佑的时候，不信天命的农民起义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捣王莽老巢。倒行逆施的王莽再也阻挡不了农民斗争的浪潮，只好跌跌撞撞地躲到四面环水的渐台上。可笑的是，这个至死不悟的儒家信徒，临死之前还学着孔老二的丑态叫嚷着：“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可是最后他还是葬身于农民革命的铁腕之下。随着王莽的灭亡，“托古改制”的闹剧也就收场了，呈现在东汉王朝面前的已是一片“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的局面。

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次赤裸裸的倒退行为。可是反动文人胡适却别有用心地对王莽和他的“托古改制”进行无耻吹捧，他说，王莽是一个“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其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却长期蒙受了不白之冤等等。胡适要替王莽伸冤，其实就是为孔孟之道、儒家路线张目，这也正道出了这个封建买办妄图复古倒退的祸心，表明了他和王莽完全是一丘之貉。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和王莽一样，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大耍两面手法，妄图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结果是阴谋破产，死无葬身之地，这正是一切企图搞倒退的反动派的必然下场。

---

注：①② 徐幹《中论·亡国》。

## 白虎观会议和《白虎通义》

白虎观，是东汉皇帝与儒生们在洛阳北宫讲学的地方。公元七十九年，汉章帝刘炟（dó 怛）曾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儒家经籍注释讨论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会议从头到尾，一直吵吵嚷嚷，闹得不可开交。那些危冠博带、怪模怪样的“经学大师”，为了争论“《五经》同异”，一个个汗流满面，唾沫横飞，各执歪理，莫衷一是。最后，儒生班固秉承皇帝的旨意，依据这次会议的精神，编订了一部庞杂的儒家“经典”——《白虎议奏》，即现在通称的《白虎通义》。这部书是白虎观会议的一次总结，也是东汉儒家反动思想的集大成。它从头到尾露骨地宣扬孔丘、董仲舒的反动思想，大肆鼓吹“三纲五常”，而且兼收并蓄了荒诞不经的图谶灾异、阴阳迷信等乌七八糟的东西，进一步把孔丘神圣化，把儒家学说宗教化，把封建制度的理论系统化，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一部反动的尊孔法典。

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和《白虎通义》的出笼不是偶然的。它是地主阶级从政治上走向腐朽没落的产物，是地主阶级内部尊儒反法思潮的一次大泛滥。

东汉政权，是一个篡夺了农民起义果实而以豪族大地主

为支柱所建立起来的政权。这个政权一建立，就处在动荡之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一直很尖锐，小规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时刻威胁着东汉中央政权。面对这种形势，统治者除了继续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以外，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思想武器为自己的统治进行辩护。这样，在西汉后期出现的谶纬学就被东汉统治者视为至宝，把谶纬学定为儒家的正统。谶纬以外的其它思想，则一律被斥为异端邪说。

反动的儒家思想，总是要遇到法家思想的不断反抗。为了进一步排除异端，统一思想，向西汉末年以来法家学派对谶纬神学的批判发动反攻倒算，汉章帝刘炟亲自出马，召开了“白虎观会议”。他在下令开会的诏书中说：“汉承暴秦，褒显儒术”<sup>①</sup>，清楚地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尊儒反法，推行儒家路线。参加会议的，也都是一些反动儒生，如建议开这个会的校书郎杨终，就是一个大肆攻击秦始皇，主张放弃我国北方和西北方大片领土、撤销边备、准备投降匈奴的反动家伙。他在奏折中狂妄地叫嚣：要“论定五经”，“永为后世则”<sup>②</sup>。就是说，要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统一解释来统一儒家学派的思想，并要将这一套永远成为后代统治思想的唯一“准则”。但由于儒家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异端纷纭，互相诡激”<sup>③</sup>，思想极为混乱，结果在白虎观会议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演出了一场狗咬狗的丑剧。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儒家内部的两个学派。原来先秦的儒家著作，经过秦始皇焚书以后，大都烧毁散失，成了禁书。西汉初，由一些儒生口授，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



来,这就是“今文经”。西汉末年,又发现一部分被一小撮反动儒生保藏下来的儒家经典,是用战国时代的古文字——篆文写成的,被称为“古文经”。那些钻在儒家经书中讨生活的儒生便按此分成不同的学派,即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本来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一些狂热地宣传儒家反动思想的儒生。自从西汉中叶尊儒反法思潮逐步泛滥以后,儒家内部这两大流派产生了狗咬狗的争斗。它们这种斗争,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争夺儒家正统地位的学术流派争论,然而就其实质来说,是腐朽的大地主反动集团中的不同派别之争,是采用那一种手段欺骗农民、抵抗法家的批判、维护反动统治的争论。东汉初,由于光武帝刘秀采取了一些法家措施,因此政局相对地比较稳定,这种斗争不是最突出。到了那个“少宽容,好儒术”的章帝即位后,随着封建统治每况愈下,统治阶级急待需要利用儒家经典,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这样,经今古文学派之间,为争夺和保持各自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展开了激烈斗争。白虎观会议,便是这一斗争的集中表现。

在白虎观会议上,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各不卖账,面红耳赤地互相攻击,着实地热闹了一场。“今文经”的代表李育,以《公羊春秋》之义诘难“古文经”大师贾逵。贾逵呢?当然不甘示弱,也引经据典地回敬李育。到会的一帮儒生则在一旁起劲地鼓噪起哄,殿堂上一时鸦聒雀噪,煞是有趣。然而“今文经”和“古文经”毕竟都是儒家一个营垒里的货色。他们虽然在某些地方有争论,但是在宣扬谶纬迷信这一点上,则是完全

一致的。例如丁鸿，他是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曾极力鼓吹“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的“天人感应”说。象这样一个极端相信图谶迷信的人，在白虎观会议上却被认为是“论难最明”的“高才”。另外如古文经学派的贾逵，也同样是以提倡谶纬之学投皇帝所好，而受到提拔重用。撰集《白虎通义》的班固，曾根据图谶纬书，写了一篇历史论文《典引篇》，从开天辟地，讲到白虎观会议，完全用荒唐的宗教呓语，说明汉继尧统是天命，并胡诌章帝召开这次会议，也是受命于天。这些事实说明，参加白虎观会议的这些反动儒生，为了贪图利禄，望风承旨，堕落到何等庸俗、无耻的地步。

白虎观会议，拖拖拉拉，前后共开了二个月之久，闹得几乎不可收拾。最后，只得由汉章帝出面，“亲称制临决”，参与了经义的裁决。封建统治者通过研究注释“五经”，以封建国家法律的形式，大肆吹捧和抬高孔丘，确定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给后世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白虎观会议讨论的范围极为广泛，从自然界到各种社会现象，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都作了解释和说明。作为会议结论的《白虎通义》宣扬的中心内容是尊孔复古，“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

孔丘本来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在《白虎通义》中，却被打扮成一个有丰富的先验知识，能预知未来，与天神相通的天生圣人。他写的经书，也都是受天命而作的，是“永为后世则”的统治阶级支配思想，任何人都不能有所非议。诚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④《白虎通

义》极力吹捧孔老二这个历史亡灵，目的是为了“复礼”，是为了恢复和巩固被绿林、赤眉农民起义打乱了的封建统治秩序，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这一套“复礼”的理论根据，就是从孔丘到董仲舒一脉相传的“天命论”或“天人合一”说。大肆宣扬“君权神授”，是为了给地上的王权披上一层天命的神权外衣，来肯定封建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地位。《白虎通义》“复礼”的基本内容，就是所谓“三纲”“六纪”。“三纲”的思想，在孔丘的“正名”说中已经有了。董仲舒根据他的“阳尊阴卑”的理论，把君、父、夫比附为阳，臣、子、妻比附为阴，把君臣、父子、夫妻的尊卑主从关系已经讲得很明确了。《白虎通义》则把“三纲”作为永恒不变的伦理规范和最高的政治准则，正式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君权、父权、夫权进一步绝对化，并把“君为臣纲”提到“三纲”的首位。

除此以外，《白虎通义》还大肆宣扬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本不承认妇女的独立人格，胡说“妇人因夫而成”，妇女必须依附于丈夫才能存在，妇女生来就是为了服侍丈夫，不得参与社会活动，从理论上把妇女置于被统治的最底层。

“六纪”是什么呢？《白虎通义》解释说：“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这些无非和“三纲”一样，都是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是“三纲”的延伸和扩大而已，也就是为了把封建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神圣化。毛主席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白虎通义》用儒家唯心主义神学世界观，来解释封建社会的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以论证封建统治的神权、君权、父权和夫权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其实质就是要用四种权力捆住农民的手脚，维持地主阶级的政权。

白虎观会议借助封建政权的力量，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思想体系抬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最后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政治地位。这次会议，是地主阶级历史地位演变的一个必然结果，它意味着在封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里，地主阶级加强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表明了地主阶级进一步走向保守反动。

---

注：① 《后汉书·章帝纪》。

② 《后汉书·杨终传》。

③ 《后汉书·郑玄传》。

④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卷三。

# “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王充

“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东汉杰出的法家思想家王充在他的讨孔檄文《问孔》篇里写下了这句刚劲有力的话。它充分反映了王充鲜明的反孔思想。

王充(公元二十七——九十七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生活在东汉王朝的前半叶，经历了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四朝。东汉王朝是在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摧毁了王莽反动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一建立，就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东汉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用文武两手，一方面继续用暴力手段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以柔道行之”，掀起尊孔崇儒逆流，并把儒家思想同西汉后期出现的谶纬神学揉合在一起，用以加强思想统治。王充就是在这尊孔崇儒妖雾弥漫的社会里开始了他英勇的批孔斗争生涯。

王充的反孔思想，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王充八岁那年，开始进入学馆读书，但读的尽是《论语》、《尚书》之类的儒家“经典”。既迂腐又反动的儒家教条，使王充越读越厌倦。

大约二十岁左右，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愿望，只身来到京城洛阳，跨进了由儒学大师班彪主持的太学。但太学的生活，同样枯燥乏味，整天只准死啃孔孟经书，子曰诗云，不许浏览其他书籍，这对具有强烈求知欲的王充真如误入樊笼，深感束缚。不久，王充振翅冲破阻碍，毅然离开儒生嗡嗡钻营的太学，走上了洛阳的街头，深入社会，到实际中去学习。

社会是一个多么广阔的课堂啊！王充呼吸着民间的空气，了解了许多民情风俗，增加了实际知识。王充不仅十分重视实际知识，也强烈渴求书本知识。他家庭贫穷，买不起书籍，就每天带上一一点干粮，来到街坊书肆借书读。他饱览了诸子百家著作。那些法家的著作和他们的思想，引起了年轻的王充很大兴趣，他仔细的看，认真的想，贪婪的吸收……寒暑易节，春去秋来，随着岁月的流逝，王充学到的东西越来越丰富。后来，王充离开京都洛阳，开始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实际，又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为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的形成，为他从理论上批判孔孟之道，奠定了基础。

在王充生活的年代里，孔老二已被定为一尊，成为不可非议的“圣人”，朝野上下，儒家思想妖雾弥漫，气势汹汹。但一些法家思想家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他们在农民起义的推动下，努力从先秦法家思想中寻找理论武器，同谶纬迷信思想以及它的反动祖师爷孔丘进行坚决斗争。东汉初年的桓谭就是一个敢于反对谶纬迷信的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桓谭认为，图书谶纬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伪造出来欺世惑众、荒诞



儒法斗争史话插图

图七  
二



不经的玩意儿。为此，桓谭险些丢掉脑袋。桓谭的遭遇，突出的表明了东汉思想斗争的尖锐性。然而，斗争出人才。东汉的反孔斗士王充，正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奋笔疾书，用辛辣的笔调，写下了闪烁着战斗光芒的篇章——《问孔》、《刺孟》，讨伐儒家的祖师爷。他义正词严地说：“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向反动的儒学进行公开的挑战。他辛辣地嘲弄孔孟这伙“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文理不通，自相矛盾。王充在《论衡》这部巨著中，还对孔孟伪君子的虚伪本质作了大胆揭露。例如《问孔》篇“孔子之卫”一段，在揭露孔老二为了保持官架子不肯卖车买椁（外棺）一事，接着追问孔老二：你口口声声说“君子杀身以成仁”，为什么连对“退位以成礼”都难以做到呢？可见孔老二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一套。对孔老二两面派的揭露，在“佛肸（xì希）召”一段更为淋漓尽致。王充层层剥皮，揭穿孔丘口头上标榜“坚强”、“清白”，实际上是个“软而易污”的两面派；表面上避开“恶名”，背地里追求“恶实”的阴谋家；他“言无定趋”，“行无常务”，是个投机取巧的大骗子。在王充的笔下，孔老二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面目被揭露无遗。

王充的反孔，突出表现在对“天命观”和“天人感应说”的批判上。长期以来，唯心主义的神学理论，一直是阻碍法家人物实行变革的反动思想。尤其在东汉，反动统治者把儒家的“天命观”和谶纬迷信融为一体，把思想界搞得乌烟瘴气。王充挥动如椽大笔，明确提出，“天道，自然也，无为”<sup>①</sup>。并说：



“夫天者，体也，与地同”<sup>②</sup>。而“天地，含气之自然也”<sup>③</sup>。这就明确宣布天是自然而不是神灵，天和地一样都是无知觉、无意志的物质，把儒家的有人格、有意志、至高无上的“天”推翻在地。在此基础上，王充还尖锐地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胡说，肯定了“万物自生”的唯物主义命题。

王充在反对“天人感应”说的斗争中，形成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断然否定“生而知之”，指出人的知识是后天才有的，是人的感官与外界事物接触后获得的，他举刺绣和织锦为例，说：齐国都城的人世世代代刺绣，因之，那里所有的女子没有不会刺绣的；襄邑人传统会织锦，即使被认为是不聪明的妇女也是一把巧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天天见，日日练，自然会熟能生巧，所以根本不存在“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人。王充宣扬唯物主义认识论，目的是为了剥去孔丘、孟轲“生而知之”、“先知先觉”的圣人外衣。在《知实》篇中，他又举出十六件事，说明“圣人不能神而先知”。例如，孔丘和他的学生颜渊曾被匡人包围，如果孔丘有先知之明，就应该早早“易道以违其害”。可是，孔丘事先根本不知道，以致和匡人接触而被围。王充从这件事指出，孔丘根本不是一个生而知之的圣人。

王充在“伐孔”时，还继承法家进步的历史观，主张厚今薄古，反对儒家“好称古而毁今”、“好长古而短今”的厚古风气。在《超奇》篇中，他以形象的比喻，深刻地批判了儒家鼓吹的“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那种一味崇古的偏见。从孔丘、孟轲到西汉的董仲舒，都大肆鼓吹“今不如昔”

的谬论。董仲舒胡说什么汉朝由于继承了秦的法治而腐败得象朽木泥墙一样，无法修补，只有推行孔孟之道即开历史倒车才是唯一的出路。王充充分肯定商鞅的耕战政策，认为它取得了“为秦开帝业”的重大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秦王朝的进步作用。他指出，怀有今不如昔、汉不如周的俗儒们以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好，越古越好，这种偏见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的。在《宣汉》《恢国》等篇中，王充高度评价刘邦打败项羽分裂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的成就，对汉朝的建立和西汉前期巩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割据势力的措施都作了充分肯定，他认为：“秦汉之际，功奇行殊”，只是被儒家贬低和轻视了。他从各方面把汉代和周代作了比较，指出汉代国土的开辟远远超过了周代；在生产力提高方面，周代的荒野地区到汉代很多已经变成肥沃的农田；汉代在思想文化上也比周代发达。一切都证明“汉高于周”，汉“在百代之上”。他还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发展，举出古代的人吃不上五谷，也没有衣服穿，现在却“穿地为井，耕土种谷”，“有布帛之饰”等事实，肯定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驳斥了“今不如昔”的谬论。他嘲笑儒家说，你们“上则求虞夏，下则索殷周”，对古代的东西津津乐道，但对于当代的成就却反而全不看在眼里，“知古不知今”，简直是昏庸愚昧到极点！儒家说“汉不及周”，鼓吹一代不如一代，是十足的反动的历史倒退论；王充肯定“汉高于周”，汉“在百代之上”，坚持一代胜过一代，继承了法家的厚今薄古传统。

王充的批孔斗争，实质上是先秦以来的儒法之争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王充反对儒家的斗争是不彻底的。他在《问孔》《刺孟》等篇中，对孔孟思想所作的尖锐批判，主要是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来揭露孔孟言行的矛盾、言论和事实的矛盾和言论本身的矛盾，没有抓住路线问题。在《非韩》篇中，王充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态度显然和对待儒家的态度不同，但是对韩非的政治主张评价是不正确的。他指责韩非只讲耕战，不讲礼义；只讲刑，不讲德，认为儒者是代表礼义的，不可缺少，不同意韩非关于儒居于“五蠹”之首的观点。这恰恰暴露了他不能从路线上分析问题的局限性。在讲到秦统一六国时，他也只说是“秦以兵强，威无不胜”，至于秦为什么强，他就说不上来了。

尽管王充不能对孔孟从思想、路线上给予彻底批判，但是，在当时儒术独尊的历史条件下，王充敢于公开向孔孟挑战，是很了不起的。他对孔孟尖锐的批判，直接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所以王充的学说一出世，就被视为异端邪说，遭到了士族豪强和儒家的围攻。他们惊呼这是“妖变”，攻击《论衡》“文刺于俗，不合于众”，破坏了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王充不怕政治上的迫害，坚决给予回击。他说：“两刃相割，利钝乃知”<sup>④</sup>，表示决不“循旧守雅”，随从儒家那一套，去讨统治者的欢心。这充分表明了他坚定的尊法反儒立场。

王充作为东汉时期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敢于起来同孔学进行斗争，是受了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影响。西汉末年的农民战争，以革命暴力批判了封建统治者的尊儒反法思潮。王充从中受到了教育，看到了董仲舒之流鼓吹的那套神

权论的虚妄。王充对下层劳动人民比较接近和同情,他认为农民起来造反,是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sup>⑤</sup>引起的。这种说法虽然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实质,但有力地驳斥了儒家污蔑农民由于本性缺少“礼义”而起来造反的反动理论。这同王充在政治上反对士族豪强的垄断和经济上反对兼并土地的立场一致,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王充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的唯物论不能贯彻到底,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宿命论,即“自然命定论”,这是王充思想消极的一面,这也是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所共有的特点。

---

注: ① 《论衡·谴告》。

② 《论衡·祀义》。

③ 《论衡·谈天》。

④ 《论衡·案书》。

⑤ 《论衡·治期》。

# 向谶纬神学挑战的科学家

——张衡和祖冲之

观测天象,制订历法,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天文历法对农业影响很大,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需要不断地研究天文、改革历法。天文历法研究中充满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新的地主阶级政治集团的上台,或者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维持自己地位的需要,第一件做的事就是颁布新历、改元定号。天文历法就这样同儒家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我们介绍一下两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张衡和祖冲之,他们虽然所处的朝代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天文历法的研究中向谶纬神学大胆挑战,同儒家之徒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炎正昔衰微,  
新都诡图讖……  
独有平子疏,  
排诋请纠禁。”①

这首诗反映的,就是东汉时期伟大科学家张衡同谶纬神学斗争的情况。张衡(公元七八——一三九年),字平子,出身

于没落的官僚家庭。在他诞生的第二年，汉章帝召集了臭名昭著的“白虎观”会议，把谶纬神学法定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从此谶纬迷信风靡一时，搞得东汉社会乌烟瘴气。张衡年青时，就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离开家乡，从南阳郡（今河南省南阳县）出发，跋山涉水，来到三辅（今陕西省西安一带），考察社会情况，使他对谶纬神学的毒害有比较深切的认识。南阳郡守几次要保荐张衡为“孝廉”，都为张衡所拒绝。在张衡看来，可耻的不是“位之不尊”“禄之不伙”，而恰恰是“智之不博”。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天文、历法等实际的学问，使他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后来，他被汉安帝征召到京都洛阳，当上了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令”。他夜以继日地研究古代天文学，并躬身实践，对天象进行无数次实际观察，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测定天象的“浑天仪”。他还写下了《灵宪》、《浑天仪图注》，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浑天说”。不久，他又首创了“地动仪”、“候风地动仪”等天文、地震观察仪，用他的科学活动，狠狠打击了谶纬迷信。

孔孟之徒是一群阻碍科学发展的蠹虫。他们对张衡的科学活动恨之入骨，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妖风，威胁、利诱张衡，妄图依仗权势，迫使张衡向谶纬神学屈服。公元一二三年，儒生夏诵、梁丰等一伙，经过紧张的策划，突然抛出了用图谶改定历法的建议。他们在朝廷里大吵大嚷，有的说，当时通行的“四分历”（东汉初李梵、编诉等人编创的先进的历法）“不可用”，唯有“甲寅元（殷历）与天相应，合图谶，可施行”；有的说，实行“四分历”后，“灾异卒甚，未有善应”，不如倒退回去用“太

初历”(汉武帝时制定的历法,反映了当时的天文学水平,误差较大)。这时,张衡怒不可遏地挺身而出,同当时另一位天文学家周兴等人一起,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力地驳斥这伙对天文一窍不通、搞阴谋却颇为能干的儒家之徒,指出:“太初历”经过西汉末期王莽的谋士刘歆“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糅合天施、地化、人事“三统一”的谶纬迷信,已“差谬”百出,每六千一百五十六年就多出了一天,其“迂阔不可复用,昭然如此”;至于老掉牙的殷历“复多违失,皆未可取正”。你们用谶纬神学乱改历法,完全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简直愚蠢到了极点!直驳得亶诵、梁丰之流“或不对,或言失误”②,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在批判儒生谬说的同时,张衡同周兴进一步提出用“九道法”计算日月食,这种推算方法考虑了月亮运动的快慢,是一个大进步,但却没有被尊儒反法的汉安帝所采纳。尽管如此,由于张衡等人的斗争,“四分历”得以继续实行,腐儒们用谶纬神学改定历法的阴谋破产了。

四年后,汉顺帝上台,又任命张衡为“太史令”。这时,张衡已经五十岁了。早在张衡三十八岁时,就当过“太史令”,十二年来,“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这在狗苟蝇营地追逐高官厚禄的儒家之徒看来,简直是可悲的事情。儒生们认为,张衡不能升官发财,就是因为他“独妙思于机巧”,而不能随波于谶纬。于是,他们就以“富贵”为诱饵,在张衡身边摇唇鼓舌起来。有的说:你动足脑筋作《灵宪》,制“浑天仪”,造“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的天文观察仪器,不过是一些雕虫小技,根本无助于升官发财,还不“卑体屈己”,对提倡谶纬神学的统治

者“美言”谄媚，以求富贵。有的干脆说：“器赖雕饰为好，人以舆服为荣”，赶快“性德体道，笃信安仁”，做个儒家之徒，“以思世路”，为自己的仕途着想吧！对这些可憎、可笑的儒家之徒，张衡嗤之以鼻，驳之以文。他写了《应问》一文回答他们的“规劝”。张衡说，你们这些“趋偶为幸”，靠图讖吃饭、“不能通其变”的“儒士”，正象韩非痛斥过的“守株而伺兔”的笨蛋！对于你们追逐富贵的“捷径”，“我不忍以投步”；对于你们阿谀谄媚的“苟容”，“我不忍以歛肩”。这一番光明磊落的话，把儒家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达了他以天文历法的研究为武器，同谶纬神学斗争到底的决心。

最能反映张衡战斗精神的，是他在公元一三三年写的《驳图讖疏》。张衡在这篇疏中指出，“自汉取秦，用兵力战”，汉初的帝王根本不“称讖”；“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图讖成于哀、平之际也。”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汉初的法家代表刘邦、文帝、景帝等不信儒，搞的是法治，一直到汉元帝后，地主阶级转向尊儒反法，“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张衡引用了韩非的著名寓言《画鬼最易》讽刺了这种现象。这个寓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问画匠“画什么最难啊”？画匠回答“画狗马最难”。“那么，画什么最容易呢？”回答是“画鬼魅最易”。张衡说：“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现在对“律历”之类的实际学问，“世莫肯学”；对于“图纬”之类“虚妄”的“妖言”，儒生们却争学“竞称”。这帮“虚伪之徒”以讖纬“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实为国家的祸害。因此，张衡大声疾呼：“宜收藏图讖，一禁绝之”<sup>③</sup>！当然，张衡把禁绝讖



纬神学的希望寄托在一味尊儒反法的汉顺帝身上，只能是一种梦想，因为儒法两家向来就是势不两立的。

儒家之徒与宦官宠臣们勾结起来，要拔掉张衡这颗眼中钉。他们在汉顺帝面前竭尽诋谗之能事，把张衡赶出了朝廷。张衡五十九岁那年，被贬为“河间相”。但他并没有向尊孔的反动势力让步。他担任地方官三年，“治威严，整法度”，狠狠打击了“豪右”“奸党”，“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豪族地主、儒家之徒“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不过，晚年的张衡看着东汉王朝的日益腐朽，谶纬神学瘟疫般地蔓延，感到前途渺茫，无限失望。他作诗叹道：“我所思兮在太(秦)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龙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在东汉王朝，儒家路线统治下，不管是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张衡的理想都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写了《归田赋》，想“纵心于域外”了。不久，六十二岁的张衡离开了人世。在谶纬神学逆流横行的东汉，张衡能以他的科学活动大胆地向这种儒家思想挑战，不愧是继王充以后的又一个反儒斗士。

恩格斯说过：“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三百年后，有个披着“善历者”画皮的儒家之徒戴法兴，又拾起了被张衡驳得体无完肤的用图讖定历法的命题，招摇过市，欺世盗名。也正是在同儒家之徒的斗争中，又冲杀出一位

高举唯物论战斗旗帜的尊法反儒科学家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四二九——五〇〇年)出身在南北朝时期宋朝的一个世代研究天文历法的寒门庶族家庭。在他诞生的前九年,即公元四二〇年,宋武帝刘裕利用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打击门阀士族统治的成果,消灭了腐朽的东晋王朝,建立了宋;同北方的鲜卑族著名改革家拓跋珪建立的北魏相对峙,开创了南北朝的局面,结束了西晋八王之乱以来的动乱局面,取得了暂时的安定。宋的初期,刘裕任用庶族地主革新派刘穆之等人,打击士族门阀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发展农业生产,积极进行北伐,力图恢复国家的统一。祖冲之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从小比较接近实际,不受儒家思想束缚。年青时,进了“华林学省”,刻苦钻研天文、历法、数学、机械。特别是他“不顾世俗之惊”,手拿仪器,躬身实践,进行了“频年测候”天象的艰苦工作,获得了天文、历法方面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远考唐典,近征汉籍”,对古六历、太初历、四分历、元嘉历进行了分析、比较,用对天象的观察进行“事验”,相符的就保留,相违的则纠正。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古历疏舛,颇不精密”,元嘉历虽“比古十一家为密”,但仍不理想,必须“更造新法”。公元四六一年,他被任为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市)“从事史”的小官。他总结了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成果,编制了一本新的历法,即“大明历”。“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大明历”对历法作了两项重大的改革,一是改革“闰法”,二是应用“岁差”。原来,元嘉历承袭的古闰法,十九年加七个闰月,每过二百年要相差一天。祖冲之改为三百九十一年设置

一百四十四四个闰年，减少了误差；祖冲之根据日测和计算，认为“冬至所在，岁岁微差”，他在历法中第一次考虑了岁差，突破了以往所有的旧历。这两项改革的提出，是他对数学的研究分不开的。祖冲之算出圆周率介于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在世界数学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三百年前张衡对圆周率的研究成果 3.16 大大向前推进了。第二年，祖冲之把“大明历”上表宋孝武帝，并表示了“改易”旧历的决心。一场天文、历法史上的著名的大辩论爆发了。

原来，宋朝到了孝武帝统治时期，刘裕的法家革新路线已为儒家守旧路线所代替，门阀势力膨胀，谶纬神学流行，朝廷大权旁落到“太子旅賁中郎将”戴法兴为代表的守旧集团手里，戴法兴“事无大小专断之”，被称为“真天子”。他一看到年轻职卑的祖冲之想革新历法，不禁火冒三丈。

这一天，孝武帝下了议历的诏令，侍立在朝廷两旁的群臣慑于戴法兴的权势，一个个噤如寒蝉。戴法兴摆出一副“大人物”架势，气势汹汹地叫道：“古人制章，万世不易”，你祖冲之一个区区小人物的“浅虑”就能“妄可穿凿”吗？这完全是孔丘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破烂货。祖冲之面对这个“大人物”的威胁，毫无惧色，坚定地说：就算我是个“愚”者，但是，我决不盲目迷信，“虚推古人”，我“专功数术，搜练古今”，对周朝以来的历法“咸加校验”，改正“众谬”，“理据炳然”，“凡夫”就是能议历！戴法兴见硬压不行，竟然冒充“善历者”，胡诌说：十九年加七个闰月，这是天经地义的，你要改闰，就是“削坏闰章”，破坏了“人生之大本”！再说，“冬至日有定处”，太阳永远

走在它的“故辙”上，你搞什么岁差，是“违天于改易”，“治历之大过”！祖冲之据理驳斥：古闰法“今已乖远”，难道要“永当循用”吗？再说：天体运行“非出神怪，有形可检，有数可推”，旧历不讲岁差，“乖谬既著”，难道不应“改易”吗？戴法兴紧步孔丘“信而好古”、“行夏之时”的后尘，大弹“信古而疑今”的调调，俨然以古历卫道者自居。他根本没有一份第一手天文资料，对赖以招摇撞骗的“老黄历”也没有真正搞懂，辩论中语无伦次、漏洞百出。祖冲之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征引诗书，三事皆谬”，“所议六条，并不造理”，明明对天文、历法一窍不通！“善历者”被剥了画皮，这怎不使戴法兴恼羞成怒！戴法兴暴跳如雷了，他狂叫：旧历“据文于图讖”，你敢“刊古革今”，就是“诬天背经”！技穷的黔驴几声发疯的吼叫声岂能吓倒祖冲之！祖冲之巍然屹立，从容不迫地说：儒家之徒用图纬附会历法，无非是“借号帝王以崇其大”、“假名圣贤以神其说”<sup>④</sup>，是他们“丧业曲技”、无能为力的表示。东汉的桓谭“知其矫妄”，认为“讖记多虚”。你所说的“讖记碎言”，我也“不敢依述”！祖冲之坚决与儒家的讖纬神学决裂，把戴法兴驳得理穷词屈、目瞪口呆。尽管辩论中，朝廷里那些主张新历的人，对戴法兴的邪说“立异议”，因“畏其权”，没有卷入这场针锋相对的论争，仅有一个叫巢尚之的“中书舍人”公开表示支持祖冲之，但这场反儒的小人物打倒尊儒的大人物的辩论，实质上是南北朝时期儒法斗争的一个侧面。

在同儒家之徒的斗争中，祖冲之在多方面获得了出色的成就。他发明、创造了“指南车”、“千里船”、“水推磨”等许多

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科学机械,成为一个成绩卓著的科学家。

祖冲之晚年,宋为齐所代替。特别是齐明帝上台后,皇室内乱,豪族兼并,北魏入侵,内忧外患迫在眉睫。祖冲之对儒家守旧派的腐朽统治极其愤恨,他投笔从戎,担任了守卫京城的禁卫军将官,并写了《安边论》,主张“开屯田,广农殖”,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他还准备“巡行四方,兴造大业”。这表明他继承了法家人物重视耕战的优良传统。公元五〇〇年,七十二岁的祖冲之与世长逝了。九年后,经过他儿子祖暅等人的努力,“大明历”终于冲破儒家的压制,被颁布实行。这一先进的历法一直沿用到公元五八九年,在南朝境内整整使用了八十年!

当然,作为庶族地主阶级改革派,祖冲之也摆脱不了自己的局限。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他的思想仍混杂着唯心论糟粕。他注重“事验”,却承认了孟轲的“可坐而致”的先验论;他主张革新,却追求“永定之制”,把自己编制的“大明历”看成尽善尽美的顶峰。但是,他大胆地向谶纬神学挑战,勇敢地同儒家之徒斗争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

注:① 刘青藜:《过张平子墓诗》。

② 《后汉书·律历志》。

③ 《后汉书·张衡传》。

④ 《宋书·历志》。

#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 ——东汉末年农民反孔斗争

东汉末年，民间广泛流传着这么一首革命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  
小民从来不可轻。”

这首东汉末年的革命歌谣，极其形象地歌颂了贫苦农民敢于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以不屈不挠的意志，掀起革命的狂澜，前赴后继地向当时的大地主集团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英勇气概。

东汉政权，是个尊儒反法的反动政权。东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定儒家思想为“一尊”，标志着东汉王朝彻底地走上尊孔崇儒的道路。由儒家思想脱胎出来的谶纬迷信泛滥成灾，谁敢稍持异议，立即会被戴上“非圣诬法”的罪名，判处死刑，午门斩首。同时，这个时期，地主阶级中已逐步形成了一股大地主豪强势力，他们与儒家学派日益紧密结合，形成“世传儒学”的世家大族。到了东汉末期，这股反动势力

更加恶性膨胀。它们在经济上“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sup>①</sup>；在政治上垄断仕途，“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它们是压迫人民的大恶霸，也是削弱中央集权的大蠹虫。当时，虽有一些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如仲长统、王符等人上疏进言，呼吁改革，但他们的声音，早被儒家的喧嚣淹没了。谁能够挺身而出，为社会的前进开辟道路呢？阶级斗争的规律早已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受压迫最深重的贫苦农民，才敢于铤而走险、打破东汉末年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看：东汉的农民站起来了！熊熊烈火般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从公元一〇八年至一八〇年，平均每年就有一次。上面提到的那首民谣，千人唱，万人和，它是足以压倒儒家拉拉队的，它唱出了当时农民起义的气势：象遍地丛生的韭菜，几经刀剪，更长得郁郁葱葱；象预报黎明的金鸡，刀搁在脖子上，也依然引喉高歌！儒家鼓吹“三畏”，胡说达官贵人们是碰不得的，可劳动人民奉行的是斗争哲学，“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公元一八四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这座火山喷射的岩浆，把士家大族专权的尊孔王朝烧得土崩瓦解！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大起义，它是对东汉反动阶级尊孔逆流的总清算。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农民首先挥动铁拳，砸碎了孔孟之道的“天条”。起义军领袖张角利用“太平道”作为发动群众、准备起义的工具，明确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斗口号，以敢于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敲响了东汉统治的丧钟。东汉

统治者借着谶纬神学，竭力宣扬孔老二“君权神授”的天命论。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仲长统尊法反儒，曾愤然地揭露儒家是“伪假天威”<sup>②</sup>。但作为一个有“良田广宅”的地主，他的批孔并不是想要地主阶级的“苍天”倒台。农民则不同了。他们过的是“地广而不得耕”，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遇天灾“死者相枕”的地狱生活，他们与大地主阶级有不共戴天之仇！孔孟之徒和一切反动派“敬天”、“信天”、“畏天”，农民阶级偏偏敢于把“苍天”踩在脚下，宣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苍天”已死，农民自己的天下——“黄天”当立，决心以革命的暴力掀翻吃人的旧世界，建立农民理想中的新世界。起义军战士握着粗大的笔，描绘出自己的天下：那里“人人自有筋骨，各自衣食其力”，那里男女平等，决不容许“天下无道”者残杀女子的罪行重现。一字一句都那么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对孔孟之道如此大胆宣战，这是地主阶级的改革家所望尘莫及的。

再看看黄巾起义军在实践中革命纲领中的英勇气概吧！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张角和他的弟子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组织起几十万农民，编成三十六“方”，千军万马由张角统一指挥，“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甲子年，即公元一八四年二月，几十万起义战士个个头裹黄巾，横刀跃马杀了出来。黄巾，统一的战斗标志，鼓舞着千万革命农民为创立美好的“黄天”战斗。在张角的率领下，起义军“燔烧官府，劫略聚邑”，把世代冤仇化为力量，向着反动统治阶级英勇斗争，讨还血债。南阳的黄巾军斩了太守褚贡的脑袋；汝南的黄巾军大败太守赵谦，各地人民群众密切配合，活捉那些鱼肉人民的士族豪



强、贪官污吏。黄河上下，“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剥削阶级的“苍天”被农民起义的大火烧焦了！

反动派总是以孔孟之道作为精神支柱的。得道多助的黄巾军，仅仅十来天工夫，攻城夺县，发展成百万大军，马不停蹄地杀奔东汉王朝的反动老巢洛阳。这一着，可把统治阶级吓成一团。当时，一个名叫向栩的儒家官僚，自作聪明地向皇帝递交一封奏书，上面写道：“只消在黄河南岸向着北边的黄巾军读《孝经》，贼徒们自然会消灭了。”这匹儒家蠢驴，已经被孔孟之道毒害得晕头转向了，竟捧出儒家经典当作镇压起义的万灵法宝。然而黄河的怒涛是挡不住的！起义军没有被儒家“圣经”“消灭”，他们是踩着“圣经”造反的，是顶天立地的反孔英雄！

当起义军向孔老二的老家山东曲阜胜利进军时，千军万马直捣孔府，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反孔活剧。起义战士手挥大刀、锄头，把那些刻着“圣经”的石碑、祭孔的礼器砸个稀烂。孔丘的“圣像”不见了，曲阜原野，孔府内外，树起了威风黄巾军战旗。

为了顶住东汉时期尊儒反法的逆流，王充等法家曾不断地对孔孟之道进行过批判，但这种批判尽管很犀利，却怎么也比不上黄巾起义对孔孟之道的万炮齐轰。起义军对孔府的扫荡，在社会上产生着巨大、深远的影响，直到魏文帝曹丕的时候，曲阜还是“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一片衰败气象，听不见儒生们的读经声，也没有谁敢去给孔老二上供焚香。黄巾起义军的反孔壮举，沉重地打击了东汉时一度气焰

嚣张的儒家路线，“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被起义军斥为“伪学”、“伪道”的儒家学派威风扫地。就这样，黄巾军用革命暴力搅乱了世家大族的酣梦，孔孟之道的一统天下也被打得千疮百孔。三国时期，政治思想领域出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以曹操为首的一大批法家人物，他们纷纷“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前进、统一的法家路线，这个新局面的开创，难道离得开黄巾起义反孔的功劳吗？

东汉的世家大族恶势力十分猖狂，他们尊崇世传儒学，自封“儒宗”，思想保守、反动，而且还掌握大量地主武装，养着一大群“刺客死士”，家兵恶棍，恣意妄为，为非作歹。一般“细族孤门”出身的官员根本奈何不得他们，就连曹操，早年“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摸了一下老虎屁股，结果“从坐免官”，只得请病假躲在家里。黄巾起义了。在封建统治下，起义的黄巾军战士，他们“生有终身之劳，死有暴骨之忧”，世世代代吃尽了世家大族这只恶虎的苦头，他们是千千万万条打虎的好汉！孔老二的二十世孙孔融，垄断曲阜的政权、军权、财权、文权，本人当着东汉王朝的北海相，是世家大族中“名震远近”的霸中之霸。黄巾起义时，他还设着孔丘的亡灵，“崇学校”、“显儒士”，在自己的小王国里闹哄哄地演出尊孔丑剧。黄巾军义愤填膺，一把揪住了这只恶虎。战士们冲到徐州城下，孔融“大饮醇酒”，壮壮胆量后，便跨上瘦马，领着一批乌合之众，在涑水边上与黄巾军顽抗，很快就吃了败仗，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正当孔融及其徒众被黄巾军打得人仰马翻之际，另一支

起义军已胜利地攻进城了。这时，孔融魂飞天外，连忙气急败坏地夺路出逃，“弃郡而去”。他滚蛋后，孔丘子孙世袭的“褒成侯”的官衔儿，一连好几世都空着，黄巾军的神威吓得谁也不敢出头顶这个“美缺”。农民起义，把孔融打得象孔老二一样“累累若丧家之犬”。这个时候，孔融手下的爪牙“不满数百，谷不至万斛”<sup>③</sup>。他是作为一个逃亡地主不得已才投奔曹操麾下的。昔日的权势，一扫而光，昔日的名声，一文不值。黄巾军使这只纸老虎变成了丧家狗，当他后来扬起脖子向曹操狂吠的时候，曹操便毫无顾忌地把这条落水狗给宰了。曹操来到济南，这里正是黄巾军活动的中心，在大起义创造的形势下，曹操比较顺利地采取了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措施。他发布了“重豪强兼并之法”，一下免去了济南境内豪强豢养的八个“阿附贵戚，赃污狼藉”的贪官。黄巾起义打掉了世家大族的气势，曹操才可以放心大胆地收拾他们。也正是由于黄巾起义的扫荡，“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许多世家大族在大风暴中吓得作鸟兽散，东汉原来的“征辟”制无法实行，三国时的法家们才能改变世家大族任人唯亲的路线，实行“唯才是举”，重整法治路线的旗鼓。

与黄巾起义同时，张鲁在汉中领导“五斗米道”农民起义，建立政权达三十年之久；琅邪人于吉，也在江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黄巾军被反动派镇压后，几十支农民起义军接过他们反对孔孟之道，打击豪强地主的旗帜，“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sup>④</sup>。东汉王朝黑沉沉的“苍天”终于完蛋了。三国时推行法家路线的程度，取决于黄巾起义和其它农民起义。

曹操推行法家路线比较坚决，诸葛亮次之，孙权又次之，这是由于农民起义给他们提供的条件有所差别，“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没有伟大的黄巾起义，儒家的一统天下打不破，三国的法治路线何从谈起！汉末农民阶级的英勇斗争，创造了历史条件，为地主阶级革新派开辟了道路，准备了前提和提供了舞台。农民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功绩是不容抹煞的。

---

注：①②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③ 《三国志·魏书》。

④ 《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

## 魏武挥鞭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这首光辉诗词里，曾形象地刻画了曹操于公元二〇七年秋天，率众来到洪波涌起的渤海边，跃上碣石山岗，挥鞭赋诗的雄姿，对曹操的历史功绩作出了应有的评价。

曹操(公元一五五——二二〇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省亳(bó)县)人，是三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出身寒族，“本非岩穴知名人士”。年轻的时候，“揽申、商之法术”，以执法森严著称。二十岁那年，任洛阳北部尉。一到任，就赶制五色大棒数十根，悬挂衙门两侧；命人四处张贴告示：凡有违法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汉灵帝的宠幸宦官蹇硕的叔父倚仗权势，公然为非作歹。曹操大怒，立即命人将他依法处死，京畿上下都为之震动。几年以后，迁任济南相，又下令“禁断淫祀”，使所辖之境，“奸宄逃窜，郡界肃然”。年轻的曹操初露锋芒，就大为“强豪所忿”，表现出与当时的士族、俗儒截然不同的法家战斗锐气。



圖八二

公元一九〇年以后，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豪强势力，纷纷拥兵自立，割据一方。河北大军阀袁绍为了扩大自己势力，阴谋另立刘虞为帝，亮出分裂旗号。他的弟弟袁术干脆“僭号于九江”，忙着当皇帝，两个老婆还为争做“皇后”闹得不可开交。各路军阀“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乱哄哄的厮杀不休，直把个傀儡天子汉献帝东撵西赶的，弄得没个安身之地。连续多年的军阀混战，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使富饶的黄河流域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景。在这时候，尽快地结束割据状态，统一中国，便成为当时广大人民最迫切的愿望。曹操，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起兵陈留，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曹操是地主阶级的法家政治家，他起兵的目的，虽然也有镇压黄巾起义军的一面，但同那些乌眼鸡似的相互争权夺利的世家大族代表袁绍、袁术之流不同。曹操曾经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sup>①</sup>。这句话固然暴露了他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也清楚的表明，他起兵的目的是要用战争手段结束军阀割据状态。为了实现这一宏大抱负，曹操一起兵，就以远大的政治目光，制定了政治、经济上的两大方针。

在政治上，曹操坚持“奉天子以令不臣”。一九六年，他亲自把汉献帝接到许昌。这与袁绍之流大搞独立王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经济上，曹操提出了“修耕植，畜军资”的方针。他深知“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的道理，称赞秦国“以急农兼天下”，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都是“先代之良式”，决心要

仿效、继承这些前辈法家的经济措施。从公元一九六年起，曹操开始在许昌周围大规模“建置屯田”，命令各州郡“创置田官”。屯田的结果，使“所在积粟，仓廩皆满”，军队“无运粮之劳”，为曹操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由于曹操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成功的推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因此，在短短的几年内，军力日渐强盛。在这个基础上，曹操马不卸鞍，亲率大军南征北讨，接连向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发动进攻。旌旗指处，所向披靡。继灭袁术，降张绣，擒吕布，破杨奉，并于公元二〇〇年，同大地主豪强的政治代表袁绍，在官渡展开了一场决战。

袁绍这家伙，出身于“四世居三公位”而“势倾天下”的名门豪族家庭，是一个“繁礼多仪”的孔孟忠实信徒。他怀着割据称王的野心，起兵以后，收罗了许多反动儒生，推行一条儒家复辟倒退路线，勾结中国境内的北方乌桓奴隶主军事政权，大搞分裂扩张活动，逐步占有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分裂割据势力。曹操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给袁绍推行儒家路线带来极大威胁。袁绍又急又怕，便来个先发制人，拉起三军，倾巢而出，向许昌扑来。出战以前，袁绍命令兵士每人携带三尺绳，准备活捉曹操，真是狂妄至极！

形势对曹操一方来说，确实是极为不利的。袁绍拥兵十万，气焰嚣张，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而曹操总共只有二三万军队，处于守势。双方军力悬殊如此之大，怎么办？究竟是打，还是投降，曹营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

钻进曹操营垒里的孔丘二十世孙孔融，是个政治上和袁



绍一鼻孔出气的反动儒生，早在做北海太守时，就搞得“政散民流”，又被黄巾农民大起义打得抱头鼠窜。钻进曹操营垒以后，与曹操的法家路线格格不入，曹操要杀勾结袁术的大豪族杨彪，他跳出来竭力阻止；曹操为节约粮食而下令禁酒，他大叫：“酒之为德久矣”；曹操坚持统一战争，但他向汉献帝提出“宜准古王畿之制”，要走西周分封制的道路。对孔融这样一个反动儒生，曹操心里早就极度不满，曾经以逐祢衡，杀边让来“敲山震虎”，严重警告孔融。但孔融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破坏曹操的统一事业。这次袁绍大兵压境，他便心怀叵测地拉拢了一批和他差不离的角色，秘密与袁绍书信往来，暗通消息，充当内奸。并鼓动如簧之舌，四处散布失败主义舆论，吹嘘袁绍“地广兵强”，文官武将济济一堂，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战胜呢？在孔融的煽动下，有些本来就被袁绍气势汹汹的假象吓唬的人，更是谈虎色变，都“以为不可敌”，一时人心浮动。

以曹操为代表的法家，大敌当前，坚决主张迎战袁绍。为了驳斥孔融之流的投降主义论调，曹操召集将领就敌我双方优劣长短作了详尽的剖析。他指出袁绍这个人，是个“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sup>②</sup>的家伙，他的军队，也是“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sup>③</sup>，没什么了不起，只是顶着一个外强中干的躯壳而已。最后，曹操还风趣地把袁绍比作给他押送粮草的运输大队长，说袁绍“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sup>④</sup>。曹操的主战思想，得到了他的主要谋士，年轻的法家郭嘉等人的大力支持，驳斥了孔融等散布的难以

与袁绍为敌的谬论。曹操营中，由于法家路线战胜了儒家投降主义路线，全军士气顿时大振。曹操和郭嘉等经过仔细推敲，制定了一个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详细周密的作战计划。

大战的序幕刚一拉开，曹操就在白马、延津二地，分别采用“声东击西”和“诱敌深入”的战术，出奇制胜地歼灭了袁绍部分主力，大挫了袁军的锐气。首战告捷使曹军初步扭转了战略上的被动地位。接着，曹操又指挥军队大踏步地往后退，撤到官渡一线，凭借有利的地形，以逸待劳，同袁绍足足对峙了三个多月，又用计一举烧毁了袁绍的几千辆粮车，把袁绍抛入了劣势和被动的地位，使之产生了后顾之忧。

决定曹胜袁败关键一仗打响了。那是十月的一个晚上。曹操亲率“精锐步骑”五千，打着袁军旗号，踏着星光，衔枚疾行，直插袁绍的屯粮之地乌巢，一把大火将乌巢屯粮全部化为灰烬，这下闹得袁军大乱，不战自溃，象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一气。曹军乘机全线出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袁军压去，一下子歼灭袁军七万多。袁绍最后只拖着一群残兵败将逃回河北，不久气得一命呜呼了。官渡之战最后以袁败曹胜而载入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史册中。

官渡决战前夕，郭嘉曾对袁绍和曹操两个集团之间的政治路线作了很详尽的分析比较，例举了曹胜袁败十条根据，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绍以逆动，公（曹操）奉顺以率天下”。郭嘉所讲的“奉顺”，实际上就是曹操执行着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法家路线，所谓“绍以逆动”，就是说袁绍推行了一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儒家路线。袁绍曾狂妄地叫嚣要南据河，北阻

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十足暴露了他那个分裂割据势力总头目的嘴脸。而曹操却认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显露了他决心以法治路线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两般话语，两条路线，一儒一法，泾渭分明。官渡一战，曹操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不是一个单纯的指挥艺术高低的问题，而是曹操的法家路线最终战胜袁绍的儒家路线的必然结果。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又攻下袁绍盘踞多年的老巢河北地区。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袁熙在一群残兵的拥持下，投奔辽西乌桓而去。为了巩固已经统一的北方地区，曹操在这些地方大刀阔斧地推行法治，医治袁绍推行“以宽济宽”的儒家“礼治”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创伤。他颁布了《抑兼并令》，揭露了袁绍推行的儒家路线“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宣布再也不容许“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并下令抄检了袁绍的亲信审配、逢纪的家，杀掉了十几个顽固不化的豪强地主，从政治、经济上对河北这些胡作非为、大搞兼并的豪强势力进行了沉重打击，同时，曹操又在思想上对儒家思想来了一次扫荡，他下了有名的《整齐风俗令》，严厉地斥责那些原受袁氏重用的反动儒生“阿党比周”，不服教管，“以白为黑”，四处散布流言，扰乱社会秩序的罪行，坚定地对这些反动儒生宣布：“吾欲整齐风俗”，不达目的，“吾以为羞”！表现出了曹操坚定的尊法反儒立场。

再说袁尚、袁熙两人，丧魂落魄地逃到辽西乌桓以后，对乌桓奴隶主军事政权头目摇尾乞怜，想借用乌桓军事政权的

力量,卷土重来,重温割据称王的迷梦。乌桓是中国北方境内的一个奴隶主军事政权,它乘中原多年内战的机会,经常侵扰北方,“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对于乌桓的入侵,原先拥有重兵的袁绍不但不抵抗,反而“立其酋豪为单于”,与之狼狈为奸。袁绍的这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结果使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次袁氏兄弟逃到乌桓,两股势力合在一起,“屡次入塞为害”,向曹操大举进犯。面对袁氏兄弟和乌桓的进攻,曹操又率领轻骑,长途跋涉,直捣乌桓的心脏地区——柳林(辽宁朝阳县南),大破乌桓,彻底消灭了袁氏割据势力。

曹操自起兵以来,身不离鞍,马不停蹄,推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先后消灭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对国家的统一做出了贡献。然而,任何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任何一项带有进步性的社会变革,都是在冲破了旧势力重重阻力后才得以贯彻的。曹操的法家路线,始终受到混进曹操营垒里的反动儒生的极端仇视,特别是袁绍被消灭以后,这些家伙更是如丧考妣,向曹操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其中跳得最凶的又是孔融。这个死不悔改的反动儒生,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还歇斯底里地“戏侮曹操”,气焰嚣张到了顶点。这样,曹操与孔融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公元二〇八年,曹操写下了一封言简意赅的《与孔融书》,对孔融提出了警告,并向孔融表示了“破浮华交会之徒”的坚定决心。孔融接到曹操这封信,大耍两面手法,表面上向曹操表示决心洗心革面,实际上仍是“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

在家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大搞聚党营私，诽谤朝政的罪恶勾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曹操毅然采取果断措施，镇压了孔融，并将孔融的罪状公布于众。路线斗争从来就是不可调和的。曹操杀掉孔融这个名声很大、危害极深的反动儒生，是当时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必然结果，是曹操尊法反儒路线的一大胜利。

杰出的法家曹操，为了贯彻他的法家路线，统一中国，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割据势力推行的儒家路线战斗了一生。在他的晚年，已经是“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但他仍然为实现全国统一而积极努力，逝世前还在《遗令》中告诫他的继承人：“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要后代坚持法家路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生前写下的这四句诗不仅表达了他的宏图壮志，而且也是他法家战斗精神的生动写照。

---

注：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②③④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 隆中对策

“三顾茅庐”，说的是三国时期的刘备(公元一六一——二二三年)三往襄阳隆中，求访诸葛亮(公元一八一——二三四年)，请教统一天下的故事。诸葛亮在他的草屋中，曾出色地分析了天下的形势，向刘备描绘了一幅以荆益二州为根据地，内修政理，外联孙吴，然后出兵宛洛、秦川，用武力统一全国的蓝图。诸葛亮和刘备在隆中进行的这次著名谈话，历史上一概叫做“隆中对策”。

“隆中对策”是诸葛亮和刘备在政治上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标志，也是他们开始积极推行法家路线，逐步由弱变强的一个转折点。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刘备同曹操一样，也是一个有志于统一天下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虽然出身于没落贵族，但从小生活贫困，“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实际上是个小手工业者。黄巾起义时，他也拉起一批“徒众”，加入镇压黄巾军的地主武装，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但在他起兵以后的二十年中，一直辗转南北，势孤力薄，找不到立足之地。坎坷的经历，使刘备急切地想总结教训，扩充实力，延揽人才。当他听说隐居隆中的诸葛亮才略出众，便冒着鹅毛大雪，三顾茅庐，以一片

诚意，将诸葛亮请到自己一边，成为他得力的好帮手。

说起诸葛亮这个人，恐怕是妇孺皆知。但他决不是什么能未卜先知的神秘人物。诸葛亮年轻时，就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sup>①</sup>，加上从小跟着叔父诸葛玄从山东流转各地，使他熟悉了一些山川地理形势，了解了一些社会状况。定居隆中后，虽然“躬耕陇亩”，但他时刻关心着天下的政治形势，“自比于管仲、乐毅”，表现了远大政治抱负。这次刘备登门邀请，他所以“厚相结纳”，欣然接受，决非只是为刘备那种思贤若渴，“三顾频频”的诚心所感动，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和刘备有着共同的志向，都想结束东汉末年纷乱的局面，重拓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从此以后，刘备和诸葛亮就积极按照“隆中对策”所制定的路线和方针，开始了统一事业。

“隆中对策”奠定了蜀汉政权统治的路线，但它也是蜀汉政权长期无法发展的原因。诸葛亮在这个对策中对天下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所制定的分兵两路进攻曹魏的战略却是错误的，它使力量本来有限的刘备无法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敌人，影响了蜀汉政权的统一事业的发展。

夺取荆州，这是刘备、诸葛亮建立霸业必须要走的第一步。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而盘踞在荆州的刘表，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儒家之徒，刘备完全能够乘虚而入，摧毁这股腐朽的割据势力。不料军情瞬变，公元二〇八年，已经平定了北方的曹操，怀着统一中国的雄心，又率领二十多万大军兼程南下，一举拿下了荆州，并在当阳长坂坡将刘备打得大败。面临新的挫折，

刘备没有惊慌,委派了诸葛亮出使东吴,来个“结好孙权”,积极争取了雄踞东吴的孙权,组成联军,凭借长江天险,赤壁一战,大破曹军,创造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又一战例。

赤壁之战的胜利,保卫了东吴政权,使刘备在荆州站稳了脚跟。公元二一四年,刘备、诸葛亮又分兵两路进入巴蜀,攻下了险塞益州和咽喉要地汉中。从此,“蜀有重险,吴有三江”,完全按照“隆中对策”所预见的那样,形成了魏、蜀、吴三方鼎立的局面。

巴蜀原是刘璋父子统治的地方。刘璋和他的父亲刘焉,都是很讲究儒家那一套繁文缛节、仁义道德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他们推行“礼治”,对豪强地主“岁岁赦宥”,致使益州境内政治“阉弱”不堪,地方豪强“专权自恣”,为所欲为。为了使这里成为将来问鼎中原的巩固后方,刘备、诸葛亮按“隆中对策”中“内修政理”的精神,在益州大刀阔斧地推行法家路线。刘备尖锐地指出:刘璋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因此,刘备、诸葛亮“承先帝轨迹”,继承汉高祖刘邦的法治路线,针对益州政治腐败的局面,坚持“威之以法”,不轻易颁布赦令。诸葛亮还亲自“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按法家思想制定了《蜀科》。刘备、诸葛亮采取的这些措施,沉重打击了当地的豪强势力,在短时期内,初步扭转了益州羸弱腐败的政治局面。

一条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总是要遇到阻力的。那些盘踞巴蜀多年,一贯作威作福,逍遥法外的大地主豪强、反动儒生,极端仇视刘备、诸葛亮的法家路线,他们纷纷跳出来,利用



讖纬迷信，对刘备的法家政权进行恶毒攻击。他们阴险地诅咒刘备进入巴蜀是“得其地，不得其民”<sup>②</sup>，很快就要完蛋的。有一个叫张裕的更是四处散布流言，制造混乱，说什么“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sup>③</sup>。反动儒生的这些猖狂吠集中到一点，就是想推翻刘备的法家政权，恢复刘璋父子的儒家路线。坚持尊法反儒的刘备、诸葛亮坚决顶住了这股反动逆流。刘备大声宣布：“芳兰生门，不得不锄（锄）”<sup>④</sup>，果断地镇压了张裕这个跳梁小丑，打击了这些家伙的嚣张气焰。

刘备、诸葛亮在打击豪强势力和反动儒生的同时，比较注意团结那些原是刘璋旧部，对自己又不抱敌意的官吏，在用人问题上，坚持一条法家任人唯贤路线，坚持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管那些人原先为刘璋信任还是受到排挤，只要确实有才能，刘备都让他们“处之显任，尽其器能”，结果是团结了一部分，带动了一大批，使蜀地出现了“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的兴旺局面，缓和了刘备手下的荆襄地主与益州地主之间的矛盾，增强了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法家领导班子的力量。在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刘备于公元二二一年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这样，整个西川巴蜀便成为刘备、诸葛亮的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公元二二二年，刚称帝不久的昭烈帝刘备病卧成都，临终以前，留下遗诏，谆谆告诫太子刘禅，要他看《申》、《韩》、《管子》、《商君书》等法家著作，认为这些书可以“益人意智”，启发人的思想，增长人的才干，并托孤诸葛亮，要刘禅很好地向诸葛亮学习法家思想，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刘备的尊法反儒

立场。

刘备死后，蜀国的这副担子，落到了受诏辅助后主刘禅的诸葛亮身上。诸葛亮为了完成刘备未竟的事业，秉政以后，“夙兴夜寐，不敢自逸”，继续贯彻执行一条尊法反儒的路线。他先后平定了起兵叛乱的南方豪强割据势力，处置了一批顽固不化的反动儒生，胜利地保卫了蜀汉政权。同时，又积极按照“隆中对策”制定的路线，一方面“遣使聘吴，因结和亲”，巩固与东吴的联盟，另一方面在国内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经济，为进行统一天下的战争作好充分的物质准备。同时，他依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精神，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怀柔、和睦政策，使他们“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解除了蜀国的后顾之忧。诸葛亮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国家很快出现了“田畴辟，仓廩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强盛局面。公元二二八年春，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出兵祁山，为最后实现“隆中对策”指定的目标，开始了北伐中原的统一战争。

在军事上，诸葛亮继承先秦法家的优良传统，坚持以法治军，做到“法令明，赏罚信”，将赏罚分明看作是“为治之要”，所以他指挥的军队能做到“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遇到战斗，“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兵虽不多，战斗力却很强。第一次出兵北伐，蜀军就接连攻下魏国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直使“关中响震”，逼得魏明帝曹叡(ruì 锐)只得亲自“西镇长安”，派出了著名的大将张郃引军与诸葛亮对阵。但是，诸葛亮制定的一方面“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一方面“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这种两个拳头打

人的策略，没有集中兵力，分散了自己的力量，不仅造成了荆州的失败，而且埋下了街亭失守的根子。

张郃本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但由于镇守咽喉要塞街亭的蜀将马谡，是个“纸上谈兵”的家伙，他不听诸葛亮靠山近水、稳扎大营的指示，而是“舍水上山”，结果“举措烦扰”，被张郃打得“士卒离散”，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蜀军“进无所据”，无力再向魏进攻，诸葛亮只得率军退回汉中。为了整饬军纪，诸葛亮含着眼泪斩了马谡。部下许多将领为天下未定而戮大将感到惋惜，诸葛亮回答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sup>⑤</sup>，并告诫部下：现在“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sup>⑥</sup>！表现了诸葛亮坚决以法治军的立场。这且不算，诸葛亮还深刻检讨了自己身为主帅，用人不当的错误，上表刘禅，“请自贬三等”，主动要求降职处分，为三军严格遵守军纪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能认识到自己战略思想的错误。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杰出的法家诸葛亮，为了完成统一事业，先后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战争，最后病死在军务倥偬之中。诸葛亮虽然没能完全实现“隆中对策”，但他为统一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给了后世深刻影响，受到了后人的长期追念。

刘备和诸葛亮，从“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的困境，发展到建立“兵甲已足”、鼎立一方的蜀汉政权，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们推行了一条正确的法家路线。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在刘备还是诸葛亮身上，都还保留着儒家思想的影响，反

映出比较明显的局限性。有比较才能鉴别。只要我们将刘备、诸葛亮同曹操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对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不如曹操来得坚决和彻底。如在打击豪强势力、镇压反动儒生这一点上，曹操态度坚决，毫不含糊，果断地处死了边让、孔融之流。而刘备、诸葛亮对于来敏这样一个代表名门豪族利益的反动儒生，明明看到“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孔融)”，但还是对他一再采取宽容态度。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分出刘备、诸葛亮和曹操之间的强弱高下。同时，这也决定了刘备、诸葛亮治理的蜀国不可能最后完成统一天下的任务，西晋的全国统一政权最后只能在曹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当然，从刘备和诸葛亮本身来说，毕竟还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在自己统治的区域内扫除了分裂割据势力，改变了汉末大分裂的混乱状态，为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都是我们应该加以肯定的。

---

注：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②③④ 《三国志·蜀书·周群传》。

⑤⑥ 《三国志·蜀书·马谡传》注引《襄阳记》。

## 从吕蒙读书谈起

吕蒙（公元一七八——二一九年）是三国时代东吴的名将，十五、六岁就跃马横刀驰骋沙场了。他作战英勇、屡建功勋，是孙权（公元一八二——二五二年）非常赏识的青年将领。可惜的是他能武少文，要写个什么奏章战书之类都得请别人代笔。对于这一点，起先他倒满不在乎，认为武将只要冲锋陷阵，凭一身高超武艺就够了。至于读书，那是书生们的事，用不着为此劳神。

有一天，孙权把他召去，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你已经是个独当一面的军事将领了，可要下功夫认真读点书，增长见闻和才干。吕蒙一听，开始不理解，便推托说自己军务在身，实在繁忙，恐怕抽不出时间来读书。孙权连忙严肃地批评他：“难道你的事比我还多？我又不是要你死啃儒家经书，去当经学博士，而是要你认真看一些书，学到一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亲切地谈了自己的读书体会，又用许多著名人物发愤学习、能文能武的事例来激励吕蒙，并为他开了书目，要他先刻苦研读《孙子》、《六韬》等法家军事著作，还得读一点历史书。最后，他鼓励吕蒙，趁“意性朗悟”的年轻时期，认真读书，“学必得之”。经过这次谈话，吕蒙又惭愧又感激地接受了孙权的教

海,从此认真读书,“笃志不倦”,并结合实际,讲究效果。经过一番努力,吕蒙的学问果然大有进步,他的真才实学,远非那些自以为博学的儒生好比。东吴都督鲁肃一次路过吕蒙防地,顺便去看望他。吕蒙设宴招待,席间同鲁肃议论起如何对付坐镇荆州的蜀国大将关羽的事。鲁肃起先不把吕蒙这个草莽武夫放在眼里,敷衍地说:“急什么,到时候再讲吧!”谁知吕蒙非常清晰地分析了两军形势,劝鲁肃严加防备,还提出了五条很有见地的应敌之计。这不能不令鲁肃惊奇,赶忙跑过去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好兄弟,我当你只会厮杀,谁知如今学识渊博,早已不是往日的吴下阿蒙了!”吕蒙风趣地回答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①”言下之意,你得换换脑筋,不能总是拿老眼光来看人哪!孙权知道这件事后,对吕蒙的好学精神极为称赞,把吕蒙立为部下文臣武将的榜样。

武将读书的事,过去一般不大为人重视。孙权这么郑重其事地向吕蒙“劝学”,又把他树为武将们的读书典范,培养了一批文武双全的臣僚,这决不仅仅是单纯地出于对部下的爱护,而是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吕蒙“折节好学”发愤读书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权的法家思想。

孙权是吴国的第一个皇帝,十八岁就继承父兄遗业,“坐断东南”,以法治国,称得上是一位雄略之主。他曾意气风发地说过:“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反映了以统一中国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三国鼎立的争峙局面是东汉以来激烈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标志着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正朝着全国统一的目标转化。这种转化非用暴力不能解决,武将的英

勇顽强当然可贵，但关键在于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其中也包括军事路线。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具备清醒的政治头脑，能武亦能文，才能在复杂的局面下担得起这个重任。孙权要吕蒙“急读《孙子》、《六韬》”，正是统一战争的需要；学习历史，目的也是为了用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样的读书，与儒家之徒为沽名钓誉而钻故纸堆截然不同，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一个重要环节。孙权读的书，是经过严格选择的，他特别喜爱法家军事著作，从中汲取养分，“自以为大有所益”，对一生都有深刻影响。

孙权“志在平世”，思想上政治上推行的是一条尊法反儒，要求前进的路线，目光比较远大。魏、蜀、吴三国中，他是最迟称帝的。黄武二年（公元二二三年），东吴群臣劝他称帝，还说这是天命符瑞所决定的，但孙权考虑到当时三国鼎立，吴的实力还是较弱的，在魏、蜀已称帝的形势下，自己打着“存救汉室”的旗号更为主动，倘自己称了帝，魏、蜀两国势必借口来“讨伐”，使自己处于“二处受敌”的被动局面，这真犯不着，就没答应，根本不理什么天命符瑞的无稽之谈。相反，在此以前（公元二一九年），他曾写信劝曹操做皇帝，想以此剥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当然，颇有政治主见的曹操也不是马大哈，他看出了孙权的用心，一边把信摊给大家看，一边说：“是儿欲据吾著炉火上邪！”果断地拒绝了孙权的建议。

由于活跃在中原地区的黄巾起义对南方士族触动不大，豪强地主在东吴仍有相当的势力。公元二〇〇年，孙权即王位时，就面临着“天下分裂，擅合者众”的局势，统一中国的思

想和行动,受到大土豪和儒生的反对,斗争是很尖锐的。各地的士族,见风使舵,对东吴政权冷眼相看,有的甚至企图搞颠覆。庐江太守李术,收罗一批反动土豪,率领军队,公开扯起反叛旗帜。孙权采取了坚决措施,一举消灭了这股刚冒出来的割据势力。对付豪强,孙权有一套政策,凡是坚持分裂割据的,就坚决实行镇压,其余则采用怀柔、限制的方法,借助他们的人力、财力为统一大业服务。有个叫士燮的大土豪受了孙权感召,诱导另外一些豪强前来依附,孙权就封他们为侯。士燮死后,他的儿子不服管理,妄图割据称王,孙权便派兵把他镇压了。孙权的东吴政权,就是在打击豪强地主的斗争中得到巩固的。

孙权劝吕蒙读书时,曾说过,我绝不是要你“治经为博士”,这里所谓的博士,就是那些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显而易见,孙权对这帮儒生是十分厌恶的,他不愿自己的得力部下沾上儒生们的臭气。对付反动儒生,就象对付反动豪强一样,孙权是从不手软的。吴郡太守盛宪是个大儒,与孔融密切勾结,曾阴谋从江南钻到魏都洛阳,企图结成反动联盟,破坏统一事业。孙权识破了盛宪的丑恶面目,及时把他杀掉,消除了隐患。这件事杀一儆百,大灭了那些儒生的威风。孙权是崇尚法治、反对礼治的,在东吴,他管理国家靠的是“赏不择怨仇”,“罚必加有罪”的法治路线。孔老二鼓吹的“礼”,被他斥为“俗儒”之说,大胆破除。有些文臣武将家中有丧事,为了尊孔守“礼”,丢下国家大事不管,回家奔丧,在家一赖就是三年。孙权很恼火,公开下令禁止。他说,要是世道太平,守礼尽孝也



不能算犯法，现在战事繁忙，哪容许这样搞！命令颁布后，有个大臣孟宗违令奔丧，尽管有陆逊为他求情，孙权还是给他以降职处分。从此，再也没出现这种现象，孔老二的“礼”，被孙权踩在脚下了。

孙权在政治上立志“整齐天下”，思想上尊法反儒，就是在用人上也体现了法家精神。他哥哥孙策曾说过，自己在“尊贤任能，各尽其心”方面不及孙权。的确，孙权是很会用人的。他不问门第，任人唯贤，只要能为统一事业出力的人，一律量才录用，论功提拔。吕蒙少失父母，“贫贱难可居”，孙权一旦发现他的军事才能，立即把他从戎伍中提拔上来，委以重兵，又亲自嘱咐他好好读书，培养成文武双全的大将。孙权还从俘虏中选拔潘濬为大将。潘濬这个人“信赏必行，法不可干”，后来为东吴立了不少战功。孙权行赏罚不论亲疏，同时对犯错误的人也坚持通过批评教育加以挽救。有一次开宴会，孙权的堂弟孙皎吃醉酒侮辱大将甘宁，双方吵闹起来。但孙权一点也不偏袒孙皎，毫不留情地加以斥责。过后还耐心地劝戒他说：“人谁无过，贵其能改”，下次不重犯就可以了，孙权的做法，博得了部下的心悦诚服。

孙权曾有过一个出色的比喻：“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他说这一道理对人也是一样，各有所长，应当把大家的智慧才能发挥出来，“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sup>②</sup>这种观点反映出朴素的辩证法。当然他说的“众”只是周围的文武百官，不可能是人民大众，但他蔑视“圣人”，重视集体力量，在当时是难能可贵

的。他“每事必咨”，“乐闻异计”，很注意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倘若自己有了错误，便诚恳地“引咎责躬”，检查责任。他还曾发布过一道命令，把自己比作齐桓公，希望部下以法家先驱管仲为楷模，“尽言直谏”，千万不要有顾虑。这样，文武百官就敢于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这对于孙权掌握全局，及时做出正确的估计和决策，是很有好处的。

在三国鼎立的频繁战争中，孙权较为稳固地统治了吴国五十二年。在法家路线指导下，半个世纪来，东吴经济发展也很快，孙权执政不久，就仿效曹操实行屯田，一面引进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一面根据江南情况，改革农具，他还利用东吴临海的地形，大力发展航海事业，多次派将军卫温等人出海到台湾等地，给商业带来了繁荣。东吴大臣冯熙出使魏国时，对魏文帝曹丕说自己国家是“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这虽不免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确也反映了东吴经济的发展面貌。

孙权曾在吕蒙面前称赞曹操“老而好学”，可见对曹操个人并不仇视，同样，曹操也很看重孙权。一次魏吴两军水战，他俩各自引军对阵，曹操遥望着指挥自如、英姿勃发的孙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赞赏之情溢于言表。这就说明：这两个政治对手虽然刀兵相见，但在尊法反儒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孙权的所作所为有其阶级局限性，而且采用法治不如曹操、诸葛亮。不过在他身上，法家思想还是占支配地位。他所推行的一条路线，对于统一事业仍有不可抹杀的贡献。特别是他劝吕蒙读书，鼓励武

将学文，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对我们仍有启发作用，虽然我们今天的学习目的和内容与孙权、吕蒙的时代已完全不同了。我们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做到能文能武、又红又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奋斗不息。

---

注：① 《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 《神灭论》和《齐民要术》

《神灭论》和《齐民要术》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梁朝的范缜和北魏贾思勰的著作。这两篇著作的具体内容不一样，前者论述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后者则记载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情况和劳动人民在同自然作斗争中积累的科学知识。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坚持尊法反儒观点，坚持唯物主义思想，因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儒法斗争。

《神灭论》的作者范缜(约公元四五〇——五一五年)，字子真，南朝梁代南乡舞阴(今河南省泌阳县)人，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战斗的无神论者。

南北朝时期，我国的社会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当时把持政权的门阀士族大地主集团，看到传统的儒学经过历代劳动人民和法家的批判，已不能完全适应统治的需要，就变换手法，在进一步加强孔孟之道宣传的同时，把佛教作为儒教的帮凶，对劳动人民进行麻痹、欺骗，妄想从思想上解除人民的反抗。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汉代传入我国。它主要是宣扬“灵魂不灭”、“因果报应”之类的荒诞理论和天堂地狱的鬼话，对受尽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进行思想麻痹和精神恐吓，具有很大

的欺骗性。

佛教和儒教在表现形式上虽有不同，但它们的反动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佛教把儒教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说得更神秘，解释得更玄妙，而目的都是要劳动人民相信“天命”，忍受苦难，放弃一切反抗斗争，俯首贴耳的听统治阶级的奴役，使他们舒舒坦坦稳坐统治的宝座。也正因如此，当时的一些统治者大多都是“双料货”，既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又是虔诚的佛教徒。儒佛两教，双管齐下。

南朝梁武帝，就是一个老儒兼老僧式的典型人物。他“少而笃学，洞达儒玄”，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名儒。做了皇帝以后，对孔孟之道崇奉备至，为孔丘立庙，置五经博士，他在“立学诏”里说：“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并且亲自写下了《制旨孝经义》、《春秋答问》、《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书籍，露骨地宣传孔孟之道。同时又宣布“唯佛道是正道”，把佛教作为国教。并大兴土木，广建寺院。“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梁武帝的提倡和强迫下，当时寺院四布，僧侣大地主同门阀士族大地主互相勾结，加重对人民以及广大僧侣的剥削。反动地主阶级的头子梁武帝曾经三次假惺惺的“舍身”给寺院做服役的人，结果朝廷从人民头上搜括了大量的钱财，三次把他从寺院“赎”回来。就这样，反动的孔学同佛学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形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统治人民的粗大绳索。

在这样一个佛教大盛的社会里，出身寒微的范缜继承并发展了汉魏以来的无神论思想，对佛教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公元四八九年，南齐武帝七年，范缜在齐做官的时候，那时皇帝的本家——宰相竟陵王萧子良广延宾客，在自己的客厅里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佛学讨论会，找了许多高僧来讲论佛法。那天，范缜也应邀参加。会议开始以后，那些僧侣唾沫横飞，津津于佛学，争论不休。唯独范缜坐在一旁连连哂笑。这下惹得“精信释教”的萧子良大为光火，竟置会议于不顾，煽动与会的大批僧侣和朝廷官员，向范缜这个“异教徒”发动围攻。萧子良气势汹汹，责难范缜：你不是公开宣扬自己不信佛，不相信轮回因果吗？那末世界上为什么有人富贵，有人贫贱呢？范缜从容不迫地用手指着庭前盛开的花树回答说：“人们降生下来，就好比这棵树上的花。这些花，都有一个蒂，可风把它们吹下来，有的落在茵席之上，有的却落到了粪坑里，这完全是偶然的。象你生在皇族，就好象是落在茵席上的花瓣；而我一生潦倒，就象飘落在粪坑里的花瓣。贵贱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遭遇，轮回因果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一席话，真把萧子良说得词穷理屈，无言对答，那些跟在萧子良后面一味瞎起哄的僧侣也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萧子良精心筹备的佛学讨论会，结果变成了范缜宣扬唯物论，批判佛学唯心论的战场。

当然，范缜诘难萧子良，反对轮回因果，以花瓣飘落为比喻，尽管说得很机智，但他把人生的贫富归结为一种偶然性，看不到这是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显然是错误的。然而范缜那种反对荒诞的因果论，敢于直接向王公贵族和佛学作斗争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后来，范缜在梁朝武帝时，又进一步同以梁武帝为首的佛教信徒作了斗争，用自设问答的文体写下了宣扬无神论的著名论文《神灭论》，从理论上进一步批驳了“神不灭论”的佛学唯心主义，从而奠定了他在我国哲学史和儒法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

《神灭论》一开头，范缜就针对佛学灵魂不灭的谬论提出了“神即形”的看法。认为：“人的精神离不开形体，形体离不开精神，因此，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消灭。”范缜的“形神相即”的理论是与佛教所宣扬的“形神相异”理论直接对立的。究竟是“形神相即”还是“形神相异”，精神能否离开物质单独存在，这是哲学上一个根本问题。范缜坚持的“形神相即”的唯物论，从根本上驳斥了佛教所宣扬的灵魂不死、因果报应的谬论，打击了佛教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

范缜在论述形与神关系时，不仅认为物质和精神相互结合，而且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结合的关系。他明白指出：“形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所以形体是指它的质体，精神是指它的作用，形体和精神不能割裂。”在这里，范缜指出了物质是产生精神的本体。为了更好地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精神和形体的关系，恰如锋利和刀刃的关系一样。离开了刀刃就谈不上单独存在的锋利，离开了形体也就说不上单独存在的精神。”这就阐明了精神对于形体的依存关系。范缜还认为不同的物质形态产生着不同的作用，他指出：人与木同是物质，其区别就在于有知与无知。也就是说只有人才有精神作用，而人死了精神随之消灭，那时

人就象木头一样无知了。在这里，范缜进一步说明他的“形体存在，精神方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消灭”的论点，驳斥了佛教宣扬的“灵魂不死”、精神能独立于物质之外的谬论。

在《神灭论》中，范缜还驳斥了佛教所宣扬的人之所以能思想、有感情，是因为灵魂在起作用的谬论。他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作用是人的生理器官的产物，“是非之虑，心器所主”，人的思想、感情产生于心而不是灵魂。当然，范缜由于受到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限制，把心说成是思维器官是不科学的。但他能把心理活动看作人的生理活动的基础，这是十分可贵的。

《神灭论》发表以后，震动了朝野。由于范缜对灵魂不灭的批判，直接揭露了当时门阀士族的剥削特权是前生命定的谎言，引起了当时反动势力的切齿仇恨。以皇帝萧衍为首，发动了六十多个僧侣对范缜进行围攻，但都被范缜一一驳倒。有人不自量力，写了《难神灭论》，但也只能从书本上拉出一个鬼神来证明有神论，事实上，谁也不能找出一个真鬼来做证明。梁武帝看看不行，只得亲自出马，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以“神灭之论，朕所未详”为理由，强迫范缜改变观点。但范缜始终毫不妥协，依据真理，向以梁武帝为首的佛教徒展开了全面论战，“辩摧众口，日服千人”，使得梁武帝亲自策划的围攻丑剧宣告失败。

道理既然讲不过，他们就想别的办法来。他们先指使一个自称熟读“伊、周、孔、孟之道”，名叫王融的人来劝范缜说：“象你这样有才能，还怕得不到中书郎那样的高官吗？何苦非



要坚持你那套议论，影响自己的前途呢？”望着王融那醉心功名的“禄蠹”嘴脸，范缜仰天哈哈大笑说：“想叫我放弃自己主张而求高官，那办不到！假使我当初真按你老兄的意见办，早已做到尚书令这样的大官了，岂止中书郎！”一下说得王融浑身不带劲，羞愧得无地自容，硬从嗓门眼里挤出几声干笑，搭讪着溜走了。一着不行，再换一着。有一个名叫王琰的孔孟信徒，干脆打上门来，搬出儒家信条，责问范缜说：“范先生啊，你竟不知道祖先神灵所在？”他洋洋得意的自以为这句话讲得乖巧，打中了要害，范缜必定无话可答。殊不知范缜微微冷笑了一声，反唇相讥道：“王先生啊，你既然知道你祖先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赶快杀身跟从他们，以尽孝道？”寥寥数语，直使王琰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在范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下，统治阶级所发动的理论上围攻、政治上诱骗和恐吓都先后破产，最后，梁武帝萧衍只得给范缜硬扣上“违经”、“乖理”、“灭圣”等罪名，把他充军到了广州。然而，统治阶级对范缜毕竟只能进行肉体的折磨，而无论怎样也磨灭不了他的照耀千古的无神论思想。

范缜的神灭论观点，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还存在着一一些错误，显示出他的不彻底性，但总的来说，范缜仍然不失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无神论者。他对佛学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也是对儒家反动思想的批判，是儒法斗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表现形式，对于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如果说，范缜在哲学上批判了儒、佛两家的宗教唯心主

义。那么北魏末叶(公元六世纪)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则运用自然科学成果,冲击了儒家的学说。他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农业科技史上的一部杰作。这部书共分十卷,凡九十二篇,书中反映的科学技术成就是与作者的法家思想紧密相连的。由于缺乏资料,贾思勰的生平至今不详,然而通过这部著作可以看到,他具有比较鲜明的尊法反儒观点,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儒家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批判。

在《齐民要术》的《序》里,贾思勰以《管子》的“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为立论的基础,对劳动者进行歌颂。他引用劳动人民责问孔丘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批判了以孔老二为首的儒家轻视农业生产的反动思想。贾思勰还引用前人的话指出:“四体不勤,不动脑筋,而能把事情办好使生活富足,是没有听说过的。”这也是对孔丘之流鄙视生产劳动的有力批驳。

贾思勰在批判儒家反动思想的同时,又大量引用李悝、商鞅、晁错、桑弘羊的言论来阐明重视农耕的法家主张。他称赞晁错等人“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论述是极有道理的,赞扬桑弘羊的“均输法”是有益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不朽之术”。他对执行法家路线而取得成就的李悝、商鞅进行热情的歌颂,认为李悝在魏文侯时实行变法,“尽地力之教”,因而使国家富强;秦孝公任用商鞅,重耕战,行赏罚,使秦国很快就成了一个雄驾诸侯的强国。在《序》的最后,贾思勰明确表示了自己著书的态度,并宣布“舍本逐末”的“商贾之事”和“纵有春花而无秋实”的“花草之流”一律弃而不录。从中可以看出贾思勰鲜

明的法家立场。

另外，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对儒家的天命论和复古倒退思想也进行了批判。孔丘之流宣称世间一切“莫非命也”。还吓唬人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种天命论反映在农业生产上就是“听天由命”，不要去同自然斗争。贾思勰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他继承法家思想，认为要使农业发展，就必须奖励农耕，赏罚分明，贮粮备荒。同时，要注重兴修水利，进行农业技术的革新，并认为丰实与穷困，全在人为。这显然是继承了荀况“人定胜天”思想，并运用发展到农业的实践中去了。

在主张前进、反对倒退的问题上，贾思勰也同儒家思想作了斗争。儒家之徒都是鼓吹“今不如昔”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将新的技术、新的工具污蔑为“奇技淫巧”，叫嚷“奇技奇器以疑众，杀！”<sup>①</sup>而贾思勰则高度评价了秦汉以来各地在农业技术上实行革新所取得的成就，并运用大量事实，说明了应用新的生产工具，推广新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的重要性，并从农业生产的发展论证了今胜于昔，有力的批判了儒家的倒退谬论。

由于贾思勰继承法家传统，重视农业，坚持前进，坚持革新，因而比较重视实践，比较注重总结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贾思勰当过北魏高阳（山东临淄）太守。有一次出差，他不辞鞍马辛劳，沿途对农业生产进行了认真的访问、考察，了解到山西的豌豆种到井隆口以东地区后由于适应性较差，结果只长叶而不结实。这次考察，对于他得出农业生产必须“相地之宜”的结论，是有帮助的。

贾思勰对敢于发明创造、搞技术革新的人总是热情的赞扬,而对那些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腐儒给予辛辣的讽刺。他嘲笑一向被称为“圣人”的那些人,都是“其与事也,有所不能”的凡夫俗子,否定“圣人”是万能的神话。他引用当时的谚语说:“智如禹汤,不如常耕”,即使有夏禹商汤的聪明,不如经常参加农业实践,这对于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开口先王、闭口尧舜”的儒生真是入木三分的批判。

贾思勰为了写成《齐民要术》这部卷帙浩繁的农业科技史巨著,曾经“采摭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广泛收集了农谚,询问请教了许多有经验的老农,又用事实作了反复的检验。试想,如此辛勤的劳动,那些专靠“韦编三绝”、“皓首穷经”混日子,而“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的孔孟之徒能够做到吗?从这部著作成书的过程可以看出贾思勰是一个多么讲究实际的科学家啊!

---

注:① 《礼记》。

# 唐太宗和他的法家思想

“之采思汉帝，  
碣石想秦皇。①”

唐太宗李世民留下的这两句诗，集中表达了他对秦皇汉武辉煌业绩的敬仰。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最盛时期的李世民，十分企望自己能象秦皇、汉武一样，有一番大的作为。唐王朝的建立，李世民起了重要作用。他在位的二十三年中，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有了进一步加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历史上通常把这一段时间称做“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出现，决不象地主资产阶级所歪曲的，是什么圣君贤相推行“让步政策”的结果，而是隋末唐初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的直接产物，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法家革新派继隋末农民起义打击大地主门阀士族以后，进一步同儒家保守派、大地主门阀士族势力斗争的结果。

唐王朝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隋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太宗的法家路线也正是适应这一历史趋势才得以贯彻。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六四九年)从十八岁开始便跟随他的父亲李渊起兵反隋。隋末农民起义的革命烈火，驰骋疆场的戎马生涯，使他接触到社会现实，多少

看到了一些人民的力量。在他周围,不仅有一些贵胄子弟,也有相当一批地主阶级中下层的人物。这些社会经历的影响,使这个出身于关陇贵族的公子哥儿有可能转变为庶族地主的政治代表。

李世民上台当皇帝,是同大地主士族势力斗争的结果。大地主门阀士族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扫荡之下,虽然“多失衣冠之绪”<sup>②</sup>,但仍然“好自矜夸”<sup>③</sup>，“恃其旧地”<sup>④</sup>,并伺机进行反攻倒算。唐高祖李渊,本人就是周、隋的大贵族,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不少世族大地主钻进了李渊的麾下,在新的政权内争得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还拉拢宗室贵戚,找到李渊的长子李建成作为自己的靠山,形成一股以李建成为首的反动势力。他们为了恢复士族大地主的垄断地位,把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李世民视为眼中钉。李建成一伙,“擅募骁勇二千余人”,布置在宫中要害之处。同时,把大批武器盔甲暗送给庆州都督杨文干,“使之举兵”反叛,以便“表里相应”,用武力迫使李世民就范。在这阴谋破产以后,李建成又以东宫太子的身分,唆使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嫔妃,散布流言,对李世民进行谤诽陷害。另外,还卑鄙地用金钱收买引诱李世民的部属,企图削弱李世民集团的基础。在这一连串阴谋相继破产以后,李建成竟丧心病狂地几次用暗杀手段来谋害李世民。由于两个集团的矛盾业已发展到外部对抗的形式,彻底铲除李建成集团已成为势在必行的大事,于是便爆发了“玄武门之变”。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公元六二六年七月二日(武德九

年六月四日), 李世民一面在唐高祖李渊面前揭发了李建成集团的罪恶活动, 一面果断地伏兵玄武门, 准备擒拿李建成归案。李建成事先从一个名叫张婕妤的嫔妃那里, 得知李世民已在李渊面前告发了自己, 心里非常慌张, 想进宫探听虚实。当他和死党齐王李元吉骑马进宫, 走到临湖殿时, 发现气氛不对, 急忙拨马回头, 但为时已晚, 李世民大声叫住了他们。齐王李元吉首先张弓搭箭, 连连向李世民射去, 都未射中。李世民随即引弓还箭, 李建成应声栽落马下。李元吉也同时被李世民部下射死。李建成、李元吉这两个专搞阴谋诡计, 竭力推行儒家路线的家伙, 终于从损人的目的开始, 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玄武门之变”的发生, 不是偶然的, 表面上是兄弟争夺帝位的斗争, 实质上代表着两个不同地主阶级集团的利益, 反映了儒法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 李世民所以能顺利地消灭李建成集团, 是由于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庶族地主集团在农民大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 推行了一条比较进步的路线, “安社稷, 利万人”, 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李建成的失败, 则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士族大地主推行的是一条儒家路线, 目的是要维持和恢复已被农民革命战争打得七零八落的门阀制度。抗拒历史潮流, 结果必然要被历史所抛弃。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谈政变经, 把唐初这场激烈的儒法斗争, 诬蔑为“兄弟相杀, 争夺皇位”, 完全暴露了他尊儒反法、搞篡权复辟阴谋的反动面目。

公元六二六年, 李世民即位做了皇帝, 开始在政治、经济、

军事等各方面全面推行法家路线，进行一系列改革。他在政治上，积极推行郡县制，打击豪门贵族势力。为了打击“自矜门第”的山东士族大地主，他下令修改《氏族志》，将这些名门望族“例降一等”；在经济上，他实行均田制，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在对外政策上，实行屯垦戍边，加强防务，反击外来侵略。李世民这些改革，符合庶族地主集团的利益，得到他们的支持，但却引起了士族大地主集团切齿仇恨和强烈反对。继粉碎李建成集团以后，唐初儒法斗争在李世民为首的法家当权的新局面下继续进行着。

唐太宗与大地主保守集团的斗争，首先表现在要不要巩固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问题上。唐太宗即位不久，有个叫肖瑀的就跳出来，狂热鼓吹分封制、攻击郡县制。肖瑀本是后梁明帝的儿子，早在隋文帝统一天下以前，就是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梁被隋灭以后，他投降隋朝，“以女兄(姐姐)为隋晋王妃”，乞得要职。隋王朝被推翻，他又摇身一变，混入唐王朝的政府机关。此人“爱经术，善属文”，“骨梗儒术”，是个以“克己复礼”为宗旨，竭力主张开历史倒车的大儒。他见唐太宗新即位，就向唐太宗胡说什么：“臣观前代国祚所以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盘石之固”，并攻击郡县制不能长久，信口雌黄地说什么：“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什么“秦制守令，二世而绝”，把秦王朝的复灭归罪于秦始皇，归罪于郡县制，大叫唯有“封建之法，实可遵行”，妄想把社会拉向后退。肖瑀的这些厥词一露口，便博得他的同伙大声叫好，一个个摇头晃脑，自以为得计。儒生颜师古象屎克郎一样跟在肖瑀后



面嗡嗡大叫：立国治民最好的办法“不若分王宗子”，如果“一定此制”，那就“万代无虞”。颜师古还上了一道《论封建表》，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说：“臣愚以为当今之要，莫如量于远近，分置王国，均其户邑”<sup>⑤</sup>，大言不惭地说搞封建、立诸侯的主张是“妙策深远，既合时宜，实惟治要”<sup>⑥</sup>。但是，肖瑀、颜师古的这些胡言乱语立即遭到法家革新派的迎头痛击。唐太宗的得力助手，庶族代表魏征、马周当即在殿上给予痛斥，指出分封的结果必然导致王国之间“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使“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政”。出身庶族的李百药还专门写了篇《封建论》，批驳肖瑀、颜师古的谬论，论证了郡县制的优越性，严正指出恢复分封制只能“乱常干纪”，导致“王室浸微”，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庶族地主的支持下，唐太宗实行郡县制，宣布“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以巩固中央集权，使封建制度向前发展，给了鼓吹分裂倒退的逆流以沉重的打击。

大地主顽固集团对内是分裂主义者，对外则是投降主义者。突厥，是我国境内北方的一个带有严重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军事政权。唐朝初期，突厥贵族倚仗强盛的军事力量，连年入寇，使唐“边州略无宁岁”，危害甚大。究竟如何对待这一问题，是妥协苟安，还是勇敢抵抗？唐太宗同大地主顽固集团之间，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奉行法家路线的唐太宗，对外来势力的侵略，一贯主张进行坚决抵抗。为了巩固唐王朝政权，保护中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曾数次率兵北击突厥。即位以后，他更是积极部署反侵略战争。他屡次告诫说：如果“突厥入侵，莫能抵御”，

那就会“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平时一定要加强战备训练。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亲自率领将卒，每天在显德殿坚持练武习射。由于唐太宗注重严格训练军队，结果上行下效，“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使国家有了一支强大而又善战的武装。

公元六二六年，唐太宗刚即位不久，突厥的颉利、突利两个可汗，联兵二十万大举入侵，兵临长安城下，并派遣心腹使者进入长安城，“以观虚实”，对唐王朝进行战争讹诈，要挟唐王朝屈膝投降。在这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关头，唐太宗不畏强敌，大义凛然地怒斥突厥侵略者“自夸强盛”，兴兵犯境，喝令左右将突厥使者斩首。这下可把那些代表大地主顽固集团利益的软骨头吓坏了，肖瑀和他的同伙、北齐旧官僚的后裔封德彝都跳出来向唐太宗鼓吹儒家那一套“仁义道德”，战战兢兢地劝说唐太宗不要得罪突厥使者，而应“以礼遣之”，对突厥侵略者报以温情脉脉的“礼义”。唐太宗一眼看穿了肖瑀、封德彝之流以“礼”卖国的无耻行径，针锋相对地指出，若行礼义，敌“必谓我惧”，会更加猖獗，“纵兵大掠”，使国家遭殃更甚。于是唐太宗毅然将来使扣留，准备亲率大军与突厥侵略军进行决战。这下可更把肖瑀吓得魂飞魄散，他“叩马固谏”，竭力反对唐太宗与突厥公开对阵，十足暴露了这个儒家之徒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但唐太宗不顾投降派的反对，还是亲冒矢石，率师出征。渭水边一时“旌甲蔽野”，“军容甚盛”。在唐王朝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突厥侵略者的战争讹诈政策遭

到彻底破产，只得狼狈逃窜。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捲出辕门。”贞观三年冬天，唐太宗又派遣兵部尚书李靖、总督李勣统帅十余万大军，爬冰卧雪神速出击，活捉颉利可汗，解归长安，平定了突厥侵略势力。同时，唐太宗加强同周围少数民族部落的联系，公元六四一年，唐太宗还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的松赞干布，进一步融洽了汉族同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唐太宗也因此被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总之，唐王朝对突厥贵族的胜利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沉重打击了大地主顽固集团卖国投降势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唐太宗和庶族地主集团的地位。

政治路线决定着组织路线。唐太宗与大地主顽固集团从不同的路线出发，在用人方面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唐太宗执政以后，抑制和打击门阀豪族，采用了“唯才是用”的法家政策，推行科举制，代替过去为士族大地主集团把持的“九品中正”的荐举制，为庶族地主参与政权开了方便之门。大地主顽固集团对唐太宗不论门第、“唯才是用”的政策又恨又怕。他们知道，那些庶族地主和寒门子弟在政府中参与要职，对实现门阀地主的分裂阴谋与篡权野心是十分不利的。肖瑀等人就采用造谣诽谤混淆视听的恶劣手法，攻击唐太宗用人“不细谙知”，“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并把矛头直接指向贯彻执行唐太宗政治路线的房玄龄和魏征，上书诬告他们“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攻击唐太宗偏听偏信，包庇房玄龄和魏征。他还诬蔑出身庶族地主，能文能武、屡立战功的大将李靖。但是，唐

太宗始终坚持“任官惟贤才”、“计勋行赏”的法家路线。他不但没有加责李靖，反而赐绢千匹，加其俸禄，对房、魏等人也更加信用，挫败了大地主顽固集团“清君侧”的阴谋活动。

大地主保守势力不择手段，丧心病狂地反对唐太宗的法家路线，坚持分裂、主张投降，目的就是要推翻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庶族地主的统治，恢复士族大地主集团的腐朽统治。但是，要想搞倒退是决计没有出路的。唐太宗在庶族地主强有力的支持下，粉碎了大地主集团的种种阴谋，继续坚定地推行法家路线。以肖瑀为首的一伙人，虽然屡遭失败，他们仍然顶着花岗岩脑袋一意孤行。肖瑀最后来个以屈求伸，企图用出家当和尚的手法，向唐太宗施加压力。唐太宗识破他的居心，将计就计，下诏同意肖瑀出家。这下搞得肖瑀骑虎难下，十分狼狈。他连忙改变腔调，声称自己“不能出家”。唐太宗早就对这个出尔反尔的阴谋家、野心家感到厌恶，果断地罢了肖瑀的官，把他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去，给士族大地主集团以沉重打击。

唐太宗李世民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所推行的法治路线，也还是从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他曾对大臣说：“朕终日孜孜”，“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地主阶级的“长守富贵”，意味着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因此，到了贞观后期，徭役、兵役越来越厉害，对农民的剥削越来越加重。还应当指出的是，唐太宗对世族大地主集团的打击也是很有限的，他在抑制这股反动势力的同时，还依靠了其中的一部分力量。到了贞观以后，这股反动势力仍然“旧望不减”。在思想领域里，贞观

年间尊孔读经的气息也越来越浓。这些，都是唐太宗的地主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刘少奇、林彪一伙常用“贞观之治”作为鼓吹“让步政策”的历史根据，否认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否认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完全是反动的唯心史观，充分暴露了他们尊儒反法的现代大儒嘴脸。

---

注：① 唐太宗：《春日望海》，《全唐诗》卷一。

② 《唐会要》卷八十三《嫁娶》。

③④ 《旧唐书·高士廉传》。

⑤⑥ 《文苑英华》卷六二三。

# 女皇帝武则天

“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这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对中国历史上杰出女皇帝武则天的高度评价。

武则天(公元六二四——七〇五年)，名曩(zhào)，出身寒门庶族。十四岁被唐太宗李世民召为才人。唐太宗死后，出家为尼。公元六五四年，唐高宗李治把她复召进宫，册封为昭仪。第二年，被立为皇后。公元六九〇年，她亲自登基做了皇帝。武则天是唐初庶族地主集团拥立的法家当权派。在她当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坚持推行法家路线，一直遭到大地主顽固势力的拚死反抗。武则天是在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杰出的尊法反儒女政治家。

公元六四九年，推行法家路线的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士族大地主势力进行打击。但是他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彻底，特别是对那些随李渊起兵的关陇贵族，不但没有给予打击，相反还依靠了其中一批力量。因此，等到年轻的高宗李治继位，这批大地主顽固势力就蠢蠢欲动，妄图改变唐太宗的法家路线，复辟士族大地主垄断政治的局面。这样，在围绕着要不要继续建立和巩固庶族地主统治的问题上，庶族地主同以关陇贵族为代表的大地

主集团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斗争。

唐高宗李治，史称“薄于儒术，尤重文史”，是一个具有尊法反儒倾向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头几年，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士族贵戚长孙无忌和顾命老臣褚遂良等人的手中。这些人同出身于豪门贵族的王皇后串通一气，在朝内形成了一股很大的保守力量。为了摆脱豪门士族左右朝政的不利局面，继续唐太宗的法家路线，唐高宗很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帮手。这样，他就很自然的看中了“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武则天。在庶族地主代表李勣、许敬宗等人的支持下，高宗决心废去王皇后，改立武则天做皇后。高宗的这一决定，在朝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士族大地主的保守集团意识到废去王皇后，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而让出身低微的武则天当上皇后，对他们更是严重的威胁。于是，他们蝇营狗苟地聚在一起“私议其事”，哀叹大祸“必由此始”，经过密谋策划，他们决心不顾一切，倾巢而出，在高宗面前“以死争之”，反对把武则天立为皇后。

那时，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首的一群大地主官僚，在高宗面前，搬出陈腐的门阀观念，七嘴八舌的叫嚷：什么王皇后出身“名家”，“岂可轻废”；什么“陛下必欲易后，请择令族，何必武氏？”这些家伙开口“名家”，闭口“令族”，就是死死抱着一个宗旨：不许“地实寒微”的武则天做皇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顽固集团的骨干分子韩瑗公然在朝廷上借古讽今，把武则天比作殷商的妲己和西周的褒姒，恶毒诅咒武则天是亡国的祸水，并要挟说：如果让武则天做皇后，唐王朝很快就要灭亡了。顽固集团的头目褚遂良眼看费尽口舌，仍不管用，就干

脆“置笏于殿阶”，“叩头流血”，在殿上大耍无赖，以辞职不干来威胁，冲着高宗大叫：“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面对保守势力这股嚣张气焰，庶族地主代表李勣、许敬宗等给予有力的回击：天子改立皇后，“何预诸人事，而妄生异议？”在李勣等人的有力支持下，高宗不顾大地主顽固派的百般阻挠，毅然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就在这样激烈的儒法斗争中大步登上了政治舞台。

恩格斯指出，对于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武则天所以能立为皇后，决不是象反动儒生所胡说的什么“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是一场严重的儒法斗争，是庶族地主革新派战胜士族大地主保守势力的一个标志。正因为如此，所以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没有贪图后宫浮华安逸的生活，而是积极协助高宗处理政事，成为高宗政治上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高宗对武则天“委以政事”后，她更是夙兴夜寐，励精图治，推行了一条坚持革新、反对倒退的法家路线，继续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她先后罢贬了褚遂良等二十几个大官僚，逼令骄奢跋扈的长孙无忌自杀，有力地打击了士族大地主集团，成为庶族地主集团的最高政治代表，获得了“圣后”的称誉。

但是，一切“衰亡着的東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大地主顽固势力对武则天的法家路线恨得咬牙切齿。公元六八三年，唐高宗病逝。这些顽固分子自以为天赐良机，不



可坐失，组成了以英公徐敬业、中书令裴炎为首的反动联盟，公开举起了反叛旗号，妄图里应外合，一举推翻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庶族地主政治集团。这时，儒法斗争进入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阶段。

徐敬业是一个野心家。他曾因违法受到武则天的严厉处分。但他不思悔改，怀着“失职怨望，乃谋作乱”的祸心，从社会上精心收罗了一批残渣余孽、反动儒生，充当自己的党羽。一方面驱使囚徒、工匠从军，拼凑反动武装，另一方面联络中央政权内部执掌要职的阴谋家裴炎，作为内应，在扬州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他还雇用反动儒生精心炮制了一篇《讨武曩檄》，对武则天竭尽诬陷、造谣之能事，发出“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狂妄叫嚣，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九重城外，烟尘飞扬。在朝廷内部，儒法两家对徐敬业的武装叛乱态度壁垒分明。那些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革新派，坚决站在维护统一的立场上。他们义愤填膺，群情激昂，要求武则天立即派出大军前去镇压叛乱。而以裴炎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却在朝廷内部造谣生事，推波助澜，充当徐敬业的内应。裴炎这个阴谋家，表面上对武则天唯命是听，暗地里却心怀叵测。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这次徐敬业起兵叛乱，武则天一定会吓得惊慌失措，便赤膊上阵，公开逼迫武则天“返政”下台，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武则天面对朝廷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昂然挺立，镇定自若。在庶族地主集团强有力的支持下，武则天迅速查清了这次叛乱的真相，揪出了裴炎阴谋集团。审讯以后，立即将裴炎这个士族大地主的代理人

斩首示众。然后亲自部署反击叛军的战略战术，派出大将李孝逸率军三十万“兼程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徐敬业的叛乱据点。结果，由徐敬业、裴炎精心策划的这次武装叛乱，前后只支撑了五十几天，便被武则天派出的大军打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叛军头目徐敬业也同裴炎一样，枭(xiāo)首示众，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徐敬业、裴炎一伙的叛乱，虽然嚣张一时，但因为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分裂倒退的儒家路线，因此，必然是虚弱而短命的。而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政权，则依然是“海内晏然，纤尘不动”，中央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徐敬业、裴炎的武装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斗争并没有停止。武则天为了发展庶族地主掌权的大好形势，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改革，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的罗网，废黜了庸碌无能的唐睿宗李旦，于公元六九〇年亲自登位称帝，改唐为周，立号为“圣神皇帝”。武则天的称帝，是庶族地主战胜士族地主，革新集团战胜保守顽固势力的一个重大标志。一个妇女敢于坐上皇帝宝座，本身就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它记下了我国妇女反孔史上十分醒目的一页。

武周政权的建立，受到了庶族地主的热烈支持，当时曾有六万余人上表一致表示拥立武则天做皇帝，说明武则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而那些孔孟儒家之徒和大地主顽固派对此是十分仇视的。尽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庶族地主革新派的沉重打击，但仍一次又一次地死碰乱撞。他们不惜用最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武则天，说她做皇帝是“尤为非古”，攻击武则

天“专恣”。是什么“淫刑之主”。并到处“阴结朝士”，网罗党羽，妄图扼杀武周政权。武则天称帝以后，依然不向大地主集团退让半步，大力推行法治，“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运用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严厉地镇压了宰相李元素、孙元亨等三十六家“海内名士”，使“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再一次挫败了守旧派的阴谋。在庶族地主革新派对士族大地主集团的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武则天继续大刀阔斧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推行法家路线。

组织路线是执行政治路线的保证。为了使法家路线在全国范围内贯彻落实，武则天首先通过各种渠道，大力扶植中小地主，扩大庶族地主的统治势力。她下令改修当时确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姓氏录》，规定大量的庶族地主可以通过军功或作官等途径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另外，武则天还采用开科取士的办法，尽力提拔庶族地主人士做官。她诏令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员甚至百姓都可以自己推荐请求升官或做官，并首创了殿试、武举等，大胆地从社会下层提拔了大批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员担任要职。士族大地主集团对武则天不计门第选拔官吏的做法极度不满，他们恶毒攻击武则天用人“不分贤愚”，“滥以禄位收天下之心”，甚至还编造一首顺口溜：“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盃脱校书郎。”对武则天用人路线加以挖苦。但武则天对大地主集团的这些攻击，根本不去理睬，他告诫大臣们说：“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照旧坚定地推行法家路线。一时之间，在武则天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象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等有法家倾向的

杰出人物，为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和保证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进一步限制、监督顽固保守势力，严防他们颠覆中央集权，武则天又采取了广开言路的革新措施，在朝廷设置“铜匭”，作为检举箱，“以受天下密奏”，又设“登闻鼓”，若有紧急情况，无论是谁都可直接前往击鼓上告，途中费用一律由官方承担，有功的还可得到奖励。武则天采取这些措施对防止官僚大地主反动势力的叛乱和篡权活动起了一定作用。

“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sup>①</sup>。武则天的这两句诗，写出了她对均田制的歌颂和赞美。在经济上，武则天认为“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sup>②</sup>。和历史上其他法家一样重视农垦。她坚决维护唐初推行的均田制，限制大地主大规模兼并土地，保障一般地主的利益。在她统治时期，社会经济较之以前有了较大发展，全国人口由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十五万多户。在对外问题上，武则天坚决抵抗吐蕃、契丹、突厥等族的贵族武装的侵扰，并收复了碎叶（中亚伊塞克湖西北）等安西四镇，巩固了西北边防，打通了曾经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细亚的商路。

武则天在推行法家革新措施中尤为突出的一项便是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妇女有在朝中当四品或五品官的，尽管这不可能有什么实权，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在思想政治战线上，武则天十分蔑视代表大地主集团利益的反动儒家。她坚持政事“不问诸儒”，“博士助教，亦多非

儒士”，使当时出现了“先王之道，弛废不讲”的局面。崇儒大臣韦嗣立曾上疏武则天，哀叹“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他还污蔑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尊法派是“徒以猛暴相夸，罕能清惠自励(xù旭)，使海内黔首骚然不安”<sup>③</sup>。要武则天放弃法家路线，“尊尚师儒，发扬劝奖”。韦嗣立的这些攻击、叫嚣，只能是一阵“空悲切”，武则天依然坚定地执行法家路线，继续对孔孟之徒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武则天采取的各项革新措施，反映了庶族地主革新集团的利益，沉重的打击了士族地主守旧势力。武则天的反儒色彩远远胜过唐太宗，她推行法家路线也要比唐太宗更加坚决、彻底，这都是她“地实寒微”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明代法家李贽曾热情称赞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sup>④</sup>，高度评价了她的历史功绩。但武则天在晚年尊崇佛教，并且在打击了旧的大地主贵族的同时，又扶植了一批新的大地主贵族。然而，就其一生来看武则天代表了庶族地主革新集团，顺应历史潮流，勇于革新，敢于战斗，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武则天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

注：① 武则天：《石淙》《全唐诗》卷五。

② 《臣轨》下。

③ 《旧唐书·韦嗣立传》。

④ 《藏书》卷六十三。

## 史家申韩 刘知几

“烈士殉(xùn 徇)名，  
壮夫重气。  
宁为兰摧玉折，  
不作瓦砾长存。”

这是唐朝前期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刘知几留下的一段话，它充分表达了刘知几敢于批判，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刘知几(公元六六一——七二一年)，字子玄。他从小博览群书，“不假师训”，敢想敢说，不为传统所惑，不为权威所拘，“视诸儒皆出其下”。在唐朝前期激烈的儒法斗争中，他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名著《史通》，在历史领域里高举尊法反儒旗帜，勇敢地捍卫了武则天的法家路线。他的思想，给予后世以积极的影响，被后人称为“史家申韩”。

刘知几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皇帝武则天执政前后。他二十岁考中进士，担任了获嘉县主簿。官位虽然仅居九品，但刘知几并不因官小位卑而苟且偷安，他有志气，有抱负，时刻注意着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化，积极支持武则天的法家路线。

公元六九五年，武则天为了更有效地推行法家路线，决定

广开言路，下诏凡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可以直接向中央上疏陈言得失。武则天这一措施，得到了大批庶族官员的支持。刘知几几次上疏武则天，建议武则天“明察功过，精甄赏罚”，进一步加强法治，对大地主顽固集团进行更有力的打击。刘知几这些奏章，话语虽然不多，但都切中时弊，深深打动了武则天的心，使武则天不由击节称赞，大“嘉其直”。武则天是以善于用人著称的，当她发现了刘知几这个九品小官的才华与见识以后，不久就将他从地方提拔到京城任职，并量才录用，根据刘知几在史学方面的专长，让他参加了史书的编纂工作。公元七〇四年，刘知几又被武则天提拔担任位居三品的重要职务——凤阁舍人。以后他“官虽徙，职常如旧”，一直没有间断过史学研究工作。在武则天法家路线的陶冶下，刘知几“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修国史，撰起居注的工作，在史学领域里宣传尊法反儒观点，为武则天的反对“循旧”，主张“变古”的路线大喊大叫。

公元七〇五年，武则天逝世，政局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武则天的继承人唐中宗李显，是个政治上极端糊涂的“和事君子”，胆小怕事，懦弱无能。他当政以后，那些曾遭到武则天打击的门阀士族、宗室贵戚一个个“皆复旧资廕”，“追复官爵”，重又趾高气扬起来；那些在武则天新政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新贵也飞扬跋扈，作威作福，大干背弃武则天革新路线的坏事。一度受到武则天打击与压抑的尊儒反法逆流迅速泛滥。这种守旧复古势力的抬头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刘知几工作的国史馆。这时的国史馆，被新贵武三思之流把持着。这批“监

修贵臣”滥用职权，“立性邪佞，不循宪章”，完全背离了武则天的路线，并竭力阻挠、破坏刘知几等人修撰《则天大圣皇帝实录》的工作，刘知几“每与其鉴枘（rui 瑞）相违，齟齬（jǔyǔ 矩雨）难入”，面临这样一个“小人道长，纲纪日坏”的局面，他“郁快孤愤”，大失所望。公元七〇八年，刘知几愤然辞去“秘书少监”的职务，抱着“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斗争精神，发愤“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向历史领域里的复古倒退思潮开火，向政治上否定、攻击武则天法家路线的反动逆流宣战，在斗争中捍卫武则天的法家路线。

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刘知几的《史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处处都洋溢着浓烈的批儒反孔精神，紧密配合现实斗争，把斗争的锋芒直接对准了复古倒退的祖师爷孔老二及其儒家经典，剥去了罩在孔丘身上的“神圣”外衣。

孔丘思想的要害是什么？就是宣扬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通过“克己复礼”，顽固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旧秩序。为了达到复辟倒退的政治目的，孔丘及其信徒拚命玩弄“呼先王以欺愚者”的鬼把戏，只许人们在“先王”的陈迹上爬行，不许有丝毫的创新行为和变革举动。唐初的尊孔派为了反对法家的变革，也打出“复古”旗号，胡说孔丘所遵奉的“三王”之制，是后世之法的准绳，攻击武则天执政是“尤为非古”，叫嚷“依古为当”。对于这些叫嚣和攻击，刘知几坚决予以驳斥，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sup>①</sup>的进步观点，嘲



笑孔丘的徒子徒孙起劲地宣扬“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的滥调，完全如先秦法家韩非在《五蠹》中所讽刺的守株待兔式的蠢人，是永远没有出路的。

“祖述尧舜”是孔老二提出的一个复古口号。在孔老二的眼中，尧舜是不胜其美的帝王“典范”，儒家之徒都大肆吹嘘尧舜时代“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还喋喋不休地大谈尧“禅位”于舜，吹捧这是先王的圣明之处。对于这些儒家传统的说法，刘知几是怎么看的呢？他在著名的批孔檄文《疑古》篇中，大胆的指出这些纯粹都是无稽之谈。在他看来，尧舜时代，不过是“小人君子并肩齐列，善恶无分”。至于“禅授”的美谈，刘知几认为是假的，尧实际上是被舜废掉的，那有什么相让可谈！禹象这种赤裸裸的“篡夺”行为，竟“谓之让国”，岂不是“徒虚语耳！”当然，刘知几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对尧舜的褒贬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真实，这自当别论，但他否认尧舜时代所谓“禅让”的美谈，是有现实政治背景的。

武则天执政期间，以英公徐敬业、中书令裴炎为首的大地主官僚集团，就曾打着“勤王”旗号策动了一次旨在篡政夺权的武装叛乱，那些专会吹捧尧舜“禅让”之美的孔孟之徒，这时都利令智昏，纷纷跳出来加入徐敬业的叛乱行列。积极拥护武则天路线的刘知几，对徐敬业一伙的叛乱行为是深痛恶绝的，为此，他在《疑古》中指出：“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这些话直接揭露了徐敬业之流反动势力表面上“祖述尧舜”，妄谈“禅让”，而暗地里时刻

磨刀，伺机篡权的反动本质，击中了大地主顽固集团的要害。刘知几这种不盲从、不迷信，敢于向儒家传统说教挑战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宪章文武”是孔丘提出的又一个复古口号。孔丘把周文王作为行“仁义道德”之说的样板，同时蓄意把殷纣王作为“不胜其恶”的暴君典型。唐初的儒生们继承孔孟衣钵，借古讽今，恶毒咒骂武则天是“淫刑之主”，俨然是当代的纣王。还鼓吹“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要挟武则天“缓刑用仁”，学习周文王那套虚伪“仁德”。刘知几在他的另一篇杰出的反孔檄文《感经》中从现实的政治斗争需要出发，毫不含糊的揭开了周文王脸上的假面具。孔丘说：“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刘知几指斥这是孔丘的“虚为其说”，如果当时周仍是殷的臣属，哪来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土地呢？如果有，也只能是掠夺来的，不可能“服事殷”，而且周文王实在象阴谋窃取曹魏政权的司马昭。刘知几在《疑古》中勇敢地为殷纣王翻案，指出在儒家的经典中，称赞周之盛况时就讲纣王是独夫，谈到殷失败时又说纣王有臣凡万人，为其流血奋战。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刘知几公然指斥儒家对纣王的攻击是“厚诬”、“伪说”，是“欲加之罪，能无辞矣？”尽管刘知几受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尚不能对殷纣王作出科学的评价。但他在《疑古》中敢于向儒家的传统说教开火，大胆为儒家所“厚诬”的殷纣王翻案，充分体现了这位法家具有大无畏的反儒精神，有力的回击了那些卫道小丑们对武则天法家路线的恶毒攻击。

毛主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

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歪曲、篡改历史，是一切反动派的惯技，在这方面，《春秋》是个典型。孔丘为了实现其“善复古，讥易常”的目的，采取了种种弄虚作假、颠倒黑白的恶劣手法，为历代反动阶级歪曲历史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历代的尊孔派，也都把《春秋》奉若神明，吹得神乎其神。唐初的孔颖达就把《春秋》吹成是“实永世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的“皇王之明鉴”<sup>②</sup>，直接用《春秋》来为唐初的复古势力撑腰打气。刘知几顶住这股逆流，在《惑经》中，他列举了大量史实，尖锐地指出《春秋》这部书并不是什么“善无不备”的典范，而是“微婉其辞，隐晦其说”的骗人经；孔丘也是个“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的两面派、伪君子。刘知几一针见血地指出：“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是“事靡洪纤，动皆隐讳”。“讳”者，掩饰之谓也，一个“讳”字，确实抓住了孔丘“春秋笔法”的要害。“多为贤者讳”就是不择手段地替周天子为首的没落奴隶主集团歌功颂德，藏乖遮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春秋》，就是一部“遵彼乖僻，习其讹谬”、“真伪难分，是非相乱”的歪书。象这样一部书，为什么竟被吹捧为“善无不备”的“经典”呢？刘知几指出：“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一句话，就是因为历代反动儒生百般吹捧的结果！

刘知几对孔丘及其儒家经典的批判，是建立在先秦以来法家路线的思想基础上的。在《史通》中，刘知几对历史上的

法家人物大胆地予以肯定，并继承他们的革新思想。他称赞自从商鞅、秦始皇创立、推行郡县制后，“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千门万户，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龙盘，帝王表其尊极”<sup>③</sup>。使得帝王从此处于“尊极”的地位，雄驾诸郡，集权中央，保证了国家统一。他还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件“可取”的积极措施，并对秦王朝的迅速败亡表示惋惜，认为“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回答了反动儒生对秦始皇的攻击。对汉朝的著名法家贾谊、晁错也给予称赞，认为“昔贾谊上书，晁错对策，皆有益于国”<sup>④</sup>。对东汉的王充，刘知几更是十分推崇。他曾说：“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可以说，刘知几继承了王充的反孔精神，他的《疑古》、《惑经》就是王充《问孔》《刺孟》的续篇。刘知几肯定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同他的反儒精神一样，也都是为他所处的时代服务的。他肯定历史上的法家，也就是为了肯定武则天执政时所推行的法家路线，从而有力地回击了大地主顽固势力对武则天法家路线进行的恶毒攻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刘知几在《史通》中充分显示了尊法反儒的斗争精神，体现了法家修史传统，因此，它一问世，就引起毁誉纷纷，激起层层波澜。一些死抱着儒家传统的尊孔复古派，异口同声地对《史通》进行恶毒攻击，“互言其短”，开列了刘知几“妄诬圣哲”的五大罪状，其中以“弹劾仲尼”为最“甚”，还大骂刘知几“舌长而笔辣”，“得罪于名教”，“工诃古人”，还有什么“薄尧禹”，“惑《春秋》”，“高自标榜，前无贤哲”

等等，不一而足，骂来骂去，就是“怒其非圣无法”。然而，一切反动儒家的恶毒咒骂与围攻，丝毫掩盖不了刘知几的思想光辉，反而更衬托出“史家申韩”刘知几的法家战斗性格。

刘知几是一个地主阶级史学家，他的法家思想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彻底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更不可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历史进行科学的总结。但他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如此猛烈地对孔孟之道、儒家思想进行抨击，是值得肯定的，他在思想领域里批判儒家的复古倒退思潮，适应了中小地主集团在政治上打击门阀豪族势力的需要。

---

注：① 《史通·模拟第二十八》。

② 孔颖达《春秋正义序》。

③ 《史通·书志》。

④ 《史通·杂说》。

## 韩柳之争

“请君莫奏前朝曲，  
听唱新翻杨柳枝。”<sup>①</sup>

公元八〇五年，以王叔文（公元七五三——八〇六年）、王伾、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八一九年）、刘禹锡（公元七七二——八四二年）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冲破儒家复古、分裂的“前朝曲”，在唐朝中叶掀起了一场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永贞革新”。

这时的唐王朝，已经从封建社会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在“安史之乱”中膨胀起来的藩镇割据势力，“号称藩臣，实非王臣”，他们依仗握有的重兵，霸占大量地方，“自补官吏，不输王赋”，父子相袭，窃据一方。他们或相互杀伐，或联兵抗唐。有个叫朱泚的卢龙节度使甚至自称楚帝，把唐德宗赶出了长安。后来平藩将领李晟花了很大气力，才消灭了朱泚。同时，朝廷内宦官专权，权力大到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藩镇、宦官、官僚大地主沆瀣一气，把农民压得苦不堪言，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受到了侵犯，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样，当着支持变法的唐顺宗登基，王叔文、柳宗元等改革派掌握了政权，立即实行变法。他们免除欠税、降低盐价、释放宫女、打击宦官、藩

镇势力,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与拥护。但是,中小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力量,毕竟远逊于盘根错节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这场变法仅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以大宦官俱文珍、节度使韦皋为头子的顽固派就发动了宫廷政变,扼杀了这场改革运动。结果,王叔文被杀害,王伾被逼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名改革派骨干,分别被贬到边远地区充当“司马”小官,并宣布永远不得赦免,这就是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

鲁迅说过:“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二王八司马”事件发生后,顽固派并没有放松对改革派的迫害,他们唆使韩愈等儒家之徒,对柳宗元、刘禹锡的革新活动,进行反动的思想围剿。著名的“韩柳之争”,实质上是公元八〇五年变法反变法斗争的继续,是唐代中叶儒法两家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论战。

韩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是藩镇、宦官卵翼下的儒家之徒。他年青时,就依附武宁节度使张建封,以顽固派为政治靠山。他吹捧张建封、韩弘、贾耽、董晋等封建军阀是什么国家的重臣、天子的心腹、王室的屏障,说他们“威行如秋,仁行如春”,简直是人民的救星了。他把大宦官俱文珍比喻为“冲天鹏翅”、“报国剑铓”,吹捧俱文珍对改革派的镇压是什么“奋其武毅,张我皇威”<sup>②</sup>。韩愈一生,替活人捧场、为死人作碑,捞取了藩镇、宦官的大量不义之财。他正是适应了守旧、分裂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政治需要而狂热地尊孔崇儒的。在臭名昭著的《原道》中,韩愈鼓吹:“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他煞费苦

心地把仁义和道德结合起来，规定道德的内容为仁义，为反动统治集团提供了吃人的思想武器。韩愈又抛出了道统说，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串了起来，耸人听闻地说道：“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哀叹孟轲死后，孔孟之道便不得其传，现在要由他来继承道统、拯救人类了。为此，他大肆吹捧一个履行仁义道德的黑样板——伯夷，竭力向反动统治集团献媚。毛主席曾明确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被贬在荒僻的永州、寄居和尚庙里的柳宗元，拿起他那支刚劲有力的笔，开始了新的战斗。针对韩愈宣扬的仁义道德和道统说，柳宗元一针见血地指出：“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sup>③</sup>本来，圣人讲的道理“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那些“拘儒瞽生”们死抱不放，盲目地师古训，这完全是在“荣古虐今”。韩愈不正是这种“拘儒瞽生”吗？柳宗元以极大的愤怒，揭露了儒家“道统”中的圣人及其门徒的丑恶嘴脸。他写的《断刑论》是非孔的，《天爵论》是非孟的，《时令论》是非汉儒的，《贞符》是非董仲舒的，《六逆论》驳《春秋左传》，《非国语》批《国语》中的怪诞之说。在对这些儒家经典的批判中，柳宗元所揭露和鞭挞的“圣人”及其徒子徒孙达二十八人。韩愈宣扬性分三品，“下品”即劳动人民是天生之愚，只配受“上品”即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奴役。柳宗元对之进行辛辣的嘲讽。柳宗元寄居的庙宇旁，有一条清澈的小溪，被柳宗元命名为“愚溪”。一天





夜晚，柳宗元梦见“溪之神”向他提出抗议，说：“予甚清与美，……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为何称为“愚溪”？柳宗元回答说，因为我“头抵木石，冲冒榛棘”，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被自命为“智”者的儒家之徒看成“愚”者。我自甘“愚”者，所以也称你为“愚”溪。这个寓言，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敢于搬走两座大山的可敬的愚公。柳宗元还写过一篇《种树郭橐驼传》，称赞一个以种树为生的普通农夫，因为掌握了种树的规律，使“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一个被儒家视为“下愚”的种树人竟然列入“传”，这是破天荒的事，同韩愈的《伯夷颂》形成鲜明的对照，是对儒家“道统说”的有力挑战！

“道统说”是以“天刑说”作为理论根据的。早在“永贞革新”的高潮中，韩愈就恶狠狠地叫道：“天位未许庸夫干”！意思是，“永贞革新”是违背天意的。“永贞革新”被血腥镇压了，韩愈又阴森森地嚷道，俱文珍之流是“仰喻天意”，代表天的意志来扼杀这场地主阶级改革运动的。接着，韩愈假惺惺地规劝在儒家汹汹“颓波”冲击下仍“心如砥柱”的柳宗元、刘禹锡，说是搞革新、反道统，“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柳宗元不信这一套，立即写回信驳斥道：“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理智的人是不讲这些的，你韩愈自诩为“智”者，为何“惑于此”？什么“不有人祸，则有天刑”，此乃“大惑”！在著名的唯物主义战斗论文《天说》中，柳宗元记载了这样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韩愈摆出一副唯独他“知天”的孔孟卫道士的架式，对柳宗元恬不知耻地说教：你知道关于天的说

法吗？我来讲一点给你听听。接着，他胡说八道开了，什么人的产生是由于元气、阴阳的败坏，人们改天换地的活动是“为祸元气阴阳”。因此，凡能摧残、减少人类，是“有功于天地者”，如要使人类昌盛、繁息，那是“天地之仇”。这就是说，改革派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定，反而是天的仇敌，理应受到惩罚；而顽固派破坏生产力、摧残人民，倒是天的功臣，应该得到赏赐。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天刑论”，柳宗元奋起反击，他指出：天地、元气、阴阳，“虽大，无异果蓏（luǒ裸）、痲痔、草木”，都是没有意志的物质的东西，根本不会“赏功而罚祸”。人们“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如果期望天来怜悯或行“仁”，实在是“大谬”。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也挥戈上阵，一口气写了《天论》上、中、下三篇，提出了“人能胜乎天者，法也”的光辉思想，意思是，有一条正确的法治路线，人就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发展生产。这是对荀况的“人定胜天”思想的进一步发挥，配合柳宗元对“天刑说”作了有力的讨伐。柳宗元看到《天论》后，欣喜地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称赞《天论》所阐述的与《天说》“无异道”。这两位革新战友共同战斗，把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场关于“天”的大论战中，柳宗元还写了杰出的《天对》，全面地表述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天对》是回答屈原的长诗《天问》的。《天问》中，具有法家倾向的诗人屈原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问题，对“天命论”大胆怀疑。《天问》问世一千多年，只有柳宗元给予唯物主义的答复。在《天对》中，柳宗元指出：自然界的运行不是什么神的意志，而是“元气”自身的运动；这种运动有

它自己的规律,就是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吁炎吹冷,交错而功”。这些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从理论上驳倒了韩愈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狡辩。柳宗元在另外一些论著中,还揭露了韩愈及其推崇的“圣人”搞“尊天”的目的是要“愚蚩蚩者”,麻痹人民,“诳乱后代”。这些人简直象“淫巫瞽史”即妖淫的巫婆、瞎眼的史官那样卑鄙无耻!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场“持矛举盾”的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中,柳宗元一反传统偏见,大胆地提出了地球绕太阳旋转的地动思想,这是天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这也说明,儒法斗争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当然,柳宗元的反儒和唯物论思想是不彻底的。他写的《道州文宣王庙碑》,给孔丘留下了地盘。他宣传唯物论,但又以佛教徒自居,瑕不掩瑜,这些缺点毕竟不能掩盖柳宗元法家思想的光辉。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在政治上仍坚持法家路线,主张打击藩镇、宦官势力,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这同主张以分封制作为国家“纪纲”、以“亲亲”作为任人原则的韩愈之流是针锋相对的。所以,“韩柳之争”又集中表现为统一和分裂、“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的斗争。柳宗元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朝廷内,法家裴度、李愬坚持“古今异制,不可因循”<sup>④</sup>的变革思想,以削平藩镇、维护统一为“己任”,同李逢吉、王涯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地方上,刘禹锡、韩泰等改革派与柳宗元遥相呼应、并肩战斗。在这场斗争中,柳宗元写下了千秋盛赞的《封建论》,发出了法家人物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最强音。

统一与分裂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任人路线问题。当时的藩镇拥兵割据，“继世而理”，俨然成了世袭土皇帝，他们需要抬出奴隶社会世袭制度为自己卑鄙行为辩护。韩愈当然是心领神会的。“永贞革新”中，王叔文革新集团提拔了一批与藩镇、宦官没有亲缘关系的“出身卑微”的地主阶级中下层的人。这对韩愈说来，比什么都难过。他写了一首《永贞行》的诗，呜呜咽咽地诅咒：“狐鸣枭噪争署置……超资越序曾无难”，“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沆（wán丸）瀾”。韩愈认为，搞“先王”那套世袭制度——也就是藩镇所实行的把官职“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否则，让资微望轻的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掌权，就会“僭乱”。柳宗元对这条儒家路线极其愤慨，他把顽固派比作一窝“草摇风动，百毒齐起”的毒蛇，或者象钻到人的肝脏里“阴幽脆侧”、潜伏为害的“尸虫”。他认为“择君置臣之道”是“天下理乱之大本”，主张命官以材不以姓，任人唯贤，打破藩镇、宦官及其豢养的儒家之徒对政权的垄断。在《六逆论》中，他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秦用张禄（范雎）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亲不足与也。苻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旧不足恃也。”他说，如果“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却不去提拔贤智的新人，让愚蠢的老顽固掌权，必然“乱天下”。柳宗元的这条“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的任人唯贤的路线，反映了法家人物要求掌握被藩镇、宦官篡夺去的政权、军权，建立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强烈愿望。

“二王八司马”事件发生十年后，即公元八一五年，在裴度

等人的力争下，唐宪宗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五人进京。裴度指望这些坚定的改革派来京，能为他的法家集团增添勇猛的闯将；唐宪宗却盘算着用“洗涤痕累，渐序用之”的手段软化这些革新斗士。在十年论战中勇敢捍卫了法家路线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并没放弃革新主张。刘禹锡到京城玄都观走了一圈，看到把持朝廷的大都是些腐儒，法家势力孤弱，愤慨之余，写了首诗，把那些投靠藩镇、宦官的腐儒比作妖冶献媚的桃花：“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指自己）去后栽”。儒家之徒气得暴跳如雷，他们大叫八司马“不可复用”！于是，柳宗元被再贬到更远的柳州，刘禹锡被再贬到一个最荒凉的地方播州。新的打击，对柳宗元来说，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他十分难过的是，自己的革新战友刘禹锡家有老母，都被贬到如此荒僻的地方！于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在裴度的帮助下，刘禹锡改贬连州。两位患难与共的战友离开京城，一路上赠诗互勉。这年六月，柳宗元到达柳州，他的第一首诗就是《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  
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zhǎn展)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  
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  
犹自音书滞一乡！

意思是：登上城楼，遥望远方，想念战友，不禁心字浩茫。刘禹锡等虽遭再贬，儒家之徒是不会罢休的，他们必然象“惊风”“密雨”那样，对改革派残酷迫害。想到这里，愤懑的心情恰似九曲回肠。现在尽管音讯不通，但坚信大家会恪守革新之志的！柳宗元在柳州四年，改革弊政，解放奴婢，发展农业，继续着他的革新事业。

韩愈在柳宗元逝世的那一年，即公元八一九年，一度被唐宪宗贬了官。他在去贬地潮州途中，凄凄惨惨戚戚，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也是八句。诗中呼天唤地地哀叹离家“路八千”之遥呀，唧唧囔囔地埋怨自己骑的马也有气无力、不愿向前走呀，又是谄媚地表白自己为宪宗是不惜“残年”，又是绝望地悲鸣，要侄孙到那满是瘴气的江边去收自己的枯骨，说来说去，无非是个人的生死荣辱。韩愈到潮州后，上书乞罪，“伏唯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死皮赖脸地讨官做，实在令人作呕。

两首诗歌两种情，一儒一法泾渭明。韩愈和柳宗元的这两首诗，反映了儒法两家精神面貌和世界观的对立，是理解韩柳之争的路线斗争本质的生动材料。

- 
- 注：① 刘禹锡：《杨柳枝词》。  
② 韩愈：《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  
③ 《柳河东集·与杨京兆凭书》。  
④ 《旧唐书·裴度传》。

## 《封建论》和李愬的淮西之捷

夜深似漆，朔风如剑。纷飞的大雪中，驰骋着千骑万马。那是公元八一七年的冬天，唐朝著名的平藩将领李愬，在法家代表、新任宰相裴度的统帅下，率兵直捣藩镇割据的一个巢穴——蔡州。蔡州是淮西的重镇，吴元济等军阀势力在这一带“狂悖而不可遏”，蹂躏人民、抗拒朝廷，“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sup>①</sup>。朝廷曾命严绶、韩弘等带兵讨淮，但他们都是同吴元济一鼻孔出气的家伙，不是“闭壁经年，无尺寸功”，就是“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反而搞得吴元济越发骄横，不可一世。李愬“名位素微”，吴元济是不会把这位年青的平藩将领放在眼里的。况且，这一天又是风雪交加的“黑道凶日”，吴元济一点也没有防备。李愬的铁骑在大风雪中艰难行军一百三十里，突然出现在蔡州城下，吴元济一伙竟没有一个人发觉他们的到来。当吴元济被震耳欲聋的杀喊声惊醒，听到“官军至矣！”的消息时，还眨巴着眼阴笑道，什么官军，是那些囚徒在造反吧，左右替我杀光这些穷光蛋！一会儿，又有人惊呼：“城陷矣！”吴元济仍睡眠惺忪地说：对了，看样子是手下的兵士“求寒衣”来了！等到他亲耳听到近万人呼应着李愬的传令，才如梦初醒，但时已晚矣，只好慌慌张张爬上院墙负隅顽



抗。这时雪已停了，李愬带领的骑兵已把院墙围得水泄不通，箭就象刺蝟身上的棘刺一样密集，火犹如猛虎一般扑去，被吴元济割据集团害得好苦的人民“争负薪芻助之”<sup>②</sup>，吴元济这只瓮中之鳖，只得无可奈何地束手就擒了。

李愬雪夜袭蔡州、活捉吴元济，看来易如反掌，其实这胜利来之不易。唐朝以唐玄宗的尊孔崇儒为标志，由盛转衰，中经安史之乱，从此藩镇林立、宦官专权、军阀混战。围绕统一还是分裂，儒法两家进行了长期、曲折的斗争。永贞革新是唐朝中叶儒法斗争的高潮。王叔文、柳宗元革新集团执行了一条“内抑宦官，外制方镇(藩镇)”<sup>③</sup>维护统一、巩固中央集权的法家路线，很快就遭到儒家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永贞革新”被打了下去，但斗争仍在继续。朝廷外，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同儒家之徒韩愈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朝廷内，以御史中丞裴度和李愬为代表的法家人物继续“永贞革新”的事业，同宰相李逢吉和王涯为代表的守旧、分裂势力反复较量，进行殊死斗争。这是唐代中叶儒法斗争的第二次高潮。裴度一生“以平贼(藩镇)为己任”，在他担任御史中丞期间，向朝廷推荐了勇敢善战的李光颜等人参加平淮西的战斗，顽固派韩弘曾以美女收买李光颜，李光颜严厉地回答韩弘：“光颜以身许国，誓不与逆贼同戴日月”，“何忍独以声色自娱悦乎！”象李光颜这样的将领团结在裴度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家集团。公元八一五年，由于平淮统帅严绶推行守旧、分裂的儒家路线，“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群臣多请罢兵。这时，裴度挺身而出，用他视察淮西的见闻，驳斥淮西之

藩不可平的谬论，分析了可以战胜这股分裂势力的条件。当时刚任宰相、执掌兵权的武元衡也坚决支持裴度。儒家之徒终于撕破了伪装，他们上下勾结，用卑鄙的暗杀手段杀害了武元衡，裴度也被刺身负重伤。“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儒法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武元衡死后，裴度继任宰相，他坚决表示：“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并为平淮西藩镇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两年后，接任平淮统帅高霞寓等兵败而归，宰相李逢吉、王涯等“朝臣多以罢兵赦罪为便”，裴度却毅然请求奔赴前线，“亲自督战”。他指出，吴元济“势实窘蹙”，只要诸将团结，“破贼必矣”！接着，李愬也主动请求参加平藩之役，被任命为前线指挥。奇袭蔡州前，李愬认真地执行了裴度的法家路线和政策，注意团结手下将士，安定军心，使“军气复振，人有欲战之志”，军法严肃，号令划一。接着，李愬又耐心细致地争取吴元济割据集团的胁从分子、一般将领、甚至某些骨干分子，教育他们与吴元济的分裂路线划清界线，站到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的正确路线上来。结果，争取了一个，带动了一批，在法家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路线感召下，“降者相继于道”。反动的分裂头子吴元济被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营垒的瓦解又暴露了吴元济集团的虚实。李愬知己知彼，得道多助，吴元济众叛亲离，困兽犹斗。在这种情况下，李愬毅然决定奇袭蔡州，取得了平定淮西战役的胜利。

远贬在荒僻的永州的柳宗元，密切注视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柳宗元名为“司马”，实际上毫无实权，等于软禁，但他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法家立场。在“愚溪”旁的

庙堂里，柳宗元废寝忘食，奋笔疾书，开辟了儒法论战的另一条战线，同朝廷内以裴度、李愬为代表的法家集团的斗争遥相呼应。当时，儒家之徒韩愈适应了以李逢吉、俱文珍、韩弘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政治需要，竭力鼓吹“先王之法”，为早已陈腐的分封制大唱赞歌，恶毒攻击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违背儒家道统的“纪纲”。他破口大骂秦始皇“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无分势于诸侯”，实行了郡县制，致使“传二世而天下倾”。很清楚，韩愈辩护古人，实际上就是为顽固派的守旧、分裂找历史根据，得出坚持分裂割据的藩镇是国家“股肱”的荒谬结论；咒骂秦始皇，则完全是为了攻击裴度、李愬、柳宗元、刘禹锡等法家代表坚持统一的主张。柳宗元认识到，要消灭最反动、最黑暗的藩镇割据势力，决不能容忍韩愈对历史的歪曲，更不能听凭这种宣扬复辟、分裂的尊儒反法思潮的蔓延。于是，他“发之以愤激”，凝之以笔锋，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战斗诗文。他在《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等文中，愤怒揭露了藩镇的“骄兵悍将”对人民的压榨和摧残。他说，藩镇势力根本不是“守天子土”的王朝的屏障，恰恰是“乱天子边”的祸根。他反对向藩镇妥协退让，主张“除恶务本根”，“非兵胡以定乱”，要求用暴力扫荡分裂割据势力。

为了从理论上彻底驳倒韩愈之流的谬论，为裴度、李愬的法家集团的平藩斗争提供理论根据，柳宗元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材料，针对藩镇割据的现状，写下了“识透古今”的《封建论》。

《封建论》热情赞扬了法家路线的伟大实践者秦始皇；充

分肯定了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的革新精神，对一千多年来关于秦始皇功罪、郡县制和分封制优劣的争论，特别是唐代中叶围绕统一还是分裂的大论战作了精辟的总结，提出了一条消除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法家路线。

柳宗元指出，分封制也好，郡县制也好，都是时势造成的。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完成了千古伟业。柳宗元根据地主阶级的公私观，热情称赞：“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在郡县制下，地方官吏“有罪得以黜（罢免），有能得以赏”，早晨任命的官吏，发现他不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晚上就可以撤换他，这样，中央集权的国家对地方指挥自如。汉、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了“秦制之得”。刘邦建汉时，“郡邑居半”，另一半“立宗子，封功臣”，结果，十只手指按十个跳蚤，无法控制诸侯王，“奔命扶伤”，病死流矢。不过，那时“有叛国而无叛郡”，这说明郡县制才是符合历史趋势的。唐初李世民法家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制州邑，立守宰”，打击以肖瑀为代表的分裂、守旧势力，这使唐王朝延续了二百年而“大业弥固”。但是，藩镇势力“桀滑时起，虐害方域”，这些叛将的出现只能说明加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必要性。历史雄辩地告诉人们：实行分封制必然出现国家分裂、军阀混战的局面；而凡是实行郡县制的朝代，一般地说，国家是统一的，社会是安定的。孔丘不是鼓吹“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吗？柳宗元则以高屋建瓴之势指出：“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历史不能倒退，适应时势发展

的郡县制不可废，百代都行秦政法，这是历史的结论。要使唐王朝强盛，必须坚持郡县制，消灭分封制的残余——藩镇割据势力，通过“善制兵，谨择守”，即善于掌握军队，谨慎选择地方官，使政权和军权掌握在主张国家统一、前进，反对分裂、倒退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手中，以建立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

郡县制既然比分封制优越，那么，为什么秦王朝“二世而亡”？这个问题在地主阶级内部一直争论不休，也是主张平淮西藩镇的法家集团急需回答的一个理论问题。肖瑀断言：“秦置郡县，二世而亡”，韩愈宣扬：“封建而延，郡县而促”，在儒家之徒攻击秦始皇及其实行的郡县制的猖狂吠中，柳宗元砥柱中流，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他指出，秦二世而亡，是由于秦始皇死后，“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并残酷地“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柳宗元当然不可能理解当时的“政”是奴隶制复辟政权，与秦始皇建立的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是截然不同的。但他能看到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是赵高的反动统治，肯定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在当时发挥的作用，“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这个见解是很杰出的，驳得主张守旧、分裂的顽固派目瞪口呆。柳宗元这些逻辑严密的分析，把郡县制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的优越性和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的历史功绩，非常突出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有力地粉碎了儒家之徒的思想围剿，发出了法家人物要求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战斗呐喊！

《封建论》的产生，极大地支持了裴度、李愬的斗争，为裴

度出任宰相、组织平淮西之役大造了舆论。在朝廷内外法家代表的斗争下，以裴度、李愬为代表的法家集团暂时取得了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愬才得到重用，打了平定淮西藩镇这样一个漂亮仗！

李愬平淮西之捷是法家路线在军事上对儒家路线的胜利，儒家之徒对这一仗充满刻骨仇恨。淮西战场硝烟未尽，一场轩然大波又在朝廷掀起。事情是这样的：唐宪宗下诏刻石记平淮西之功，在淮西之役中担任行军司马的韩愈领旨撰文。韩愈“经涉旬月”，精心炮制了《平淮西碑》，把平淮西之功归于大军阀韩弘。事实上，韩弘挂着“淮西诸军行营都统”的招牌，根本没参加这一战役，而是躲在城里，让他的儿子带了三千兵卒归李光颜部。尤为甚者，这个顽固派“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sup>④</sup>，一听到部下打了胜仗就“数日不怡”，专干“危国邀功”的勾当。但是，韩愈信口雌黄，肉麻吹捧什么“都统弘贲战益急”云云。“平淮之功，李愬第一，此天下之公言”<sup>⑤</sup>，但是，韩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韩弘喜出望外，赶忙犒赏了韩愈五百匹绢。然而，这块黑碑在李愬及平淮战士中是通不过的。李愬部下有个名叫石孝忠的看了石碑，义愤填膺，“因作力推去其碑”，把巨大的石碑推得摇摇欲坠，官吏把他带到唐宪宗那里，石孝忠理直气壮地说：“臣所以推去碑者，不唯明愬之绩，亦将为陛下正赏罚之源！”<sup>⑥</sup>同时，朝廷中许多人也纷纷提出抗议。唐宪宗只得下令砸碑，换人重写。“长绳百尺屨(jù)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sup>⑦</sup>儒家之徒篡改历史，为守旧、分裂集团树碑立传的阴谋，在“韩碑”倒地的轰然巨响中破灭了。

法家爱法家，英雄颂英雄。受到再贬的法家斗士柳宗元、刘禹锡，在遥远的边地喜闻李愬平淮西之捷，不禁心潮澎湃，挥笔赋诗。“雨雪洋洋，大风来加，……是震是拔，大歼厥家。”在著名的《平淮夷雅》中，柳宗元把李愬雪夜取蔡州这幕法家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描绘得有声有色。刘禹锡也写了《平淮州》诗三首，生动地展示了平淮历史画面：“蔡州城中众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汉家飞将下天来，马箠一挥门洞开。”柳宗元还特地把《平淮夷雅》献给李愬，并在祝贺信中心情激动地对他说：“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辅万分之一，虽死不憾。”<sup>⑧</sup>他完全把李愬看作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才倾吐这些知心话，表达他为法家路线奋斗到底的决心。

《封建论》的诞生和李愬的淮西之捷，距今已一千多年了。奔腾向前的历史潮流早已把封建社会抛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千秋盛赞的《封建论》至今仍保持着战斗锋芒，而在法家路线指引下获得军事上全面胜利的淮西之役也有许多历史经验令人深省，这是因为，在历史上，法家总是主张革新、维护统一的；儒家的路线则是一条倒退、分裂的路线。唐代围绕统一与分裂的斗争生动地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不可阻挡的总趋势，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你看，秦以唐的两千多年，统一时期约占三分之二，分裂时期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分裂的期间越来越短。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

证。”妄图搞复辟、搞分裂的林彪一伙，在伟大的历史潮流面前，只能落得个粉身碎骨、折戟沉沙的可耻下场。当然，阻挡历史潮流的牛鬼蛇神还会跳出来同我们较量，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熟读唐人《封建论》，研究淮西之捷的历史经验，古为今用，坚持前进，反对复辟，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注：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

③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

④ 《旧唐书·韩弘传》。

⑤ 章士钊：《柳文指要》卷一。

⑥ 罗隐：《说石烈士》。

⑦ 李商隐：《读韩碑》。

⑧ 《柳河东集·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



## 年青的法家诗人——李贺

“谁看青简一编书，  
不遣花虫粉空蠹？”

这是唐代诗人李贺(公元七八九——八一六年)在《秋来》中写下的愤激的诗句。意思是,他留给后人的诗集,决不能被蠹虫蛀成粉屑。自从韩非写了著名的《五蠹》,“蠹虫”成了儒家的代名词。李贺这里说的“蠹虫”,指的就是儒家。固然,李贺二十七岁早夭后,儒家蠹虫们对李贺及其诗集竭尽歪曲之能事。他们把李贺污蔑为“鬼才”;把李贺的诗称为“鬼诗”、“鬼仙之词”<sup>①</sup>,说什么“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sup>②</sup>。真是一派胡言乱语!今天,我们要拨开儒家蠹虫散布的妖雾,读一读李贺“青简一编书”,恢复这个年青的法家诗人的本来面目。

李贺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仅做过一名“奉礼郎”的九品小官。二十岁前就死了父亲,留下老母和一个弟弟,生活比较窘迫。所谓“衣如飞鹞马如狗”,尽管是李贺对自己贫寒生活的一种夸张,但确实反映了他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这时的唐王朝,已经从唐太宗、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顶峰跌落下来,由盛转衰。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官

僚大地主疯狂兼并土地，残酷压榨农民，加上突厥奴隶主贵族频繁入侵，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日趋激化，分散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规模农民起义正在酝酿。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反动统治者拚命尊孔崇儒，把孔丘这具政治僵尸捧上“文宣王”的宝座。而地主阶级中社会地位比较低的阶层要求变革社会现状，儒法两家摆开了各自的阵营。公元八〇五年，也就是李贺十五岁那年，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革新集团掌握了政权，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打击藩镇割据和儒家守旧势力。这场改革运动虽由于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仅维持六个月就失败了，但却给年青的李贺以强烈的震动。他带着童仆，“背一古破锦囊”，四出考察，“偶有所得，即书投囊中”<sup>③</sup>，这使他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带着浓厚的法家战斗气息。

李贺十八岁（一说二十岁）那年，入京考进士，就他对诗歌的造诣说，无疑是能中举的。但当时的儒家之徒，竭力鼓吹“避讳”，李贺就成了儒家的直接受害者。原来，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同音。假如李贺中了进士，被叫为李进士，这岂不是触犯了君父“大讳”了吗？！这一理由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但在唐代，李贺竟然因此被剥夺了应举考试的权利！这场风暴的袭击，使李贺加深了对儒家路线的痛恨和对腐败现实的不满。当时，被贬在边远地区的革新派骨干柳宗元、刘禹锡，正在同儒家代表韩愈等进行不屈不挠的论战。有人劝李贺去向皇帝“请恩泽”，投靠专权的宦官与割据的藩镇，参与对革新派的思想围剿，李贺坚决拒绝。他在诗

中写道：“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sup>①</sup>他不和反动儒生妥协，坚信终有一天会实现扫除黑暗，迎来光明的理想，因此，决不做那独坐悲叹的可怜虫。为了这种革新理想，他密切注视韩柳围绕统一和分裂、尊儒和反儒的大论战，以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用诗歌作武器，在政治上配合柳宗元坚持法家事业、反对分裂割据的斗争。

李贺同柳宗元的政治主张是一脉相通的。他痛恨“举头为城，掉尾为旌”的藩镇割据势力。经常为一统河山被藩镇割据势力搞得支离破碎而“忧眠枕剑匣”，寝食不安。在《公无门出》中，他愤怒地写道：“我虽跨马不得还，历阳湖波大如山。毒虬相视振金环，狻猊（suānní 酸倪）猊猊（yànyǔ 亚雨）吐磷凝。”“毒虬”、“狻猊”等，形象地刻画了藩镇割据势力的凶恶，反映了李贺对反动势力的愤怒声讨。李贺坚决主张维护国家的统一，抵抗突厥奴隶主贵族的入侵。在《南园》中，李贺大声疾呼：“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强烈的统一愿望激励着他，统一前景吸引着他做一个削藩平乱的战士。他要“见买若耶溪水剑”，拿着这把名剑跟善剑的人学剑术，亲自带兵打仗，削平藩镇，统一全国。他痛斥那些儒家蠢虫，只会在《四书》《五经》中讨生活：“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对“豪彦骋雄材”“唯愁裹尸归”的英勇抗战的边防守将，他寄予热情的礼赞和深切的悼念：“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些诗句，同柳宗元的《封建论》交相辉映，表达了法家人物维护国家统一的强烈

愿望。

柳宗元、刘禹锡是战斗的唯物论者。他们给狂热鼓吹“天命论”的韩愈之流以有力的回击，用“人定胜天”的唯物论思想捍卫了法家路线的理论基础。在这场斗争中，李贺用诗歌配合作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李贺指出，沧海桑田才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规律，哪里有什么天的意志！韩愈不是扬言：“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吗？李贺偏偏要尖锐地诘问：“神君何在，太一安有！”“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神君”、“太一”、“任公子”，都是神仙的名字，李贺认为，这些神仙是根本不存在的。唐宪宗一上台，就下诏求仙，进一步促使了儒、道、佛的合流。李贺顶住这股逆流，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宣判了“神仙”的死刑，李贺说，假使天上有神仙的话，那么，“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就是说，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的王母娘娘的桃花也该谢了数千次，“长生不老”的彭祖、巫咸也该死了好几回了，真可谓“几回天上葬神仙”。更何况神仙、鬼怪都是人间的蠢虫凭空捏造出来的。李贺在《神弦》中，作了这样淋漓尽致的揭露：阴云密布，旋风呼啸，一群人围着一个女巫，等待神鬼的降临。女巫浇了祭酒，弹起琵琶，众人也跟着烧香击鼓，一会儿，女巫宣布海神山鬼来了。人们毛骨耸然、目眩神晃，一直搞到日落西山，女巫才送走神鬼。这真是：“神兮长在有无间，神嗔神喜师更颜”。明明都是人间的蠢虫在装神弄鬼，那会有真的神仙、鬼怪！这些无神论的战斗诗篇，把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论思想形象化

了。当然，李贺因为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的需要，在诗中有时也写神仙、鬼怪，但这同他哲学上的无神论是不矛盾的。

年青的法家诗人李贺，以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打破了儒家对孔家店的迷信。中唐时，对孔家店迷信到如痴如狂地步的，莫过于韩愈了。韩愈“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他一面凄惨地哀叹孔孟“道统”的“久荒”，一面恶狠狠地叫嚷：“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李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写了著名的《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热情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无名石工的形象：“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诗歌接着描写了那紫石砚是怎样美丽、精致和细净，最后大胆地向儒家之徒当头棒喝：“孔砚宽顽何足云？”孔丘在世时，尚无笔砚，“孔砚”是后世儒家捏造出来的所谓孔丘用过的砚台。又臭又硬的孔庙石砚，从此成为儒家的一件神物。李贺让“踏天”“割云”的石工把它踩在脚下，真是大快人心！难怪儒家之徒嚎叫李贺“太无忌惮”了！

李贺这种敢于破除迷信的风格，还突出地表现在对“避讳”的憎恶上。据《剧谈录》记载，有个卖力地倡导“避讳”起家、后来当上宰相的儒生，曾登门拜访过李贺，企图以自己当官的“诀窍”引诱李贺放弃反儒的战斗精神。李贺拒不会见，叫门人传呼道：“明经擢弟（即通达孔孟经典而做了官），何事来见李贺？”那个儒生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离开了李贺家。李贺在他的诗篇中，更是毫无避讳。即是对皇帝，他也直称其名。如称汉武帝为刘彻、刘郎。在《苦昼短》中有“刘彻茂陵多滞骨”的诗句；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称“茂陵刘郎秋风客”。

李贺对汉武帝是肯定的，他敢于直呼其名，是为了同儒家的“避讳”唱对台戏，破除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框。李贺的这种势如破竹的风格，是法家的宝贵传统，在封建社会中，乃是十分难得的。

诗言志。李贺把他尊法反儒的思想，熔铸到二百多首诗篇中。这些诗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塑造了历代法家代表的光采照人的形象，通过咏赞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将相来寄托他改革政治的理想。李贺每以屈原自命，“斫取青光写楚辞”，写出一篇又一篇要求变革现状的诗篇，但他比屈原坚强，他说：“屈原沉湘不足慕。”他要同儒家之徒和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战斗到底。李贺写了一首叫《公莫舞歌》，赞颂大法家刘邦战胜项羽的正义性。李贺以气势雄伟的诗句描绘刘邦大军直捣咸阳的壮观：“芒砀云端抱天迥，咸阳王气清如水。铁枢铁键重束关，大旗五丈撞双环。”诗中又无情地鞭挞了实行复辟倒退的项羽及其军师范增、走卒项庄：“腰下三看宝玦光，项庄掉箭拦前起”，在“鸿门宴”上策划、演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丑剧。李贺大声喝道：“材官小臣公莫舞”，项庄这个小子，不要剑拔弩张的，“汉王今日颁秦印”，刘邦路线正确，又比项羽先入关中，理应他取代秦二世称王。在《感讽》中，又颂扬继承刘邦法家路线的汉文帝和贾谊：“都门贾生墓，青蝇久断绝”。“皇汉十二帝，唯帝称睿哲”。把孔孟之徒比作“青蝇”，专门诋污法家，这是在影射唐代儒家对王叔文、柳宗元等的迫害事件。在《马诗》中，李贺生动地描写了唐初法家李世民年轻时起兵反隋、创建唐朝的伟业：“唐剑斩隋公，卷毛属太宗。莫

嫌全甲重，且去捉飘风。”这实际上是在向昏庸的唐宪宗棒喝，希望他以唐太宗的法家气度治理国家。

“秦王骑虎游八极，  
剑光照空天自碧。  
羲和敲日玻璃声，  
劫灰飞尽古今平……”

气势磅礴的《秦王饮酒》，栩栩如生地塑造了秦始皇的英雄形象。李贺用积极浪漫主义的手法，把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伟业比喻为羲和（传说中替太阳赶车的神）驱赶着太阳运行，敲着光焰万丈的太阳发出玻璃的声音。一个“敲”字形象地写出了秦始皇驾驭天地的伟大气魄。李贺满腔热情地高呼“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使“劫灰飞尽古今平”，好极了！在另一首诗《白虎行》中，李贺描绘了秦始皇生气勃勃的战斗风貌：“火鸟日暗崩腾云，……烧书灭国无暇日”。对秦始皇的歌颂，说明李贺同柳宗元一样，是多么渴望消灭藩镇割据和恢复国家统一啊！这两首精采的诗篇，使人们很容易联系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的诗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贺比李白晚诞生九十年，他不愧是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尊法反儒倾向的积极继承者。

当然，由于李贺没有直接卷入王叔文、柳宗元变法斗争的漩涡，参加实际斗争比较少，他的尊法反儒思想没有能达到柳宗元的高度。正如鲁迅在《豪语的折扣》中说的，李贺想“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善剑者）”，然而“他到底没有去”。他曾以高屋建瓴之势突破了儒家诗人为反动统治者歌功

颂德或低吟于风花雪月之中的所谓“馆阁体”的框框，有时却又留下一条没落贵族的尾巴，对反动统治者抱有幻想，陷入迷惘与苦闷。鲁迅在评论李贺时还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李贺渴望变革、憧憬未来，但他找不到一条“雄鸡一声天下白”的道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的诗歌中还杂有不少封建性的糟粕，需要我们批判地对待。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光辉诗篇中，以这两句富有哲理、意味深长的诗作结尾。“天若有情天亦老”，出自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是对韩愈以“天命论”为理论根据的“道统说”的有力批判。毛主席赋予李贺的诗句以崭新的思想，指出：犹如自然界的沧海桑田的变化，人类社会的革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毛主席的诗句，又是对年青的法家诗人李贺尊法反儒的思想和破除迷信的风格的热情肯定，为我们树立了“古为今用”的优秀典范。

---

注：① 《沧浪诗话》。

② 杜牧：《〈李长吉集〉序》。

③ 李商隐：《李长吉小传》。



# “天街踏尽公卿骨”

## ——唐末农民反孔斗争

“轰轰昆昆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公元八七五年，一支农民起义大军，浩浩荡荡冲进曹州城。曹州城里，到处可以看到起义军将士激动地张贴战斗檄文，那上面，揭露唐王朝官吏贪残，赋税繁重，赏罚不平，历数反动派罪行，说的都是人民大众的心里话。檄文象火上浇油，整个曹州城沸腾起来了。这是唐朝末年王仙芝领导的河南农民起义的第二年，农民起义军已从开始的几千人，滚雪球似的发展到几万人。这次大起义，是唐朝后期社会阶级斗争的总爆发。

唐代的由盛转衰，是以唐玄宗尊孔崇儒为标志的。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连年混战；官僚大地主与宦官狼狈为奸，社会政治十分腐败。曾有一批批地主阶级革新派起来奋斗，但是，永贞革新一百多天就流产了。淮西之捷后，唐王朝也未能根除藩镇割据这一祸害。晚唐诗人李商隐沉痛地长叹：“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sup>①</sup>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裴度、李愬等具有法家思想的文官武将，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可以千方百计为“疮疽”寻找膏药，却决“不敢抉其根”。导

致唐王朝日益衰败的社会“疮疽”，并不是法家的膏药能贴好的。革命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唐末农民大起义，千千万万双贫苦农民粗壮的手挥起刀矛，对准疮疽猛戳猛挖，法家们不能解决、不敢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王仙芝一起兵，就在自己的帅旗上写下“天补平均大将军”七个大字。那时的唐朝，小皇帝僖宗李俨在一群宦官、大官僚的操纵下，推行儒家路线，天下昏暗，黑夜沉沉。门阀士族兼并土地尤为厉害，“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sup>②</sup>；加上藩镇割据的凶残压迫，“万户膏血穷，一筵歌舞价”，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千百年来，孔家店贩卖的是“尊卑有序，贵贱有别”，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作为天下通义，天，怎么会平得了？“天补平均”的口号，是反孔的利箭，直射反动的封建等级制度。天下不平，人民补；反动阶级利用孔孟之道来压，就要砸烂这个软刀子。曹州城中起义军的檄文，讲的都是要使人们过平等生活的愿望，受到人民大众的热烈拥护，“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也率领几千名战士，与王仙芝会师，汇成强大的革命洪流。起义军攻城夺县，开仓济贫，镇压豪富，散发财货。为实现“天补平均”的纲领而奋战。

天下不平，首先在于士家大族的为非作歹。汉魏以来出现的世家大族这股反动势力是根深蒂固的。虽然曹操、武则天等法家人物曾打击过，但没挖去老根。隋末农民起义扫荡过，但后来，他们又演变为唐代的庄园大地主。唐末农民起

义，担负起彻底摧毁这股恶势力的历史使命，他们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十年流动作战，在全国对门阀地主来了一次全面扫荡。起义军的革命行动，使大官僚、大地主闻风逃窜，家口散亡，千万顷霸占的土地，被起义军分给老百姓；传宗接代凭以做官的谱牒，被起义军一把火烧光。从此，门阀士族的世系、门第土崩瓦解了，“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sup>③</sup>五代以后的几百年封建社会，就再也看不见士族老爷们的臭威风了。消灭门阀制，是唐末农民起义的伟大功绩，它证明，孔老二鼓吹的“贵贱不愆”的剥削阶级等级观念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只有被剥削阶级才能打破。这是任何地主阶级改革家代替不了的。

天下不平，在唐朝还突出地表现在藩镇割据上。藩镇割据，是唐玄宗推行崇儒反法路线的产物。从藩镇割据一开始，地主阶级内部就围绕着统一与分裂的问题展开了儒法两家的尖锐斗争。柳宗元著名政治论文《封建论》，从理论高度对秦始皇以来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作了总结。后来，李愬一举荡平淮西，为反对藩镇割据和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法家的理论与实践远不足以对付庞大的藩镇势力，淮西之捷后半半个多世纪，又冒出了许许多多新的吴元济。这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成了唐末农民起义的主要目标。有个叫高骈的藩镇割据头目，凶狠残暴，在唐僖宗时历任地方节度使，一次杀人就几千，“以车载尸投之于江”。这么一条恶狼，受到唐末农民起义军狠狠收拾。起初唐王朝想凭高骈的凶残扑灭黄巢起义，故委以重兵。谁知在武装起来的农

民面前，高骈很快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六十万起义军冲进高骈驻防的淮南地区，“乘胜长驱，若涉无人之境”，一仗就斩了高骈悍将张璠。吓得高骈这条恶狼佯称得了风痹病，“畏怯不敢出兵”，只得上表向朝廷告急。在农民军的打击下，整个统治阶级“上下失望，人情大骇”，慌作一团。打下淮南后，黄巢率领起义军南征北战，继续扫荡割据势力。在他签署的讨敌檄文中，充满胜利豪情地写道：“我军从淮南打过来，赶高骈如同赶老鼠，你们休想顽抗了！”一路上势如破竹，藩镇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蹶不振。唐朝灭亡后，经过五代十国短暂的分裂时期，宋太祖赵匡胤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从此宋、元、明、清基本上都是统一的集权制国家。唐末农民起义的功绩不可磨灭。

在与反动阶级浴血奋战中，唐末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他们的政治觉悟也在飞快提高。王仙芝牺牲后，黄巢接过了他手中“天补平均”的战旗，改上了“冲天”两字，被推为“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要天下平均，要天下太平，靠“补”还不能解决问题，要下定决心去“冲”破它！关于“天”，孔孟及其信徒是经常用来吓人的，什么“畏天命”哪，无非就是要人民在吃人的剥削制度下逆来顺受、安分守己。法家反天命，从荀子的《天论》到柳宗元的《天说》，都宣布不信天命，但是他们的阶级地位，使他们不可能把批判天命观同用革命暴力批判剥削制度直接结合起来，与广大劳动人民相比，他们的批判必然是软弱的。当然农民的革命思想也是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程度、阶级斗争的实践而逐步提高的。从“补天”到

“冲天”，这个飞跃很了不起，迸发出新的灿烂的反孔、反压迫的思想火花。唐末农民起义，决不仅为打击几个世家大族和几处藩镇割据势力，他们要推翻整个李唐王朝，冲破封建制度的昏天黑地！请读一读黄巢借菊咏志的“冲天”诗吧：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他把自己的阶级比作傲霜竞发的菊花，把反动阶级比作凋残的百花，一旦金风飒飒，统治阶级就会“无可奈何花落去”，愤怒的人们将以“冲天”的气概攻入李唐王朝反动统治的老巢长安，黑暗世界就会变成香气浓郁的农民阶级新天地！剥削阶级的词客诗人，曾写过成千上万首菊花诗，抒发他们的情怀，可黄巢的诗篇壮志凌云，气吞霄汉，压倒了诗坛上所有的咏菊名作，它是农民阶级冲垮唐王朝的宣言，它是起义军夺取政权的胜利预言。“冲天大将军”的战旗伴随“冲天香阵透长安”的战歌飞舞，鼓舞着百万农民起义军以“冲天”的劲头英勇奋战！

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是统一的。金风飒飒、菊花怒放的日子来到了。公元八七九年，黄巢以“义军百万都统”的名义，发出了推翻唐王朝的宣言。起义军登上几千只木筏，全线渡江，一路上，起义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在扫荡士族、藩镇、贪官污吏的同时，铁拳猛砸孔孟之道。看：孔老二泥塑木雕的偶像从宝座上被拉下来了；唐王室十二库中的儒家经籍“一时散

失”。曲阜的孔老二子孙“宗族散走，死亡略尽”。一批民愤极大的反动儒生遭到了农民军的镇压。福州有个儒生名叫周朴，被起义军抓住，黄巢教育他改邪归正，他竟死不改悔地叫嚷：“我尚不仕天子，安能从贼！”被起义军一刀砍了脑袋。反动儒生纷纷惊呼：孔孟的庙宇“经黄巢之乱，存者无几”了！在唐朝，柳宗元的文章，李贺的诗篇都向孔孟之道开过炮，但是对孔孟之道打击最厉害的，还数这次黄巢起义！

公元八八〇年，冲决了孔孟之道网罗的农民起义军终于胜利跨进了长安城门。唐僖宗抱着宰相大哭一顿，向四川狼狈逃窜，他伏在瘦马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简直是吓破了胆！“百花”凋零，长安城中弥漫着菊花的冲天香阵：起义军将士穿着鲜明的军装，“甲骑如流，辎重塞塗，千里络绎不绝”，农民军统帅黄巢一身戎装，雄姿英发，登上含元殿，宣布农民政权诞生，“国号大齐”。“齐”，削平了剥削阶级森严的等级制，起义初期“洗濯朝廷”的壮志今天终于实现了！起义军激动地向老百姓们说：“黄王起兵，为的是劳苦大众，不象姓李的皇帝欺压人民，大齐政权是穷人的，你们尽管挺起胸来吧！”在这革命人民盛大的节日里，黄巢无比兴奋地宣布：“禅让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要推翻暴政，只能象商汤放逐夏桀那样，采取暴力，这是势所必然的！”孔老二那套“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全给造反农民抛进了垃圾堆。一小撮李唐王朝的孤臣孽子不甘心灭亡，猖狂地在农民政权尚书省门口写反动诗词，攻击“大齐”政权使“贵落深坑贱出泥”，“扶犁黑手翻持笏”，并叫嚣封建等级制“平不得”。起义农民满腔怒火，为保卫鲜血

换来的江山，立即开展了一场反复辟的扫荡。那个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的唐朝大将张直方，阴险地耍两面派手法，假投降，真反扑，在家中的夹壁里窝藏一大批官僚贵族，被黄巢亲自领兵搜捕，一网打尽。起义军采取严厉手段镇压反革命，“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三千多名反动儒生被依法处置，威风扫地。就连宰相豆卢瑑、崔沆等反动头子，也逃不了午门斩首的厄运。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唐政府的法律已被推翻，威权已被捣碎，唐帝国简直是已经整个儿被黄巢毁灭了。”这就是目击这次大起义的外国商人的观感。<sup>④</sup>“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sup>⑤</sup>这种使革命农民扬眉吐气、反动阶级心惊胆战的革命行动，只有在农民的大起义中才能出现！

唐末农民起义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攻入长安后又没有乘胜追穷寇，结果在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是起义军坚强不屈地坚持了十年革命战争，歼灭了唐末大量的军阀武装，镇压了一大批反动豪强，狠狠扫荡了孔孟之道，它的威力，是法家的改革根本无法比拟的；它的伟大业绩，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永远在历史上熠熠放光！

注：① 《李义山诗文全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② 《陆宣公集》卷二十二。

③⑤ 韦庄：《秦妇吟》。

④ 参看《苏莱曼东游记》。

# “祖宗之法不足守”

## ——北宋王安石变法

北宋时，被革命导师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公元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年），曾领导过一场著名的变法运动。后来，变法被顽固派扼杀了，王安石满腔悲愤写下一首《读史》诗：“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黷（dàn 淡）阍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这首诗借史咏志，恰好道出王安石一生的政治抱负和变法失败的愤慨心情。然而，千秋功罪，自有评说。拂去被一小撮儒家之徒散布的“纸上尘”，王安石变法毕竟是儒法斗争史上灿烂夺目的一页！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句曾作为王安石变法旗帜的口号，今天早已被人们所熟知，它闪耀着法家思想的光辉。可是这曾作为王安石变法旗帜的“三不足”口号，在当时的思想界却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一天，宋神宗看到几个思想保守的大臣挤在一堆，叽里咕



嘈地窃窃私议，不知谈什么。他便发问道：“你们在议论着什么新鲜事，说给我听听吧！”过了半晌，为首的一个大臣才吞吞吐吐讲出了关于“三不足”的“奇闻”。说完，还吐了下舌头，流露出既恐惧又仇恨的心理。宋神宗乍一听也未免有点吃惊，急忙找王安石问：“您最近可听说过‘三不足’这句话吗？叫什么‘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王安石从容一笑：“陛下不用担心，这‘三不足’依臣看来并没有错：只要干的事合乎正道，那种流言蜚语又有什么可顾忌的？至于祖宗不足法，更是天经地义。一个皇帝本身还要好几次修改自己的法制呢！后代子孙变法更有理了！”一席话说得神宗连连点头，转忧为喜。从此，王安石就公开把这“三不足”的反儒变法口号，用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作为一生奋战的坚强信念。“三不足”中，“祖宗之法不足守”是核心。“不足守”，就要变。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代进入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宋王朝的大官僚地主统治集团，推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政策，纵容大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田都给大地主霸占了。当时，我国北方契丹贵族的辽政权和西北部党项贵族的西夏政权经常向宋朝进行武装挑衅。可是当权的大地主阶级保守派不敢抵抗，却奴颜婢膝，割地求和。每年向侵略者交纳大量财物，以换取朝廷的苟安。投降主义造成的严重财政危机统统转嫁在广大农民身上。本来宋朝的阶级矛盾一直很尖锐，从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农民反抗斗争更是“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潜伏

着深重的危机。当时朝廷分成两派，一派是司马光为头子的儒家顽固派，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反对任何社会变革，力图用孔孟儒家思想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另一派，就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改革派。王安石在青年时代，曾游学南北，担任过下级地方官。接触社会实际，使他痛感北宋“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国势，鄙视那些当道的“俗儒不知变”。还在鄞县当知县时，年青的王安石就曾试行过“变”的方针。他带领人民修堤堰，兴水利，开办学校，建立保甲制，还把官府库存的积谷贷给农民，鼓励大家努力增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王安石很兴奋，他希望全国都来变一变，他写了一篇万言书，交给当时的皇帝仁宗，慷慨陈词，强烈要求变法，“改易更革”。但宋仁宗没有理他，直到仁宗的孙子神宗赵顼当政，才采用了他的主张。

司马光要守祖宗之法，王安石要变祖宗之法，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以儒法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便直接反映为“荆公新学”与反动理学的对立。“荆公新学”是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汲取法家思想而创立的一个进步学派，“三不足”就是它的基本思想。在反对新学的斗争中，司马光一派的思想代表程颢、程颐发展了孔孟之道，形成唯心主义的理学，这是儒法斗争在宋代的继续。

二程把王安石的“新学”视为“今日之大患”。为了反对新学和变法，他们抬出孔丘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来与“三不足”对抗。把孔孟的天命论，发展成“天即是理”的反动理学，还把“理”与“礼”直接挂起钩来，胡说“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也”，攻击王安石变法破坏了礼治，违反了天理。司马光更是疯狂叫嚷违反天命，“必有天灾”，要受天刑。有一年，河北地区九个月没有下雨，司马光一伙大钻自然灾害的空子，别有用心地画了一张凄凄惨惨的“流民图”献给神宗，火上添油地造谣天灾是变法带来的，叫嚣“去安石，天乃雨”。“天灾”、“人言”，并没有把王安石吓倒，他对神宗说：“自然界旱涝灾害是经常有的事，就是尧、舜、成汤也不能防止。陛下即位以来，连年丰收，现在虽然大旱，也没有什么可怕，要紧的是‘修人事’，抗天灾。”又有一次，陕西省华山因地震崩下几块石头，儒家之徒文彦博立即在上朝的时候攻击王安石。他耸人听闻地嚷着：“不得了啦，华山崩了！全因为新法祸国殃民，老天爷用天意示警了！”王安石藐视地扫他一眼，迎头痛击：“天地与人事毫不相关，我不相信‘天人感应’！实行新法为的是抑制兼并，要说华山之崩是‘天意示警’的话，那正是惩戒你们这帮为非作歹的家伙！”当下把这个小丑驳得瞠目结舌，狼狈不堪。

王安石继承荀况以来法家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破旧立新，才能前进。王安石的革新变法主张，受到司马光一伙的疯狂反对。司马光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他骂王安石新学“首倡邪术”，变法是“违法易常”，是个该杀的“民贼”。在《奏弹王安石文》中，他咬牙切齿地宣布自己与王安石“犹冰炭之

不可共器”，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主子出了马，喽罗们也紧锣密鼓，齐声吆喝。司马光死党吕海攻击王安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僻而坚”，妄想袭用孔老二屠杀少正卯的卑劣手段。另一个死党范纯仁，则公开把王安石比作商鞅，说他“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他们犹如一群疯狗，恨不得一口把王安石吞下去。不过，他们的恶言，也从反面道出了真相，王安石尊法反儒，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家。面对群犬乱吠，他挥笔写下歌颂商鞅的著名诗篇：

“今人未可非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

在这里，他不但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商鞅，迎头痛击儒生们的谰言，而且对自己作为法家路线的继承、捍卫者感到无比自豪。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正是在法家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王安石发扬商鞅“无顾天下之议”的精神，领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声势最大的一次变法革新运动——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针对宋朝的积贫积弱，在变法中抓住两大课题：理财与整军。北宋大地主疯狂的兼并，不但弄得“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而且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进一步缩小了赋税的来源，造成财政危机。理财，就是调整封建生产关系，是当务之急。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儒法斗争，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变法

前，在理财问题上，司马光与王安石发生过一次激烈的辩论。那天，宋神宗和大臣们一起商议如何克服“国用不足”的财政危机，王安石说：“国用不足，是因为过去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本是个守财奴，这时却装作一副“罕言利”的假正经，不以为然地插嘴：“靠理财有什么用，只不过鸡零狗碎地挣那么点钱，反把百姓给坑苦了！”王安石严肃地驳斥道：“不对！我说的‘善理财’，是要不加重老百姓的赋税而使国家富强。”司马光又气又急，忍不住破口大骂：“岂有此理！‘善理财’就是设法与民争利，比加赋还狠！这全是当日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胡言，陛下别信他！”王安石寸步不让，英勇反击：“就是桑弘羊怎么样？能够变通天下财富，治国强盛的，后世就数桑弘羊了！”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年），宋神宗批准变法。王安石首先建置三司条例司，具体负责各项变法措施的落实。几年间，“农田、水利、青苗、均输等新法，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相继并兴”。新法的推行，引起了革新与守旧两派之间一场大斗争。

变法的一个主导思想，是“损有余以补不足”<sup>①</sup>，打击与抑制大地主阶级特权。过去只有老百姓出役效力，而大官僚大地主却享受着免役特权，而今王安石制定“募役法”，按财产分等出钱。象河南府就命令大官僚富弼出“助役钱”，本来是为富不仁、一毛不拔的富弼，这下只好乖乖地掏腰包。“尽地力之教”，向来是法家的优良传统，王安石根据过去在鄞县修水利的经验，制定“农田水利法”，大兴水土之利。熙宁三年到八年短短五年，全国兴修水利一万多处，可灌溉三千多万亩土



地。为了鼓励生产，王安石提出“青苗法”，规定在青黄不接之际，由政府向农民贷放钱粮，用以抵制大地主高利贷盘剥。他还组织人力丈量土地，挖出了长期被大地主瞒产漏税的大批土地，增加了朝廷的税收。

在这同时，王安石还着手“整军”，改革宋王朝腐败的军事制度，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作好反击侵略者的准备。北宋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大地主的不抵抗主义，使辽、西夏贵族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中原地区大片土地被侵占。但是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却从未放下过反侵略的刀枪。他们“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童习鞍马，妇女能弯弧”。变法运动中的整军政策，将人民长期的反侵略斗争推向高潮。司马光一伙卖国求荣的大儒，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整军政策深致“契丹之疑”，扯着“屈己之愧小，爱民之仁大<sup>②</sup>”的降旗扰乱人心，破坏抗战。当他们听到侵略军打进来时，又怕刀枪不长眼，要了自己的脑袋，吓得抖成一团。王安石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无比藐视侵略者。他说：“契丹内部四分五裂，而我们人众地广，哪有怕它之理！”“整军”抗战的信念从未动摇。变法中王安石击退了司马光一伙干扰破坏，坚定不移地推行使国家富强的方针。他设置了“军器监”，制造大批精良武器；他提出用征兵制代替佣兵制。另外，他还组织民众修筑河北城池，置河北三十七将……。在他的推荐下，宋神宗任用法家沈括多次出使辽国，展开唇枪舌战，逼得敌人收回无理的领土要求。王安石积极支持名将王韶“先取河湟”的战略方针，用武力从侵略者手里夺回大片失地。在王安石的爱国主义变法路线下，北

宋王朝长期以来的贫弱之势有所扭转。

王安石曾写过一首题为《元日》的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欢度佳节的绝唱，也是庆祝变法胜利的赞歌。王安石变法，正好比震天的爆竹，炸开了儒家统治的死气沉沉的局面，祖宗之法变对了！但是司马光一伙是绝不会甘心新桃换旧符的，他们聚集在孔孟复古倒退旗帜下，不择手段地破坏变法，攻击王安石。整个变法期间，骂变法的上疏、万言书如同雪片似地飞舞，汴梁街头纷传流言蜚语，顽固派还唆使乌合之众哭闹“请愿”……。司马光跳得最凶，一天，他来到神宗那儿，见四下无人，便放肆地攻击王安石什么事都一窍不通，却一味刚愎（bì必）自用，几年变法，弄得天下大乱，鸡犬不宁。当下受到神宗的严厉训斥：王安石不求高官厚禄，变法是为国图强，不是沽名钓誉！司马光碰了钉子不死心，回家后摇动秃笔，给王安石写了封又臭又长的信，操起“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条大棒，咒骂革新，威胁王安石。王安石只冷冷地回了张条子。紧接着司马光又发了第二封信，妄图逼王安石屈服。

王安石忍无可忍，以不到四百字的篇幅，词锋锐利地回了一信，即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他义正词严，对“四大罪状”一一批驳，痛骂司马光一伙不恤国事，苟且偷安，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们死守孔孟儒家之道的反动本质，斩钉截铁地表示要将新法推行到底，给予司马光一伙狠狠一击！

在那么一个儒家正统思想严密统治的时代，王安石敢于高举“三不足”的旗帜，变祖宗之法，不能不说是黑夜里的闪



光。“落尽群花独自芳，红英浑欲拒严霜。”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的七年中，他曾两次拜相，两次罢相，为了革新事业，他始终抗击着顽固派严霜般的袭击，以“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sup>③</sup>的气概，坚持斗争到底。但是，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的没落，决定了王安石变法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必然要失败，王安石本人由于阶级局限性，也根本开不出解决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药方。他的变法毕竟是软弱狭隘的，但当时儒家倒退思想已占统治地位，即使这样的革新，也遭到大地主顽固派的百般阻挠。神宗死后，顽固派高太后当政，司马光当宰相，立即宣布所有新法统统废除，一切复旧。变法中千辛万苦夺回的失地，全部拱手奉献给侵略者。鲁迅先生曾指出：“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这段话正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深刻总结。

---

注：① 《王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②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三，《北边劄子》。

③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

## 沈括和《梦溪笔谈》

一〇七二年，王安石变法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新旧两党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这年，一连九个多月没下一滴雨，河北平原土地龟裂，灾情十分严重。顽固派司马光一伙幸灾乐祸，整天在朝野上下散布流言蜚语，胡说这是老天爷对变法运动的惩罚，叫嚷“去安石，天乃雨！”一次，连着阴了好几天，突然又出了个烈日炎炎的晴天，顽固派更加得意，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司天监的中年官员力排众议，断然地说：“雨候已见，期在明日。”啊，明天就有大雨！顿时，朝廷上活跃起来，儒生们威胁说：“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岂复有望？”言下之意：老天爷是开不得玩笑的，要是明日无雨，可是欺君之罪啊！那位官员镇静地把自己通过新仪器观测到的气象情况分析给大家听，对科学一窍不通的儒生只得哑了。第二天，果然雷声隆隆，闪电划空，一场倾盆大雨浇灭了旱魃的凶焰，更把儒家的谣言冲得一干二净。那位预报雨期的便是新任司天监长官沈括（公元一〇三一——一〇九五年）。

不久前，王安石罢黜了用所谓“天久阴，星失度”的“天象”来攻击变法的儒家之徒亢瑛，任命沈括接任司天监长官。沈

括一进司天监，便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一下子罢免了六个“侈谈玄理”、“拘泥术数”的儒家之徒，破格提拔“布衣”出身的天文学家卫朴。他创造新历法，改进了浑天仪等天文观察仪器，对日蚀、月蚀的成因和月亮的盈亏作了科学的说明。这使那些信奉孔丘陈腐说教的儒家之徒暴跳如雷，他们竟“屡次搦起大狱”，企图对他进行政治迫害。沈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用大量的天文资料论证“物理有常有变”，自然界的变化有它自己的规律，根本不存在对变法进行“警告”的“天象”。这样，法家路线指导下的天文研究机构，就成了变法斗争的有力支持。大雨预报，就是一例。

沈括，这位十一世纪的进步政治运动——王安石变法所造就的杰出法家和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始终挺立在变法斗争的前列，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开展科学活动，又用自己的科学活动卓有成效地为法家路线服务。

沈括旗帜鲜明地站在革新派阵营的前列。被顽固派列为沈括第一大“罪状”的，是他积极协助王安石制定免役法。免役法规定：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大地主必须缴纳募役钱。这是反兼并的重要措施。司马光首先跳出来，在臭名昭著的《致王介甫书》中，大叫免役法“常人皆知其不可”。司马光的死党文彦博更纠集了一千多人进京闹事，反对免役法。在顽固派的阵阵喧嚣声中，有人问沈括：“免役法颁布已经这么多时候了，民间的骂声至今未绝，这是什么缘故？”沈括明确地回答：“这不奇怪，骂免役法不好的，尽是一些士大夫和富商，他们过去一

直享受免役权,现在要他们与老百姓一样,他们能高兴吗?”与王安石一样,沈括的结论是:儒家之徒的诋毁“无足恤”!被顽固派列为沈括又一大“罪状”的,是他出使辽庭,与侵略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〇七四年,契丹族侵略者给宋神宗发了一封国书,要北宋满足他们的领土要求,契丹的信使蛮不讲理地赖在汴京不走,借以要挟。在这种情势下,宋神宗派遣沈括使辽,与敌方谈判,这可是件棘手的事。司马光一伙,一听到契丹来闹,早吓昏了,儒生们对付侵略的唯一办法是屈膝投降,他们既不敢打,也不敢去谈。沈括出使的决定宣布后,有人问沈括怕不怕,沈括坦然一笑:“要说怕,只怕自己能力不足,至于个人的生死祸福,早就置之度外了,我决心用生命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宋神宗召见沈括,讨论了有关交涉的一些事后,问道:“敌人居心叵测,心狠手辣,万一中途生变,危害来使,你将何以自处?”沈括坚定地回答:“臣以身许国,宁可粉身碎骨,决不辱使命!”不久,神宗收到了沈括哥哥转来的沈括预先写好的遗奏,上面提供了应敌的良计,并且又一次表示了决心,字里行间,闪烁着法家爱国主义的光辉!沈括在契丹埋伏着刀斧丛的酒席筵上,与侵略者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巧妙地引用辽人自己的文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斗得侵略者理穷词屈。谈判中,有时契丹一方多至千人,沈括依然是胸有成竹,岿然如山,最后出色地完成使命,逼得契丹收回蛮横无理的领土要求。

正因为沈括一直处在斗争漩涡中,所以他敏锐地掌握着王安石变法的脉搏,最理解斗争的需要。沈括是按照政治斗

争的需要确定科学研究课题的。他不象那些书斋里的学者，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他所研究的都是政治斗争迫切需要的重大课题，所以他的科学活动和政治活动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

斗争需要他研究农业，他就研究农业。早在变法前，沈括任沭阳和宁国县官时，便立志要改变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他研究淤田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主持修治万春圩的工程，开辟了大片良田。圩田工程触犯了顽固派兼并土地的既得利益，他们造谣惑众，气势汹汹威胁说：“水中有蛟龙，堤岸要崩塌”。为了驳斥顽固派的谣言，他经过深入调查，运用水利学理论的深刻造诣和实际工作经验，写了《圩田五说》，指出圩田堤岸个别地方的崩塌是由于“潭深”，完全可以用措施防止，“非所当怪也”！变法期间，他主持汴河的水利建设。“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当时，流经北宋首都汴梁的那段黄河支流，叫做汴河。它挟带着大量泥沙，沉淀到汴梁的河床，年久淤积，影响京师水路运输。同时，水高于田，经常给人民带来江河横溢的灾害。因此，治汴工程关系到发展交通运输和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反侵略提供物质基础的大问题。这项工程进行两年后，尽管取得不少成绩，但却引来了司马光一伙的攻击。有人无中生有，捏造淤田淹没庄稼房屋的谣言；有人冷嘲热讽，说淤田薄得象面饼。甚至当发生庆州兵变，商议对策的时候，有个家伙竟十分荒唐地把罪责推到汴河淤田上头，当场受到王安石的痛斥。苏轼曾上书神宗，胡说：“汴水这么脏，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不能种稻。现在变法，千方百计修水利，万一堤防决口，洪水滔天，到那个时候，

就是把倡议新法者的肉吃了，也无济于事！”但是，沈括不顾儒家之徒的反对，脚踏实地地领导治汴工程。他从汴京上善门直到泗州的淮口止，踏勘、测量了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这正是汴河最紧要的地段，为了对新法负责，沈括真可谓一丝不苟。他认为单凭水平、望尺等仪器，难免会发生差错，便大胆革新技术，创造出“分层筑堰”的新测量法，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是个首创。

斗争需要他研究军事，他就研究军事。一〇七四年，沈括被任命兼管军器监，这是一个为加强国防而设的新机构。加强军器生产，实行军事改革，是王安石变法图强的一大关键。过去，沈括一直当文官，对军事接触不多，但为了加强国防，实现新法，他决心奋发图强，攻克难关。从此，沈括认真攻读古代各种兵书，对军事技术更是刻意讲求，不多久，包括阵法、城防、兵车、兵器的各门军事战略与技术，他都娴熟地掌握了，并使之上升为理论，编成《边州阵法》和《修城法式条约》两部反映变革思想的军事著作。为了制造“柔薄而韧”的铁甲，沈括亲自深入民间冶锻作坊，特别研究了熟铁和钢的性能。就这样，他在军器监作出了很大成绩，一年多来，精良军器比过去增产数十倍，“可足数十年之用”。后来，沈括到延州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直接承担了对付西夏劲敌、保卫宋朝边境的重任。他组织青壮年练习武艺，举行射箭、骑马比赛，奖励武艺超众者，使延州居民个个学习弯弓射箭，人人爱国热情高涨，边防实力大大增强。第二年，敌寇入侵，狼烟滚滚。沈括亲冒矢石，率师应战，围上一战，就歼敌七万。为了激励士气，沈括

亲自编了“凯歌”数十曲，用士兵中流传的通俗语言填写歌词，教兵士高唱：

“天威卷地过黄河，  
万里羌人尽汉歌。  
莫堰横山倒流水，  
从教西去作恩波。”

嘹亮的抗战凯歌伴随着胜利的金鼓之声，回荡山谷，直冲霄汉，震得侵略军和卖国贼心胆俱裂。在反侵略战争中，他还研究了牛皮箭套的特殊声学效应，“附地枕之，数里之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他在世界上最早制造了立体地图，这项重大的发明适应了反侵略斗争需要，在与辽的划界谈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沈括被视为新党余孽，谪居乡间，编于民籍。年近花甲的沈括，来到了镇江的梦溪园，面对青山绿水，壮志未已。他决心拿起笔，继续战斗。他将平日见闻谈论，发明创造，参加变法的实践写成文字，汇集成为一本综合性的书，这就是我国科学史上第一部重要著作——《梦溪笔谈》。《梦溪笔谈》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内容涉及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军事和工程技术等十分广阔的领域。

在这本书中，他比较注意发现和记录劳动人民对科学技术的卓越贡献。儒家从孔老二起都鼓吹“上智下愚”，根本看不见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才干。沈括反对这种谬论，他说：“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

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书中记载着不少普通工人的发明创造。如木工喻皓，是当时人民口碑传颂的一位“匠师”，著有《木经》。可惜这部工匠的著作与封建时代人民的无数创造一样，被地主阶级守旧派无情地扼杀了，只是由于沈括的《梦溪笔谈》，才使今天的人们知道《木经》的一些论述。又如河工高超，提出自己大胆创新的三节分压工作法，曾遏制住黄河决口的严重自然灾害，在那些专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正史里，休想找到这位聪明能干的河工的名字，而沈括却用赞美的笔调详细地写下了他的事迹。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梦溪笔谈》明确而有条理地记述了我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活字印刷的发明，那是当时一位名叫毕昇的“布衣”首创的，这个伟大的发明，在正史里又是找不到的，《笔谈》的记载成了唯一珍贵的史料。

《梦溪笔谈》还记述了沈括在许多自然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其中如磁偏角、凹面镜成像、隙积术、会圆术等物理、数学的好几个方面的发现，都比西方早数百年。难怪沈括的研究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要把他称作“科学史上的座标”。沈括察访浙东的时候，攀登上温州的雁荡山。站在乱云飞渡的雁荡顶峰，他看见丛岭峭拔，巍峨峥嵘，便合理推测出这些山峰的成因，是由于“谷中大水冲激”，这比英国人郝登的水蚀对山岳成因的理论早六百年。同年秋天，沈括察访河北西路。在高高的太行山上，他发现山崖之间有螺蚌壳和鹅卵石，感慨地说：“这里是过去的海滨啊！现在远离海已近千里了。这么看来，河北平原原来是黄河的泥沙构成的”。这要比西欧的达



文西研究地球海陆迁移早四百多年。“人间正道是沧桑”。沈括这些从自然界得出的丰富的科学材料，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王安石“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的正确思想，一次又一次痛击了司马光之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把沈括的科学活动同北宋的儒法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到，沈括所以能在十多门自然科学领域里有所贡献，是因为他有着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主张变革、前进的政治路线。“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法家的政治路线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儒家“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和唯心主义自然观“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沈括的每一个科学成就，都是冲破了孔孟之道的思想牢笼、参加了政治斗争才取得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的实践，在各门科学中批判儒家思想的流毒，是很有启发的。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沈括只是找到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作为自己政治和科学活动的指导，而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哲学，并没有能最终摆脱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今天，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指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方向，我们一定能够在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 儒家阴谋诡计的代表作

## ——《辨奸论》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南宋时期，儒家道学小丑邵伯温炮制的那篇《辨奸论》，便是这样的代表作。

邵伯温是北宋反动道学家邵雍的儿子。在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的儒家集团中，邵雍是一个摇羽毛扇的狗头军师，专门躲在阴暗角落里攻击王安石变法。不仅如此，此人还是个算命、看风水的祖师爷，他曾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掌握着什么“无字天书”，“指节可以观天，掌文(纹)可以察地”<sup>①</sup>，是个能通天地造化之机的活神仙，难怪后世靠算命打卦混饭吃的江湖骗子，都爱亮一块“得康节(邵雍)先师真传”的招牌。邵伯温忠实地继承了其父的衣钵，既造就了一个顽固不化的脑袋，又学会了全套骗术。年青时，刚混上一官半职，邵伯温就投身到大地主反变法的营垒里，上窜下跳，大肆鼓噪“复祖宗法度”，攻击王安石等革新派，很快成了司马光集团中后起的骨干，深得司马光赏识。

王安石变法运动被司马光一伙的黑手扼杀后，北宋国势急转，辽和西夏侵略者的铁蹄，儒家路线的倒行逆施，逼得北宋王朝一步步滑向亡国的深渊，终于在一一二七年，战火烧到了京都汴梁，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都成了金兵的阶下囚，北宋王朝就此结束了苟延残喘的历史。这就是所谓“靖康之难”。

北宋的灭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南宋时期，社会上很多人写文章，发议论，各抒己见，真是众说纷纭。然而得出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而且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着：凡是主张革新的人们，一致追忆“荆公之时，国家全盛”<sup>②</sup>，无限怀念王安石，他们激愤地指斥“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揭露这伙破坏变法的顽固派“最为大患”，是断送北宋王朝的祸根；而那些大地主阶级顽固派与儒家之徒，却无一不把亡国之祸归罪于王安石，胡说这是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带来的恶果，“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sup>③</sup>。他们还在话本《拗相公》中，十分卑劣地制造“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的反动舆论，竭力为儒家卖国投降主义开脱罪责。一时鸦聒雀噪，甚嚣尘上。邵伯温正是其中的一个急先锋。他以回忆北宋时期一些事情为名，炮制了一本《闻见录》，这是一本向王安石变法进行疯狂反攻倒算的变天帐。在《闻见录》中，他用冒名顶替、偷梁换柱的下流手段，假托与王安石同时的苏洵名义，抛出了大毒草《辨奸论》。

在《辨奸论》中，邵伯温袭用儒家造谣诽谤的传统伎俩，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运动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虽然只有五百来

个字，却充分暴露出他是一个死守儒家立场的江湖骗子加政治流氓。

《辨奸论》是怎么出笼的？邵伯温曾杜撰了一段离奇的故事情节：早在王安石变法前十多年的公元一〇五六年，苏洵来到京都汴梁，那时欧阳修见到王安石“党友倾一时”，声名满天下，便劝苏洵去结交王安石。但苏洵不以为然地说：“王安石嘛？我知道此人，这是个不近人情的怪物，看着吧，将来准得成为天下祸患！”于是，苏洵便满怀激愤地写了这篇专门笔伐王安石的《辨奸论》。其实，这纯粹是个弥天大谎，邵伯温想一手遮天，但毕竟是徒劳的，清初的学者李绂就曾抓住《辨奸论》中矛盾百出的破绽，指出：苏洵去汴梁的时候，王安石只是个小小地方官，根本没有受重用，等到王安石当宰相实行变法名振四海的时候，苏洵早就死了，邵伯温硬说他写什么《辨奸论》，不是活见鬼吗？为此，李绂讽刺道：可见这位“作伪者”也够“心劳日拙”<sup>④</sup>的了。李绂的揭露是很有力的，但李绂不可能看到邵伯温“心劳日拙”背后的政治斗争内容。

邵伯温这个“作伪”的骗子，玩弄阴谋诡计，是以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思想基础的。他根本不懂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却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预言家姿态，吹嘘自己能从“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自然现象中，“见微而知著”，预算到未来的“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这种胡说八道实在不能自圆其说，太露骨了。为了圆谎，邵伯温为自己拉来两个证明：一是山涛看王衍，二是郭子仪看卢杞。王衍、卢杞在历史上都是被人们划在“奸臣”一流中

的，山涛、郭子仪则被视为贤臣。据说晋惠帝时，王衍为尚书令，清谈误国，而“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在王衍年少时，就从他美貌空谈中，看出他长大必非好人，断定“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唐德宗时，卢杞作宰相，“奸险乱政”，而当时著名的大将郭子仪早就从卢杞“貌丑有才辨”中判明他是个大坏蛋，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抓到这两个例证，邵伯温可得意极了，请看：历史上的山涛与郭子仪不就是有“见微而知著”的本领吗？因此，今日我邵伯温也同样可用“见微而知著”的说教，断定王安石是个“大奸慝(tè特)”，岂但是“误国”的王衍，“残害忠良”的卢杞，简直是吃人肉的魔鬼，现今北宋灭亡，不就是因为有了王安石这条“祸根”吗？因此，要保住南宋的江山，就必须严防王安石式的人物上台。这就是邵伯温炮制《辨奸论》的现实目的。

邵伯温依据什么“见微而知著”，预知王安石十多年前就是个“大奸慝”呢？在《辨奸论》中他抓到了王安石“与人异趣”的生活细节。据说王安石平素不讲究吃穿，不爱洗脸而特别爱读书。就因为王安石在这些生活细节上违背了美衣鲜食的大地主阶级的“人之至情”，邵伯温便得出结论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于是进一步推断此人将来“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真是神乎其神到了极点。为了论证他辨的正确，邵伯温在《闻见录》中还煞费苦心收集不少当时诽谤与污蔑王安石的“遗闻轶事”。例如，有个叫李承之的儒家之徒，早在王安石刚入官场任小小的知县的时候，发现王安石“眼多白”，就料定“他日乱天下者，此人也。”这不就与邵伯温

“英雄所见略同”了吗？邵伯温还把他老子邵雍抬了出来，煞有介事地记着这么件充满鬼怪气的事：嘉祐末年，邵雍和朋友信步走到洛阳天津桥，忽而，远处云端传来几声杜鹃叫，邵雍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连连悲叹：“怪呵，北方哪来的杜鹃，十年后国家将大乱了！”他的朋友奇怪地问：“几声杜鹃叫，就把你吓楞了？”于是邵雍瞎吹了一通阴阳八卦，什么天下大乱，地气就会“自南而北”，今天杜鹃都朝北方飞来了，可见大祸不远！果然，十年后发生王安石变法，扰得“天下汹汹”。请看：所谓“见微而知著”就是这种捕风捉影的造谣，装鬼弄神的恐吓！其实，把玩弄阴谋诡计搬到政治舞台作为斗争手段，也并非邵伯温的新发明，不过是儒家的惯用手段。从孔老二堕三都、杀少正卯，吴王刘濬发明“清君侧”，霍光诛桑弘羊……，直到邵伯温用算命术“辨奸”，也算是儒家搞阴谋诡计的一脉相承吧！所不同者，只是邵伯温的阴谋手段更带上点阴阳怪气而已。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辨奸论》的出笼从反面揭示了一条经验：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儒家对主张革新的法家攻击与陷害更是不择手段的。正因为《辨奸论》集中了儒家搞阴谋诡计的种种下流手法，因此自从出笼以来便受到孔孟之徒的称赞，奉为标本。大骂王安石变法的反动理学家朱熹，看到《辨奸论》兴高采烈地狂呼：可以“补救于世”了。清代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曾国藩，把它奉为至宝，作为反革命将领的必读经典。值得注意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凭借其反革命的嗅觉，也看中了《辨奸论》，他恶狠狠地叫嚣要“见微而知

著”，仿效邵伯温自命为“预言家”的姿态，大谈“政变经”，以唯心史观对阶级斗争的历史作了根本歪曲。他还搬用《辨奸论》的造谣诡辩手法，进行阴谋活动，在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处处游荡着《辨奸论》的阴魂。这充分说明，林彪同历史上的儒家一样，虚伪无耻，只能靠制造谣言和玩弄阴谋诡计过日子。如果说封建时代邵伯温的那篇歪文还有几个糊涂虫上当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林彪故伎重演，留下的只能是自己可耻的失败记录，历史的铁案是谁也翻不了的！

---

注：① 《皇极经世》卷十二。

②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四。

③ 《宋史·杨绶传》。

④ 李汝：《书〈辨奸论〉后二则》。

## 卖国大儒秦桧

南宋建立的第四个年头。一个隆冬之夜，金军侵占的涟水水面上，有只小船自北向南，漂流而下。几天后，这只小船在南宋京都临安城徐徐靠岸了。上岸的是当了金军俘虏的御史中丞秦桧，身后跟着一大帮子家眷随从。秦桧不自然地笑着，对迎上来的人们大声叫道：“好不容易啊，我杀死了金军监官，从虎口里逃出来了！”

秦桧回来了，很多人表示狐疑。有的说：“两千八百里水路，他就没遇上一个金兵吗？”有的说：“要说他是奸细吧，敌人为什么不留下他的妻小为人质呢？”谁也打不开这个闷葫芦。当时的丞相范宗尹，是秦桧的知交。他见秦桧心怀鬼胎，心中早有几分数，赶忙出来拦着大臣，为秦桧评功摆好，捂住了盖子，于是秦桧安然地驶进了“避风港”。

秦桧乘回南宋的真的是一只“救命船”吗？不，那是一只地地道道的卖国主义贼船！他是怎么上了这条船的呢——

当时，我国东北部的金贵族集团挑起了对中原宋朝的大规模掠夺性战争，北宋在战火中灭亡，秦桧也与皇室成员一起被俘，押送至金，宋高宗赵构逃到南京（河南商丘）建立偏安政权——南宋。这个卖国皇帝，在金国重兵面前，唯有逃跑一



策，不久又从南京逃到临安。“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封建统治者可以醉生梦死扔掉祖国的大好河山，广大人民则决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揭竿而起，在黄河两岸拉出了“红巾军”、“八字军”同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梁山泊地区“水上义勇军”的抗金队伍，用斧头、大刀浴血奋战。一些地主阶级内部的主战派，也举起了抗战的刀枪。人民抗战的怒涛，正象滚滚黄河，一浪高一浪。金侵略军犹如一匹野牛冲入火阵，烧得焦头烂额，十分狼狈。如何摆脱困境呢？金国贵族头子们十分发愁。这时身为俘虏的秦桧一看是个“将功赎罪”爬出狗洞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向金军献策：硬的不行来软的，打不下去，搞和议嘛！他还厚颜无耻地表示情愿当金军说客，打包票把高宗拴上贼船。金军侵略头目大喜，立即开了秘密会议，策划了“以和议佐攻战”的新阴谋。接着，临江城畔便出现了那条令人费解的小船。

秦桧是宋朝的大臣，当了俘虏屈膝投降不算，竟献上门去干这种无耻的汉奸勾当，这是“一念之差”吗？不，他的灵魂深处，早就种下了卖国的劣根。秦桧原是北宋太学生，会做孔孟文章，又能奔走办事，混号“秦长脚”，他是宋朝大汉奸汪伯彦的高足弟子。儒家是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要钟爱自己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贪生怕死的秦桧对这点特别合意。凭着尊孔读经，他一步步爬上了御史中丞的宝座，更加卖力地推行孔孟之道。他对《论语》、《孟子》这类黑货赞不绝口，命令印成大批墨本，在各州、路学校广为推销。他曾无耻地对高宗说：“只要‘尊儒重道’，士人那怕当俘虏，也往往能守节。”其

实，儒家的活命哲学，正是叛徒、汉奸的卖国哲学。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尊孔必然卖国。孔孟之道就好比卖国船上的一把黑舵。当叛徒，当汉奸，必然是大儒秦桧唯一的归宿。

秦桧把贼船开到了南宋，手中的橹摇得更勤了。他天天围着宋高宗团团转，骗得了信任，宋高宗将他视为心腹，称赞“秦桧比谁都忠实，我得了这么一个‘佳士’，真高兴得欣喜若狂！”秦桧利用高宗这个胆小鬼和保守派大臣们畏战的心理，拍着胸膛四处放风：“假如我做宰相，不出几个月，保证四海清平，大伙都能过安定日子。”宋高宗果然升他当了“右丞相”，从此，卖国贼秦桧成了南宋王朝投降卖国的当家人。他乘势对高宗说：“陛下，要想天下无事，只有讲和，把北方失地索性让给金国，划清两国界限，‘南自南，北自北’，这才是长久太平之计。”宋高宗是北宋大地主投降派的总代表，他只要自己能保住“皇帝”尊号，过神仙日子，卖国投降都无所谓。但朝廷中还有不少主战派大臣，这种赤裸裸的卖国行径他们能答应吗？他心里不禁有些犹豫。秦桧在一旁紧盯住不放：“满朝臣僚各持一端，成不了大事。陛下决心和议，同我当宰相的商量就成了，用不到大臣们参加。”于是，一对君臣，两个卖国贼，就这么定出了“和议”之计。其实，所谓“和议”，不过是决定宋朝向金国投降的代名词而已。秦桧打保票，只要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大量财物，金兵就退出中原，天下就能过太平日子。宋高宗起先还有点羞羞答答，秦桧又用孔孟之道给他冠冕堂皇地加了顶卖国有理的漂亮帽子：“屈辱和议，原是人主为了孝亲嘛，陛下怕谁讲话呢？一切包在我身上！”就这样，秦桧丑态百

出地代表高宗，跪在金使面前，叩头称臣，签定了卖国“和约”。

侵略者从来是穷凶极恶、贪得无厌的豺狼，它们决不会放弃一切机会去残害和奴役人民的，一纸和约掩盖不了历史上无数血的事实。当时有个叫魏缸(gāng扛)的主战派大臣提醒大家要防止金国背信弃义，秦桧却冷笑说：“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①”一个“诚”字，恰恰证明卖国贼秦桧早已死心塌地充当了金国贵族的一条癞皮狗。魏缸气愤地反唇相讥：“相公以诚心对待敌人，只怕敌人不以诚心对待相公吧！”

在卖国贼秦桧专权下，抗战有罪，卖国有功，得宠的全是些无耻之徒。秦桧的卖国主义祸心，骗得了昏庸的宋高宗，骗不了主战派，更骗不了广大人民雪亮的眼睛。“宋金和议”一宣布，杭州城内，万民沸腾，街头巷尾，不时出现“秦相公是奸细”的大字标语；有人还勇敢地写了一份“愤激作气”的抗议书，把秦桧的卖国罪行一桩桩公诸于众，要求把秦桧的脑袋割下来谢天下！这份抗议书，被印刷了成千上万份，雪片似的迅速传遍全国各地。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南宋政府中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和人民站在同一个爱国立场上，坚决反对卖国贼秦桧炮制的“和议”政策。岳飞激愤地指责秦桧：身为相国却不为国家打算，子孙万代都饶不了你！他多次上奏高宗，揭穿“和议”只不过是阴谋。侵略者“犬羊无信”，根本不会遵守什么“金石之约”，不要把和平的希望痴心地寄托在一纸空文上面。他还慷慨激昂地表示，只要高宗下令，自己愿出生入死冲杀在抗敌第一线，一定用武力

把丢失的祖国领土夺回来，复仇报国，“从头收拾旧山河”。然而，宋高宗完全被升平曲灌醉头脑，听不见金军的磨刀声，岳飞的奏折，一道道都被秦桧扣了下来，打入冷宫。

秦桧的卖国主义路线，葬送了抗金的大好形势，侵略者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和约”达成几个月，“盟墨未干”，金军就一手撕毁“和约”，分四路大军，挥戈南下，向南宋发动了更猛烈的袭击。大敌当前，再也不能忍耐了！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冲破秦桧的重重封锁，杀上前线，奋起迎战，在人民群众“拖车牵牛载糗(qiǔ丘上)粮”的全力支持下，连着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如仙人关之捷，顺昌之捷，郾城之捷，直打得金军丢魂落魄，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②岳家军何以有这么大的神威？因为它的后盾是千千万万抗金的人民！岳飞又采取“连结河朔”的方针，率领宋军和北方起义军，在“还我河山”的战斗口号下，同仇敌忾，势如破竹。战场上宋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金军统帅不得不承认“金宋强弱之势已易，今宋军勇锐，有似往日金军；金军怯弱，则似往日宋军”。眼看着一片大好形势，岳飞兴奋万分，他激动地鼓励战士们：“加油啊，要直捣金军老巢——黄龙府！”沦陷区的老百姓翘首盼望着早日被拯救出水火，南宋人民也欣喜地准备迎接抗战胜利的一天。

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是主将高超的“十八般武艺”和“精忠报国”的壮志，而是取决于是哪条路线占统治地位。宋金战场的形势出现了鼓舞人心的变化，但宋王朝的当权派还是卖国贼秦桧，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儒家罪恶的卖国路线。

这一点不变，大好形势保不住，更谈不上最后胜利了。卖国贼秦桧在岳飞的抗战攻势下，吓慌了手脚，但一想前面有宋高宗这个草包挡着，后面有金国主子撑腰，手里又有说一不二的“右丞相”大权，便有恃无恐，坚持儒家立场，变本加厉地推行卖国路线。他“力排群言，始终以和议自任”，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誓“死且不避，宁避怨谤”，沿着卖国主义的投降路线走到底；他攻击岳飞等抗战派“儒术末末”，都在清洗之列。为了立即扑灭抗金烈火，老奸巨滑的秦桧利用职权，不择手段地利诱一些主战派，迫使岳飞“孤军独战”，又以孤军不可久留的借口，一天发十二道金字牌，强行命令岳飞班师，立即撤兵，正在乘勇追敌的抗战大军，只得拨转马头。岳飞气得仰天长叹：“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于中兴！”岳飞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将领，毕竟摆脱不了孔孟之道的束缚，在秦桧的高压手段下，他终于含着热泪退出了抗金战场。

一条儒家卖国主义路线就这样断送了宋朝军民南征北战用热血换来的胜利局面。岳飞收兵，实质是向秦桧让了步。但是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反动派决不会施仁政，阴险狠毒的秦桧，视主战派为仇敌，他认为岳飞不死，“终梗和议”。在金国主子兀术“必杀飞，始可和”的秘密指令下，秦桧用手中大权，把岳飞陷进监狱，百般摧残，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夺去了这位民族英雄的生命。临刑前，岳飞满腔悲愤说道：“吾现时才知落于国贼秦桧之手，使我为国忠心，一切都休！”阶级局限性使岳飞临死前方才认出

一个卖国贼，却始终不懂得孔孟之道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而且也是投降卖国的护身符！秦桧卖国，就因为他是大儒；杀岳飞，就利用了儒家这把刀子！岳飞死后不久，“宋金和议”再次达成，大批南宋领土再次被儒家路线出卖，秦桧这条走狗博得了金国主子的喝采，心里好不得意。

然而，人民是饶不了卖国贼的。一天秦桧还朝，坐着八人大轿回家，突然在路旁“腾”地跃出一个大汉，手持闪亮的钢刀，向轿子中的秦桧砍去。秦桧吓得慌忙躲闪，刀锋砍在轿门上。那大汉再举刀行刺，秦桧亲丁蜂拥而上，将他五花大绑。这时秦桧早已吓瘫了。那个报仇的大汉被乱刀肢解时，还痛骂不绝：“秦桧，你这卖国贼，全国老百姓早晚要吃你肉，扒你皮！”

俗话说，“做贼心虚”。自此后，秦桧日日提心吊胆，六神不安，在全国人民声讨卖国贼的怒涛中，秦桧的贼船逃不了没顶之灾！不久，这个万民唾骂的卖国大儒便吓成大病，结束了狗命，见孔丘去了。

秦桧罪恶的一生，就是从尊孔读经走向投降卖国的一生。尊孔必然卖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

注：① 《宋史·秦桧传》。

② 岳飞：《满江红》。

## 反动道学家朱熹

南宋的朱熹(公元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是个“集诸儒之大成”的反动道学家。他继承了孔丘以来历代儒家的反动思想衣钵,炮制了一套庞杂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毒害最深远的反动思想家。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大肆吹捧朱熹的理学,叫嚣“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为什么叛徒、卖国贼林彪对朱熹的反动思想这么推崇备至呢?说到底,就是为了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朱熹是个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出身在江西婺源一个大地主家庭。其父朱松,是当地有名的尊孔派。八岁起,朱熹便开始读《孝经》,系统接受儒家教育,日长月久,孔孟之道渐渐浸透了他的灵魂。还是个小孩子呢,就提笔在《孝经》上涂下誓言:“不若是,非人也。”就是说,我如果不按照孔圣人的教诲去做,就不算人,朱熹一辈子就是按照孔孟之道立身处世的。十八岁那年,朱熹考中进士,从此,他以一个顽固的孔孟卫道士的面目,登上了南宋的政治舞台。

南宋,是个十分反动腐朽的封建王朝。当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在我国北方女真贵族政权——金的进攻下,南宋政权节节退让,偏安江南,奉行一条妥协投降

的卖国主义路线。在南宋内部，由于官僚大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残酷压榨农民，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危机，迫使农民不断起义。革命农民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浪潮，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民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而且还反映了自西汉董仲舒以来的那套维护封建统治的纲常伦理已经支离破碎了。为了摆脱面临的困境，加强对农民的思想统治，南宋封建统治者急需给他们千百年来赖以维护统治的“孔孟之道”涂上一层新的油彩，继续为它们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路线服务。朱熹就是这一时期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思想代言人，他的那套反动理学是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条件而炮制出笼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社会危机，朱熹赤膊上阵，坚持了守旧、复古、倒退的反动立场，他一面紧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后尘，大唱“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把孔丘当作神灵高高供奉起来，一面大骂法家思想是“功利邪说”，攻击秦始皇、王安石等法家人物的变革行动。可惜，末世光景，此术难售，于是他又迫不及待地根据反动统治的需要，对儒家学说精心地做了阐微补缺的工作，炮制了更加反动、周密、精致的唯心主义“理学”。

理学又称道学，它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汇集了儒、释（佛）、道三家思想破烂的反动思想体系。因为它“以天为本”，而“天”即是“理”，所以称为理学；又因为推崇孔孟的“道统”，所以也可以称道学。理学的首创者



是北宋的程颢、程颐两兄弟，但集大成者却是朱熹。朱熹大力宣扬韩愈的道统说，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丘、孟轲，一脉相传，到了孟轲以后中绝了，幸亏程颢、程颐继承孟轲，他自己又继承二程，所以又称为程，朱理学。朱熹的理学，对奄奄一息的孔孟之道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为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维护和挽救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起着十分凶恶的反动作用。

为了兜售“理学”，扩大影响，贻祸后世，朱熹袭用了孔丘那套聚徒讲学的方式，广收门徒。他在福建建立“小山丛竹书院”，作为据点，精心网罗了一批“无行义之徒”，充作自己的党羽，逐步形成了一个为“理学”摇旗呐喊的“闽学派”。以后，朱熹又流窜到江西、安徽、浙江和湖南等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书院”，作为他结党营私、散布理学的基层组织。就这样，朱熹一伙“潜形匿影，如鬼如魅”，四处放毒。正如当时人所揭露的那样，“道学权臣，结成死党”。在反动统治者的支持下，理学象祸水一样很快泛滥成灾。

“理学”，玄而又玄，庞杂臃肿，但它的核心就是朱熹说的六个字，叫做“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朱熹不同于先辈儒家的抱残守缺，他大量剽窃佛教的神秘观点和道教的荒诞理论，掺和了儒家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谬论，把“理”说成是永恒的宇宙万物本源，绝对精神的体现。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就是说，整个宇宙是由精神的“理”和物质的“气”所构成的，但是，“理在先，气在后”，精神的东西先于物质而存在。万事万物，大至天地，小至蝼蚁，都是由神奇莫测的

“理”所派生出来的，“有是理，然后有是气”<sup>①</sup>。这完全是一种道地的唯心主义说教。然而，在朱熹看来，天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还可派生出包括封建秩序、伦理道德在内的人世间的一切。朱熹认为，“理则为仁义礼智”<sup>②</sup>，天理体现在人间，就是三纲五常的一套封建伦理，居心叵测地给三纲五常披上一层更加神秘的外衣，胡说什么“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使它成为禁锢人们头脑的阴险毒辣的精神枷锁。这充分暴露出朱熹高叫“天理”的政治目的就在于把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说成是永恒存在、不可侵犯的绝对观念，即所谓“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以此来维护反动统治，抵御人民反抗。这一狼子野心在“存天理，灭人欲”这六个字中淋漓尽致地显露出来。所谓“存天理”，就是企图强迫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内无妄想”，“外无妄动”，一切按照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行事，俯首贴耳地听任统治阶级的摆布；所谓“灭人欲”，就是坚持用反动理学来征服人心，强迫被剥削的人民根除一切反抗意识，放弃任何革命行动，甘心做牛做马。这就说明：朱熹的理学，说到底就是竭力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的地主阶级反动哲学。

“理学”的妙用，朱熹认为在于“攻心为上”，能够用来麻痹和束缚劳动人民斗志和革命精神。他得意地吹嘘：“吾生平所学惟此四字”，即“正心诚意”，“正心诚意”干什么？“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一语道破“理”就是“礼”，他生平所学就是象孔老二那样死心塌地地维护反动统治。他奔走官府，出谋划策，阴险地提出对人民既要“以严为本”，使之不敢犯上作

乱,还必须“振举纲纪”,用孔孟之道实行严密的思想统治,使之“各依本分,凡事循理”,成为一群听任宰割的羔羊。他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套唯心主义的修养经,叫做“敬”字功夫,要人们象佛教徒参禅那样,“闭眉合眼”搞什么“默识”(自我修养),什么“坐如尸,立如齐”,什么“头容端,目容直”,连走一步路,抬一下手,都要毕恭毕敬,好一副道学先生的虔诚面貌。在朱熹看来,只要人们都去闭门修养,“私欲净尽,天理乃行”,就没有人造反,没有人革命,朱熹的“天理”就可以畅行无阻,统治阶级的天下就可永远太平无事了。朱熹洋洋得意地向人们描绘了一个虚无飘渺的幻境,实际上是用蛊惑人心的廉价谎言为极端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蒙上遮羞布。

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什么“道学”、“理学”,什么“敬”字功夫,不过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朱熹本身就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别看他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一旦广大农民起来造反,向着封建统治和反动的孔孟之道猛烈冲击时,他就再也顾不得什么“闭眉合眼”的菩萨面具了。他马上抛了软刀舞钢刀,赤裸裸地声言“佃户不可侵犯田主”,对敢于起来与地主老财说理斗争的农民,他主张发配充军,更不必说起义造反了!朱熹认为对人民“刑愈轻”,“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主张以严刑酷罚对付敢于反抗的人民群众。在他的“施政纲领”上,直言不讳地写着“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对的)不右(不宽恕)”。一纸“施政纲领”,沾满广大劳苦农民的血和泪,无限冤仇!朱熹出任湖南安抚时,当地正爆发农民起义。他一到任,就凶相

毕露，破口大骂起义军是“盗贼”，并恶狠狠地限定打手们“谕以某日，不俘以来，将斩汝”，以此来胁迫手下爪牙前去“进剿”，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杀了人，他还杀气腾腾地叫嚷，对人民“当杀则杀”，扬言“我只有寸铁，便可以杀人”。这个言必称“诚”、“敬”，口不离中庸的道学家，就是这么一个杀人恶魔。他从不肯放过屠杀人民的机会，有一天，朱熹得到密报，新皇帝宁宗马上就要即位了，照例要搞一个“大赦天下”的骗人花招，朱熹把密报藏在袖里，奔回衙门，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鲜血犹在刀刃，“大赦”的诏书就颁布了，朱熹的手段多么毒辣！在这里，朱熹又一次露出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狰狞面目，抢着杀人，嗜血如命，公然用屠刀来“灭人欲”。清朝学者戴震曾唾斥朱熹“以理杀人”，这是有真凭实据，击中要害的。其实呢，他何至是以理杀人，无理也要杀人。

朱熹这个大儒很可恶。他在“以理杀人”的同时，还大干以“理”卖国的罪恶勾当。当时宋金对峙，女真族贵族集团不断率军南下，步步进逼，南宋的大地主阶级当权派却打出卖国主义降旗，讲“和议”，搞妥协，用大片国土和人民的血汗换取小朝廷的苟安。朱熹就是当时一个顽固的“主和派”。他用反动理学，狂热鼓吹卖国投降理论，密切配合统治阶级推行卖国路线。他吹捧“古先圣王”的对外政策“不在于威强”、“号令”，而在于“德业”、“纪纲”<sup>③</sup>，对侵略者，只能用奴颜婢膝的“德业”去讨饶，对人民也不必号召抗敌，只要用“三纲五常之教”加强统治就行了。他大弹亡国之调，说什么“区区东南，事有不可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这种内奸论调，博得了侵略

者喝采，金朝皇帝托人带信，向朱熹问好，足见朱熹的投降言论完全迎合了敌人的需要。

朱熹的卖国谬论，势必引起主战派的痛斥。当时，爱国主义者陈亮曾勇敢地揭露了朱熹的卖国嘴脸，并多次上书，要求收复失地，统一祖国。同时，他还赶到朱熹家中，拉出朱熹当面辩论。他批判了朱熹之流“举一世而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的投降哲学，戳穿他们是一群得了麻痹症“不知痛痒”的家伙。结果，朱熹暴跳如雷，他疯狂攻击陈亮的抗战思想是“利欲胶漆盆中”的异端邪说，骂陈亮是什么“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的“巧言之士”。为了给自己的卖国投降理论张目，他还血口喷人，恶毒污蔑北宋爱国主义者王安石的反侵略政策是“只管好用兵”，“费了无限财谷，杀了无限人”。总之，他认为，任何抗战的主张都是不符“天理”的越轨行为，必须除灭干净。朱熹曾肉麻地吹捧卖国大儒秦桧是“端人正士”，在卖国投降这个问题上，朱熹的所作所为，真不愧是当时的秦桧第二了！

人们往往用“道学先生”来称呼那些两面派、伪君子。不错，朱熹这类道学家，也确实是典型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朱熹的“道学”，在当时就有人斥之为“伪学”。一个“伪”字，确实抓住了朱熹一类道学家的本质特征。朱熹有一条处世格言，叫做：“知欲圆而行欲方”，就是说，做人应该言行不一。朱熹正是按着这条格言立身处事的，他从来就是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一生的历史都是丑事串起来的。请看：“百行孝为先”，朱熹成天把“忠孝”挂在嘴上，实际上连自己亲生老娘也要虐待，

自己吃鱼吃肉，给老娘吃霉米馊饭，结果把他娘活活气死。老娘死后，他又装模作样地守起孝来了，活象个“孝子”；朱熹表面上悲天悯人地说什么“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可是做福建同安县主簿时，催租逼税如狼似虎，谁交不出租子他就“断不恕”，害得穷苦百姓家破人亡。他听说建阳学堂风水好，是“侯王之地”，便顾不得什么“守道”、“人伦”、“圣言”、“世故”，竟然把学堂里的孔丘泥像，用“大木巨缆”捆绑起来，强行拖出门外，结果这个“至圣先师”给摆布得狼狈不堪，泥手泥脚全给折断了，大庭广众，直弄得“观者惊叹”。在泉州当地方官时，朱熹嫌当地风气不好，特地假作正经制定了一套“婚娶仪式”，要百姓们严格遵守，自己却鬼鬼祟祟地诱骗两个小尼姑作“宠妾”，……斯言斯行，活画出朱熹其人是个寡廉鲜耻的伪君子、无恶不作的大恶霸。难怪明代李贽对朱熹之流下了个“真个道学，脸皮三寸”，“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评语，煞是骂得痛快。

朱熹一辈子站在官僚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他的“待人”哲学，是杀人哲学，骗人哲学，卖国哲学，是尊孔倒退的反动哲学。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朱熹以及他那一套唯心主义的庞杂体系，也被南宋以来的历代反动统治者越捧越高，定为“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的官方御用哲学，作为它们维护反动统治的护身法宝。而朱熹这个“理学大师”则被当作“先儒”、“先贤”供奉起来，甚至把他抬进孔庙与孔丘一起接受儒生们的冷猪头肉。他那本浸透了孔孟毒汁的《四书集注》也被当作钦定教科书，流毒深广。叛徒、卖国贼林彪

更是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不仅号召他的党羽要象朱熹那样去“待人”，而且还以《四书集注》为蓝本，别出心裁地搞什么《四书集句》，挂在墙上，放在枕边，朝夕诵读。这就足以证明：林彪与反动道学家朱熹是一丘之貉——都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

注：① 《孟子或问》卷三。

② 朱文公文集·答陈器之。

③ 《朱子年谱》。

## 爱国思想家陈亮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sup>①</sup>一一六九年，第二次妥协投降的宋金和议达成，腐朽的南宋统治集团，又沉醉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朝廷内外的大官僚、大地主和那一帮被金国侵略者吓破了胆的儒生们，奔走相告、“忻然”雀跃，他们竟不以“称姪”金国、割地纳款为耻，反以通敌卖国为荣。就在这年十二月，朝廷收到了一份慷慨激昂的《中兴五论》。

《中兴五论》大声疾呼：四十年来，人民涂炭无告，其灾“不可以不拯”；国家屡遭劫难，其耻“不可以不雪”；中原惨被蹂躏，其地“不可以不复”！今天，天下的“雄伟英豪之士”“延颈待用”，愿以死报国，但他们却不得重委，“穷饿而死”；而那些专事投降卖国的“懦弱委琐之人”却充斥朝廷。正因为朝廷“中实无能”，才导致金国“外为欺罔”。因此，要“励志恢复”，必须“明赏罚以厉其后”，对那些首倡主和、出卖国家的“禽兽”要“诛之杀之”。上书还制定了一个完整的恢复中原、“图济大业”的作战方案：主张迁都建业（今南京），“前为诸州之援，后依屯田之利”；采取避实就虚的方针，一部分兵力通过海道奇袭金军以“捣其脊”，一部分兵力在敌后为“内应”，“变化形敌，多方牵制”，使金军疲于奔命；然后，出师反击，“以搃（zhèn阵）其



胸”，“成大举之势”。

这篇痛快淋漓的战斗檄文，是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的陈亮（公元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年）写的。在风起云涌的人民群众抗金斗争的推动下，他毅然冲出学堂，打点行李，离开故乡永康（今金华东南永康县），风尘仆仆，来到南宋的京都临安（今杭州），把凝聚着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兴五论》上奏孝宗。但是，卖国投降的儒家之徒把陈亮的上书封锁了起来，不向皇帝奏报。眼见得上书石沉大海，陈亮满腔悲愤地离开临安，回到了故乡。

陈亮身在书房，心在抗金战场，看着“文士既不识兵，而武夫又怯于临敌”<sup>②</sup>，国势每况愈下，真是忧心如焚。他根本无心于“科举之文”，而是孜孜于使国家富强之术。在他三十五岁那年，曾参加了科举考试。他的痛砭时弊的战斗文章当然不会被头脑迂腐的考官们所欣赏。“考试官”何淡秃笔一挥，胡乱窜改陈亮的文章，陈亮怒不可遏地骂道：“亮老矣，反为小子所辱！”陈亮大闹考场的行动，引起“满学之士，口语纷然”，诽谤诅咒，数月不绝。仕途被堵塞了，陈亮毫无悔意，他声明：“自是始弃学校而决归耕之计矣！”当然，他后来并没有“归耕”于田地，但这种敢于造科举制度反的行动，体现了法家人物中的斗争精神。

陈亮这时仍然把光复中原、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孝宗身上。这反映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阶级局限性。就在他大闹考场的第二年，他第二次来到临安，伏在京都丽正门下，上书议政。由于陈亮改名为“陈同”，这篇《上孝宗皇帝

第一书》竟然侥幸地转奏到皇帝手中。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比起《中兴五论》来，更是锋芒锐利、铮铮有声。陈亮在书中愤懑地说：自秦桧“讲礼乐”、“倡邪议”以来，“国家之耻不得雪，臣子之愤不得伸”，令人“痛心疾首”！他把矛头直指朱熹一伙，说他们只知道“低头拱手以谈性命”，简直是“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他指出，必须“劝农桑”以富国，励群臣以强兵，“破去旧例”以变法，才能开“今日大有为之略”。孝宗皇帝看了陈亮的慷慨陈词，“赫然震动”。他把陈亮的上书公布于朝廷，并召集左右大臣上殿，将自己准备任用陈亮抗金的想法说了出来。话音刚落，那些在卖国道路上跑惯了的大臣们顿时惊慌失措。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陈亮的上书这样放肆，根本不能重用！“浙江总管”曾觐（dì 敌）想劝陈亮放弃主战立场，心怀鬼胎地来到陈亮那儿。陈亮听说是个主和的“儒士”，跳墙避开、拒不会见。曾觐碰了一鼻子灰，回到朝廷，更是破口大骂陈亮。八日后，陈亮见杳无音讯，又呈了《上孝宗皇帝第二书》，书中痛斥秦桧及其卖国路线的继承者是一伙“国之贼”，并用婉转的语言，批评孝宗皇帝重用整日价“讲先王之道”的朱熹一类“小儒”、“庸人”，致使拖延了抗金统一的日程。过了两天，陈亮接着写了《上孝宗皇帝第三书》，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出了他的变法主张。他指出：变法是“天下大势之所趋”，如不是随着时势的变化“变而通之”，国家势必“萎靡”而不振。南宋所以丢了半壁江山，根子就在“以儒立国”、不思变通。这三篇激切的上书，犹如三份对儒家卖国罪行的宣判书，使朱熹一伙目瞪口呆，相顾骇言。于是，朱熹象条疯

狗一样，气急败坏地诅咒陈亮：“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他的门徒也大骂陈亮是“怪人”。懦弱的孝宗当然不能接受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激进思想的，他准备授给陈亮一官半职，应付了事。陈亮对孝宗皇帝多少有点失望了，他断然拒绝做官，立即动身回家，并声明：自己三次上书，不怕坐牢、杀头，完全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大计，根本不是为了猎取官位。

在故乡，陈亮认真总结了同儒家卖国贼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儒者世守之”的“孔氏之家法”乃是朱熹“理学”的“源”<sup>③</sup>。要使国家富强、坚持抗金，就得同守旧、卖国的理论基础——孔孟之道及其变种的朱熹“理学”进行思想上的斗争。

一一八二年一月，朱熹窜到婺州、衢州一带，推销他的守旧、卖国哲学。陈亮在婺、衢间找到了他，同他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后来，陈亮又写信给他，把他的“腐儒之谈”驳斥得体无完肤，吓得朱熹逢人便惊呼：“浙中近年怪论百出，骇人闻听，坏人心术”。过了两年，由朱熹的门徒策划已久的陷害阴谋开场了。陈亮被加上毒杀人命、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下了大理狱，并受到严刑摧残。幸亏爱国词人辛弃疾等多方救援，陈亮才被释出狱。

那是一一八四年秋，陈亮出狱后，途经绍兴，首先来到武夷精舍，与他的仇敌朱熹见了面，重新宣战。朱熹等陈亮走后，随即修书一封，劝诫陈亮“细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sup>④</sup>。这样陈亮、朱熹的论战，就集中到义利王霸的问题上来了。陈亮写了一系列战斗的书信、

文章，摆开“堂堂之阵”，树起“正正之旗”，以“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之势，“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对反动“理学”进行猛烈的批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

朱熹根据孔丘的“克己复礼”反动纲领，提出了“尊王贱霸”论，胡说什么孔丘要复辟的夏、商、周三代是“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秦汉以来的社会是“人欲横流”、智力把持天下的“霸道”衰世。陈亮驳斥说，这种历史退化论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事实上，三代的帝王并非专以“王道”治天下，他们同样追求富贵，心地并不“净尽”，就是说，三代也充满“人欲”。相反，三代以后，如汉唐的刘邦、李世民，他们“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讲“霸道”，对统一中国建立了功业，谁能否认他们是“英雄豪杰”呢？陈亮指出，朱熹用“天理”来压制“人欲”，用“王道”来否定“霸道”，用“三代”来贬低汉唐，是为了把三代以后的一千多年说成是“一大空阙”、“举世皆盲”的黑暗时代；是为了把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法家人物宣布为“圣门之罪人”；是为了反对顺应“大势之所趋”而进行的变法；是要人们因循守旧，做“半死半活之虫”。

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的陈亮，毕生以革除南宋弊政、恢复国家统一为奋斗目标，因此，他特别注重实际活动。他继承法家的唯物主义传统，提出了“务实”的口号，大力提倡“实事实功”，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功利主义，反对朱熹空谈“明心见性”的玄虚之“理”。儒家是忌谈“利”的，唐代诗人李白曾写诗讽刺过孔丘：“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

烟雾。”朱熹更进而把反对“功利”作为“存天理，灭人欲”的重要内容。其实，儒家正是“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朱熹“理学”的本身，就是为了适应守旧、卖国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需要而炮制的。朱熹不是要陈亮做个“不敢有一毫做作”的“醇儒”吗？陈亮回答是：做人要学管仲那样，做一个“当得世界有无”的人，就是说，要象法家人物那样，讲功利，讲实际，敢于担当历史重任，决不做只会“嚼木屑”、啃经书的蠢虫。朱熹不是把功利与道德对立起来吗？陈亮驳斥说：“功到成时，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与它的道德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在当时，能够以“救时之志”，从事抗金、统一的事业，便是有功，“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总之，为了地主阶级的功利，不妨“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使朱熹丑态百出，黔驴技穷。朱熹一面咒骂陈亮“在利欲胶漆盆中”，哀叹“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sup>⑤</sup>同时又祭起了他的拿手好戏：阴谋陷害陈亮。朱熹的死党先是雇佣数十个流氓，威胁贫病交加的陈亮，妄图用死来吓倒这位爱国思想家；继而又兴风作浪，制造“罪名”，把陈亮再次陷害下狱。从一一九〇年至一一九二年，陈亮在监狱中受尽折磨。又过了两年，五十二岁的陈亮在贫病中与世长辞了。

陈亮在《又甲辰答朱元晦书》中明确指出，他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是战国时期荀况、孟轲“义利王霸”之争的继续。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陈亮与朱熹的斗争，是儒法斗争在南宋

的表现。陈亮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从守旧、卖国的朱熹“理学”出笼的那一天起，就对它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亮在儒法斗争史上的杰出贡献。

- 
- 注：① 林升：《题临安邸》。  
② 《陈亮集·与叶丞相衡书》。  
③ 《陈亮集·祭吕东莱文》。  
④ 朱熹：《甲辰寄陈同甫书》。  
⑤ 《朱子语录》。

# 反动儒学普及本

## ——《三字经》

风雨飘摇中，南宋这只破船，千疮百孔，东摇西晃，时时都有触礁的危险。封建王朝的一小撮孤臣孽子，为挽救没顶之灾，已到了病急乱投药的地步。朱熹把儒、道、释三合一的理学抛出来不久，临安街头又上市了一件新玩意——《三字经》。它的表达形式跟那些咬文嚼字、狗屁不通的“十三经”不同，总共千把字，都是三字一句的顺口溜。但在俚语俗言的后面，渗透着孔孟之道的毒液，是本害人经。难怪宋代以后的历代反动阶级都把它当作蒙童读本，誉之为“袖里通鉴纲目”。薄薄的几页纸，书价不贵，评价可高得吓人。在它出笼以来的六百年间，不单中国私塾拿它作启蒙读物，翻来复去背诵，而且还翻译出洋，流毒全球。

《三字经》相传是南宋反动儒生王应麟炮制的，以后历代有所修改增订。《三字经》在宋朝出现不是偶然的。宋朝，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后期，地主阶级日益反动没落，封建制度更加腐朽。宋初以来，连续爆发了王小波、李顺、方腊、钟相、杨么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响亮地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

的革命口号，斗争矛头直指极端腐朽的封建制度。他们“不事神佛祖先”，“无视君臣上下”，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到了南宋，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加上民族危机严重，偏安一隅的宋王朝为了摆脱困境，一方面用屠刀镇压农民反抗，一方面更加狂热地乞灵于孔孟之道，用虚伪的纲常道德说教毒害人民。反动理学家朱熹，大量注释儒家经典，使孔孟之道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与此同时，在同样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背景下，孔孟通俗化读物《三字经》也就随着出笼。作为反动理学的普及和补充，它在宣扬孔孟之道方面起到了文字晦涩难懂的经书起不到的作用。它的产生适应了当时反动的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革命，尊儒反法，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这一点，从《三字经》作者王应麟与宋理宗身上就可看出。

当时的皇帝宋理宗赵昀，是个尊孔反法的头子。上台后崇理学，祭孔庙，大肆鼓吹孔孟之道。他曾对朱熹的儿子朱在说，朱熹的书写得太妙了，“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宋史·理宗本纪》的赞语告诉人们，赵昀“怠于政事，权移奸臣”，本来是个糊涂皇帝，只是由于他尊儒反法，强调“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才得了这么一个美号：“理”宗！王应麟同样是个虔诚的孔孟信徒，他与理宗碰在一起，当然是“君臣相得”，一吹一唱。一天，南宋与蒙古骑兵交战又吃了亏，理宗唉声叹气地说：“边事甚可忧”。王应麟马上凑上去阴险地说：“无事深忧，临事才能不惧。应天变，不如先回人心，愿陛下汲汲预防。”<sup>①</sup>意思是，打了败仗没啥了不起，不用担忧，还是先把国内老百姓的情绪控制好，这可是个必须注



重的大问题呵！一副十足的卖国贼腔调。又一次，理宗对王应麟谈起，做学问首先要“灼见古人之心”。王应麟连忙献策说，要倡行“古人之心”，须“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己之诚”。这话与理宗一拍即合，当下就被连加三个头衔，成为宋理宗的重要谋士。

“防未萌之欲，存不己之诚”，王应麟这句话，就是“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的翻版。它正是大毒草《三字经》的创作思想。王应麟劝理宗注意“汲汲预防”，加强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自己也为这个问题搔头皮、卖力气。“回人心”、“防未萌”是一套软刀子战术，它主要是对农民造反意识而言的。孔孟的书虽多，越理论化老百姓越不沾边，而且，为了培养自己阶级的继承人，要让他们尽早地接触孔孟之道，也必须抓住启蒙这一关。于是，通过冥思苦想，王应麟抛出了这本小册子。这里面包括孔孟之道的反动哲学观、历史观、教育观、道德观，乌七八糟，包罗万象，好象用一只破烂的小锅子，炒出了孔孟之道的大杂烩。过去反动派吹嘘“三字经，通人心”，现在让我们来翻翻这本“经”，看看它究竟通了谁的心，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的开场锣鼓就是地主阶级的人性论，这是儒家政治路线、教育路线的理论基础。王应麟从人性论出发，论证反动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教化”群众的必要性，论证尊孔读经是维护“人类本性”的需要。性善论，是从孔老二、孟轲那里搬来的。孔丘说：“仁者人也”，孟轲说：“人无有不善”。王应麟又加了一个补充“性相近，习相远，苟不

教，性乃迁”。儒家认为人生来就有“上智”与“下愚”之分，但是如果不用孔孟之道对人们进行教育与灌输，那么，先天的善性就会变恶，就会走上邪路。《三字经》正是为了防止人们背离孔孟说教而炮制出笼的。在讲了“孟母三迁”后，王应麟抬出个窦燕山，说他“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其实，这位儒家的教子专家窦燕山本人就没有半点性善的影子。窦燕山原名窦禹钧，是个恶霸地主，家财万贯，为富不仁。他专用大斗进、小斗出的卑劣伎俩，敲榨勒索，盘剥百姓。这么一个豺狼成性的地头蛇，怎么会被称为“有义方”的呢？有人编了个荒诞无稽的故事说，窦禹钧由于丧尽天良，三十岁还膝下无子。一天半夜，忽然梦见死去的老子，对他说：“儿啊，你恶名远扬天府地曹，不但没儿子，连命都难保！快快悔恶迁善，多积点阴德，把天意挽回来，改祸呈祥！”窦禹钧吓出一身冷汗。自这后，豺狼收心，做了好人，不但不抢不刮，反而拿出钱来接济贫寒，办学校……不久，又梦见老子，说是“你如今阴功浩大，老天爷知道了，特送你五个儿子，还给你添阳寿！”窦禹钧干善事更起劲了。——这真是活见鬼！靠着亡灵托梦，这个黑心狼的地主“性乃迁”了，成了按孔孟之道教子的黑样板。然而，有趣的是，窦燕山的转变告诉人们：不见鬼，性难改，不正好说明儒家“性善论”是个大骗局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仁与善，在儒家那里有特定的解释：“克己复礼为仁”，施行“仁政”为善。“性善论”的真谛就在于用“善”的烟幕去掩盖反动派的屠刀。王应麟重弹老调，就是要给南宋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掠

夺、绞杀农民运动涂上一层“善”的油彩。然而笔写的谎言掩盖不住地主阶级的豺狼本性，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罪恶滔天，永远成不了善政！

《三字经》在宣扬“性本善”的基础上，大肆贩卖“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三纲的思想，在孔丘的“正名”学说中已经有了。到了东汉白虎观会议，把三纲作为永恒不变的伦理规范和最高的政治准则，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王应麟在《三字经》中从“天人感应”的谬论出发，给“三纲五常”戴上了神圣的光圈。他胡诌：“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又是什么“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十分阴险地用形而上学的诡辩手法，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搅浑，在数字上穿凿附会，力图证明天上的“三光”与地上的“三纲”一样顺天，万物的“五行”与人间的“五常”一样有理。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剥削阶级统治的一切世代里，任何吸血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谬论来加以粉饰的：牧师、哲学家、律师和国家活动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个人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三字经》也正是借神骗人，企图配合反动统治者的武力镇压，扑灭南宋农民起义的烈火，巩固封建的吸血制度。剥削阶级自己是丝毫不讲仁义的，正是那个被鼓吹为四岁能让梨的大儒孔融，当他镇压黄巾起义，反对曹操革新路线之时，何尝有半点礼让风度，完全是一副杀气腾腾的刽子手嘴脸！南宋理学家朱熹也是个手中有寸铁，便可以杀人的恶魔。“三纲五常”是反动统治者对付人

民的精神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三纲五常”是以忠君为核心的。《三字经》打着“考世系，知终始”的幌子，把一部中国历史，歪曲成应天命而生的历代帝王的改朝换代史。这完全是历史的颠倒。“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没有陈胜、吴广揭竿起义，摧毁秦二世、赵高的统治基础，刘邦怎么“兴”得起来？不是借助隋末窦建德、李密农民起义的力量，李渊怎么“创国基”？后代儒生增补《三字经》时，破口大骂明朝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是什么“寇如林”，完全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诬蔑柳下跖为“盗跖”的故伎重演，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唯心史观。《三字经》讲历史时，贯穿着一条尊儒反法的黑线。对孔老二赞为“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三字经》啧啧赞美成“八百载，最长久”，而对秦始皇的革新政权，则学《春秋》“正名”笔法，恶毒攻击。对其它帝王不论贤愚，一律称“宗”道“祖”，对秦始皇则呼名道姓，还幸灾乐祸地攻击秦王朝“二世”而亡。至于女法家武则天建立的“周”政权，《三字经》一笔勾销，这种任意阉割历史的手法，只有卑鄙的孔孟之徒才干得出！

《三字经》中，尊孔的思想还明显地暴露在教育观上。请看王应麟开的长长一串书目吧：全是什么《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之类乌七八糟的儒学破烂，正象资产阶级教育“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一样，《三字经》就是用孔孟之道为日薄西山的封建地主阶级培养忠实的爪牙，或者是顺民和蠢物。经书开出来了，怎么读？王应麟一

口气讲了十几个死读书、飞黄腾达的故事，形象丑恶不堪。什么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只要能爬上封建统治集团的宝座，简直不择手段。最令人作呕的，是一个八十二岁老儒生中状元的事：“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梁灏是五代人，从后晋天福三年（公元九三八年）应试起，历经后汉、后周，四、五十年里每场必考，考不中誓不甘休。到了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九八五年），八十二岁总算考上个状元。这个披着满头白发的腐儒，乐得手舞足蹈，忙不迭向皇帝献“谢恩诗”：“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载始成名，饶他白发巾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真是绝妙的自我解嘲！这个封建王朝的白发奴才已经麻木不仁了。王应麟视丑怪为神奇，要人们效法梁灏，白首穷经，一辈子不闻窗外事，成为孔家店的卫道士，封建王朝的奴才。《三字经》还拉扯上一些靠发奋读经做大官的牧童樵夫，妄图以此向人们证明：受苦受难，只能怪自己，只要有萤窗读破万卷书的精神，穷人一样能得到书中的黄金屋。这是个骗局！旧社会，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哪有条件上学，千千万万个高玉宝呐喊“我要读书”，却被地主拉去当牛作马，连身边带本书的权利都没有。《三字经》中鼓吹的路温舒、朱买臣之流，沿着“读经做官”的路，爬进达官显贵的行列，毕竟是极个别的，这不过是统治阶级收买奴才、搞政治欺骗的需要而已。个别人的向上爬和整个阶级的解放，完全是两码事，那些“新贵”，只能是剥削阶级的帮凶和装饰品，怎么会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表呢！孔孟的经书是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砸孔庙，烧经书，狠狠冲击孔孟

之道，就是为了砸碎这个枷锁，《三字经》愚弄不了批孔的英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决不是靠尊孔读经，而是起来反抗、斗争、革命！

《红楼梦》中有一句词，“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说的是地主阶级末世光景，金银财宝再多也挽救不了没落的命运。王应麟在《三字经》里最后一句话就是“人遗子，金满籯(yíng)，我教子，惟一经”。南宋地主阶级的统治出现严重危机，阴风森森，黄泉路近。孔孟之徒深深感到，只从物质上考虑，给子孙留些金银财宝不抵用，更重要的是传剥削经、权术经。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是没落阶级的“传家宝”，而《三字经》“三字编成便学童”，“子史经书一贯通”，充当了孔孟之道的“入门经”。

王应麟这“一经”抛出后，博得了反动阶级的一片喝采，什么“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吹得天花乱坠。很快，这一类的“启蒙读物”，风靡一时。诸如什么《女儿经》啦，《弟子规》啦，《增广贤文》啦，如此等等，在宋、元、明、清直至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几百年间满天飞。这些东西，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在宣扬孔孟之道这一基本立足点上却是异曲同工。《女儿经》主要宣扬“三从四德”；《增广贤文》主要宣扬反动人生观和处世哲学；《弟子规》发挥反动伦理道德观念……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些孔孟之道通俗的启蒙读物纷纷出笼，再一次说明反动派总是乞灵孔孟之道的，越是在垂死挣扎的危境中，越是千方百计“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

然而，“金满囊”救不了反动阶级的命，孔孟万卷经书同样无济于事。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亿万工农兵奋起挖了孔孟之道的毒根，《三字经》之类的毒草也被批得臭不可闻！孔孟的黑货不管是什么“经”，什么“版”，只有一个不光彩的归宿，那就是丢进历史的垃圾箱！

---

注：① 《宋史·王应麟传》。

# “凡事一新，毋循旧弊”

——元世祖忽必烈

浩浩沙漠，茫茫草原，驰骋着一支英勇善战的游牧部落。它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统率下，“龙飞朔方，雷震云合”，以所向披靡之势，统一了我国北方、西北、东北的各个民族，草创起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但是，成吉思汗没有来得及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就死在战途中了。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后继者面前：是乘胜前进，建立高度发展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还是守旧倒退，坚持原先的以游牧为特点的落后生产方式？这个十三世纪时提出的风貌独特的课题，为延续了一千几百年的儒法斗争铺垫了新的舞台。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于一二三四年灭亡了金朝。从此，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空前激烈起来了。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西北诸王”，他们要开倒车，把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强加给中原人民。他们在辽阔的中原搞裂土分封，“掠人户为奴，课以游牧之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对于封建农业经济充分发展的中原地区，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



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有首诗这样写道：“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在这批守旧的蒙古贵族的铁骑践踏下，土地处处荒芜，人民纷纷逃亡。旧制度复辟的魔影在中原地区游荡着。

忽必烈(公元一二一五——一二九四年)是阿里不哥的哥哥。兄弟俩早在争“汗”(即皇帝)位前就分道扬镳了。由于多年转战南北，忽必烈亲眼看到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亲身感受到各族人民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反抗，认识到要巩固统治，统一全国，必须“凡事一新，毋循旧弊<sup>①</sup>”。他在继位前，负责对中原的军事行动，在军中持法峻严，攻城拔地时禁止滥杀人民；在他管辖的邢州，鼓励农桑，厉行改革，生产迅速恢复，从而得到了蒙、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支持。

一二六〇年春，屡建战功的忽必烈回到开平，被拥立为“汗”。继位后的第一道诏令，就大张旗鼓宣告变法：“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sup>②</sup>。”他毅然表示要抛弃“遵祖宗之法”的守旧传统，坚决采用“汉法”。他所说的“汉法”，主要指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农业经济。忽必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废除蒙古贵族的分封、世袭制度，正式建立“行省”，加强中央集权；并参照汉初法家贾谊、晁错“众建而分其势”的“削地之议”，限制蒙古贵族在地方的权力。忽必烈首创的“行省”制度，是郡县制的进一步发展。它便于“统郡县，镇边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起着重要的作用。忽必烈又颁布“以农桑为急务”的诏令，命令各地破格提拔“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负责该地农业生产。

死抱着游牧生产方式和分封、世袭制度不放的“西北诸王”，看到忽必烈大刀阔斧地“鼎新革故”，实行变法，气得快发疯了！他们麇集到蒙古旧都和林，召开了“库里尔台”。所谓“库里尔台”，是蒙古贵族推举“大汗”、分封诸王的传统会议形式。会上“西北诸王”公然叫嚷：忽必烈“遵用汉法”，违背“本朝旧俗”<sup>③</sup>，应当废黜，由阿里不哥当“汗”。紧接着复辟的紧锣密鼓，阿里不哥粉墨登台，在和林称“汗”，并发号施令，要挟忽必烈承认蒙古贵族分封、世袭的特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围绕着前进与倒退、统一与分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终于从王室内部的分歧转化为外部的对抗，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年秋天，大风吹沙，烟尘蔽日，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军队会战于甘州东部。这一仗，击毙了叛军头目阿蓝塔儿、浑都海，阿里不哥只得收拾残兵败将狼狈逃窜。第二年，阿里不哥“伪言归顺”，偷袭和林，妄图卷土重来。忽必烈亲率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地前去讨伐，阿里不哥溃不成军，仓惶北遁。后来，阿里不哥屡战屡败，众叛亲离，不得不于一二六四年投降了。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为代表的守旧、分裂势力后，为了更有力地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实行“混一南北”的宏图，把统治中心从开平迁到了燕京（今北京），改国号为“元”。一场新的、更尖锐复杂的斗争开始了。

守旧派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在元王朝境内，阿里不哥

的死党“西北诸王”海都、乃颜等，继续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军事叛乱。海都是窝阔台的嫡孙，在西北割据一方，不服“行省”的管辖，忽必烈多次诏他入京，他都以“马瘦道远”为辞加以拒绝。阿里不哥僭称“汗”位后，他立即起兵呼应；阿里不哥兵败投降，他又怙恶不悛，召集“库里尔台”，自称“大汗”，纠合“西北诸王”麾兵直逼燕京。世代盘踞辽东的乃颜也乘机叛乱，构成犄角之势。面临顽固守旧的“西北诸王”贵族集团的疯狂反扑，忽必烈以“鼓荡风雷，驾馭群才，鞭笞九垓，粪扫凶灾”的非凡气概，车驾亲征，擒诛乃颜，消灭这股分裂势力，多次把海都叛军打得落花流水。

鼯鸣蟹应，同气相求。在元政权内部，以阿合马、桑哥为代表的守旧派，相继窃取丞相等要职，“屡毁汉法”。阿合马占有奴隶七千名，是个贪赃枉法的大奴隶主。据统计，因献妻女姊妹给他或重金贿赂他而当官的竟有七百多人！桑哥更是野心勃勃，指使儒家之徒为其刻石记功、树碑立传，图谋更大权力。这伙守旧派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敲骨吸髓，无恶不作。同时，当年在南宋尽唱老调子的反动道学家纷纷改换门庭，削尖脑袋钻进元朝廷，战战兢兢地捧出孔丘亡灵，“力扶周孔上经筵”<sup>④</sup>。他们鼓吹：“为政必因先王之道”，必须象孔丘那样“制礼乐”；孔丘“为百王师表，为万世立法”，必须“尊孔养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个儒生毫不讳饰地用“克己复礼”命名书房，曰：“克复堂”，十足暴露出这伙复古狂的反动面目！他们要“复”的“礼”，就是适应落后生产方式的分封、世袭制度。他们公开上书，反对以农桑为本，提出以守旧、倒退的孔孟之

道作为立国“大本”。他们的复辟活动，同“西北诸王”的叛乱活动，里应外合，成了对抗忽必烈法家路线的严重障碍。

忽必烈同守旧势力的代理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厉行“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的法治，明确宣布：凡在军前立功或上书陈言朝廷得失的人，可“速行迁赏”；对于贪官污吏，则“量轻重议罚”。他制定“官吏赃罪法”规定：贪污受贿五十贯以上者，受杖刑，除官职；一百贯以上者处死刑。在这条严明的法治路线下，阿合马、桑哥之流盘根错节的守旧集团迅速土崩瓦解。阿合马死后，忽必烈撤除他滥设的两百多所官署，裁汰了七百多名冗官。桑哥罢官后，忽必烈抄出他横征暴敛、贪污受贿的大量珍宝。同阿合马、桑哥之流用人唯亲相反，忽必烈实行的是“尊贤使能”。在封建社会中，作为阶级压迫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压迫是不可避免的。忽必烈也不例外，他曾把各族人民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但他还是力图把政权向各族地主阶级开放，以期缓和民族矛盾。他多次命令各地长官调查各族中有才能的地主阶级中下层人士，“列名上闻，以听擢用”。他不但重用了主张“汉法”的蒙族青年安童当宰相，而且破例起用汉人担当这个职务。具有法家倾向的科学家郭守敬担任了主管天文、水利的要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被委任为外交官和扬州总管达十七年之久，与忽必烈关系亲密。同他的前任相比，忽必烈的统治基础是比较广泛的。当时人们称颂道：“人材之得，于斯为盛”、“规模宏远，朝野清明”；后人赞扬忽必烈“纪纲法度灿然明备”，可与唐太宗“贞观之治”相比。这些评价与赞

美不是偶然的。

忽必烈“不重儒术”，他极其痛恨南宋“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有一次，他同儒生张德辉议政，张德辉喋喋不休地赞扬“圣人之道”，忽必烈问他：“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忽必烈汲取了“金以儒亡”的教训，坚定地说：元朝决不步金朝后尘，必须变革“祖宗法度”！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明令“禁阴阳图谶等书”，儒家那一套很吃不开，甚至孔孟后裔也“往往失学，甘为庸鄙”。社会上流传着“大元典制，人有十等”的说法，儒家列为第九等，比医、工、猎民的地位都要低下。南宋的遗老谢枋得为此呜呜咽咽地抽泣：“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sup>⑤</sup>有个叫董恢的儒家之徒，好歹混上个“酒税副使”的小官，租了间陋房权充官衙，他哭哭啼啼地写了首《僦居》的诗发牢骚：“白发苍头一腐儒，行无辙迹住无庐；邓林万顷青青木，肯为鹪鹩借一株。”意思是，他这个无家可归的“腐儒”还不如一种叫“鹪鹩”的小鸟！有一年，宫廷乐队缺少人，忽必烈就命令京都旁的“儒户三百八十四人为乐工”，让这些自命不凡的孔孟之徒干拉拉唱唱的老行当。难怪“儒学教授”仇远、李淦哀叹：现在连“小夫小妇”也敢嗤笑、挖苦儒家，这样，“天下今无读书者”<sup>⑥</sup>了！正是在这种社会影响下，著名的戏曲家关汉卿写出了控诉儒家礼教的作品；石君宝辛辣讽刺孔丘的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相传也在这个时期问世。当然，忽必烈有时也尊孔，他在“立新政，创法制，辩人材”的同时，也修了几间孔庙，印了几本儒家经典，用了几个儒生，甚至对失学无业

的孔孟后裔表示一点怜悯，但这不是他的主要倾向。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同刘邦一样，大抵是故作姿态、“英雄欺人”而已！比如，他任用过儒生许衡，但当许衡不执行法家路线，搞“以义为本”的儒家那一套时，忽必烈就严厉责问他：是孔丘教你这样做的吗？“往者不咎，今后毋然”。

“以农桑为本”，这是先秦以来的法家的传统政策。忽必烈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粉碎了守旧派和儒家之徒对农业生产的破坏阴谋。他再三强调：不管是汉人、色目人，还是蒙古贵族人，都“禁约军马”，不得肆意放牧，凡损坏庄稼者，一律严加惩处。他驳回守旧派和儒家之徒“请禁畿内农民复耕，恐妨刍牧”的上书，重申不得妨碍京城周围的农业生产。忽必烈在北方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组织大规模的屯田。在各族军民辛勤劳动下，开垦了大量乱草丛生的荒地，使军队供应“岁不乏用”，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他设立“劝农司”，掌管全国农田水利，命令各地“劝农官”经常外出考察，“劝农桑，抑游惰”，按照年终收成判定“劝农官”和州县官的勤惰，成绩卓著者赏迁，无成效、账目不清者贬黜，并“每岁申明其制”。他还设置“营田总管府”负责丈量土地，勒令超过“份田”数目多占土地的“权豪势要之家”，于一百天内自首，否则尽数追征隐漏税租，酌情断罪。这就多少抑制了一点蒙古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忽必烈的法家路线和政策，使受到宋、辽、金、元长期战争破坏的黄河、长江流域农业生产得到复苏和发展，造成了“版图生齿之繁，财赋畜牧之盛”超过历代的兴旺景象。过去专门从事游牧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

学会了稻麦桑麻的种植：棉花这种重要经济作物，开始在全国各地“滋茂繁盛”。郭守敬受忽必烈的委托视察西北河渠，领导人民兴修大量水利工程，他还远至“北海测景所”（北纬六十四点四度）、“铁勒测景所”（北纬五十四点二度）和海南诸地，观测天象，编制了先进的“授时历”。在忽必烈倡导下，司农司遍求古今农桑之书，“删其繁重，扩其切要”，由“劝农官”孟祺主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天下”。王祯的《农书》也在忽必烈时期成书、发行。女纺织家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妇女那里学得先进的纺织技术，在忽必烈去世前后传播到全国各地。这些重要的科学成就为我国优秀的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这与忽必烈的法家路线是分不开的。可见，把元朝看成我国历史的中断，这是一种多么狭隘的尊儒反法的偏见！

“乾坤噫气三百年，一风扫地无留残”。忽必烈能够摧枯拉朽般地扫灭支撑了三百年的宋王朝，发展了我国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归根结蒂，是由于他推行了一条“凡事一新，毋循旧弊”的法家路线。正是这条正确的路线，结束了中原地区南北对峙、边远地区几个割据政权并存的局面，促使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少数民族加快了历史发展的步伐。不过，忽必烈有时划不清“汉法”与孔孟之道的界限，他没能妥善解决当时沦为“驱丁”的奴隶，晚年又热衷于侵略性的征服战争，反映了他的阶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正象列宁指出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元世祖忽必烈，毕竟比杰出的成吉思汗提供了新的东西，在儒法斗争史上有着他

## 独特的贡献。

---

- 注：① 《新元史·世祖本纪》。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③ 《元史·高智耀传》。  
④ 胡紫山：《庆王承旨八秩》。  
⑤ 《谢叠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⑥ 《元诗纪事》卷十。



# “古今异势，便俗为宜”

## ——张居正变法

一五七七年（明神宗万历五年）十月，有一道很长的苍白的彗星，从西南直射东北。这个今天看来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却使正在进行变法的明朝政府受到极大的震动。那些反对变法的大贵族、大地主和儒家之徒麇集起来，硬说这个变异的天象是上天对“内阁首辅”张居正（公元一五二五——一五八二年）改革祖宗旧制、违背儒家礼教的一个谴责，将造成天灾人祸。

原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儒家“纲常”，他应该奔丧故乡，守孝三年。儒家之徒弹冠相庆，想趁机把这位法家赶走，把变法扼杀。张居正觉察了他们的阴谋，毅然冲破礼教，改变返乡计划，继续实行变法。这下，儒家之徒狗急跳墙，反对变法的急先锋吴中行和赵用贤一吹一唱，大放厥词：春秋时宰我要短丧，被孔圣人责骂，今天，“圣贤之训”还要不要听？“祖宗之制”究竟要不要？他们耸人听闻地说：这是关系到“万古纲常，四方视听”的大事，不然的话，“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裕”，后果将不堪设想。儒家之徒一个接一个跳出来，破口大

骂张居正是“贪位”、是“禽彘”，甚至把诽谤的传单贴满京都大街。面对儒家气势汹汹的攻击，张居正毫不妥协。他说，要实行变法，就得顶住守旧派的“浮言”和“谤议”；如果不顶住，那“天下事无一可为”。因此，他理直气壮地申明：为了国家利益，“怨敌何足恤”！他毫不手软地严惩了吴中行、赵用贤等顽固派。儒家之徒是不甘失败的，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咬牙切齿地记下了变天账。赵用贤被“廷杖”后，把受刑后的腐肉割下来，晒干留给子孙。守旧的大贵族、大地主纷纷为他们打气，送给赵、吴犀角杯和玉杯，杯上刻着：“不惜刻心，宁辞碎首！”鼓励他们把仇恨刻骨铭心，继续向变法进攻。

儒法两家，就是这样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因为它们代表着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爱国与卖国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

明代中叶，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末世征兆，在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反动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如明武宗朱厚照在他登极的一个月里，就掠夺大量农田，建立了三百多处“皇庄”。当时占地数万顷的“皇庄”、地主“庄园”遍及全国，造成千百万农民流离失所，一些中小地主也受到破产的威胁。以大官僚严嵩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集团，推行一条守旧、卖国的儒家路线，他们对内残酷剥削人民，据估计，饱读儒家经典的大贪官严嵩一家历年受贿的黄金有三十万两，白银有二百万两，而嘉靖末年国库存银仅十万两！他们对当时蒙古贵族的掠夺和倭寇的入侵置若

罔闻。严嵩甚至认为，侵略者只是抢些东西，腰包装满自然会走，不必兴师动众。这条儒家路线，使国势渐弱、危机日深。为了挽救垂危的封建制度，反动统治者需要进一步改造程朱理学，于是，极端腐朽反动的王阳明的“心学”炮制出笼了。王阳明总结了反革命经验，叫做：“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谓“山中贼”指造反的农民；“心中贼”指农民的造反思想和法家的变革思想。他竭力鼓吹“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主义，把“三纲五常”说成人心固有的东西，宣扬“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妄图把进步思想消灭在“一念发动处”，用孔学加屠刀“挽回先王之道”。

究竟是“挽回先王之道”，还是改革“祖宗旧制”？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地主阶级各党派面前。还在张居正担任“首辅”前，他就写了《陈六事疏》、《陈时事疏》，主张革除弊政，实行变法，限制“豪强兼并”，改变“赋役不均”，加强北方和沿海的边防，抵御蒙古贵族和“倭寇”的侵掠。当时担任“首辅”的守旧派李春芳首先跳出来反对，宣称变法会造成混乱，不符“帝意”<sup>①</sup>。妄图依仗权势，扼杀张居正的变法思想。

张居正不为守旧的“庞然大物”所吓倒，相反，他加紧了变法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他特别重视对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学说的研究，根据韩非“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提出了“古今异势，便俗为宜”<sup>②</sup>的变法口号，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只有顺着时代的变化，改革旧制度，才有出路。他高度肯定荀况的“法后王”思想，指出，“法无古今，唯其时之所宜”，必须按照现时的具体情况而立法。变法前夕，他认真

总结了秦王朝到明以前的历史经验。他热情歌颂秦始皇完成了“混沌之再辟”的创举，称赞秦始皇“创制之法”的变革精神，希望能把它发扬光大。他痛心地说，由于“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导致秦朝二世而亡，必须引以为诫，警惕赵高那样的“奸宄”和“六国余孽”那样的复辟势力。他肯定汉初法家刘邦、贾谊、晁错所继承的法家路线，赞扬他们不愧为“人杰”、“明臣”，为他们生气勃勃、厚今薄古的精神叫好。他喜欢读《盐铁论》，主张根据桑弘羊的经济政策，改革财政，增加国家收入。他是个“三不足”者，试图重演王安石变法。他痛恨汉元帝以后，尊儒反法思潮越来越占上风的历史现象，认为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他愤怒地说，当今“腐儒不达时变”，他们的守旧、卖国理论，完全是宋朝道学家的老调重弹，是“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张居正在这里多少认识了儒家理论是守旧、卖国的祸根。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一五七二年，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后，开始了历时十年的变法。

张居正首先实行了考核官吏的“考成法”，改革腐败的政府机构。根据“考成法”，一批执行儒家路线的守旧官僚被清除了，一批“有功于国家”的地主阶级革新派充实进政府机构，这就为变法作了组织上的保证。接着，他下令封闭各地几十处宣扬王阳明“心学”的“书院”，“不许别创书院，聚党空谈”，把许多“大者摇撼朝廷”、“小者匿蔽丑秽”的孔孟之徒从“书院”中赶了出来。张居正并没有放过尊孔的巢穴——“衍圣府”。当时的“衍圣公”孔尚贤（孔丘六十四代孙），是个口称仁义、行

同强盗的家伙。他在家乡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犹嫌不够，每年还打着“朝贡”的幌子，又抢又卖，无恶不作。张居正愤怒揭露：孔尚贤每年自曲阜入京“朝贡”，“沿途生事百端，军民避之，无异夷虏，及至京师，淹留数月，待私货卖尽，然后启行”，而政府机关对此不敢“绳治”，这究竟为什么？无非因为他是“先圣之后”，所以敢胡作非为。张居正严厉警告说：就是孔丘在世，今天也得乖乖“守朝廷之法”，你若“再行骚扰”，必将“参究”、“持法”！张居正接着下令：取消一年一度的“衍圣公”“朝贡”的制度。在变法风暴的冲击下，儒家之徒又是哀鸣，要求实行“宽大之政”，“重君德，苏民困，开言路”；又是污蔑变法“误国”，造成“水旱失调”；又是密谋暗杀张居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张居正并没有动摇变法的决心，他认识到同守旧、卖国的儒家之徒，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坚定地表示，为了变法事业，“赴汤蹈火，皆所不避”。在他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儒家的阴谋一一破产了。

一五七八年，张居正开始清查、丈量土地，把变法的矛头直指兼并、隐瞒土地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明初朱元璋统治时期，纳税的田亩为八百五十万顷；到明中叶，纳税田仅四百二十二万顷。另一半土地，被大贵族、大地主兼并、隐瞒了。经清丈，大部分土地恢复了税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清丈土地基础上，张居正又改革税制，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是把劳役和田税编在一起，按田亩征收税银，所以又叫“条编法”。它是符合货币经济发展的水平的，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抑制兼并和“均平税赋”。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遭到大贵族、大地主的疯狂反对，他们公开阻挡清丈，攻击新税制变乱了“祖宗成法”，“利于下，不利于上”，“利于编氓（百姓），不利于士（大）夫”。伪装拥护变法、骗取张居正信任的大臣张四维，指使一些反动儒生上书，攻击张居正使大臣都不敢讲话，托病不朝，“人情汹汹”，“流言四起”，政局不稳。他们阴谋策动政变，改变张居正的变法路线。大贵族、大地主、儒家之徒结成了反变法同盟，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张居正迎头痛击他们的进攻，明确宣布：皇室官僚、“强宗豪民”，“有挠法者，严惩不贷”！并惩处一批破坏变法的藩王和官吏。张四维一看苗头不对，赶快“韬晦”起来，图谋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张居正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国防，抗击倭寇的入侵。由于他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边防、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措施，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节节胜利。张居正曾身披戎装，威风凛凛地检阅新选拔的兵士。阅兵场上，呼声阵阵，旌旗飞扬。阅兵后，兵士们开往前线，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这个场面，同变法前武备废弛、兵力衰疲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反侵略战争中，他与抗战将领戚继光建立了深厚友谊，把戚继光派到反侵略前哨，担负军事指挥的重任。当卖国投降的儒家之徒对戚继光进行政治陷害时，张居正又挺身而出，保护这位著名的抗倭将领，挫败了儒家破坏反侵略战争的阴谋。

张居正的变法，打击了大地主阶级的兼并，抗击了外来的侵略，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产

的发展。但它依靠的只是上层统治集团和一部分地主阶级革新派，没有群众的斗争作后盾。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正因为如此，在张居正故世后，儒家代表张四维上了台，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立即把变法陷入血泊之中。大贵族、大地主统治集团以“纯任霸术”、“专恣擅权”的罪名，抄了张居正的家，惨杀了他的家族，革新派官员被排挤、迫害，相反，已被“考成法”革除的守旧、投降派粉墨登场，以大官僚严嵩为代表的儒家路线复辟了，新法一件一件被废除了。儒家的反攻倒算说明：在封建社会后期，即使不触动封建制度的某些改良，也是为腐朽的地主阶级所不允许的，封建社会无可挽救地走向其生命的尽头。

---

注：① 《明史·李春芳传》。

② 《张文忠公全集·辛未公法五策二》。

## 尊法反儒的斗士李贽

十七世纪初，明朝最高封建统治者神宗及其豢养的反动儒生，用“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sup>①</sup>等“罪名”，杀害了一位白发苍苍的法家斗士。他就是李贽。

李贽（公元一五二七——一六〇二年）生活在明代后期。由于大地主、大官僚贪得无厌地兼并土地，加上蒙古贵族、“倭寇”的掠夺日益严重，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四伏。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以“重开混沌之天”的气概，捣毁“皇庄”、“秣马孔府”、“污书（孔孟经书）于池”，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从正反两方面给李贽以深刻的影响。李贽从小思想就比较解放，他“不信学（儒），不信道，不信仙释（佛）”，“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少年时代，他就写过一篇《老农老圃论》，讥笑孔丘轻视劳动，赞扬樊迟学稼的反潮流行动。青年时代，他不满八股取士，公开声明他不愿参加进士考试。中年时代，李贽曾做过二十多年的小官。那些维护千疮百孔的封建制度的道学家们的卑劣行径，给了他强烈的刺激。特别是，与他同时代的法家张居正死后，儒家思想猖獗一时，守旧派向变法派反攻倒算，其手段之



毒辣令人发指。李贽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从儒家的营垒里冲杀了出来，不怕压，不怕杀，成为一位杰出的法家斗士。

一五七六年，李贽五十岁了。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他坦率地作了自我解剖。他说，以前他自己也盲目地“尊孔”，就象矮子看戏，跟着别人喝采，简直是“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自己“五十以前真一犬也”。李贽能作这样的自我解剖是很可贵的，表明了他对儒家思想的深恶痛绝。不久，李贽辞官，先后来到黄安、麻城开办学堂，著书立说，对孔孟之道和反动理学进行了大胆、尖锐、泼辣的批判，树起了尊法反儒的旗帜。

鲁迅说过：“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李贽的批儒正是这样。他处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腐朽的封建统治和无耻的道学说教的反动本质充分暴露，使他对儒家思想的批判达到封建社会法家人物的思想高峰。这必然引起儒家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当时麻城有个学阀叫耿定向，如李贽所说，此人善讲理学，表面上道貌岸然，但骨子里极为阴险毒辣。他的学府，门庭寥落，学生们走的走、溜的溜，都去听李贽传播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了。两千年前“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活剧今天又在麻城重演，这可把耿定向气得牙痒痒的。他又是威胁，又是利诱，都没能消除李贽的影响。后来，耿定向去京城当上了“都察院副都御史”，三番五次地写信给李贽，吹捧孔丘是“千古不容改易的模样”、“不可不依仿”的“圣人”，妄图依仗权势，扼杀李贽的战斗精神。李贽根本不买他的账，奋笔反击。在著名的《答耿中



儒法斗争史话插图

图十二

承》一文中，李贽给他当头一棒，说：孔丘只不过是一个“无学无术”的人，为什么事事必须依仿他？如果这样，“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这就是说，根本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另一封信中，李贽讥讽耿定向：你死抱着孔丘亡灵不放，又自吹“兼通诸圣之长”，真不愧为“圣人”的“继往开来者”，当代的孔丘呀！李贽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的老底：你从早到晚、年年月月，不是为了收租放债，就是为了造房买地，不是为了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可你讲学的时候，却口口声声“我为他人”、“我欲利他”，真可谓“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无耻之尤。这一封封信，象一支支利箭，射穿了这位道学先生的伪装。耿定向气得暴跳如雷，他指使麻城的一伙道学家，气势汹汹地打上李贽讲学的芝佛院来。李贽对于这些家伙极其蔑视，“令之远坐，嫌其臭秽”，他把这些道学先生们奚落得如坐针毡，纷纷逃之夭夭。远在京城的耿定向刚接到麻城党徒吃败仗的消息，忽然又传来了李贽招收女学生听课的事。这对他犹如晴天霹雳，轰得他六神无主，七窍生烟。京师专管礼仪的大官僚亲自出马，攻击李贽“肆行不简”、“勾引士人妻女”，伤风败俗。女子上学这个新生事物竟使得这伙儒家之徒如丧考妣。他们有的叫嚷：“女子无才便是德”；有的胡诌：“妇人目光短，不能听课。”耿定向乘机摇唇鼓舌，极力诋毁李贽，并写信威胁李贽立即停办女学。李贽不顾谩骂和威胁，坚持斗争。他回信挖苦耿定向：你的信无非是为我李贽招收女子上学“掩丑”吧，你真称得上道学先生了！他还专门写了《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指出：“人有男女”、“见有常短”，但决不能说“见

有男女”，更不能说“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李贽提倡男女平等的言行，是对耿定向一类道学家的有力打击，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否定。

一五九〇年，《焚书》出版了。这是一部向孔孟之道及其变种程朱理学猛烈开火的宣战书！李贽向儒家经典宣战，认为《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只不过是孔孟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录下来的“有头无尾”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鸡零狗碎的《论语》中不厌其烦地记载孔丘的奢糜生活，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惟酒无量，不及乱”啦，李贽在《四书评》中，批道：“惟酒无量，不及乱。大圣人！大圣人！其余都与大众一般。”<sup>②</sup>就是说，“大圣人”原来是个大酒鬼而已！在《焚书》的一篇《赞刘谐》中，李贽意味深长地讲了个笑话：有个道学先生时时拾起朱熹吹捧孔丘的话，叫做“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聪明的刘谐听后笑着说，怪不得孔丘以前，人们“尽日燃纸烛而行”。李贽机智形象的讽刺揭露了儒家之徒对孔丘的肉麻吹捧是何等的荒谬！李贽用他锋利的笔，抹去了孔丘头上的神圣光圈，又把孔家店的大小“圣人”一一推上了审判台。在李贽笔下，孟轲是个“以死语活人”的、“舛谬不通”的大草包；董仲舒只不过是特别迂腐的“章句之儒”；程颐、朱熹之类的道学家更是一些“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sup>③</sup>、“脸皮三寸”的无耻之徒。更不要说那些“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了！对反动理学的批判，这是李贽的主要贡献。李贽深刻指出：理学是害人误国、“流无穷之毒害”的“伪学”。他一一驳

斥了道学家的种种谬论。针对他们捏造的所谓“理”，李贽指出，“天下万物”是由“阴阳二气”所生成的。针对道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主张，李贽指出，人欲决不是罪恶的东西，“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尽管李贽这种说法属于地主阶级人性论的范畴，但他在当时提出这些思想，无疑是对反动理学的公然挑战，是对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猛烈冲击！

《焚书》收录了李贽同耿定向在尊孔和反孔的根本问题上进行论战的七封信，这就等于公开剥下了这位道学先生的画皮。《焚书》出版后，麻城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幼都在谈论李贽批驳耿定向的事。封建统治者和道学家们惊呼：李贽使麻城“一境如狂”了！耿定向意识到，他同李贽的较量，是一场捍卫孔孟之道、维护封建统治思想的斗争。于是，他气急败坏地发出《求做书》，恬不知耻地要求人们象子路保驾孔丘那样尊敬、捍卫他。他以当代孔丘自居，号召死党对李贽“鸣鼓而攻之”。耿定向的死党蔡毅中马上抛出《焚书辩》，疯狂地向李贽反扑。湖广一带的大官僚、大地主和道学家们沆瀣一气，攻击李贽“左道惑众”，要求把李贽驱逐出去。李贽毫不动摇，大义凛然地说：“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掷地有声的誓言，集中反映了他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

在反儒斗争中，李贽对法家思想认识更深刻了。他“手不敢释卷”地研究《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笔不敢停挥”地写下一篇又一篇为历史上法家“辩雪”的战斗檄文，吸取着历史上法家人物的斗争精神。《焚书》出版九年后，《藏书》出版了。那

时，李贽已经是七十三岁的高龄了。从南京的大街到麻城的穷巷，人们争相传阅《藏书》，“人挟一册”<sup>④</sup>为荣。耿定向的徒子徒孙们哀叹：人们“全不读四书五经了”！儒家之徒的悲鸣说明，这部书的出版是对传统的历史观的沉重打击，是尊孔派的一场灾难。

《藏书》和在一九七三年发现的李贽另一部重要著作《史纲评要》，是按照尊法反儒观点整理、评论的历史著作。千古历史的颠倒，对秦始皇的评价是一个重要内容。在儒家对秦始皇一片漫骂的妖氛迷雾中，李贽挺身而出，盛赞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他赞扬秦始皇以“天崩地坼”的英雄气概，“掀翻一个世界”，“挣得一个天下”，完成了千古伟业。他实行“焚书坑儒”，是大势所趋，根本“埋怨不得”的。李贽认为，秦始皇的事业就断送在赵高手里，赵高是粪坑里的“蛆”。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法家继承了秦始皇的事业，开创了汉王朝，直到汉元帝尊儒，才“不足称帝”，李贽痛惜地说：“天下不败于武，而败于元”。意思是说：汉朝的地主阶级天下不是汉武帝而是汉元帝所败坏的。这些杰出的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秦汉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李贽还为历史上的法家人物“一洗千古之谤”。他称赞吴起、商鞅、申不害都是“英雄”“好汉”，他们的法家学说，用到哪里，哪里就“国治兵强”；荀况、韩非的理论，才是“真实有用”，同专干“千古怪事”的儒生截然不同。他肯定贾谊“识时知务”；惋惜晁错惨遭冤杀；赞扬桑弘羊善于理财；歌颂曹操大有作为；赞扬柳宗元的《封建论》“卓且绝矣”；认为武则天治理国家“胜高宗十倍、中

宗万倍”；指出司马光的守旧、卖国理论“不足以动安石之一颌”。李贽对秦始皇和其他法家人物的精采论述，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封建社会中的法家先辈。

儒家反动势力是不能容忍李贽传播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的。《藏书》出版后，道学先生们制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策划着一系列的阴谋，他们必欲置李贽于死地而后快。李贽预感到一场新的迫害即将来临，他嘱咐朋友说，将书藏好，只要书没焚完，我死也心甘。一六〇〇年，耿定向的徒子徒孙们，怀着对法家学说的刻骨仇恨，闯进李贽讲学、著述、居住了十多年的麻城芝佛院，纵火焚烧院堂建筑，李贽在朋友的帮助下，幸离敌手。一年多后，也就是一六〇二年，耿定向的死党蔡毅中，一手炮制了蓄谋已久的迫害事件，他伙同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和“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用下流不堪的语言、荒诞不经的情节，制造“莫须有”的罪名，上奏神宗皇帝，经神宗皇帝亲手“批示”，“严拿治罪”，把七十六岁的李贽从病床上拖下来，用门板抬进监狱。李贽宁死不屈，为了免遭污辱，愤然自杀。在这以前两千多年，正当奴隶制崩溃前夜，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丘用所谓“五大罪状”惨杀了主张革新的法家先驱少正卯；而当封建社会灭亡前，日益腐朽的反动地主阶级又差不多以同样的“罪状”对本阶级的叛逆者下了毒手！

尊法反儒的斗士李贽，尽管他剔肤见骨地揭露和批判了孔孟之道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取代孔孟反动思想的新的理论武器。整个地主阶级的没落，决定了李贽不可

能找到这个阶级的出路，因此，尽管他尖锐地批判了儒学，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他对法家评价还有许多不正确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哲学思想上，他也没有能摆脱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有时甚至向佛教的唯心主义寻求解脱，这些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决定了李贽不可能从根本上批倒孔孟之道和反动理学。尽管如此，李贽还是遭到了儒家之徒如此刻骨的仇视和凶残的迫害！李贽的悲剧告诉我们：即使在封建社会后期，儒法斗争也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条路线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调和的余地。

---

注：① 《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

② 《四书评》。

③ 《续焚书·三教归儒说》。

④ 《诵幢小品》卷十六。



# “开了城门迎闯王”

## ——明末农民反孔斗争

轰然一声！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凌晨，明王朝京城——北京城墙的一角被强劲的人流冲坍了。霎时间，战马嘶鸣，杀声震天，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大军蜂涌而入。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走投无路，匆匆鸣钟召集百官，但是群臣百官早已四处逃命，哪里还见一个身影！他在绝望之中，只得凄凄凉凉地爬上煤山，挂在一棵槐树上吊死了。与反动统治阶级这种孤伶凄凉的景象相对照，起义军领袖闯王李自成在城里人民的夹道欢呼声中，戴着毡笠，穿着缥衣，骑了乌骏马，由起义战士簇拥着，威风凛凛地踏上明朝皇帝的宫廷。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就这样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中哗然倒塌了！

明末农民起义是明朝末年政治、经济危机总爆发的结果。从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没落的我国封建社会，到了明代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一小撮大地主大官僚和专权的宦官狼狈为奸，疯狂地兼并土地，造成了“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的局面，广大农村“黄埃赤地，乡乡几断

人烟”，封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明王朝对外软弱无力，经常遭到倭寇和我国北方境内满洲贵族的侵扰。整个明王朝已经“元气羸（léi 雷）然，疽毒并发”<sup>①</sup>，病入膏肓了。面临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以法家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曾经进行过变法；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李贽也冲破了层层障碍，勇敢地批判被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越捧越高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他们的斗争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有利于革命人民起来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也找不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出路。张居正对此曾哀叹道：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sup>②</sup>。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只有从根本上打碎反动的生产关系的桎梏，才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只有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一六二七年，以陕西饥民起义为序幕，以闯王李自成起义军为主力的农民大起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起义战士用“闯王”来称呼自己的领袖，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怒不可遏的仇恨。“闯”，体现了革命农民用武器砸烂旧世界，闯出新天地的豪情壮志。当时，农民被夺去土地，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旱、蝗、疫等严重灾害，本来就已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连活路都没有了。在起义的策源地陕西，甚至出现了“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的惨象。就在这种“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的情景下，封建统治阶级却依然过着荒淫无耻的

生活，明末朱由检时仅仅后宫的脂粉银一项，每年就要花去四十万两。一面是人自相食，一面是挥金如土，社会两极分化已经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条路——造反！

要造反，首先就要大破“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随着封建制度反动腐朽性的彻底暴露，李自成起义军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提出的平均思想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提出“均田”“免粮”的政治纲领。它抓住了儒家所维护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害。这个革命主张是要建立起一个“不纳粮”、“不当差”、“大小都欢悦”的理想社会。起义军每到一处，“杀富济贫”，“发粟赈饥”，并且大张旗鼓地宣传“均田免粮之说”，把孔孟之道所散布的“富贵不愆”的陈腐教条踩到了脚下。起义队伍攻克洛阳以后，立即逮住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大贵族福王朱常洵，将他押到周公庙前开了斗争会，向群众历数他的罪状，当场处斩，并且没收他的财产救济饥民。李自成起义军打破了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受到热烈的欢迎。到处流传着这样喜气洋洋的歌谣：

“杀牛羊，  
备酒浆，  
开了城门迎闯王，  
闯王来了不纳粮”。

起义军高举“闯”字大旗，用革命暴力狠狠地批判了儒家“非礼勿动”的说教，把封建纲常秩序全部打乱了。起义军无视束缚劳动人民手脚的孔孟之道，他们敢于褻渎一切与革命

法规相违抗的事物。公元一六三五年，起义军攻入凤阳，杀了在那里专门看守皇帝祖坟的贵族朱国相，怀着对反动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把火烧了明皇陵。消息传到北京，末代皇帝朱由检“素服哭”，而起义军则“合乐大饮”，共庆胜利。<sup>③</sup>这支坚持战斗近二十年的起义大军，转战黄河两岸，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杀绅衿富民”，“焚烧宦舍富宅”，“为民除害”。起义军将一批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勋戚大臣、王公贵族涤荡无余，“覆宗绝祀者，不可胜纪”，打得封建统治者胆战心惊。各地守将见起义军到来，“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各地“失陷”的告急文告如雪片一般飞向朝廷，朱由检就象陷入樊笼的野兽，“焦劳督(ào)乱”，一筹莫展，于是就来个困兽犹斗，“败一方即戮一将，隳(huī)一城即杀一吏”，忽儿削籍大臣，忽儿大辟疆吏，他在位的十七年内竟然换了五十多个宰相。从统治集团内部混乱不堪的末世光景中，也说明起义军闯字当头的冲天豪气，使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要闯新天，还必须坚决地批孔反儒。反动阶级越是接近死亡，便越是乞灵于孔孟之道。从宋代开始，伴随着地主阶级走向反动，产生了经过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加工炮制后形成的孔孟之道的变种——反动理学。由于这套反动体系更适应没落阶级复古倒退的需要，因此成为北宋以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救命稻草。俗话说，病急乱投医。有了反动理学这剂现成药方，当然更要当作万应灵药抓住不放了。朱由检一上台，就刮起了尊崇孔丘、二程的妖风。又是“授宋儒邵雍后

斋《五经》博士”，又是“释奠于先师孔子”，又是烧香，又是磕头，忙得不亦乐乎。明代的封建统治者还捧住孔丘的天命论不放，将自己装扮成“承天应运”的“真命天子”，企图以此来挽救明王朝奄奄一息的反动统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懂得，只有砸碎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才能赢得翻身解放。起义的农民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起义军在攻占荆襄地区时，还将“承天府”改为“扬武府”，针锋相对地宣布要用革命武力去打倒标榜“承天应运”的地主阶级政权。反动统治者尊孔崇儒，起义战士就批孔杀儒！他们把在明代升级为“至圣先师”的孔老二偶像，踩在脚下；把尊程、祭程的二程祠“荡然为墟”。当起义军攻占北京后，李自成还派兵攻破孔丘的老窝曲阜，俘虏了狼狈不堪地“执印信，跪纳道旁”的大恶霸知县孔贞堪。起义军在各地还诛杀了一批对抗起义、作恶多端的道学先生和五经博士。尊法反儒的斗士李贽曾对儒家进行了揭露批判，对那些象书蠹一样啃啮孔孟经书的腐儒、迂儒投以极端蔑视的眼光，但是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的反孔斗争只能止于嬉笑怒骂。只有革命的农民才能从行动到思想上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的孔孟之道。

农民革命的高潮，使“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斗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机构建立了；宗族祠堂焚毁了；土地菩萨砸碎了；受压迫最深的劳动妇女也上战场了。这种种敢于向旧世界开火的革命行动，充分说明农民阶级一旦冲破束

缚他们的罗网，就远远地超过法家的改革愿望，将封建的“纲常法纪，扫地无余”。起义军攻入北京前夕，同明朝军队进行了一场艰苦的决战，一举击败了拥有几万辆新式战车、总督七省军务的兵部尚书孙传庭，打得孙传庭“一日夜踰四百里”，拚命地逃命。经过这一仗，明朝的军事力量基本摧垮，“气败沮不复振”<sup>④</sup>。接着起义军攻潼关，取西安，建立了“大顺”农民革命政权，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了明朝的老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由于阶级异己分子和孔孟之徒的混入，社会上反孔与尊孔、前进与倒退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地反映到起义队伍里来。特别在攻占北京后，以窃取了天祐阁大学士和丞相要职的牛金星为代表的一小撮地主阶级尊孔派，逐步现出了原形。牛金星这个混入农民政权的孔孟信徒，抓到一点权势后，便“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样，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sup>⑤</sup>；他招揽儒生，开科选举，反对农民参政；他还在革命队伍里面排斥异己，挑拨离间，大刮分裂主义妖风，罪恶地破坏了大好革命形势。

由于部分农民起义领袖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被混入革命队伍内的儒家蠹虫钻了空子，再加上汉、满封建统治阶级内外勾结凶残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最终失败了。但是，广大农民反封建、反孔学的革命烈火是永远扑灭不了的。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摧毁了明王朝的统治，为清初法家路线的推行开辟了道路。

注：①③④ 《明史》卷三百九。

- ② 《张文忠公全集·诗五·闻警》。
- ⑤ 《甲申传信录》。

# “推故致新”

——明末清初的法家王夫之

三百年前，湖南衡阳荒凉的石船山下，搭起了一间土屋。土屋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副对联：

六经责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土屋的油灯下，一个瘦削、苍白的老人在伏案疾书。一会儿，他停笔凝视对联，手抚那写在一束束废旧帐簿上的书稿，感慨万端，不禁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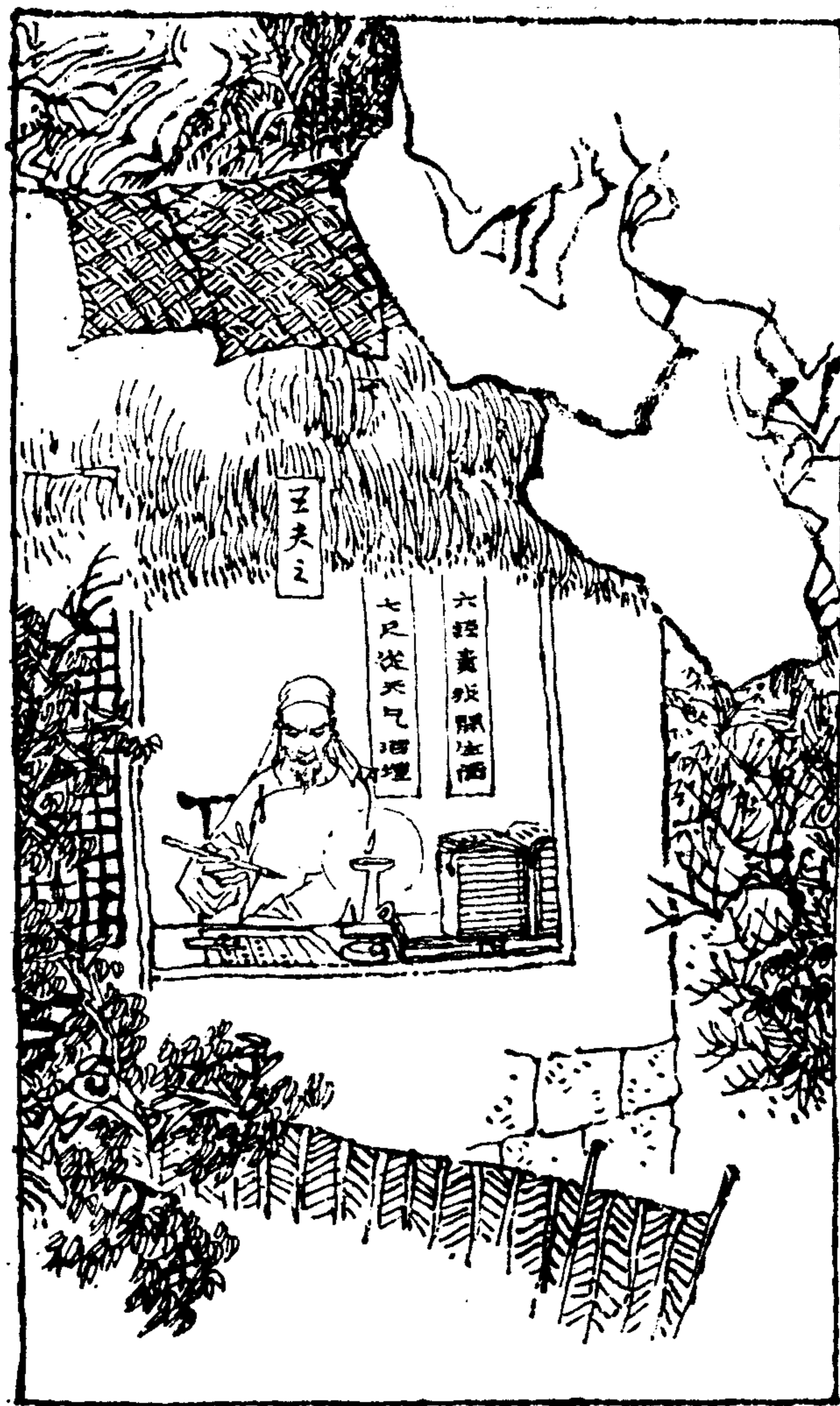
“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

他，就是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爱国主义者王夫之（公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在这间简陋的土屋里，他挥笔著书十多年，用犀利的笔锋“推故而别致其新”<sup>①</sup>，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孟之道及其变种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集我国古代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之大成，在儒法斗争史上写下了别开生面的一页。

王夫之生活在一个“天崩地解”<sup>②</sup>的时代。他十岁那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明末农民起义。起义军经过十多年的鏖战，以



儒法斗争史话插图



伟大的革命力量，摧毁了腐朽的明王朝。但是，以吴三桂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地主，引进虎视眈眈于关外的满洲贵族，血腥镇压了农民起义，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呈现出纵横交错的复杂情势。

还在明王朝灭亡前夕，年轻的王夫之就极其关注动乱的政局。他逢人便问天下大事，考察各地山水险要，了解四方民情疾苦，感到有责任改革社会、挽救国家。于是，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组织了一个叫做“匡社”的诗社。“匡”，就是匡正时弊、扶持国家的意思。他当时把希望寄托在荒淫无度的崇祯皇帝身上，要他奉诏进京的大哥用“痛哭”感动皇帝。但这个希望很快破灭了。在二十五岁那一年，张献忠起义部队克复衡州，请王夫之参加农民起义军，被他拒绝。他固执地用刀割破脸和手腕，装成重伤的模样，叫人抬到张献忠那里去，赎回被作为人质拘留的父亲。这些都说明：王夫之的变革思想和爱国主义带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深刻的阶级烙印。

满清贵族进关扼杀李自成、张献忠农民政权，一路上烧杀抢掠，对汉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奴役，甚至规定：汉人必须服从满人风俗，把前半个脑袋的头发剃光，后面拖上一根辫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面对这种民族压迫与人身污辱，王夫之“颈血如泉欲进出”，他写下了两篇悲愤的长诗，吟诵时哽咽不已，热泪沾襟。他决心投身到抗清的武装斗争中去。于是，他星夜赶到湘阴，上书湖北巡抚章旷，建议联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向东进攻江西，联合张献忠部向山西、陕西一带进攻，牵制南下的清军，并附上一份详细的抗清军事行动方

案。但是，章旷这个守旧、迂腐的官僚，是不会采纳王夫之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抗清的爱国主张的。王夫之不能再逗留了，他回到沦陷的故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起义由于寡不敌众失败了，但他认为：“与仇战者，败亦非辱”<sup>③</sup>。他并不泄气，冒着危险，忍着饥寒，跋山涉水，找寻汉族地主的抗清武装。当他听说广东肇庆建立了反清政权，立即日夜兼程前去投奔，准备再舒爱国抱负，挥洒忠贞热血。但是，在肇庆“南明”小王朝掌权的只是一些守旧的明末遗老遗少。他们内哄内行，抗战外行，极力排挤、陷害主张革新、抗战的王夫之。王夫之悲愤交加，失望地离开了肇庆。为了逃避清政府的迫害，他隐匿姓名，变换装束，自称僇人，流亡在荒山窑洞里，“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他到处拾些废旧帐簿当作稿纸，宣传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他一面写作，一面还要与饥寒搏斗，与敌人周旋，最后选定偏僻的石船山下，作为他新的战场。确实，作为明末清初的杰出法家，他生命后期的“推故致新”的批儒战斗，和他青年时代的改革和抗清斗争，是交相辉映的。

清初的“理学名臣”汤斌、李光地、魏象枢等，打着反对董仲舒“经学”、王阳明“心学”的幌子，拚命抬高程朱“理学”。宣称什么孔丘、孟轲、程颐、朱熹是儒家“正统”，而董仲舒、王阳明是“杂统”，扬言什么“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都不可违反程朱杜撰的“天理”。汤斌更露骨地叫嚷：“程朱为儒之宗”。你要求得孔孟之道，非从程朱理学那里找不可；就象一只船要有航线、港湾一样，不然，你只能望洋兴叹。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推崇程朱理学呢？哲学总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程朱

**“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是为宋朝的大官僚地主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投降侵略者提供理论根据的“理学名臣”们懂得：这种反动哲学，最适宜为满清贵族进行阶级与民族压迫辩护。王夫之要同这些鼓吹唯心主义、投降主义的儒家之徒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就必须揭露他们“反经学”、“反心学”的伪装，对儒家全部“经典”作“入其垒，袭其辎”<sup>④</sup>的批判，以暴露孔孟之道及其各种变种的反动本质，在批判中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这就是“推故而别致其新”、“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涵义。**

首先，王夫之用物质不能“创有”、不能“消灭”的原理，驳斥朱熹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的唯心主义谬论，认为它完全是“惑世诬民”的“贼道”。它同道家的虚无、佛教的“寂灭”一样，都是为了否认世界“实有”，欺骗、麻醉人民。王夫之指出，“气”才是“五行万物”、“飞潜动植”各种具体实物的共同的本质；客观世界是不断运动、“气化日新”的。接着，王夫之用真实的“理”——物质运动的规律，代替朱熹虚构的“理”。他说：“理在气中”。在《周易外传》中，他进一步指出，具体事物“器”与具体规律“道”的关系也是这样：“道不离器”。《周易》是儒家“六经”之一，汉以来注家蜂起，儒家的大量注释都是唯心主义的。这本儒家“经典”在每个朝代都被儒家捧出来，唱唯心主义老调，为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服务。但是，王夫之却借用儒家“经典”的材料，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使“六经”“推故致新”。这种披着儒家外衣批判儒家的手法，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家常用的斗争方式。

当时的“大学士”李光地贩卖一条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要人们掌握“志、敬、知、行”四个环节。“志”，即孔丘的“十有五而志于学”；“敬”，即“三十而立”；“知”，即“知天命”；“行”，即“从心所欲不逾矩”。王夫之深刻地揭露了这条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本质，对历史上的“知行观”作了批判的总结，明确指出，根本不是“先知后行”，恰恰是“先行后知”。他说，人的认识来自对客观外界的“闻见”。你要知道食物的滋味，就得品尝它。由于“闻见”不同，“圣人”办不到的事，普通的农夫、农妇却能办到。这真是真知灼见！朱熹不是把孔丘捧为天生“圣人”吗？王夫之抹去“圣人”头上的光圈，指出朱熹的吹捧无非是“推高孔子”。汤斌不是把朱熹抬到“儒宗”的吓人高度吗？王夫之讽刺道：想必朱熹平生定有一日“豁然贯通”了孔孟之道，不然，他何以“体贴”了“天理”，又何以成为“儒宗”？这些揭露和批判，可谓入骨三分。当然，王夫之的认识论仍然是不彻底的。他所说的“行”，仅仅是指个人的生活体验，而不是指人类的社会实践，即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他“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他一方面承认感性认识来自“闻见”，一方面又认为“德性之知”即理性认识“所得于天”，这就陷入了神秘主义。

“理学名臣”们为了替复古倒退、民族投降的罪恶行径辩护，学着朱熹的腔调喋喋不休，说“世风不古，人心日下”，宣扬什么三代以上“天理”流行，以后的一千五百年全是“人欲”支

配，一代不如一代。王夫之晚年写了《读通鉴论》，提出了历史进化的“理势统一说”，给儒家“泥古过高而菲薄当今”的历史退化论以迎头痛击！他指出：“势因乎时，理因乎势”。历史发展不仅有它的必然趋势，而且有它的规律；历史规律的“理”“只在势之必然处”。什么三代以上“天理”流行，完全没有根据！尧舜以前的人们，只能称为“植立之兽”；尧舜时代，中国只是尚未开化的“土夷”、“部落”；夏、商、周三代，“国小而君多”，人们“衣百结而食草木”，十分野蛮、落后。人类社会同自然界“气化日新”一样，也在不断地“趋时更新”，由野蛮到文明、由低级到高级、由分裂到统一，在“革命改制”中向前发展。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大“变革”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的趋势一直发展到明末。这就有力地否定了儒家的“三代盛世说”。当然，王夫之不可能懂得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把“人欲”看作历史动力，并把地主阶级的阶级特性称为天下之“大公”，美化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他的“理势统一说”也没有摆脱唯心史观的羁绊。

《读通鉴论》第一篇《秦始皇》，是王夫之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最精采的一篇。王夫之以“理势统一说”评论秦始皇的功绩，他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这是历史的“势之所趋”，是完全合乎历史规律的，从而对封建社会中的法家人物关于秦始皇的评价作了理论总结。王夫之说，在郡县制下，虽是立了大功的人，也不能提拔自己没有才能的子孙，相反，有才能但地位较低的中小地主反而有可能进入统治阶层；人民即使遇到“贪残”的守令，也尚有希望通过罢免守令而

减轻痛苦。这些都是郡县制比分封制优越的地方。谁如果为分封制辩护,那只能是“无益之论”。王夫之还指出,秦王朝二世而亡的主要教训是“托国于赵高之手”,是赵高复辟的恶果。这是很有见地的。不过,王夫之在这篇著作的结尾,推崇孔鲋的反动处世哲学,损害了它的战斗性。王夫之肯定秦始皇,但对历史上一些法家人物,如申不害、韩非、王安石、张居正、李贽,曾作过非难。这也说明,对法家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人迹罕至的石船山土屋,并不是与世隔绝的。社会上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风风雨雨,同样把它卷了进去。曾经抛出“合二而一”这种调和矛盾、取消斗争理论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方以智,看到抗清已没有什么希望了,就来到石船山土屋,劝王夫之和他一起当和尚去。王夫之谢绝了他的邀请,表示了批判孔孟之道、反对民族压迫的决心。王夫之六十岁那年,云南藩王吴三桂起兵叛乱,这个卖国大儒恬不知耻地打起恢复明朝的旗号,妄图篡权。反动儒生胁迫王夫之参予叛乱,王夫之看穿吴三桂的政治野心,断然拒绝。他躲进深山,写了《被楔赋》,申明他与吴三桂“意不属”。他坚持自己的革新、爱国的理想,战斗到最后一息。晚年他体弱多病,不能起床,手腕麻木,不能握笔,但他珍惜寸阴,不辍写作。他把纸墨笔砚放在卧榻旁边,勉强点画,以惊人的毅力写下大量著作。逝世前,他自题画像,自己枯瘦的“形骸”,竟然“把镜相看认不来”,但他坚信美好的“梦”一定会“圆”,“春天”一定会降临!他替自

己的墓碑所题的简短碑文中，有一句“抱刘越石之孤愤”的话。刘越石即西晋时枕戈达旦、闻鸡起舞的刘琨，主张反抗匈奴入侵。这也说明，王夫之直到逝世，一直没有放弃他变革、爱国的法家主张。

---

注：① 《周易外传》卷二。

② 黄宗义：《南雷文定·前集》卷一。

③ 《章灵赋注》。

④ 《老子衍·序》。



# “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清圣祖康熙

清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康熙（公元一六五四——一七二二年）到了“亲政”的年龄了，这使“辅政大臣”鳌拜颇有点惶惶不可终日。鳌拜这个家伙，是个飞扬跋扈、顽固守旧的大贵族，康熙“亲政”前，他独揽朝政，干尽坏事。这天上朝，鳌拜心惊胆颤地跨进宫廷，只见康熙与十几个少年又在玩叫做“布库”的斗力游戏，不禁转忧为喜：哼，毕竟“帝弱且好弄”！一个热衷于玩耍的十六岁的少年，能把我——一个元老重臣怎么样呢？就在这个当儿，只听得一阵唿哨声，十几个少年扑向了他，你曳头，我拉脚，把他严严实实地捆了起来。

年青的康熙皇帝以极大的机智和胆略，逮捕了党羽密布的守旧派头目鳌拜，这是清初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革新和守旧势力的第一次大较量。当时，清王朝开国不久，立足未稳。由于满、汉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长期战争及其联合起来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造成农业凋敝、人民流离，加上沙俄强盗虎视眈眈觊觎中国，清王朝的巩固和独立遭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各族人民的长期斗争，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的

扫荡,大地主阶级守旧、分裂势力削弱了,人民要求恢复生产、统一国家、抵抗侵略。十六岁的康熙顺应历史趋势,立志做一个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英君”,期望推行“天下大权,当统于一”<sup>①</sup>的法家路线,巩固和发展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但是,他首先遇到了一只凶恶的拦路虎——鳌拜守旧集团。

鳌拜推行的是一条“率祖制,复旧章”的儒家路线,他大搞“圈地”、“投充”和“逃人法”,顽固坚持入关前满洲贵族推行的那种带有奴隶制残余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谓“圈地”,是满清贵族传统的一种大规模掠夺土地的形式。所谓“投充”,即强迫汉人“隶八旗为奴仆”,使原先的农民沦为奴隶。所谓“逃人法”,即凶恶地镇压反抗压迫的奴隶。在鳌拜这一伙满清守旧贵族的蹂躏下,大批农民被驱逐,土地成为牧场;又有许多人则重新失去人身自由,被迫为满清贵族做牛马。鳌拜这一伙守旧贵族正是依赖这些祖宗旧章飞黄腾达起来的,这条反动路线严重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当时,在一些主张缓和民族矛盾、发展农业生产的大臣支持下,康熙决心改变这些祖宗旧章。那些暴发户们牙咬得格格响,他们麇集到鳌拜周围,丧心病狂地阴谋刺杀康熙、发动政变。为了替鳌拜篡位制造舆论,鳌拜的爪牙阿南达之流肉麻地把鳌拜捧为“圣人”,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康熙意识到:他同鳌拜守旧集团已经到了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地步!为了不打草惊蛇,康熙一面亲自调查鳌拜罪状,一面挑选了十几个机智勇敢的少年,以游戏为名智擒鳌拜。鳌拜被抓后,康熙立即宣布他“欺君擅权”、“恣意妄为”、“引用奸党”、

“意图倾害”等三十条罪状，把他坚决地镇压了，扫除了推行法家路线的一个拦路虎。

剪除了鳌拜，掌握了政权，康熙立即下了“禁止圈地令”：“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以后又修改“逃人法”，禁止掠夺人口和奴婢殉葬。明末清初的动乱，留下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摆在这位年青的皇帝面前。在这千头万绪中，关键抓什么呢？儒家之徒魏象枢蛊惑他：“唯教化为朝廷之先务，礼制为教化之大端。”意思是：关键在于“复礼”！康熙没有受骗，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和抵御沙俄的侵略上面。他认识到，当务之急，是要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于是，他从纷纭复杂的社会问题中理出“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sup>②</sup>。削除“三藩”，是加强中央集权、消灭分裂割据势力的首要问题；河务、漕运，则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和巩固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问题。这三件大事，确实抓住了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

云南藩王吴三桂、广东藩王尚可喜、福建藩王耿精忠，本是靠血腥镇压明末农民起义、无耻出卖汉族人民利益起家的反动军阀，是守旧、分裂势力的代表。“三藩”中，尚可喜集团“以凶虐横于粤”，耿精忠集团“以税敛暴于闽”，吴三桂集团更在云贵一带，私自设关收税、杀人越货，招兵买马，酝酿叛乱。人民被这伙蠢贼害得苦不堪言。“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却换来了三个气焰赫奕的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

一六七三年，即康熙亲政的第五个年头。“三藩”已形成“撤亦反，不撤亦反”的局面。康熙断然下了撤藩令。朝廷中

的守旧派跳出来反对，胡诌苗族人民不易制服，撤藩调兵驻防，反而会“骚扰地方”，还是不撤为妙！理学家熊赐履更是威胁说：“一夫称乱，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欤？”当时的形势是：朝廷中“言不可撤者甚多，言宜撤者甚少”。康熙严厉地驳斥他们：“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不早除之，将养痍成患”！撤藩令传到云南，吴三桂立即调兵遣将，燃起叛乱的烽烟。但是，搞分裂割据总是违反时势、不得人心的。亮出什么旗号才能“名正言顺”呢？吴三桂为此费尽了心机。打出“反清”的旗号吧？谁都知道，他是顺治皇帝的一条宠犬；打出“复明”的旗号吧？妇孺皆知，他是出卖汉族利益的无耻汉奸。吴三桂绞尽了脑汁，好歹炮制起一篇《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书》，挥舞孔孟之道的破旗招摇撞骗。这篇奇文，以“与明室复仇”，“伐暴救民，举道义之儒”为号召，宣称什么：“彗星流陨，天怒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妄图乞灵于儒家的“天命论”、“三纲五常”，网罗亡命之徒，实现其狼子野心。在吴三桂的黑旗下，尚、耿二藩及云、贵、粤、蜀、陕的一些提督、巡抚，察哈尔蒙古贵族纷纷起兵，参予叛乱，几个月功夫，叛乱势力控制六省、波及十省，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消息传到京师，“举朝震动”。魏象枢又来兜售孔孟之道。他荒谬地主张：对“三藩”作乱，应本着孔孟“以德报怨”的遗训，袭用舜感化苗民的办法，“不烦用兵，抚之自定”。那些守旧派与“理学名臣”们也跟着嗡嗡营营：“请诛诸臣之建议撤藩者”，企图重演吴王刘濞诛晁错、清君侧的丑剧。康熙却从容镇定，决心“不蹈汉诛晁错之辙”，坚定地回答：首先主张撤藩

的是我！吓得那些“理学名臣”直吐舌头。他不顾守旧派反对，一方面指令大军讨伐，一方面诏书天下，揭露吴三桂“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的反动嘴脸。

在康熙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吴三桂居心叵测地抛出“画长江而国”的议和条件，并抬出西藏达赖喇嘛从中斡旋，乞求康熙“裂土罢兵”，实行南北分治。康熙对这种制造分裂局面的荒谬主张“严斥不许”，使“三藩”的分裂割据阴谋象肥皂泡那样破灭了。由于康熙坚持统一、推行削藩的正确路线，至一六七八年，叛乱武装被康熙的平叛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吴三桂垂死挣扎，表演登基丑剧。他匆匆忙忙漆黄“殿瓦”，“构芦舍万间为朝房”，厚着脸皮、强打精神在凄风苦雨中登基称帝，“改元昭武”，“置百官、封诸将、造新历”。可是，他惊恐不定地过了半年皇帝的瘾，就一命呜呼了。吴三桂死后，这场分裂叛乱又支撑了三年，便被彻底平定。事实证明：历史要求统一、人心反对分裂，“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康熙扫平了“三藩”，为他实现“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的伟业打下了基础。

台湾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一六八三年，朝廷的守旧派提出“迁其人弃其地”的分裂主张，鼓吹放弃台湾。康熙坚决驳斥了这种谬论，认为台湾“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为此，他毅然派遣施琅率兵收复台湾，收降同“三藩”勾结作乱、已经蜕变为分裂割据势力的郑克塽集团，有力地巩固了我国南部边疆。明末杰出的爱国主义者郑成功赶走侵占台湾的荷兰殖民主义者和康熙统一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在历史上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明末大地主统治集团的腐败政治，导致水利失修，淮、黄两河经常横溢农田。如一六七七年，黄河与淮河溃堤几十处，泛滥成灾，使黄河地区七州县淹为大泽。水患成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严重障碍。因此，康熙把河务、漕运列为当务之急的“大事”。

“勤民不惮周行远，早又观风向浙江”。平定“三藩”后，康熙六次南巡，视察黄、淮两河。他步行观察水势，征询百姓意见，督促地方官吏，编制治河预算，大规模地组织了两河的修治。他下令将藩王霸占的土地归还原主耕种，鼓励农民垦荒，规定：地方官“能如数招民开垦，照立功之例”。农民缺乏耕牛、种籽，则由官府“分行助给”。每年春耕，康熙总是亲自“留心究问”“雨水田禾”，“直到秋成，始稍释念”。及至晚年，康熙虽“年近七旬，精力渐衰”，仍“扶杖而阅耕种，临畦而观刈麦”。为了发展农业、水利，康熙多次强调“人力夺天工”，“躬行实践”。他注重科学、生产的实际活动。他说，孔孟的天命论“俱系粉饰空文”，根本不可信；他揭露理学家们“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sup>③</sup>。为此，他“手不释卷”，带头研究自然科学，亲自写了《三角形推算法论》，编制《皇舆全览图》，反映了当时数学、地理的研究成果。康熙这样重视农业、水利，在历代帝王中是罕见的。他这些做法，使受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当然康熙推行的法家路线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效，是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力量扫清了道路，打下了基础。

康熙在解决昼夜悬念的“三大事”时，并没有因“三藩”叛

乱而怀疑所有的汉族官吏和将领，相反，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发展农业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他派《全唐诗》编纂者曹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当“江宁织造”，到江南一带做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这个正确的政策团结了较多的人，有利于“三大事”的实现。作为出身满洲贵族的封建统治者康熙，当着他为巩固封建统治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团结汉族地主阶级、对付人民反抗的时候，他也需要孔老二，也打着尊孔的旗号，他亲手炮制《孔子赞》，御书“万世师表”的匾额，为孔丘、孟轲的庙堂写碑文，把朱熹捧为孔门“十一哲”，还亲自讲解过《三字经》。这反映了康熙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从康熙对“三大事”的重视程度来看，当着他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实现社会的安定而进行重大斗争实践时，他实质上推行的则是一条革新、统一的法家路线。康熙的法家路线，使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有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时期，对巩固和发展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有效地抵御沙俄的侵略、扩张，起了一定的作用。

反击沙俄的侵略，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这是康熙的又一杰出贡献。列宁说过，在沙俄农奴主“这个阶级眼里，中国不过是块肥肉”。对于这块“肥肉”，“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沙皇先是派出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者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组织“远征队”，用抢和骗的方法，掠夺我国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居民财产；并任命巴伊科夫为使节，打着“大使”的招牌，密探中国的军事实力、政治经济情报和侵入中国的路线。一六七六年，正当康熙倾

注全力平定“三藩”之际，沙俄乘机在黑龙江流域大肆侵略扩张。这伙强盗抢掠财物、焚烧房屋，甚至灭绝人性地“杀土人而食”。同时，沙俄使团在胁迫康熙向沙皇屈膝称臣的卑劣要求严遭拒绝后，狂妄叫嚣：只要有两千名哥萨克，就能“征服所有地区，一直到中国的长城”<sup>④</sup>，公然对中国进行军事讹诈。面对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守旧派吓呆了。“征剿罗刹（俄罗斯），众皆难之”。守旧派散布“道远难以成功”的失败主义论调，反对武装抵抗。但康熙没有为侵略者的凶焰吓倒，他坚定地说：“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决心出师“深入挾伐”，“速加翦除”！他指令清军：决不放弃一寸领土，哪里出现侵略强盗，就在那里“擒杀”！康熙向沙俄发出通牒，警告侵略者，如“执迷不悟”，“难免诛罚”！中国的严正立场，狠煞了沙皇的威风，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坚强决心。

一六八二年，康熙在平定“三藩”后，组织了反击沙俄侵略的正义战争。除雅克萨城外，清军一鼓作气、趁胜追击，把沙俄强盗打得大败。一六八五年和一六八六年，康熙又组织两次围攻雅克萨城的反侵略战争，击毙沙俄守将托尔布辛，把雅克萨城围得水泄不通。沙皇政府乞求解除对雅克萨城的围攻，提出派遣使节谈判领土问题。一六八八年，沙俄全权代表戈洛文到北京；第二年，双方在尼布楚会晤。康熙派遣代表赴尼布楚谈判时，让代表带着中国数千名将士作后盾，并继续进行自卫反击战。清军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迫使戈洛文乖乖地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上签字，归还沙俄侵占的部分中国领土，并承认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是我国领土，而清政府



为了两国的睦邻关系,也作了必要的让步。

然而,沙俄侵略者并没有死心。条约的墨迹未干,沙俄又利用我国北方准噶尔部落的贵族集团,在蒙古、新疆、宁夏、西藏广阔的边境大肆骚扰,阴谋把中国的西北肢解出去。针对沙俄的颠覆阴谋,康熙坚决反击。他认为,只有消灭勾结沙俄的准噶尔分裂势力,“捣其巢穴,方为万年之计”。“辛苦事亲征”。康熙不愧为我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不避艰难险阻,亲自率军三征准噶尔。一六九六年,康熙越过广袤的沙漠,追赶分裂主义者噶尔丹为头子的准噶尔叛军。噶尔丹是个卖身投靠沙俄的民族败类,他动辄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犯”。守旧派们听说后惊慌失措,李光地、伊桑阿等人又是装神弄鬼,用《易经》算卦,胡诌出师将不利,又是死死拉住康熙坐骑,“力请回銮”。康熙怒斥道:那个凶卦应该在噶尔丹身上应验!我“不见贼而返,何以对天下!”他不顾李光地、伊桑阿之流的阻挠,亲自绘制地图,指挥战争。“残寇疲宵遁,横冲节制兵。我师乘锐气,谁许丐余生。”经过激烈的鏖战,击溃了噶尔丹分裂势力,使沙俄的颠覆阴谋可耻地破产!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和准噶尔叛乱的平定,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表明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康熙领导抗击沙俄侵略后的一百五十年中,中俄没有发生领土纠纷。中国有史以来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条约——《尼布楚条约》一直是有效的。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大举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沙

俄充当了瓜分中国的罪魁，它强加给中国的所谓《璦琿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割去了我国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鲸吞中国领土，这才造成历史上的边界问题。

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在对我国大肆侵略扩张的同时，粗暴地歪曲历史，硬给康熙加上一顶“敌视俄国”的帽子，胡说什么“中国当时是侵略和进攻的一方”，《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具体体现”，还无耻地用当年中国人民手下的败将来命名被侵占的中国领土，制造中国的领土以长城为界的神话。新沙皇比老沙皇的魔爪伸得更远，它的侵略扩张胃口连老沙皇也自愧不如。但是，具有反侵略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新沙皇胆敢来犯，必将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 
- 注：① 《康熙政要·君道》。  
② 《清史稿·靳辅传》。  
③ 《康熙实录》卷一一二。  
④ 《尼果赖出使日记》。

# “九州生气恃风雷”

——清末法家龚自珍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这是清末法家龚自珍(公元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的著名诗篇。一八三九年春，四十八岁的龚自珍因反对清朝反动统治集团的守旧、卖国路线，辞官离开了京城。他雇了两辆车，自己乘了一辆，另一辆装满了书，直向故乡杭州驰去。途经镇江，只见万头攒动，熙熙攘攘，人们祈祷玉皇、风神和雷神赐给人间一个风调雨顺的丰年。锦绣河山、明媚春光被这种乾隆、嘉庆以来盛行的迷信活动搞得乌烟瘴气、昏昏沉沉。这时，一个口中念念有词的道士见坐在车上的龚自珍是个读书人，跑上前来，掏出青纸，请他写篇呈献玉皇的颂词。龚自珍触景生情，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了这首诗，发出了法家人物的战斗呐喊。

我们知道，一八三九年正是我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转折的历史关头。再过一年，便爆发了鸦片战争。这时，康熙统治时期的那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一去不返了，整个封建制度犹如《红楼梦》一首曲子中所描绘的，“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尤其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打开了摇摇欲坠的“大厦”之门，鸦片就象黑色的瘟疫一样迅速蔓延。据一八三五年统计，官吏兵丁、地主商人吸食鸦片者达两百万人以上；一年中流入英国的白银有三千多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十分之一强。鸦片的倾销，造成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以穆彰阿、琦善为代表的守旧、卖国集团，一面公开贪污受贿、充当英国的鸦片贩卖商，一面转嫁财政危机，通过兼并土地、苛捐杂税、高利盘剥，搜括民脂民膏。光琦善一家，就兼并了二百五十六万余亩土地。这就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广大农民不堪忍受饥寒交迫，纷纷结社起义，反对守旧、卖国的清政府。

面对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柱石的封建大厦倾覆的局面，龚自珍“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他沉痛地指出：封建制度已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他把被鸦片吞噬了劳动力与战斗力的封建社会形象地比作一个长满了“疥癬”的病人，这个病人“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虽“甚痒且甚痛”而“无所措手”。那么，造成封建社会病势深沉的原因是什么呢？龚自珍认为，主要是官僚、科举制度的腐朽。他用当时流传的一句民谚“新官忙碌石呆子，旧官快活石狮子”，形容官僚、儒生们的丑态。“石呆子”是一种碾米用的滚石。新官上任，榨取民脂民膏，比“石呆子”还要忙碌。一旦身居高官，

就象石狮子那样，根本不管“国事”，想的是“车马服饰”、荣及子孙，搞的是贪污贿赂、阿谀奉承的“无耻”勾当。当时有个被道光皇帝捧为“学问渊博”的“心腹重臣”叫曹振鏞，曾总结为官之道的一句话，叫做“多磕头，少说话”。他的门徒当了官，他赠言总是：“毋多言，毋博豪气”。在这些行尸走肉们的统治下，社会怎不“万马齐喑”呢？

在封建社会末世，龚自珍能够对腐朽的封建制度作出如此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在风起云涌的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洪流的冲击下，封建制度的内部矛盾得到了充分暴露。同时，这也和龚自珍的尊法反儒的立场分不开的。乾隆、嘉庆以来形成的“乾嘉学派”，其末流用对儒家经典的烦琐考证为反动统治者帮闲；而当时的道学家则用程朱理学直接为反动统治集团帮凶。道光皇帝、穆彰阿、琦善之流整日口挂“天理”，极力推崇朱熹，为其守旧、卖国辩护。朝廷大小官吏，大都出于翰林，翰林是在大学士穆彰阿“总裁”下的，人们称之为“穆党”。这“穆党”就是一伙手捧“朱子语录”、口谈“性理”“天命”的儒家之徒。龚自珍一反乾嘉学派的迂腐学风，“慷慨论天下事”，尖锐地指出：“儒家之言，以天为宗，以命为极”，完全是为了假借天威，要人们俯首听命于守旧派、卖国贼的腐败统治。龚自珍说：“后世儒益尊，儒者颜益厚”，随着尊儒反法思潮一浪高一浪，儒家的脸皮越来越厚了。他们死死地“抱残守缺”，捧着“经书”，通过“高语前哲王”，来“援古以刺今”，是“改图更法”的最大障碍。他大声呵斥：“安用迂儒谈古道”！龚自珍找不到新的反儒思想武器，他只能象封建社

会其他法家一样，从他的前辈法家那里汲取力量。在《己亥杂诗》中，他写道：“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确实，还在少年时代，他就十分注意学习法家思想。他九次手抄王安石著名的《上皇帝万言书》，立志做一个王安石那样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称赞商鞅和王安石的变法，希望以历史上的改革事例为自己的变法主张开拓道路。他在诗中这样说：“此是商鞅垦土令，不同凿空误开边。”按照王安石“三不足”的战斗口号，他提出：“法改胡所弊”，“事例变胡所惧”！疾呼：“奋之”！“奋之”！他的呼声，就象一块巨石，投向了理学统治的“万马齐喑”的思想界。

龚自珍尊法反儒的战斗论述，引起了反动统治集团及其帮闲、帮凶们的极端恐慌。有首诗反映了这样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个位至“上相”的顽固派依仗权势，禁止龚自珍针砭时弊。龚自珍对此不屑一顾，说：“守默守雌容努力，无劳上相损宵眠”<sup>①</sup>，给这位显赫的“上相”当头一棒！在古经籍中讨生活、不敢触及时事的经文学家陈奂、江藩之流，竭力拉龚自珍加入他们一伙，要龚自珍注疏、考证《易》《书》《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删毁《乙丙之际箸议》等激进的政论。龚自珍写诗讽刺道：“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sup>②</sup>他公开声明：他研究的是“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即天下大事，决不做被孔孟牵着鼻子走的“书蠹”、“魁儒”！龚自珍不受利诱，不怕迫害，坚持他的尊法反儒立场和变法主张。

那么，怎样实行变法呢？龚自珍“渊渊夜思”，设想了许多改革方案。他的变法主张对内主要是“平均土地”。他认为土

地不均、贫富悬殊，是一切社会弊病的“本源”，挽救社会危机的最大的问题，“莫高于平之之尚也”。他主张按照宗族关系，划分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然后“按宗授田”。他希望整个社会能按照宗法关系形成一个“宗能收族，族能敬宗”的严密整体。龚自珍的“按宗授田”，同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其进步意义是有限的。同时，龚自珍描绘的这幅封建剥削的图景，是企图通过限制大土地所有制而保留中小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并没有超出历代革新的范围。他自己也承认“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这就决定了龚自珍的改良药方在封建社会痼疾面前必然是无能为力的。

龚自珍的变法主张对外主要是武力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他写了著名的政论《西域置行省议》，建议迁移“性情强武”的人民去西北戍边，遏制沙俄的侵略扩张野心。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中，凝聚着龚自珍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龚自珍晚年，由于鸦片贸易激化了财政危机，清王朝内部展开了一场爱国与卖国的大论战。穆彰阿、琦善、伊里布为首的投降派，从罪恶的鸦片贸易中牟取大量贿赂，反对严禁鸦片。他们以孔孟的“仁政”为理论根据，鼓吹什么“圣朝宽大”，严禁鸦片“有伤政体”，应该“以礼晓喻”；还说什么英国“船坚炮利”，“边衅一开，兵结莫释”<sup>③</sup>，他们同英国侵略军头目义律勾勾搭搭，又是设宴招待，又是“犒师英人”，又是签订割地、赔款的秘密条约。难怪当时有首民谣讽刺说：“海外方求战，朝廷言议和，将军伊里布，宰相穆彰阿。”在这场战争爆发前夕，以林则徐为

代表的抵抗派，主张“法当从严”，武力禁止鸦片。龚自珍是坚决站在林则徐一边的。他写了今已散佚的《东南罢番舶议》，指出：必须警惕“隆眶高鼻”的西方资本主义强盗“环伺澳门，以窥禺（番禺即今广东）服”的阴谋。一八三八年十一月，朝廷命林则徐赴广东禁烟，龚自珍写了洋溢着爱国主义气息的檄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文中对英国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痛心疾首，他说：鸦片是使人“病魂魄，逆昼夜”的“食妖”。他主张用斩、绞等最严厉的法律措施，制裁贩卖、制造、吸食鸦片者。针对穆彰阿之流“为宽大”、“毋用兵”的“儒生”谬论，龚自珍指出：“刑乱邦用重典”，自古已然。他希望林则徐不要为“黠滑游说”而“游移万一”，建议林则徐配备“重兵”、“火器”，随时准备打击“实乃巨诈”的英国侵略者的武力威胁，并要求与林则徐同赴广东参加反侵略斗争。林则徐离京时，斗争激烈，未及翻阅这封战斗信件。在去广东的车中，看了这篇《序》，不禁连声赞叹：“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sup>④</sup>事实正是这样，龚自珍后期的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深切”地“关注”风云变幻、急剧转折的政治形势，同卖国投降派作斗争。使龚自珍感到痛惜的是——就如他写诗怀念林则徐时说的，抵抗派“侧立南天未葳（chǎn产）（完成的意思）勋”，鸦片战争失败了，中国从此套上了半殖民地的枷锁。

恩格斯在谈到意大利诗人但丁时说，“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龚自珍，也可以说是标志我国封建社会终结和近代史开端的一个历史人



物。他的思想，反映了新旧社会交替的矛盾和斗争。他在“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诗中，要求打破封建社会“衰世”的沉闷局面，振奋精神，冲决网罗，迎接新时代的到来！由于那时中国资产阶级还未形成，他还提不出新的方案代替垂死的封建制度。他一方面说：“我闻大地狮子吼”，预感到时代要发生转折；一方面又感到前途渺茫：“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他一方面召唤变革的“风雷”，一方面又害怕人民“骄悍”。作为他一生思想、感情的纪录的《己亥杂诗》，其中第三百十五首即最后一首写道：“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就是说，他写完这些诗后，忽然搁了笔，感到无话可说了。他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揭露、批判的任务，但找不到变革社会的新的阶级力量，终于陷入了空虚，并幻想从“天台”宗的《法华经》所阐述的彼岸世界寻求解脱。这说明：作为封建社会末叶的一个法家代表，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他的思想矛盾又说明，他是个承上启下的法家代表，是时代转折的标志。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写了光辉的《介绍一个合作社》，引用了龚自珍的诗。毛主席说：“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战斗洗礼，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工

农兵的理论队伍在茁壮成长,他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向包括历史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迅猛进军!龚自珍写的“眼前二万里风雷,飞出胸中不费才”的诗句,如果借用来形容工农兵风卷残云、势如破竹的英雄气概,倒是很合适的。这种伟大的历史变革,是龚自珍的时代所不可能发生的,也是龚自珍意想不到的。

---

注:① 《龚自珍全集》第九辑《释言四首之一》。

② 《龚自珍全集》第九辑《杂诗》。

③ 《道光朝始末》卷十四。

④ 林则徐:《复札》。

## 编 后 记

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十几名来自工厂、农场的青年工人，参加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举办的历史学习班。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了批林批孔的战斗，并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本《儒法斗争史话》，就是我们这个战斗集体几个月来的学习成果之一。

由于这本书是在四、五个月中仓促写成的，再加上我们都是初次参加史学领域里的战斗，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历史知识更显得缺乏，因此，书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将来进一步修改。

曹思峰 一九七五年二月